

目录

1 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前的教会

- 1.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会
 - 1.1.1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 1.1.2 法国大革命对于教会的迫害
 - 1.1.3 拿破仑与天主教关系
 - 1.1.4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 1.2 天主教在十九世纪前期的复兴
 - 1.2.1 法国的复兴情况
 - 1.2.2 德奥的复兴情况
 - 1.2.3 英国天主教的状况
 - 1.2.4 拉丁美洲天主教情形
 - 1.2.5 葡萄牙天主教情形
 - 1.2.6 法国后来天主教情形
 - 1.2.7 其他国家情形
 - 1.2.8 教皇国的结束
 - 1.2.9 德国教会的具体情形
- 1.3 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蔓延
 - 1.3.1 自由主义的形成
 - 1.3.2 教会内的自由主义
 - 1.3.3 政治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 1.3.4 教宗碧岳九世

2 梵一大公会议至一战

- 2.1 梵蒂冈一次大公会议
- 2.2 现世主义的冲击
- 2.3 教宗良十三世的成就
- 2.4 教宗碧岳十世的成就
- 2.5 教会在十九世纪的内部生活
 - 2.5.1 教会与社会的情形
 - 2.5.2 十九世纪的神职界
 - 2.5.3 十九世纪神哲学的发展
 - 2.5.4 十九世纪的牧灵事业
 - 2.5.5 十九世纪的教育工作
 - 2.5.6 十九世纪的敬礼
 - 2.5.7 十九世纪的宗教艺术
 - 2.5.8 十九世纪的圣人

2.5.9 十九世纪的教友组织

3 一战至梵二大公会议

- 3.1 动荡不安的政治
 - 3.1.1 动荡的政治环境
 - 3.1.2 本笃十五世的贡献
 - 3.1.3 碧岳十一世
 - 3.1.4 教会与法西斯共产党的周旋
 - 3.1.5 和平的教宗碧岳十二世
- 3.2 二十世纪教会的内部生活
- 3.3 基督徒合一运动
- 3.4 十九与二十世纪的传教事业
 - 3.4.1 传教事业的概况
 - 3.4.2 宗座的传教政策
 - 3.4.3 非洲的传教情况
 - 3.4.4 北美洲的传教情形
 - 3.4.5 拉丁美洲的传教情形
 - 3.4.6 太平洋地区的传教情形
 - 3.4.7 亚洲的传教情形
 - 3.4.8 总结
- 3.5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 3.5.1 若望二十三世的序幕
 - 3.5.2 梵二大公会议的开幕
 - 3.5.3 保禄六世的继任
 - 3.5.4 会议的内容概要
 - 3.5.5 大公主义
 - 3.5.6 梵二大公会议的总结

结语

第四部分 现代教会时期

1 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前的教会

1.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会

1.1.1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大事之一。它虽然不直接针对天主教会，然而教会是置身在普世活动的中心，教会必须忍受最强烈的震惊，教会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惨重损失，但是，却使圣教会从一向束缚她的桎梏中，获得了自由。公元 1775 年所选出的教宗碧岳六世，他深为罗马民众所爱戴，他既然是“教皇国”的元首，他的国土占据了整个儿意大利的中部，而且他活力充沛，奋发有为，他的权力也被认为是稳定，而不必有所挂虑，但是万万想不到，对教宗造成威胁，竟然是来自法国。

比教宗碧岳六世早一年登上法国国王宝座的，是法国路易十六世。他本是一位虔诚的教友，一向就拥有圣德。他得以继承王位，百姓们也都感到兴奋，当时的国事固然很紊乱，极待整顿的弊端的确是不少，不过人们都以为能够和平解决。当时的政府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还是相当富裕和繁荣的，只不过是分配不平均。路易十六世在 1789 年五月宣布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包括神职界的高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阶级的代表们，齐集于凡尔赛宫会商解决危机的对策。会议开幕时，还曾举行了宗教的仪式，代表们先游行市区，然后聚集在主教座堂参加大礼弥撒，因为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人民的信仰也很热诚。但是，谁又能料到五年之后，法国的君主专政竟然被废除；国王和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们不是被捕处死，就是逃往国外；教会的财产被充公；神职人员也被搜捕或被迫逃往；阶级大会的许多代表也作了断头台上的牺牲。这是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场面完全失控，甚至一度造成了恐怖统治的可怕情况。何况这样惨烈的暴风雨所引起的波浪，又延续了那么长久的时间，这决不会只是单纯的财政危机而已。那么还有那些更为深远的原因呢？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的社会不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半世纪以来，所谓哲学家们所散布的“自由无神主义”的思想。

首先，来看看法国革命的社会原因，打从封建时代开始，一千多年来，法国的社会逐渐形成了三个阶级，就是神职界的高级教士、贵族和第三阶级的平民。这种阶级的区分与当时的观念是相吻合的，并不显得逆耳刺耳，使得一般平民不满的是，贵族阶级和高级教士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不但拥有国内大部领土，而且还不必缴税。这种特权由来已久，单从神职界本身而言，确实有不平等的现象，法国的高级教士几乎全是贵族出身，使得低级的神职人员，尤其是本堂和副本堂不满的，是他们的微薄待遇和生活困苦的情形，和那些高级神长们，特别是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比起来，他们的生活豪富奢侈，还拥有大笔的教产，真有天壤之别。国王路易十六世和大臣们，多次试图改革国家的这种畸形的财政结构，但是，都因为特殊阶级的盲目固执，始终反对削减他们已经习惯拥有的特权。第三个形成革命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所谓“哲学思想”的影响。特权阶级的固执，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哲学家所宣传的反对思想，更显得不合情理。这些思想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其中尤其是平等的思想，逐渐的赢得了各个阶级的同情，不但是服尔泰和卢骚的中产阶级读者，连农民和工人大受影响，大家对特权阶级已经无法容忍的地步，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再存在的理由，急欲铲除而后快！此外还受到“美国独立运动”成功的鼓舞，使得阶级大会的召开

转变了方向，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阶级大会原本是想要解决财政的困难，但是不久之后，代表便要求改组为“国民会议”，给每一个会员一个投票权，表示他们愿意参加政治，也像美国一样，要为法国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事态很快的就恶化而失控。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民众群起暴动，占领了那个象征专制权力的巴斯底监狱和要塞，“变乱”随后传遍各个重要的行省，一时谣言四起，说是有土匪来侵，外寇已经临近法国国境，于是民众以为大祸临头了，便疯狂的骚乱起来，抢劫、屠杀、放火乱成一片，“国民大会”大为震动，为了平息众怒，突然有一位贵族登高一呼，声音愿意放弃一切特权，这么一来，所有的代表，都如同感染了热症一样，主教和贵族都在一种带有传染性的兴奋中，自动放弃了社会阶级的区别，贵族们放弃了他们的封建特权；神职人员放弃了十分之一的“十一税”，彼此争先恐后的取消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于是各位代表们，一齐集合在凡尔赛宫的大圣堂内，共同咏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在散会之前，通过了《人权宣言》。宣称人民至上，所有国民一律平等、言论自由，对宗教政策也宣布自由宽容。全国所希望的改革，已经实现，封建制度也已经取消，凡是法国公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革命似乎已告结束，然而革命所激起的浪潮仍然继续动荡，还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竟然酿成了对宗教的大骚动。原本，革命的箭头，只是指向政治的改革，并没有任何要反对教会的迹象，神职人员也都大力支持在政治上的改革，革命的情势从此以后，更为恶化，终于成了迫害教会了。《人权宣言》固然宣布了：“人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写在纸上的自由，并不能保证事实上的自由。领导革命的首领们都浸染了反宗教的思想，他们不信“启示和超性”的事理，只相信人类的理智，肉眼看到的实证和经验，否认了“天主有约束人类良心”的至上权威，而代之以人民至上，抛弃了耶稣所说的：“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毁灭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良心自由原则。而事实上呢，却是“革命党”的专横独裁，他们自以为是负责领导人民追求幸福。他们的组织也很坚强，都团结在所谓的俱乐部内，领导者的意见代替了人民的公意，他们发行报纸，散布传单，鼓动选举，往往故意制造暴动以便威胁“国民会议”，这个政权嚣张的顶点，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恐怖统治时代”。当时，恐怖的是“革命法庭”和罗伯斯比的独裁，以断头台来作为政府杀人的工具。这个执政党甚至假借“人民至上”的名义，给法国加上了一个宗教性的政治，违反了大部份人民的意愿。他们首先没收了教会的财产，然后，试图把法国造成裂教的局面，最后，想要消灭一切天主教的信仰。不过这些努力，因为受到神职界和人民的抵抗，终于失败了。因为法国人民，绝大部份是坚贞的天主教徒。

1.1.2 法国大革命对于教会的迫害

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时代。这期间最为严重的是“革命法庭”和“罗伯斯比独裁”，他们经常以断头台作为杀人的利器。这个独裁政府甚至假借“人民至上”的口号，给法国扣上了一个宗教性的政治，先是没收了教会的财产，然后想要在法国制造裂教的局面，最后，想消灭一切天主教。但是，这一切却违反了真正的人民的意愿，因而神职界和人民起而抵抗。下面要进一步说明，教会在这段时间中，所遭受的迫害和所面临的困境。让我先从恐怖政府处心积虑的没收教会财产谈起。

1789年的国民会议中，贵族们放弃了他们封建特权，高级教士们放弃了“十一税”，但是都还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财产。后来，有一个名叫戴来朗的主教，他主张没收神职界的财产。这个提案在1790年公告实行，教会在法国的财产全被拍卖。这么一来反倒便宜了那些以廉价购买教会财产的人，让他们大大的发了一笔横财。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后，严重的影响到，在隐修院苦修的修士和修女们的生活，因此，隐修院纷纷走上关闭的命运。而所谓“哲学家”，更把这些渡苦修生活的修士、修女看作是闲人；更认为他们所宣发的圣愿是违反人权，而严加禁止；还勒令修士、修女们还俗。许多修士们因而放弃了修会的生活，反之，修女们，除了少数的例外，却大都坚持忠于她们的圣召。革命政府完全不顾各修会性质和精神的不同，强迫他们集中在少数几座大建筑物中，混杂在一起，空出来的隐修院全被拍卖掉了。神职界

的财产被没收的这件事，无论如何是不合法的。后来更促成教会与革命党势不两立的，则是所谓的“对神职界立法”。国会代表企图想要改组教会，但是，最低限度理应与教会的元首教宗磋商，何况早在 1516 年，教宗与法国国王方济一世，对在法国的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早有协议，可惜，国民会议的立法委员，他们对教会大都坚持强烈对立的态度，他们原本都是“法兰西主义”者，只顾增强国家的权力，削弱教宗的权力而奋斗，因此，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神职界法案”的内容是些什么呢？

第一，把全国原有的 134 个主教区重行划分，予以归并，减少了 51 个教区。

第二，主教和本堂神父都应该由人民选举，由国家发放生活费。

第三，主教从“首席主教”的手中领受“神权”，而不再是由教宗任命。

第四，主教和本堂神父都应该宣誓效忠这项法令。

这样一来，吾主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圣统便被推翻，教宗对主教，主教对本堂神父都丧失了权力，本堂神父既由选举产生，势必受到选举人的控制，也就是说，本末倒置，把教会来自耶稣基督的“神权”，放在国家政治的权力之下，其结果是，教会竟然成了国家的工具。这项法令，必须经过国王的批准之后才能生效，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世，他一方面看清了，这项法令所包含的危险性，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他拒绝签字，势必给教会导致惨酷的后果。他畏首畏尾无所适从，于是就请示教宗碧岳六世，罗马却在好几个月后，才要求路易十六世不要在文件上签字批准，但是已经是太迟了。路易十六受到威胁压迫早已在 1790 年签字批准了。1791 年的 4 月，教宗宣布，对这项法令的宣誓是违反了教会法，而国民会议对不肯宣誓的神父，施加更大的压力。神职界对这项不义的法令，大都抱持消极抵抗的态度，国民会议对神职界这种无言的反抗非常震怒，就议决在八天之内，所有的主教和本堂神父，都必须宣誓忠守法令，如果有人拒绝宣誓，就会受到革职的处分，倘若仍然继续行使职权，就要以“扰乱社会秩序”论罪，当然这么一来，神职人员再也没有闪避的余地了。

革命政府对有关教会的事件，采取的是这种越俎代庖的拙劣作风，使国家和教会都遭到了极为残酷而悲惨的后果，它扰乱人民的思想，使法国分成两个不能妥协的势力，也因而激起了内战。131 位主教中，签押宣誓的只有 4 到 5 位，其中就有戴来朗，他祝圣了许多位主教，那些被他祝圣的，又转而去祝圣了其他主教，就这样形成了个“裂教”的系统。10 万名神父中，只有三分之一签名宣誓，其他的坚决不肯宣誓，因而也形成了，宣誓的与拒绝宣誓的两个阵营。大致来说，教友都拒绝，去已宣誓的神职人员的手中领各种圣事。几个月以后，拒绝宣誓的神父，他们又再开始行圣事主持弥撒，但是不敢公开在圣堂内，而是在私人的家里。可惜，他们在不久之后，被看成是国家的仇敌，遭到驱逐出境的命运。当路易十六世未能及时签署法令的消息传来，激怒了这批教会的仇敌而一发不可遏止，革命政府首当其冲。1792 年，疯狂的暴民闯入巴黎及其他城市的监狱，把被监禁的一千四百多位囚犯通通给杀了，其中包括了二百多位神父。他们假如肯宣誓，便能保全性命，但是，他们都宁死不屈。到了 1793 年，法国西部的农民群起反抗，要保留那些不肯宣誓的好神父，这些农民虽然被革命军击溃，但是却仍然继续以游击战的方式，不断的反抗，一直到政府承认，他们有权利保留他们所要的神父，并且有自由实践他们的信仰，才停止反抗。而其他地区的革命，便越来越反对宗教，而“无神主义者”带头领着推动，他们的目的很显然不只是压迫天主教，而是想要根绝一切宗教信仰。他们废除教会日历，取消教会的瞻礼主日，为了消灭主日，竟把一星期七天改为十天，接着采取更为严厉的步骤，关闭了一切的教堂，其中有的还甚至被彻底的拆毁，教堂或修院内，所保存的许多在艺术方面的稀世珍宝，也遭到劫掠，圣像被捣毁，祭祀天主用的祭器遭到销毁，这些无价之宝的损失，实在无法用金钱来估计。凡是不肯宣誓遵守法令的神父，不是死，就是流亡，数目多达三、四万人，他们逃到国外去避难，度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有一部份最为坚强勇敢，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教友当中，销声匿迹，置着生命的危险，继续照顾自己的羊群。已经宣了誓的神父们，开始渥蒙优待，但是不久以后

也身陷苦境。因为，在哲学家和无神主义者看来，这些神父也是宗教狂热和反动的支持者，遵守着迷信的敬礼，于是，竟然有人想强迫他们放弃司铎的品位，勒令他们结婚，有的由于懦弱或受到利诱而让步了，其他的则誓死反对，更有以英勇的结局洗刷他们以往的错误。一般百姓，被恐怖统治的暴力折磨得疲惫不堪，到 1795 年时，虽然获得了宗教的自由，不过还不能认为是宗教的全面和平。随着政治的变迁，圣教会还要经历残酷的迫害。在 1797 年，遣配、放逐又重新开始了。许多神父被流放到南美洲的圭亚那，或是受尽折磨，或是被关进肮脏的监狱，大半数都病死在监狱里了。

在法国，有这么一句格言：“采用代用品，是消除某种事物的最好方法。”这是想消灭信仰的人所熟知的，因此他们便幻想，用新型的崇拜来代替原有的天主教。在那几年内，先后出现了六、七种代用品，有所谓“理智的崇拜”。“理智的崇拜”第一次在巴黎出现，竟然是让一位女戏子代表“理智”，坐在那神圣庄严的巴黎圣母大教堂的主教座位上，接受人民的崇拜，这是多大的讽刺啊！主张“自然神论”的罗伯斯比，他提出了“至上实有的崇拜”。以后，又有人提出“自由的崇拜”、“农业的崇拜”等等，为了推行种种的崇拜，他们还特别聘请艺术专家拟定了各种崇拜的礼节，又请诗人特别写了种种歌颂的诗词。这些崇拜虽然有政府做后盾，但是却有如海市蜃楼一样的虚无缥缈，最后则令人产生厌烦，毫无吸引力。不久之后，也就虎头蛇尾消灭于无形了，很显然，这样的幻想，决不可能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教会互争长短的。

哲学家和无神主义的领袖们，为了消灭天主教，真可谓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最后，一切手段都无法达成目的，天主教仍然在法国各城镇的乡村神父们身上。这些神父冒着生命的危险，暗中执行他们的职务，勇敢的负起了善牧的责任，有的藏在森林里，有的隐藏在枯井中，有的在地窖里，还有的，竟是藏在钉着两层夹板的橱柜里。他们想尽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逃避警察的搜捕，有时候装成醉汉，有时候，得挽着妇女的手臂，好能顺利的进到教友们家里行圣事，而大城镇的教会，也一直在暗中继续活动着，神父们有时得假扮成工人，或是乔装成小贩沿街叫卖，甚至要打扮成妇女，以便能够潜入监狱或跟着载运囚犯去刑场的囚车，好能给他们偷偷的举行临终圣事，给他们念最后的赦罪经。至于在大革命期间，究竟有多少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做了牺牲呢？这简直是太困难去计算得正确，就连历史学家的估计也有相当大的出入。有的说是五千，而一般教友的人数就更难估计了，有姓名可考、有事迹可叙述的为数已很惊人，至于那些无姓名可考的无名英雄，就只有天主知道有多少了。

这里只引证两个例子作为榜样，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名叫比诺的神父，他正穿好祭披要开始举行弥撒时，被革命党人捉到，法官判他死刑，还命令他穿着祭披走上断头台，比诺神父丝毫不害怕，从容的唱着圣咏“我要到天主的祭台前去”，走上了断头台，使得在扬的人大为感动。第二个例子，是在康白尼的 16 位圣衣会的修女，因为她们在隐修院查封以后，还想尽办法过着集体的修道生活，终于全被逮捕，法官控告她们的罪名是“宗教狂热”，其中一位胆子比较大的修女问法官，什么是“宗教狂热”的意思？法官回答说：“我认为是指你们的信仰太幼稚，你们的宗教行为太愚昧可笑了！”这位修女于是向其他的修女大声的说：“姊妹们啊！你们都听到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信仰而被判处死刑，为我们的天主而死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修女在断头台前重新宣发圣愿，一齐高唱着“吾齐赞颂吾主”和“祈求圣神降临”的圣歌，慷慨的奔赴天国，这样的场面多么神圣而庄严！这些殉道者的鲜血支持了人民的信仰，在看来已死的灰烬下面，仍然埋藏着信德的火种，一旦信仰恢复自由的时候，灰烬下面的火种也将重新燃烧起来，放出光明。而那些流亡到国外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情形又如何呢？这些流亡到国外的人数约在三万到四万人，有的是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自动流亡的，他们都在其他国家找到了避难所，像瑞士、荷兰、比利时，尤其是英国，对这些神父相当欢迎，也都乐意收容他们，当时英国的首相威廉皮特曾说：“谁也忘不了那些可尊敬的神父们的不幸遭遇，和他们长期而痛苦的忍耐，他们的生活规律，热心和礼让，深深得

到大家的尊敬和同情，为英国天主教的解放运动，和十九世纪天主教在英国的复兴铺好了路。”而放逐到南美圭亚那的神父们，有一部份转入美国，结合了法国的移民，对当地的天主教发生了主要的影响。

法国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下，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了，许许多多的修士、修女被迫还俗，许多修道院也被迫拍卖而遭到关闭，还对神职界立法，命令神职界宣誓效忠于这页法令，主要的目的是要铲除法国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天主教。为了铲除天主教，制造了许多新型的崇拜，为是要替代天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无数的教友失去了信仰的自由，残存的宗教生活，也全都转入地下，暗中活动。在这样恶劣的氛围下，难以估计的神父、修士、修女以及许多热心的、信心坚定的教友，为信仰丧生在断头台上，成为殉道英雄。这些殉道者鲜血浇灌了天主的田地，因而能够在下一个世纪，成为教会复兴发展的力量；而逃亡国外的神父修士们，在瑞士、在荷兰、在英国、在南北美洲大陆，为传扬天主教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在法国以外，其他欧洲各国，在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之下当地的教会情形。

欧洲的其他各国唯恐法国革命蔓延开来，而影响到自己的国家，于是组成联合军，在1792年攻入法国，而法国的革命军在爱国的“法兰西主义”的推动下，从事反攻，而且占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荷兰。这么一来，法国革命的思想 and 迫害神职及教会的法令，也随着法国的革命军，蔓延到所占领的地方，当时的情势，尤其是在罗马非常的严重。在公元1796年的时候，教宗的国境，也遭到了革命军的侵入，教宗碧岳六世被迫签订了“陶兰第诺条约”，割让了一部份教皇国的领土。接着第二年，在一次发生在罗马的暴动中，有一位法国的将军不幸遇害，法国政府就利用这个机会当接口，宣布教宗碧岳六世从此丧失他治理“教皇国”的特权，罗马应该改属“罗马共和国”，于是就逮捕教宗，把他监禁在意大利北部的锡也纳，然后再把教宗掳往法国。教宗一到法国，却令那批监守的人大为吃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已经被俘的教宗，在他的教民面前，仍然保持着他的威望，凡是教宗的囚车经过的地方，民众都赶来，在教宗面前跪地请求教宗的降福，但是这位八十二岁高龄饱经风霜的老教宗，心灵的幽暗和悲伤，再加上旅途的困顿，使他终于在心力交瘁之下，在1799年的八月翻越阿尔卑斯山后，死于瓦兰斯，在他临终之前宣布宽恕他的仇敌，为他们行了特别的祈祷。当教宗去逝的消息传到法国政府当局时，负责报告消息的官员说：“这是教会的最后一位教宗，从此天主教也就寿终正寝了。”

接下来，便介绍一下教宗碧岳六世去逝以后的教会情形。就人的眼光来看，这位法国政府的官员所说的不无道理，这样的预言也可以实现，说实在的，教会自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危险的情形，以“教会长女”自居的法国，已经是疮痍满目，政府已沦落成为无信仰，神职界死的死，散的散，而宗教教育已经彻底改组。人民呢？则是在恐怖和不安定中生活着。法国的邻邦意大利，被革命粉碎，教宗的国土以及比利时，都被兼并划入了法国的版图。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也被新教的普鲁士、东正教的俄罗斯、天主教的奥地利瓜分，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政权，也落入与教会为敌的人手里，德国呢，早已被所谓的开明专制的无信仰所污染，至于英国、荷兰的天主教会也正受着迫害，遥远的传教区，也因此得不到生力军的补充，亚洲的天主教也正遭到迫害，好像一切都坍塌了。

1.1.3 拿破仑与天主教关系

教宗碧岳六世去逝以后，教宗选举大会在威尼斯举行，经过了三个月的坚苦和奋斗，选出了一位最谦恭有礼的教宗碧岳七世。他原本是本笃会会士，以温良和不失劳倦的爱德知名。但是，当教会的利益面临危险时，教宗碧岳七世却能坚强不屈。当教宗从威尼斯抵达罗马后，法国的执政者拿破仑便照会教廷，希望能与教廷成立协议，恢复和平。拿破仑他计划使法国的天主教复兴，这并不是他热爱教会。他虽然生长在天主教家庭，但是从他青年时代，就已经受到了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不相信耶稣的天主性，不过还没有堕落到否认神的程度。对

拿破仑而言，不是他的信仰在领导他的宗教生活和政治决策，而是现实主义的人生观，使他深知，宗教在一般人民生活中的份量所占的重要性，但是经验告诉他，天主教绝对不如哲学家所预言的“即将寿终正寝”，事实却正好相反，天主教却正生气勃勃，所以他有意和教宗妥协。他说：“我的政治是治理人民，要照大多数人的志愿，我在埃及能立足，是因为我成了回教徒，假如我要治理犹太人，我就要重建撒罗满的圣殿。”他这种唯利是图的想法，蕴藏了后来冲突悲剧的种子。拿破仑和新任教宗碧岳七世的政教协议，在财产方面的问题，教宗可能和解，不过，一旦牵涉到教会独立自主的问题时，教宗所表现的是坚强不屈，谈判延长了一年之久，双方几乎濒于破裂，幸赖教廷国务卿擅长外交，才终于达成了协议。于1801年7月在巴黎签字，教宗虽然作了不少的让步，但也不失为一大成就。天主教得以复兴，教会组织的分裂也一扫而空，法国重新获得了天主教的统一和宗教的平安。十八世纪末的教会又重新振作起来，教宗的声望又抬起头来，但是，在公布协议时，拿破仑竟然加添了一个所谓“根本条文”，使“法兰西主义”又死灰复燃。它限制了教宗在法国行使教宗的教权，碧岳七世提出严正抗议，其他的欧洲各国也纷纷和教宗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此后的数年内，拿破仑一帆风顺、节节胜利，就在1804年称帝为皇，于是趾高气扬，想要效法古代的查理曼大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先例，请教宗为他加冕。教廷的枢机们反对教宗到巴黎去为拿破仑加冕，教宗也为此踌躇不前，毕竟这是一千八百年来破天荒、前所未有的事啊！必竟查理曼还亲自到罗马，跪伏在教宗的足下接受加冕的呀！难道这位拿破仑，自以为比查理曼更为强大？竟敢命令教宗到巴黎吗？最后教宗为了教会和信友们的益处，接受了他的要求。1804年的12月2日，拿破仑为自己隆重的举行了加冕典礼。但在典礼中，拿破仑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礼节等待教宗为他加冕，他竟然自己从祭台上把皇冠拿过来放在自己的头上，他这种傲慢而有伤教宗尊严的举动，教宗在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只好容忍下来，同时这样的举动，也预示了教宗和皇帝之间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了。至于法国人民，对教宗热烈的欢迎，使教宗颇感欣慰，凡是教宗所经过的地方，民众们夹道欢迎，虔诚的接受教宗的降福，教宗回到罗马后，曾向人述说：“我们是在民众的跪迎中行经法国的”。

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野心更加暴露，陶醉在一时的胜利中。加冕以后的第二年，教宗与拿破仑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因为教宗义正言辞的拒绝了，拿破仑为他的弟弟的婚姻问题所作的要求。而拿破仑呢，一直想要以“查理曼大帝”自居，便想把整个意大利囊括在自己帝国的版图内，既使连教宗的领土也不例外。他本来想让教宗留居罗马，但是教宗必须得乖乖的执行他的计划才成，而这时候，拿破仑正同英国从事一次决定性的战争，他既然不能在海上得胜，他就决心命令，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对英国采取经济封锁，想用饥饿来使英国投降，于是就禁止一切船只进入英国的海港，与英国通商贸易，于是他警告教宗，也应听命于他，所以，他封锁教皇国领土的港口，不准英国的船只进入，他说：“教宗固然是罗马的元首，我也是皇帝，我的一切敌人也应该是您的。”教宗却反驳他说：“神圣而又世界性的教会领袖，不能介入彼此敌对的各国所从事的世俗性的战争中，因为一切的国家都是他的子女。”拿破仑恼羞成怒，于是就在1808年，用武力占领了“教皇国”的土地作为报复。第二年决心把“教皇国”并入法国的版图内。教宗对这种侵犯自己权利的暴力能作什么呢？如果碧岳七世只是一位世俗国家的君王，或者可能如同其他的国王一样，忍受这个强横者的法令，而对于这位自认为所向无敌的拿破仑的要求暂时低头，连在教廷的枢机也建议教宗暂时屈服，他们认为，既然像奥地利、普鲁士那么强大的君王都让了步，教宗又何必那么傻，独自一人和拿破仑单打独斗，一意固执地跟拿破仑作对呢？但是，教宗却决心不让步，教会的元首怎么可以同意去听命于一个，妨碍他自由行使神权的霸君呢？说什么教宗都不肯屈服，他说：“我的前任碧岳六世，他平时暴躁如同一头狮子，死的时候却像一只绵羊，我虽然为人处事如同一只绵羊，但是却知道自卫，我愿像头狮子般的死去。”教宗既然没有武力对付这样强悍的敌人，就只有以精神的武器来对付。他对掠夺者或他的同路人，发出了一道“开除教籍”的

通谕，虽然拿破仑所派驻罗马的军队戒备森严，但是勇敢的教宗仍然派人冒险把“通谕”贴满了罗马各地的墙上。这位不以武力为后盾的老人家，竟敢不把使整个欧洲感到战栗的强有力的征服者放在眼里，拿破仑更加恼羞成怒疯狂的喊说：“他以为开除教籍就能使我的士兵们拿不住武器吗？”于是下令俘虏教宗，把教宗带往沙渥纳。拿破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把教宗暂时拘留在沙渥纳，让他独自反省一下，然后再把他正式安置在巴黎，因为他打算让教宗长住在帝国的首都。拿破仑把法国的枢机和各修会的会长们召集到巴黎，又把巴黎总主教的公署大加装修，要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梵蒂冈。他梦想要统治整个奉教世界，就如同他统治世俗世界一样，正如他所自称为“教会的太上皇”。拿破仑以为教宗既然被他俘虏，已经与世隔离，又不能同他的枢机和教廷接近，势必得让步，而放弃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会神权，教宗就这样从 1809 到 1812 年被拘留在沙渥纳有三年之久。然后拿破仑又把教宗带往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又被拘留了两年。可敬的教宗碧岳七世始终不肯屈服，他用以自卫的唯一方法，便是向众人声明，他在失掉自由和参谋团的情势下，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教宗碧岳七世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被拿破仑这样长期的拘留，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呢？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教会，主要的是法国以外的革命，其次是有关教宗碧岳六世逝世，然后是拿破仑与教宗碧岳七世之间的拉锯战，充满野心的拿破仑根本不在乎教宗把他开除教籍，甚至将教宗迁往沙渥那拘禁了三年，最后，又把教宗移往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又被拘留了两年，教宗始终都没有屈服。手无寸铁而且又完全与世隔离的教宗，他到底靠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使他始终不肯屈服于这位盖世英雄拿破仑的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信仰和祈祷；此外，他老人家用以自卫的唯一方法，便是对所有人的宣布，他在失掉自由和参谋团，也就是教廷的枢机们的情形之下，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在这先后五年的长期拘留，到底后来的结局如何？

我们知道，在当时有许多宗教问题，非得由教宗出面解决不可。比方说，当一位主教出缺时，教宗碧岳七世拒绝赋给，皇帝所特派的继承人合法的承认，这是 1801 年所签订的协议中明文规定的。教宗碧岳七世对加给他的一切压力，只是温和的，但却是坚满的拒绝而已，这样的态度，最后终于恼怒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呢，他又非常不愿意因为制造法国境内的宗教问题，而可能引发再一次的革命，所以他就召集了在巴黎的主教们，以主教会议的力量来同教宗对抗，但是，仍然是枉费心机，毫无效力。拿破仑决心取得教宗的认可，企图作最后的斗争，于是拿破仑就亲自到枫丹白露宫去觐见教宗，经过五天的争辩，以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更番兼施，可怜他老人家，由于长期的拘留和拿破仑连续五天的疲劳争辩，心力交瘁，终于被迫签署放弃了他那唯一的武器，牺牲了建立主教的权力。在这五年的斗争中，拿破仑算是得到了胜利吗？没有，第二天，教宗碧岳七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己承认他的失职，他给拿破仑送去一封他的亲笔信函，声明他是在暴力威胁下所作的一切完全无效。拿破仑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的命运急转直下，在辉煌的军事胜利之后，继续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失利，于是就在 1814 年决心放回他的俘虏，教宗碧岳七世终于凯旋返回罗马。而这时候的拿破仑已不再是皇帝，因为他在枫丹白露拘禁教宗的同一地点，签署了他的退位诏书，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权力，一是武力，一是精神，久而久之，武力终会被精神所战胜”拿破仑却在不知不觉之间，预言了他威胁教宗权位争斗的结局，教宗碧岳七世终于以精神战胜了拿破仑的武力。教宗碧岳七世，以德报怨，当英国人将拿破仑流徙到圣赫勒那岛时，教宗以慈爱的心情收留了，在罗马的拿破仑的母亲和他的其他家人，并且还请求英国人，要善意对待他们的俘虏拿破仑。

1.1.4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革命的武力和拿破仑把这句口号传遍了欧洲，这些观念，如果追根究底的来说，本来都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当初就已经宣布，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而且也都是天主的子女，圣保禄也说，在

天主教内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的分别，也没有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初期教会不也曾经是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最大的推动吗？而这些观念，在革命的大动乱中，却以暴乱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人竟然以这些原本是教会的，如今已经被他们变了质的原则为名，转过头来攻击教会，甚至想把天主教完全消灭掉，虽然最后证明是枉费心机。但是，教会在这场大动乱中，也遭受到不少的损失。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意大利的北部，丧失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财产和超然的地位，甚至拖垮了行政，因为财源被没收变卖了，又如何能维持为数可观的修道院、学校以及慈悲善事业的费用呢？最严重的是神职人员的锐减，修道院的修士也都逃散一空，本堂区的神父青黄不济，大感后继无人，而损失最为严重的是修会神父，尤其是苦修会的修士。举个例子像本笃会，在革命之前有 1500 座修院，革命之后，剩下不到 30 座；道明会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消散了；专门在圣堂举行隆重敬礼的会士也绝迹了。这对教友们的宗教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十九世纪的教友们，只能靠个人所行的神业来培养自己的热忱，而不能再靠神圣的礼仪了，教会团体的意识感也大为减低了。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也不小，教会所创办的大学，在大动乱中都不得不关闭了，而当革命的大动乱平静以后，已经改由政府控制管理了，这些大学不再注重领导教友精神生活的神学，而只求人文的知识而已，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不再提倡高等的宗教教育了。

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会固然是穷了，但也洗刷干净了，大革命对教会所施的迫害，竟在神职界中，完成了一项净化的工作。神职界当中的良与莠，立即分明，主教已经不再是世俗政权中的公卿首长，也再不会有那种，为了度阔绰生活而做神职人员的了，使神职人员，对一心献身于神圣使命的动机得以净化。教宗碧岳七世的英豪作风，虽然在世俗的眼光中，使他作了欧洲的霸主的牺牲品，但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却成为战胜者，教宗的声望也大为提高，教会以再接再厉的精神，不但恢复了它的力量，而且在新的传教区域，基督的神国比以往更为强大了。

1.2 天主教在十九世纪前期的复兴

1.2.1 法国的复兴情况

受革命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和德国，其次是大不列颠。首先，是法国的教会在 19 世纪前期复兴的情形。法国是在拿破仑取得执政权，而在 1801 年和教廷签订协议之后，教会便逐渐恢复了和平，教会也因而开始复兴。早在革命爆发以前，法国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革命的影子，这是 18 世纪的所谓“哲学派”和“百科全书派”，这两派所宣传的“唯理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后果。假如不先改变人的思想，教会也就不能有深刻的复兴。这种改变思想的工作，有赖于许多天才的作家，他们把 18 世纪的作家所剥夺和诬蔑的教会声望，又重新恢复起来。

这个时期最早的一位作家是“夏多布利昂”。在政教协议公布时，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基督宗教的天才》，内容脍炙人口，立刻洛阳纸贵。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宗教在人文和艺术方面，是最富有诗意、最人道、最爱护自由的，近代世界的一切都沐浴在它的恩泽下，由农业以至形而上学；由救济贫老孤苦的养老院、孤儿院；以至米开兰基罗所建，拉斐尔所装璜的大教堂。没有什么能比它的道德更神圣、更可爱的；也没有比它的信条，教义和敬礼更庄严的；它能促进天才，澄清兴趣，发展修身养性的情绪，加强思想的强度。夏多布利昂的这本书，并非纯粹护教的著作，教友们之所以信服它，是因为它说了真情实话。夏多布利昂本人不是神学家，他也没有意思要辩证，他只是愿意指出，天主教是优美而富丽的；天主教常是卫护文化和艺术。他以令人心醉神驰的文笔，描述教会的可爱，这本书的出版，也奇妙地达到了他所期望的目的，从此以后，具有文学修养的人，

不但不再攻击宗教，反而成了它的卫护者，宗教也不再像服尔泰的时候，那样的成为嘲笑讥讽的对象，反而成了惊奇欣羡的目标。夏多布利昂这位浪漫派文学运动的前驱，启发了 19 世纪的大部份作家。浪漫派的特征，是想象和情感胜过理论，颂扬人对宗教的向往，羡慕中世纪的天主教风味，使人心更接近天主教。不过他把信仰特别建筑在情感上，则是一个危机，这也是给宗教的“主观主义”开了路。无论如何，夏多布利昂对 19 世纪的宗教情趣贡献极大。第二位要介绍的是德麦斯特，他以卓越的文笔致力辟斥 18 世纪的“唯理主义”，他恢复了原罪的概念、救赎的重要，并且证明了在历史的过程中，隐藏着对天主的照顾。在他那本名为《论教宗》的著作中，证明一个在国家元首之上的神权，实在是人民自由和利益的保障，那就是教会和教宗的权力，这本书的影响力一直持久不衰。第三位要介绍的是拉莫乃。前面两位作家都是教友，拉莫乃则是一位神父，富有拯救人灵的心火。拉莫乃的第一本著作名叫“论对宗教的冷漠”，这是一本富有感情，充满诗意的作品，感动了所有读者，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新的教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激烈的攻斥 18 世纪的“自然神教”。提到人生唯一的大事“拯救灵魂”，谁也不能比他更使人心震惊的人了。这本书出版后，引起读者们的喜爱，立刻翻译成好几国的文字，对教会和教友们的贡献很大。第四位则是一位名叫拉高尔代的教会演说家，他是拉莫乃最为得意的门生。1835 年巴黎总主教，委任他为总主教座堂圣母大教堂的讲道神父。他在封斋期内讲了一连串的护教道理，有非常好的成效，这不仅因为拉高尔代具有非凡的口才，更是因为他最能符合当代人的希望，所以，他被视为 19 世纪最伟大的教会演说家。在巴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赶去听他的演讲，听众当中有一位曾这样作证说：“我们好像列席参加现代社会的宗教复苏。”巴黎圣母大教堂封斋期演讲的创兴裨益很大，一直到今天都仍然盛行不衰。教宗碧岳七世和拿破仑政府的协议，虽然因为保证了，教会的自由和宗教文艺的再生，为教会带来了有利的气氛，但是为使大批的民众恢复信德，仍然是不足。因为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众对宗教的道理多已经生疏了，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宗教的行动了，为了使民众大批的重回天主教的怀抱，使他们重新进堂参加礼仪，于是便有神父发动了布道大会。他们在圣堂中演讲，一连两三个星期，甚至长到四、五个星期，当圣堂不能容纳大批的民众时，便移到圣堂外面，露天演讲布道大会结束时，常可以看到上千上万的人前去领圣体，好多的公共场所都竖起了大型的十字架，成为信仰已经恢复的证明。这时候教友的传教运动也是值得注意的，也是现代公教进行会的前奏，许多教友经常参加当时的一切宗教活动，自动创办各种慈善事业，这种风气很快的便传遍了全欧洲。

1.2.2 德奥的复兴情况

德国、奥国这两个日耳曼语系的天主教教友们的生活，因为受到了“唯理主义”和“若瑟主义”的影响，患了贫血症，但是在 19 世纪的初期便重新振作起来。圣格肋孟·郝夫包尔，他在维也纳对穷人和贵族一样具有吸引力，由于他的善表和言论争取了许多人的归化。至于教友们在心灵上的复兴，则以德国最为显著，而且创导这一类复兴运动的人，并不是教区的领导人主教，而是来自一般普的教友。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复兴运动是来自新归化的教友，他们组织了许多团体，把作家、诗人、艺术家等团结在一起，共同讨论教会的需要，于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著作，便相继的出版问世。在这里，我只能提出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向您作说明。第一位是赛来，他生于 1751 年，死于 1832 年。他以他的著作和人格的高尚优美，深深的影响了当代的人，而且引领了许多新教徒重返天主教的怀抱。他的著作很多，特别是关于祈祷和默想的书，道理纯正而且又富有热情，文笔更是简洁而流畅，人人都能够看得懂。

第二位是格来斯，他生于 1776 年，死于 1848 年，他对天主教的神秘学非常有研究。第三位是莫来，他生于 1796 年，死于 1838 年，虽然年纪轻轻，却是德国当代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的历史著作，虽然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标出了很严格的界限，但是却并没有引起任何伤感情的争辩，因此引起了一个反正的运动，对天主教的立场给予新的威望。最后

一位是德林格，他生于 1799 年，死于 1890 年，特别从事于研究，教会的古代历史和宗教改革的起源。这些思想家影响了德、奥两国的教友，在心灵上的再生，加强了教友们对教会的忠诚，吸引了许多基督教徒，反正归回到天主教，而且他们的思想影响所及，包括整个儿的欧洲。我们都知道，德国人的另外一个民族性特色，就是擅长于组织的精神。在教友的生活中也非常显著，尤其是在 19 世纪的后期，目标正确的各种善会越来越多，有的是纯宗教或慈善性的，其他则是社会性的，有的组织农民，有的则把学徒或工人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有意，要把信仰的意识和习俗，灌输在他们日常的教友生活中，并且想要解决当时的大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他们对一般工人及女工、童工的法律特别的关心，积极的参与了，政府所举行的公民投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而且还从 1848 年开始，发起了一个名为“天主教日”的盛大集会，每年都集合天主教各种善会的代表于一堂，共同开会，讨论有关教会生活的现实问题。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人之一，就是梅因斯教区的主教凯特来，他是天主教会内，以在神学上的基础和教会的立场，来研究社会问题最早的路人。德国的天主教教，虽然在德国只占少数，但是因为他们的活力和共同团结合作的精神，到 19 世纪的末叶，竟然成了一般社会和政治的力量，足以抵抗迫害。

1.2.3 英国天主教的状况

接下来，我要介绍天主教在大不列颠群岛上的复兴。我先把大不列颠群岛上，在 19 世纪之初的天主教情形，作个简单的描述。在大不列颠群岛上，英国国教的改革，使得天主教信友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被视为次等国民，被排除于政治和军事之外，连他们的子女也丧失了进入大学深造，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宗教改革以来，经过两个世纪的迫害，只剩下十万人左右，还有少数几家贵族信奉天主教，但是在国内已经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教区主教，只有几位宗座代牧。纽曼枢机曾经为他年轻时，所认识的英国天主教作过一番描述，他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天主教团体了，只有一小撮信奉旧教的人，沉默而悲哀，好像只能纪念以前有过那么一回事罢了，所谓的罗马天主教，已经算不了一个宗派，只是数得过来的一小撮人而已，就好像大洪水过后剩下的几块碎石瓦片。”这边有一伙儿爱尔兰的贫苦工人，在收获期或在首都伦敦的陋巷中，寻觅一些临时工作，那边有一位老人，踽踽街头，态度虽然高贵，但是显得低沉，孤独而又古怪，有人说，这老人出身贵族而且是罗马天主教徒。英国的天主教徒只能在偏僻的地方，陋巷中或乡间才遇得到，是与大众隔绝的，只能在暗影中才看得见，他们在傲慢的英国国教地主面前，只是东闪西躲而已。当时尚属于英国的爱尔兰，虽然大多数的国民都是天主教徒，仍然被看成是低级国民。英国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真的是把他们当作是奴隶，他们虽然贫穷，仍然应该担负神职人员所需要的费用，对英国国教的牧师也得缴十一税，对国教的主人，还需缴纳更重的年税。

到 19 世纪时，天主教信友们，所期待的解放和信仰自由，是来自爱尔兰的奥考乃尔。他生于 1775 年，死于 1847 年。在奥考乃尔的带领下，教友们奋斗挣扎了三十年，才获得成功。奥考乃尔是一位令人心醉神驰的演说家，用他那雄辩的口才唤起教友们，展开了惊人的活动。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在不流血、不犯法的原则下，利用一切合法的方法，像是开会啦！请愿啦！抗议啦！这一类的方法，向英国人施加压力，为了扩大活动，他组织了“天主教协会”，把爱尔兰的信友们联合起来，政府对这个全国沸腾的运动，已经到了不能坐视不顾的。奥考乃尔为了摧毁议会的抵制，决心采取一种大胆的措施，他虽然知道自己身为天主教信友，在议会就职时不能宣誓，但是他仍然去竞选，并且还击败了他的政敌，他既然祝选成功，便不顾议会的规定去出席。而议会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让步，皮尔首相便让《解放法案》，在 1829 年正式通过，赋给了天主教信友，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并且可以担任国家的一切职务，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不流血的胜利，而且效果相当的好。奥考乃尔不但拯救了爱尔兰的教友，连同英格兰以及大不列颠所有的殖民地上的天主教教友，都获得了解放，得到了相同的权利。天主教友虽然获得了解放，摆脱了桎梏，但是，

教会所遭到的痉挛和麻痹却依然存在，因为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镇压和迫害，已经非常的胆怯。一直要到纽曼，和被他精神感召的一群知识分子起而奋斗，才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反正回归天主教的运动，发生在原本由天主教所创办，但在宗教改革以后落入英国国教手中的牛津大学，因此在历史上就称这个归正的运动为“牛津运动”。

19 世纪初，英国国教中一群年青而有思想、有抱负的牧师，对他们教会的缺乏活力，和政府对教会事务的横加干涉，感到相当的痛心。他们认为英国国教，除非摆脱扰乱它的一切恶劣影响，而恢复它原始的纯洁，便无法复兴，他们就本着这个信念，去研究最初教会的历史和教父们的作品。他们还为了宣传这样的观点，而公布了一连串的论文，就在论文中陈述了他们研究的结果。在这群青年牧师当中，最为杰出的是普西和纽曼。普西生于 1800 年，死于 1882 年，他是一位学识丰富而且深具虔诚的神学家。纽曼只比普西小一岁，又比普西多活了 8 年，他死于 1892 年，他是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加入了修会，然后当了大学圣堂的主任牧师。他在教堂所讲的道理，有了卓越的成绩，得到国教派教友热烈的拥戴。但是不久之后，有人提出怀疑，认为这群年青的牧师们在袒护罗马教会，并且控告他们是教宗派。不过，在当时这批牧师，并没有转向罗马的企图，而且普西一直到死是忠于英国国教的信徒。至于纽曼呢，则是因为他从小就相信，教宗是达尼尔先知和圣若望宗徒，在《默示录》中所预言的假基督，所以，他就想在路德·卡尔文所倡导的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找出一个中道。一方面同天主教共同保存着教父们的传统；一方面他放弃，他认为是天主教擅自改变的一切信条。可是，当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加的看出来，他所能找出的中道是行不通的事，因此他也就越加怀疑，他所生而信仰的英国国教，是否来自宗徒们所传下来的真正的教会。这种无所适从的情形延长了 4 年之久，陷入极大的痛苦中，于是他辞去了主任牧师的职务，隐身到僻静的地方，专心的祈祷，并且认真的从事研究。他这样下苦功的研究，结果终于让他看清了，只有罗马天主教，才是真正保存宗徒传统的教会。不过还有一个最后的困难，一直在他的心里徘徊不去，那就是，他认为罗马天主教，在信条上所作的改窜，已经不符合耶稣最初的门徒的教训。好在，不久以后，他就看到了光明，罗马的教会在原始的信经上所加的，原来只是教会对“寄托物”所作的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发展，就好像人的身体，虽然会随着年龄，在各方面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仍然是同一个他，是他原来的身体。这时候的“纽曼”，既然心中所有的疑惑都已豁然开朗，就在 1845 年 10 月，毅然决然放弃了英国国教，归正成为天主教徒，1846 年在罗马领受了司铎的品位。纽曼对改教的认真，他那学识上的声望，以及他对青年的影响力，在在都为罗马天主教造成非常特殊的反应，连同他的门徒、知识份子、神学家及教授们，有好几百人跟随了他，这些反正的人群中，最著名的是法倍尔神父，此外，还有马宁。

天主教在英国又重新获得了，它丧失已久的声望，可以说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大的胜利。天主教会从此就更加不停的，继续在英国发展成长。1850 年，教宗碧岳九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在英国重新建立了教会的圣统制，并且任命韦斯曼担任西敏寺的总主教，不久他就升任为枢机。韦斯曼是一位非常有份量的演说家和作家，他也是天主教方面支持“牛津运动”的代表，以他的明智和练达，使得许多重新回到天主教怀抱的人，更容易同天主教的团体融洽的相处。纽曼晋升神父之后，他按照圣斐理伯·耐里的方式，在英国建立“祈祷会”，继续他演讲和写作的生涯，1879 年教宗良十三世升任他为枢机。

1.2.4 拉丁美洲天主教情形

19 世纪，天主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发展的情形。当 1776 年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宣告独立时，天主教在美国，只不过是一棵嫩弱的小树而已，信友的总数还不到两万人，神职人员也只有二十几位，美国的宪法是不过问宗教信仰的，只注重个人权利的平等，因此，对于占总人口比例极小的天主教教友有益。然而，各地民众的态度和宪法不尽相同。19 世纪前半期，美国教友常抱怨他们的权利被剥夺，甚至也遭遇到暴力侵犯，同样的，最初的美国教友都很

贫困。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的天主教会是依靠欧洲的支助而生存，不但从欧洲获得所需的司铎，也从欧洲获得财物上的支持，虽然天主教教友的人数，还不到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他们逐渐得到社会与国家高度的重视。

有一位名叫卡洛尔的神父，他既精于政治，又善于管理，他给了天主教一个决定性的鼓励。卡洛尔神父在 1735 年出生于美国，在欧洲进了耶稣会。耶稣会被教宗解散后，他回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卡洛尔受到华盛顿的信任，他就善于利用这种影响力，提出了对美国宪法的修正案。在美国的宪法中，加上了一条保证人民的信仰自由，天主教本身也充份的利用这个便利。在 1789 年，天主教的发展已经大有进展，教宗碧岳六世就任命卡洛尔为美国的第一位主教，也是巴尔弟摩教区的第一任主教，美国的圣统制从此建立起来了。教会进展的一个困难就是神父太少，很幸运的是，正当这时候，从法国来了不少被革命军驱逐的神父，他们加入了在美国传教的行列，他们当中有不少才德兼优的神父，他们的英语虽然不很娴熟，但是，他们都能热心传教，而且成效显著，其中六位升了主教。为了开办修道院，卡洛尔主教从法国请了苏尔比斯会的会士，于 1790 年在巴尔弟摩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会士们热心传教，使得神职人员和教友的人数逐渐增加，教会的进展从此一日千里。到 1791 年时，开创了两座重要的高等学府。1808 年，巴尔弟摩教区晋升为总主教区，又增加了 4 个教区，这些全部都直属宗座，不受政府的干扰，教宗也给了主教们许多自主权，主教的人数也逐渐增加，他们都是杰出、忠诚富有机智的人物。在 19 世纪中，新的主教区、学校、修道院、慈善事业等教会机构，有如雨后春笋般的繁盛着，这种繁盛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基督教徒的归正，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还有天主教友本身的自然繁殖，最多还是欧洲的移民。从 1790 年开始，或是逃避迫害，或是逃避天灾的爱尔兰人，纷纷来到美国寻求避难所，其中最明显的是在 1847 年爱尔兰本土马铃薯横遭天灾，大量欠收，但这是爱尔兰人主要的食粮，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因此将近百万的爱尔兰人逃到了美国，从 1830 到 1860 年之间，进入美国的爱尔兰人多达 250 万。在这之后，德国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也都接踵而至，从事教育或献身于慈善事业的男女修会团体，也随着移民潮进入美国，天主教的生活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对美国人而言，“信教自由”虽然已经明文载入宪法内，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主教就不再遭到反对了。不要忘记这个新共和，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英国移民的子孙，眼看着美国东部的城镇，已经被爱尔兰的天主教信友所淹没，情绪上感到极度的不满。因此到了 19 世纪的中叶，被几个秘密社会所激起的骚动，在“美国归美国人”的口号下，很快的展开，于是导致了暴动。许多的修院和圣堂，竟然遭到公开的焚毁和抢劫，好在这种越轨的暴动很快的失去势力，终于恢复了和平。多数的美国天主教信友都来自移民，他们离开祖国来找工作，这可说 19 世纪，美国天主教的一个特征。他们大都集中在东部的城镇和海口，大都属于中下阶级，知识水平不高，正和欧洲的情形相反，在欧洲的天主教信仰，农民比工人保存得更为完整，而美国的天主教信友却大半为城市的居民。

在 19 世纪前期的数十年中，美国主教面临重重困难，而美国的疆土又不断的向西拓展，司铎人数不够，而在已有的司铎中，有些已不能工作了，而其他大部份又都是被祖国驱逐的法国籍的神父，其中有些升了主教，有些神父因为不精通英语，所以他们不被那些英国和爱尔兰籍的教友们欢迎，他们感觉到美国的天主教会，好像有被看成是外国教会的危机。而在 1850 年代，美国的教会又被蒙上了爱尔兰的色彩，直到 20 世纪，情形仍然如此；另外一个更大的困难是，参与本堂区和教区行政的教友们，很多都具有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的精神引发了许多困难，因而产生了几小型的分裂，经由几位主教的努力，才算化险为夷。从 1840 年起，爱尔兰与日耳曼的移民，使天主教人数突然大量的增加，美国的疆域也从大西洋岸发展到太平洋岸。过去墨西哥土地的改善与重建的工作又很迫切，在中西部和西部，传教的环境还算好，而在东部，只有极少的神父要牧导不断增加的教友，主教们勇敢的迎向这些艰巨的挑战。由欧洲移居到美国的人，往往都保留着自己祖国的习惯和传统，美国的教会，

似乎又面临了因种族不同，而组成不同的族群团体的分裂危机。1852年，巴尔弟摩教区召开第一次教区会议，就是为了解决“和谐一至”的问题和“统一纪律”的问题。这次会议还把巴尔弟摩省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拿来在全国去推动。到了1875年，纽约教区的总主教若望·麦克洛斯基晋升为美国第一位枢机。1893年，教宗良十三世任命方济·沙多里为第一位宗座代表，他常久驻驿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城。

美国天主教会，教友人口有着稳定性的增加。1830年代，教友人数是31万8千，到了1840年时增加到66万3千人，1850年卡洛尔主教去逝时，教友人数为160万，1866年有四百万，1878年为6百万，到1920年时，美国天主教人数是两千万人。这些教友的绝大多数，都是极其忠实虔诚的教友。

另外在拉丁美洲，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善。新成立的政府，自认为是过去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合法继承人，甚至认为有理由继承西班牙的宗主权。但是，西班牙在失去美洲殖民地以后，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西班牙国王所特有的宗主权。教宗最初也受了神圣同盟的影响，把南美洲新兴的国家当作是一种叛乱，还坚持维护已经订定的法律。这宗主权就已经包括在订定的法律中。南美洲争取独立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战争结束后，整个拉丁美洲竟然没有一位主教，教宗原本想要派宗座代牧前往拉丁美洲的，由于西班牙和美洲天主教教友的不同意而作罢。到了1828年，教宗良十二世应波利伐总统之请，为哥伦比亚任命了两位主教，同时还照会西班牙政府，表示并无意要把宗主权转给哥伦比亚总统，使得西班牙国王与教宗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1830年，西班牙使用否决权，反对曾经是宗座驻马德里大使裘斯迪尼亚尼枢机当选为教宗，因为他对宗主权的态度使得西班牙的国王不满。1833年国王去逝，西班牙发生了内战而呈现了瘫痪的状态。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正式承认哥伦比亚共和国，并且派遣使节前往，不久之后，教宗承认所有拉丁美洲的新兴独立的国家，宗主权之争也终于结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些新兴国家的宗教环境开始恶化，大部分的教会组织，尤其是高等学校都被摧毁，司铎的圣召缺乏，有学识的教友有如凤毛麟角。西班牙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反对教会的自由主义，在美洲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但在欧洲反而受到奥国宰相梅特涅的抗争，自由主义反而无机可乘。在美洲反对教会或反对司铎的运动，常是以反对西班牙、反对欧洲的姿态出现。19世纪中叶，教宗先后和各个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订立协约，由于政教分立的潮流占了优势，因此所订立的协约，因为政府与政策无止息的改变，而贬低了它的价值。南美拉丁美洲国家中，最为严重的是墨西哥的天主教会，缺乏法律上的安全。根据统计一直到1867年，墨西哥的宪法就改变过36次，有过72位元首，1870年时新的总统是位印地安人，竭力迫害教会，即使是在廿世纪，墨西哥仍然有教难。

我们可以概略的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先后在1817到1829年间不断的努力，争取到了独立。居民除了少数的土著之外，几乎全都接受了信仰，可惜神职人员太少。而他们在信仰中也参杂了许多迷信；兼而有“共济会”在知识界很活跃，也颇有影响力，再加上拉丁美洲各国，常为革命和政变所困扰，教会因此受累不少。政府随着政治的波动，时而倾向教会，时而与教会为敌，甚至有时公开迫害。在不幸的政治环境中成长的拉丁美洲教会，内外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一般民众和政府往往走的是不同的方向，实际生活和法律条文不完全吻合。比方说，有些国家的历史上记载说，有关于取消修会的事。而实际上，那只是指的修会的财产被没收，而修会的会士们不一定被驱逐，既使有时候是被驱逐，但是很快的又返回原地，因此牧灵工作虽然遭遇到种种困难，不过却从来都没有间断。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美洲，在殖民时代的末期，有42个教区，此后增加了三倍以上，教友人数由一千三百万人，增加了五倍。在巴西，殖民时代结束时，所有的政治转变，要来得比西属美洲和缓。因为在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时，葡萄牙仍然继续统治巴西，一直到1889年才正式结束，因此巴西没有发生所谓宗主权的争执，但是独立政府却沈缅在，“唯理主义”和国君兼任教会首长的理想中。自从1830年开始，政府制定了许

多反对教会的法律，1855年禁止各修会招收修生；1878年驱逐外籍修会，也没收了许多教会财产。葡萄牙王朝，在1889年崩溃后，巴西政府就宣布政教完全分离，修会恢复了，教籍修会人士也可以入境了，他们继续展开在原居地的居民中间的传教工作。从1800年到1920年，巴西教区从七个教区增加到67个，教友人数从三百万增加为四千万，这真是传教史上空前的盛况。

1.2.5 葡萄牙天主教情形

公元1826年，葡萄牙“蓬巴尔王朝”的后裔若亚敬六世去逝，长子彼得已经早在1822年时当上了“巴西王”，他放弃了葡萄牙本国的王位继承权，彼得把这项权利给了他的女儿，才七岁的“光荣的玛利亚”。彼得如此的作法，得罪了自己的弟弟弥额尔，因为侵犯到了弥额尔王位继承权，由于弥额尔与天主教的关系很好，又得到了大部份民众的支持，彼得不得不借重外在力量的援助，在1834年把弟弟弥额尔驱逐出境。替玛利亚摄政的官员们，把教会当作是弥额尔的盟友，这场兄弟间的王位之争，引发了教难，司铎被囚禁，主教被放逐，教会的财产也遭到没收，还把所有的男修会都加以解散。等到玛利亚成年后，自己主持国政时，就在1840年与教宗重修旧好。很可惜他在1853年就去逝了，改由一位反对教会的行政官掌握政权。在1857年与教宗签订了协议，葡萄牙的主教们，对政府表现了唯命是从的态度。在1862年，教宗碧岳九世义正言辞的谴责了这批主教。到了19世纪的末叶，葡萄牙教会的环境大为改善。但是在1908年，国王卡洛斯一世被刺杀身亡后，曼纽二世继承了王位，但是在1910年时被新成立的共和国所放逐，同时新政府立刻驱逐了在葡国境内的耶稣会士，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实行政教分立。在这种情形下，葡国与宗座的关系在1913年宣告破裂。接下来，我们看看西班牙的政治环境，1812年曾经制定了，具有自由主义和反教会色彩的“卡迪兹宪法”，在法国继续统治西班牙的期间，并没有付诸实行。两年后的1814年，国王佛南度七世回到西班牙，毁弃了“卡迪兹宪法”，但到1820年，他因被革命所逼，又再恢复宪法。立宪政府强迫国王驱逐返回国内的耶稣会士；没收教会的财产；严厉的惩罚拒绝宣誓效忠政府的神父。1833年，他去逝以后，又产生了新的革命，同时因为王位继承的问题，所引起的内战，因而扩大了革命的严重性。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冲突与葡萄牙的相似，佛南度把王位传授给才三岁的女儿依沙贝拉。佛南度的弟弟卡洛斯，他以最亲近的亲属身份要求继承王位，卡洛斯拥有很多的支持者，而且又都是坚信天主教的百姓。依沙贝拉女王的摄政者，坚决反对教会的独裁人物，并且在1837年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在1841年时，全西班牙只有六个教区还有主教，后来这个政权被推翻，教会的环境才得以改善。1851年双方订立协议，教会放弃了大部份的教产。1868年，女王依沙贝拉被放逐，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的儿子阿梅迪欧继承西班牙的王位，但是，并没有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希望。1873年阿梅迪欧败退。依沙贝拉女王的儿子阿尔丰索十二世，他在1876年所颁布的新宪法，规定了以天主教为国教。但是在19世纪的末叶，新的暴风雨又渐渐出现，国王阿尔丰索十二世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让自由主义者担任部长。1909年，一个名叫弗勒尔的无政府主义者兼自由思想者被判死刑，使全西班牙充满了疯狂的示威游行，这正是可怕的前奏，而真正暴风雨的来临，还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1.2.6 法国后来天主教情形

现在要重新回到法国的政治环境中。自从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以后，法国的内政立刻表现了，对过去的革命战争的反感。1801年所签订协议的内容，又再出现在1822年的条约中。查理十世的国会大部份都是由“自由主义者”所组成的，他们的决策之一，就是驱逐耶稣会士。从1830年的七月革命开始，天主教不再被称为是国教，而只不过是部份法国人所信奉的宗教而已。强而有力的天主教力量，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天主教徒在蒙达朗拜的领导，争取教育自由的权利，获得了重要胜利。1850年，法国天主教徒得到了完全的教育自由权。拿破仑三世为皇帝的时代，在表面上看来，可以说是法国天主教会光明绚烂的一段时

期，对教会一向虔诚忠信的欧静尼皇后，使教会的处境有了改善，但是，皇帝本人却不是天主教徒。他对当时困扰所有天主教徒的罗马问题，很是好奇，他一方面保护教宗；而另一方面，却又处处助长反对教宗的意大利革命运动。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反对教会的力量开始在法国滋长起来，等到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在 1870 年衰征后，这个政权就接掌了政治。法国的民族英雄在 1877 年曾经说道：“教士主义就是法国的敌人。” 1880 年开始，所有由耶稣会主办的学校一律被关闭；1881 年，政府下令俗化所有的各级学校；1882 年，通过了合法化的离婚法案；1886 年全面停止宗教教育；从 1900 年起，反对教会的各种法令不断的颁布，有如雨后的春笋；1904 年，还取消了所有从事教育的男女修会，结果，有一万四千座学校也就只有关门大吉了。在这同一年，法国和教廷的外交关系破裂，而且终止了双方的关系。所谓的政教分立，就在 1905 年完成。政教分立的后果是，政府没收了教会的财产，也不再继续支助各地教堂的经费，当然，也不再负责司铎们的生活费，政府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它从教会没收来的财产上，所获得利益相当的有限，因为各个修道院，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富有，而且在财物清理的过程中，官员们的钱囊都变大了，政府想要由教会财产获得大笔利益的希望也落了空。因为天主教徒在政治上缺乏团结心，以致于在国会中，无法阻止反对教会法律的制定，不过，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足以使政府远离各种走极端的路线，但是，无论如何，教会在法国已经失去了法律的保障。

1.2.7 其他国家情形

下面我们来看看荷兰、比利时两国的政治环境。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合在一起，组成为低地王国，这样一来，就使得比利时的天主教教友，转而隶属于荷兰信奉改革派基督教的国王权下了。国王威廉就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天主教教友，政府的一切公职，几乎全被荷兰人所占据，比利时人自然非常不满，由于受到法国革命成功的鼓励，比利时在 1830 年，脱离荷兰，自行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国王黎奥保一世公布了宪法，给予人民信仰的自由；教育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比利时人善于利用赋给他们的自由，增建了许多天主教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鲁汶大学又重行开办，而且成了比利时人知识生活的中枢，从此鲁汶大学的光芒，就不停的向比利时和周围的西欧各国放射。以后自由思想者，虽然在比利时开始反对神职人员，通过了反对宗教教育的法令，但是遭遇到天主教教友们的勇敢的抵抗，对教友们本身的权益做了妥善的维护。到了 1884 年的时候，国会和政府机构内的教友，人数已经占了大多数。从 1895 年开始，宗教课程，又再定为公立学校的必修课程。自从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以后，荷兰的天主教教友只剩下了少数，但是，却都能在主教的卫护下坚强团结，在人数上也逐渐的增加起来。1853 年，教廷在荷兰重建了圣统制，有一个总主教区，四个主教区，教友们的组织相当的严密，行动也很自由，在牧灵工作上，尤其在教育方面，有了良好的成效，所以到了 1875 年的时候，全荷兰的天主教教友，已经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接着，是在东欧的波兰。在 1795 年时，环绕波兰的三大强国，一个是基督教的普鲁士，一个天主教的奥地利，第三个就是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再一次共同瓜分了，波兰经过强邻侵略强占后所剩下的国土。1814 年的维也纳会议，竟然批准了，这种侵略瓜分他国领土的恶行，于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在世界地图上竟被删除了。到 1830 年时，被俄罗斯强占的省份，奋力起来反抗，希图能恢复他们的失土和主权的独立，以及信仰上的自由。反抗持续了两年，英勇的事迹虽然是前仆后继，终于因为寡不敌众，波兰人为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在血泊中含冤而终。1863 年，波兰人再度掀起，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遗憾的是又宣告失败了，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波兰才有机会获得独立。

我们接着看英国的政治环境，它和前面所提到的欧洲大陆的国家正相好。在英国，因着法国革命所宣传的民主与平等的理想，对天主教徒是有利的。许多法国神父，流亡到英国，受到了英国的庇护。18 世纪末叶以前，几条陈旧的强制性的刑法被废除了，爱尔兰法学家兼政治家奥考乃尔，他在 1829 年的“解放法案”，为天主教信友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1800 年左右，英国的天主教徒减少得不到十万，从此以后，不断的增加。1833 年的“牛津运动”，不但使许多人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而且还提高了天主教徒的声誉。爱尔兰教友对英国国教教会的义务，在 1838 年时取消了。1845 年爱尔兰天主教会；获得了私有财产；1850 年，天主教会在英国恢复了圣统制，当时，有一个总主教区，12 个主教区。到了 1878 年时，苏格兰也恢复了圣统制，有两个总主教区和四个主教区。过去属于天主教的财产都已经荡然无存，政府给了天主教徒应有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教育的自由。据说爱德华七世，在 1910 年临终之前改信了天主教，他的继承者在登基时，还把加冕誓词中，反对天主教的词句都加以删除了。

最后要介绍瑞士的政治环境。在维也纳会议中，强制性的派给了瑞士，一种染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体。自从 16 世纪改教运动以来，天主教教友连在日内瓦居留的权利都没有，于是在 1815 年各个联邦之间成立了一个协议，保证信仰的自由。到了 1840 年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酿成过不少严重的事件。教廷派驻瑞士的大使遭到驱逐；天主教教友成为强盗、暴力施展的对象。7 个天主教联邦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就组成同盟。抗争和冲突日益尖锐，两年后，终于爆发了内战，天主教教友不幸失败，好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结果。1848 年颁布的宪法，虽然免不了敌视天主教，但是保证各邦的信仰完全自由，天主教从此也能在新教地区发展了。而耶稣会士仍不能在瑞士传教，教廷大使也撤离瑞士。总而言之，在瑞士，来自新派基督教徒的反对，要比来自“自由主义”的反对少得多了。

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在奥地利的的影响很小。在方济一世的长期统治下，虽然常败于拿破仑，但奥地利帝国，反倒成为欧洲的领导力量。奥地利强盛的原因，是由于强人首相梅特涅的强势领导。其实他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要比他对奥地利内政的影响为大。奥地利原本在若瑟二世的时代，由主张自由主义官员所统治，传到方济一世手里，他自己不完全是，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拥护者，他具有坚强的立法头脑，是一切革命的敌人。他虽然不赞成他的叔父若瑟二世，所制定的反对教会的法令，但是他并没有意愿加以更改，他凭借着政府的谨慎和善补，减缓了法律的严苛。而首相梅特涅在信仰上是一位自由思想者，但是他却认为，天主教会特别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维持。1848 年革命以后所定的新宪法和梅特涅的政治失败，使天主教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维也纳总主教劳希尔和新登基的皇帝法兰斯·若瑟一世，在 1855 年妥协，签定了可喜的协议，取消了若瑟二世时代法律中反对教会的条款，可惜这份协议从来没有实现。1868 年所公布的有关婚姻和教育的法令，违反了协议的规定。1874 年政府废止了协议，所幸的是，在奥地利始终没有出现文化战争，因为法兰斯·若瑟一世对宗教，具有十分正确的态度。他对罗马问题虽然相当固执，但对自由主义者的官员们，所有的侵犯教会的行为，也不加以宽恕。1868 年，林兹地方的主教被政府逮捕了，皇帝就立刻释放了他，皇帝也禁止人去攻击因斯布鲁克大学内，由耶稣会士们所主持的神学院。他虽然有任命主教的权力，但是，他都能遵照教会的意见和牧灵的需要，来完成主教的任命工作。虽然是如此，奥地利的天主教会仍然有许多缺失。从外表上看来，奥地利是一个坚信天主教的国家，那里知道，在漂亮的外衣里面，隐藏着许多内在的敌意，国内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是自由主义者，仅在名义上是天主教徒，许多地方的民众，逐渐被国家主义所慑服，使得天主教的团结力量松弛。从 1867 年和匈牙利一起的“齐步运动”以来，君主政体结束，国家主义的洪流四溢，到处泛滥，已经到了不可抵御的地步。奥地利的百姓，一再地倾向于日耳曼帝国，他们把日耳曼当作是新教的化身，奥地利人一直有着一种自卑的心理，同时仇视外在世界，而当时各国的天主教徒，都在政党下联合起来，特别在日耳曼。有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所创立的“基督社会党”，这些天主教团体是国家主义的劲敌，他们不愿延宕帝国的崩溃，他们只愿意在继之而起的政权下，使天主教会的权益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

19 世纪天主教，在俄罗斯帝国内的政治环境和生存空间大概是这样，当波兰被瓜分以后，波兰、立陶宛以及乌克兰的罗塞尼亚等地的天主教民众，全都归属在俄罗斯。在 1796

到 1801 年间，沙皇保罗一世的统治之下，已经恢复了罗塞尼亚的三个主教区，并且在莫希来建立了拉丁礼仪的总主教区，主教公署就设在圣彼得堡。1818 年，又增加了华沙总主教区和七个主教区。1825 年到 1855 年间，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的期间，曾经有过一次教难，这次的教难，是与国家元首兼教会首长的制度，以及俄罗斯地方色彩的本位化运动一起产生的。三位罗塞尼亚的主教和一百五十万天主教友，被迫脱离罗马教廷。1830 年在波兰发生暴动，天主教教友受到了惩罚。1845 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到罗马访问，受到教宗额我略十六世相当的礼遇，因此在 1847 年，俄国和教廷缔结了协议，但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忠诚的去执行。到 1863 年，波兰再一次的发生暴动，这项协议也就终止了。20 年后的 1883 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与教会缔结了新的协议，1894 年起也正式恢复了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外交关。然而这个时候，武力压迫和俄国“本土化运动”仍然在继续中。1905 年的革命给天主教带来些许的安慰，俄罗斯西部各省，有 20 多万被迫离开的教友，又重新回归到慈母圣教会的怀抱。

1.2.8 教皇国的结束

现在，我们该谈意大利的政治环境以及教皇国的结束。在 1814 年的维也纳会议，曾经把西西里王国和教皇国的秩序重新调整。都斯加尼大公爵由奥地利家族的支系所统治；北方有萨丁尼亚王国和巴马、摩特拉两个小型公国。热那亚和比埃蒙属于萨丁尼亚，而隆巴第和瓦楞西亚则属于奥地利。在 1831 到 1832 年间，以及 1843 到 1845 年间，教皇国里充满了不安和纷乱，被奥地利和法国的军队所平息。造成纷乱和骚动原因是，因为民众对教皇国政府的不满，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普通的教友，不得担任政府的公职。而实际上，所有的官员全都是穿着道袍，其中有些不属于修会的神父，通常在积蓄到相当的资金时，就辞去公职而还俗结婚，这样的官员平常既不善尽责任，又不以牧灵为念，在这种情形下，不良份子很容易煽动群众起来，反对神父们的统治权，也同时反对教会的本身，许多秘密的结社当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安。教皇国里弊端虽然不少，但是历史学家，往往也未免大加渲染，言过其实。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对新发明的铁路不感兴趣，固然是事实，然而，这不是使得民众大动干戈的理由。反对教皇国行政制度的骚动，渐渐和全意大利的“政治统一运动”相呼应。19 世纪的人认为，唯有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民众才会有好日子过，不少的人，甚至包括相当有声望的、很出色的天主教友，都想在萨丁尼亚王国的国王领导下，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并且以教宗为荣誉总统。而比埃蒙的爱国份子所希望的更多，除了萨伏之外，取消所有的王朝，连教宗的领土权也得废除，想要建立一个由比埃蒙人来领导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这么一来，全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友，便陷在“忠于教宗”与“爱国”的良心的冲突挣扎中。原本教友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教宗碧岳九世身上，他当时正倡导大规模的政治特赦和民主改革，好像对“统一运动”表示着同情。国家主义者所组成的秘密结社，私底下暗自欣喜，企图想要利用一位缺乏政治经验的教宗。公元 1848 年的春天，教宗参与了萨丁尼亚的独立战争，对抗奥地利，他们深深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在罗马发动了一次公开的革命，教宗碧岳九世逃亡到那不勒斯王国。1849 年二月到七月，罗马在若瑟·马志尼的领导下，宣布成立共和国。

在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的战争中，比埃蒙人战败，当法国军队占领罗马时，教宗返回到罗马。从外表上看来，罗马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但是，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者，看得很清楚，只要不顾一切的反对教宗，不与他同行，意大利的统一就会实现，所以无论是秘密的，或是公开的骚动就愈来愈激烈。萨丁尼亚在维克多·厄曼纽二世和他杰出的大臣加富尔的领导下，在内政方面，采取了反对教会的路线，加富尔的口号是：“在自由的国家中有自由的教会”。这句话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信以为真，而实际上也不过是，许多内容空洞的自由主义者的口头禅而已。加富尔赢得了法王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国事的同情。1859 年法军击败了奥地利，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使隆巴地、都斯加尼、巴马和么特拉全都并入了意大利的版图。教宗要求奥地利的军队撤离教皇国的北境，奥国军队撤走后的省份也归属了意大利。

利。1860年，志愿军的领袖若瑟·卡里巴迪征服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而实际上，他是在为比埃蒙效劳的。就在同一年，比埃蒙也占领了翁勃利亚，并且打败了教皇国的军队，教宗只剩下了罗马城和拉西翁两个地方了。而这两个地方，也是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之下。拿破仑三世为了尊重法国天主教教友的意愿，而不愿意离弃教宗，所以在1864年的协议中，意大利不得不放弃了对教皇国剩余土地的占领。但是在1867年，卡里巴迪作了一次突击性的试探，结果在罗马附近的曼塔拉遭到失败。到1870年时，法国和德国发生了战争，拿破仑三世需要人手，就把在罗马的法国军队全都调走了，而拿破仑三世本人在色当被日耳曼军队俘虏，意大利的军队就乘着这样的空隙，违反协议进入罗马城。教宗深深明白大势已去，下令不要发炮还击，表示投降，教宗自己留守在梵蒂冈，他拒绝所有的协议。1871年，意大利颁布了“保证法规”，承认教宗的神圣不可侵犯、承认他的最高权力、政府每年向他奉献325万里拉，教宗也加以拒绝。意大利爱国份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可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并不能使有心人感到满足。因为意大利把国都迁到罗马，国王又占据了教宗在基利纳的夏宫，这是政治上的一种失策。从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就是，意大利新政府永久具有与教会为敌的特性，使得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公侯和罗马的神职人员，始终都不愿和意大利王宫打交道，教宗也颁布谕令，禁止意大利天主教教友参与国会的竞选，一直到1905年以前都有效。这个通谕的颁布，同样也是一个失策，教宗原先的目的，只是表达对新政府的抗议不予承认，使天主教教友认清，这是个不合法的新政权。他的原意虽然没有错，但是它的结果，却使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友失去了参政的权利，缺乏了政治的训练和素养，而国会从此被反对教会的份子所把持操纵。意大利政府也始终抱持着敌视教会的态度，修道院全被充公，并且被改建为学校或是军营，那最为著名的卡西诺山上的隐修院，它使政府的军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学校也不再讲授宗教课程。意大利的政治人物都因为罗马的问题而感到焦虑，因此，他们就尽量在罗马以外的地区，用各种宽大的措施来获取好评，甚至连一向反对教会的国务卿克利斯比，他都在暗中进行与梵蒂冈之间的协议，当然在十九世纪结束时，一直是毫无结果的。

1.2.9 德国教会的具体情形

根据公元1817年的“巴伐利亚协议”，在慕尼黑和福莱辛设立总主教区，奥斯堡、里根斯堡、巴撒乌这三个主教区从属之；另外在邦培也设总主教区，而威斯堡、艾希斯台、斯拜艾三个主教区从属之。主教则由国王任命，由教宗正式批准，主教们都与罗马相通功，并且在信仰与道德问题上，也有权利督导政府公立的学校。主教公署、主教座堂的神父团体和神学院的经费都由国家提供。至于已经被拍卖了的教会财产，在巴伐利亚的协议中却一字不提，但是随后又作了补充，订定了“增军条款”；第二年公布了“巴伐利亚新宪法”和“宗教法令”，取消了1817年的协议。在新公布的“宗教法令”中，规定了许多的事项，其中有关教会的事务，需要“君王的许可”的条文，又再重新出现，“巴伐利亚”政府从此以后，保持了这种君王兼教会首长的陈腐倾向。好在，由于君王态度的公正、官员们的高度廉洁，在国内很少发生严重的冲突。甚至到1848年以后，大权落入“自由主义者”手中时，巴伐利亚仍然安定一如往昔。公元1821年，教宗碧岳七世与普鲁士订定了协议，教宗所颁布的敕令，国王把它当作国家的法令来公布，同时恢复了科隆教省，以及特里、闵斯特、巴伐彭三个教区；还有格尼兹诺、波兹南两个教省，库尔姆教区则从属之。此外，还有不从属于教省的两个教区，主教，是由主教座堂的“司铎团”选举产生，不过，君王拥有否决权，主教公署的经费由政府支付。和巴伐利亚的协议一样，对于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也是一字不提，这等于是教会自动的，放弃了过去所拥有的教产。1824年，教宗与哈诺弗缔定了类似的协定，使希尔特汉、奥斯纳博来克两个教区得以重新恢复。日耳曼南部福来堡总主教区重建于1821年。在整个十九世纪，日耳曼天主教的处境，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在与政府当局的合作也差强人意。十九世纪中，很少有国家像日耳曼各邦那样，有一群清廉正义而又能干的政府官员，而且还擅长组织。然而，天主教徒不免要抱怨，教会对公共生活缺乏关心，尤其是在高等教

育制度上的疏忽，但是，日耳曼的天主教会，也一样是在挣扎中求生存。在教会获得合法地位后，普鲁士的境内发生了一场，关于混合婚姻的尖锐冲突。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儿童应该按照父亲的信仰接受教育，而科隆的总主教则坚持教会的立场，因而在 1837 年被捕入狱。接着，格尼兹诺和波兹南两个教区的总主教，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引发了天主教教友们的公愤，逼使政府让步，才同意按照天主教会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日耳曼的其他地方，在 1870 年以前，也发生过主教和政府之间的小型冲突，这些冲突的影响不大，仅仅只是引起天主教教友对政府的不满而已。

下面，要跟您介绍的是所谓的“文化战争”。1871 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以后，日耳曼从联盟改为联邦国家，这是许多日耳曼人久久已经渴望的事。普鲁士的国王荣登日耳曼联邦皇帝的宝座，在空前的军事胜利的情况下，第一任首相，也是日耳曼帝国宪法的创制人俾斯麦，他领导有方，使得帝国顿时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日耳曼的天主教教友，尤其是在南方的教友们，所受到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比较小，有些人把普法战争的胜利，看成是天主对基督新教，在军事上的一种恩惠，而且把这新兴的帝国，看成是新教的帝国。当然，天主教教友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再说，天主教的教友在这场战争中，出力不亚于新教徒，对帝国新制宪法的拥护也不亚于新教徒，但是，非常令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帝国政治统一的一开始，俾斯麦便和天主教发生了冲突。无论如何，理论上的，或是政治上的原因，都无法单独的答复这个问题，而普鲁士的宗教行政部所设的天主教，一向维护着天主教会，在宪法所应享的权益，这个机构却在 1871 年时被取消了，代之而设的是一项有关司铎在讲道时，讨论国事、妨碍社会安全的法令；以及对违背这项法令时所受的惩罚规定。这项法令行文含糊不清，可以作各种解释。1872 年，帝国法律规定驱逐耶稣会会士、赎主会、遣使会，还有和耶稣会有关的圣心会修女也都受到波及，全在驱逐之列。接着又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在 1873 年颁布的就是，普鲁士的世俗法庭可以裁夺教会事务、可以罢免神职人员；1874 年又规定，凡是没有经过政府的许可，而从事各种宗教活动的人，都一律驱逐出境；财产应该充公，而且受“剥夺公民权”的惩罚。这些新颁布的法规，显然和普鲁士的宪法相互矛盾抵触，因为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给予天主教会以自治之权。1875 年，这项宪法条文，竟然从宪法中被删除了，天主教堂和教会的进益完全被划归为所谓的“旧天主教徒”。至于“旧天主教徒”指的是什么？我会在讲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再为作详细的说明。1878 年的前后，普鲁士 12 个教区中，有九个已经没有了主教，一千多个本堂区没有了神父，两千多位的神职人员被逼罚款或是被囚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弥撒和病人的敷油圣事，也都被看成是未经政府许可的教会活动。

德国的天主教徒，曾经为那些因献弥撒行圣事，而受到罚款的主教和神父们缴付罚款，起来联合抵制所谓的国家司铎。在没有计策可施的情形下，教友们只好集合在一起，举行没有司铎的敬奉赞美天主的礼仪，教友们还在普鲁士的议会和国会里，双管齐下，从事强而有力的自卫活动。从 1852 年起，在普鲁士的参议院里，有一个小型的天主教党，由于这个政党在参议院里占有中间席次，所以从 1858 年开始，被称为“中间党”。在文化战争期间，“中间党”迅速的发展，不久之后成了国会当中最强而有力的政党。“中间党”并愿意形成一个宗教政党，不愿意只是一个为维护权利而存在的政党。他们努力维护日耳曼帝国的联邦宪法，防止各邦统一的倾向；保障公民权和宗教自由权；反对法律的侵犯，保护社会上的弱势者。1870 年开始，增加了社会工作的方针。在历史上，日耳曼德国，能成为第一个社会立法的国家，这多半得归功于中间党。在政治问题上，中间党一向都保持独立的态度，即使是对教宗也不例外。在结束文化战争的协议中，教宗良十三世，他曾经以私人名义，将函件给当时国会和议院的领袖维道斯特，希望中间党拥护政府的军事议案，以免使协议陷于危机。但是，维道斯特拒绝了教宗良十三世的要求，他还让教宗知道，如果教宗把这件事看作是不服从，那么中间党也只有准备解散了。良十三世后来曾表示，他非常赞成维道斯特所采取的态度。

在历史上，俾斯麦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感到文化战争对他是一种失败。在 1878 年和 1879 年间，俾斯麦和慕尼黑以及维也纳的教廷大使举行过秘密会议，普鲁士和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中断了十年，终于在 1882 年重新建交。普鲁士从地方政府获得了具有弹性的权宜力，以便放宽严峻的宗教法令。在 1883 年，取消了对司铎们的文化考核法令；到 1886 年，又取消了教会事务由皇家法庭审判的法令；1890 年，再取消司铎驱逐出境的法令；到 1891 年，政府付清积欠教会的薪金 1600 万马克；但是对耶稣会士的法令仍然保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 1917 年，才完全的取消。日耳曼各阶层对文化战争的反感极大，中间党也成为其他的国家，组织类似的政党的模范和参考。

1.3 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蔓延

1.3.1 自由主义的形成

我们都知道，发生在 18 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对思想或是政治，都搞得天翻地覆，引起了深重的骚扰。大乱过后，政府和教会，面对着革命党所宣传的制度和思想，所抱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呢？还是把它当作是一种令人憎厌的东西呢？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革命血腥的人，对那些凶暴的屠杀和那威胁到教会生存的战斗，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大革命，简直就是魔鬼的勾当，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应当铲除净尽而不流丝毫的痕迹，防止他再死灰复燃，还要尽可能的恢复已往的秩序。这是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几年当中，最占上风的趋势，也是为了改造欧洲，在 1814 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家们，所企图激发起来的趋势。但是，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酝酿，由多数人的深思熟虑，所筹划准备的一种事变，已经改造了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历史决不能倒转或逆流，而革命党所散布的思想，也无法从人心中扫除了，“自由”这个名词和观念，早就已经是启发西方 1830 到 1870 年之间，大部份政治斗争和思想的口号。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就是以“自由”的名义，争取到独立；希腊人也以自由之名，在 1829 年，挣脱了土耳其的宰制；1830 年在法国、1833 年在西班牙、1848 年在法国及欧洲各国所发动的多次革命，全都是为争取自由为目的的战争；即使是反对教宗世样的斗争，也都以争取自由为名；以及以后兴起的资本主义，也是由“自由经济”的学说抬头，而逐渐兴起的。

那么，教会面对自由主义，是采取了那一种态度呢？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这四个字有着种种不同的观点，因而解释和范畴也就不同。有的是把反对专制政体的人，称为“自由主义者”；有的是想要摆脱外族的侵略，希望本身的民族获得解放的人，也称为争取自由、思想自由的人；攻击教会钳制人思想的自由，或为教会争取自由的天主教信友，以及争取经济和贸易自由的资本家，也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帜。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把思想的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分开来说明，然后再把教宗碧岳九世和自由主义斗争的态度加以研究。首先，我先把思想的自由作个说明。思想自由的延续，它是要为人类争取完全的思想自由，却把高于人类的权威，也就是天主的权威、启示的权威、教会的权威等等超越性的权威，通通都加以扬弃否决，很显然，人类决不能接受这种思维方式的自由主义。不过，却有另外一种方式，它是给公民争取最高度的自由，也就是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开会结社的自由。1830 年的法国革命，就是用争取自由的名义而起的，连带着，也发生了许多反宗教的暴行。

1.3.2 教会内的自由主义

曾经讲过拉莫乃对天主教教友所发生的响影，他愿意保卫教会，他曾说：“我们既然不能靠政府来保护教会，只好开始另外一种新的策略，那就是利用现代的自由主义，使它转为有利于教会。”他还说：“有些人一提到自由主义，便有些震惊害怕，我们来使自由主义成为

宗教化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就要复兴了。”拉莫乃为了宣传他的思想，他创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的标题就是《天主与自由》。他吸收了不少有才气、有理想的志同道合者与他共同合作，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拉高尔代。这张报纸声明：“圣教会应该摆脱国家的保护。俗世政权的国家，借口保护教会，却使教会变成了附属于他们的奴隶，教会应当坚决的辞谢所谓的协议，好能与国家分离，这才是理想。而我们‘天主教的本质就是自由’，所以教会有权得到一切自由，如出版的自由、教育的自由、投票选举的自由、集合结社的自由、教会应该有她应有的自由，才能够有效的传教，并且也才能实现解放民众的使命，因为民众才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持有者，民众往民主的方向发展，必然是所向无敌。”

拉莫乃的报纸上所发表的社论，具有高度的才华，眼光都很正确，但是社论中也有一些论断，就未免过了火而过于武断。拉莫乃对教宗固然是一片至诚，但是，他对他自己的思想却很固执，而拉莫乃确实是天才，对好事也有远见，对后来发生的大事，许多都应验了他的预言。可惜的是，拉莫乃和他的同道们，对神学缺少深湛的研究，因而没有足够的神学修养。所以在正确的思想中，往往就掺杂着过份激烈的言论和判断。天主教奠定了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说天主教只能靠自由保全，就显然是一种错误。因为天主教本身有它绝对的价值，并不是靠它所生活其中的人的建设，更何况拉莫乃本人对“自由”的完全信赖，是他过份单纯的相信“人类是绝对的善良”。似乎好像人一有了自由，就是以“能够看事正确，修德行善，而绝对不会受私欲偏情的困扰了。”而可事实上，绝非如此，不是吗？这就是拉莫乃的固执，看不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偏激，实在可惜。这份报纸不但及于法国，还远及国外，有些主教对它的煽动作用深感不安，便下令禁止神父和修士们阅读这份报纸。面对主教们的这种反对，拉莫乃、拉高尔代等人决心向教宗申诉。这几位自称为“自由的朝圣者”，向罗马出发，他们自信能获得，完全而决定性的赞同。到了罗马，他们很快的就发现，当时的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很慈祥的接待他们，但是并没有丝毫赞同他们的主张。拉高尔代明白了，教宗额我略十六世这种沉静而慈祥的接待，正是教宗不能赞同他们的主张，但是又不愿意公开谴责他们的做法，于是他就离开了罗马。而拉莫乃呢？他却坚持执意的要等待决定。决定终于颁发下来了，那就是，1832年所颁发的被称为《惊奇您们》的通谕，在通谕中，清楚的谴责了拉莫乃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从此以后拉莫乃他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偏差，以顽强的态度，反抗教会对极端自由主义的谴责。他简直是被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冲晕了头，他的同道和徒弟，以及教友们也渐渐离开了他，最后在众叛亲离的凄惨景象中去逝，甚至在临死的时候，都还拒绝了一位神父的探视，这使我不禁这么想，假如他能够谦逊的反省，看出自己的错误，并且以他的天才，像过去那样继续为教会服务，那么，我相信，19世纪的教会历史会整个儿的改写的，这是令我们感到遗憾而惋惜的。但是，拉莫乃的徒弟拉高尔代，他却谦逊的接受了教会通谕的指导，从偏激之路返回正确的自由思想，继续慷慨的为教会，所认定的自由主义的尺度而努力奋斗。拿破仑曾把教育大权独揽，划归政府，君主复辟以后，这种制度仍然保留，成为宗教教育的一大阻碍，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天主教信友，所要致力的重要工作。终于在1833年，教会重新再获得初级教育权，到1850年又重获中学教育权，最后在1875年重获高等教育权，这真是教会在法国的重大成就。

1.3.3 政治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至于在政治上的自由，在1814年拿破仑宣布退位以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签订条约以后，欧洲又重新落入几个强权的手中。他们玩弄着政治手腕，对人民合理的要求不大注意，然而在专制政体之下，人民却要求制定宪法。从此之后，西欧各国的人民，为了争取政治上的自由、为了获得应有的权利，也就不再有安宁的岁月了。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外族的统治；一方面是要摆脱专制独裁的淫威，仅从教会的观点来看时，那么它的效果就有幸也有不幸了。当教友们获得实际上的宗教自由时，则可以说是幸；当所谓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指的是绝对自由，但当对整个教会和信仰的教义，加以诬蔑和敌视的时候，那就是大大

的不幸了！下面，要特别提出来在 19 世纪形成的几种新的观念。

首先要讲的是新的国家观念，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独立，这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念，从此以后，欧洲皇族所形成的王朝，已不再扮演政治权力的重心，土地和人民，变成了缔造国家的两大要素，民众自己制定法律，也就是说，可以建立君主国或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在民众的心目中，好像是赋予了民众生命的一种杰作。而实质上呢，这种杰作比起中古封建制度还要更加的抽象，它并不是一个有机体，然而它却又像有机体一样，具有生命与活动。在国土上的居民就是国家，但是个别的居民，则又是国家的臣属，与过去臣服于国王的庶民一样，甚至还更有过之呢！在这个新形成的国家观念下，埋伏着国家至上与国家主义的根苗，这是近代历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个概念，还须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日，才会开花结果，在欧洲要到 1848 年的革命以后，它才得到完全发展的时机。第二个要讨论的观念是“民众的意志”。从现代的观念来看，每一个统治力量包含了三种权力，那就是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我们都明白，真正把持这三种权力的，不可能是全体民众，而是那少数的与民众的意志相符合的个人。因此，各种民主政治的基本困难，就是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或者更好说是判定民意的方式。当然，我们别忘了，民众的意见会有多少呢？也正如组成这个国家人口数一样的多，如果是以大多数民众意志的标准的话，不管它是绝对多数或是相对多数，这就已经表示了，民主的概念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么一来，很清楚的看出来，统治整个国家的力量，并不是操纵在全体民众的手里，而是操纵在与一部分意见相反的许多人手里。在整个 19 世纪中，常是以投票数字作为决定民意的原则。在欧美国家中，这种倾向使投票权有了偏差的发展。

1848 年以后，各国所草拟的、或是修改过的宪法中，国会议员的选举，仍然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由具有投票权的选民所选出来的代表，来选举立法者；此外，还有一种按照社会阶级的投票方式，法律规定按纳税的轻重和责任的大小，来规定谁应该有投票权。同样的，各种选举，通常是基于区域性的原则。每一个立法者，是由各地方投票产生，这样，他才会确实知道，他所代表的民众心里真正的意愿。这种投票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不负责任的民众，偶然产生而又无法控制的冲动情绪。欧美各国的上议院、下议院或是参议院、众议院的议会制度，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许多在发展过程中的限制，随着时间而慢慢的消失于无形，逐渐建立起以数字总和为基础的投票法则。刚开始，常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人，被选为立法者，他们在进入议会前，并没有什么党派的分别。到了 19 世纪的末期，政党成为永久的组织以后，政党政治也就成为通常的游戏规则，这些政党的本身不是立法者，而是投票者的组织，最后所选出来的，不是立法者，而是各政党所提名的党员，这样，就与原来的民主理念正好相反了。治理国家的人，不再是民众所选、众望所归的议员，而是政党的领袖，选举者和立法者都必须服从于他。我们从这种现象看到，“党派的专政”已经是近在咫尺，原本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的国家，有可能走上一党专政的独裁之路，在这种情形下，决定性的权力不在全体党员手里，而是在政党。事实上，在往后的世界历史上，也的确发生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假如，在 19 世纪所形成的国会，使天主教徒面临新的难题，那么 19 世纪，“国家至上”的国家全能制度的演变，使得这些难题更加的复杂。这两者之间，是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些幻想自己是为人类自由而战，因而自诩为自由主义的人，事实上，反而是替国家套上了枷锁，使人类的灾难变得更多，唉！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啊！

在今天，当我们听到，一个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怎样持续不断的，控告教会奴役民众的良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实啊！在所谓自由国家之内，一般的天主教教友，都被强迫去维护那“以民众自己的方法获得拯救”的权利，天主教教友并没有处处都按照政府所指示的爱国观念来做。这个时代，政府交替无常，它们所标榜的爱国观念也不一而足。由于近代和现代国家的行政与立法范围，越来越广，因此，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学校、教育和公共福利各方面，教会与政府发生间接关系，当国家想要整饬教会的财产，组

织和牧灵工作时，教会便会受到直接的干预。在 19 世纪，这些相继发生的现象，一点儿也不稀奇，早在君主专制时代，教会为了能够完成牧灵的职责，已经不断的在为自由而奋斗。19 世纪的新环境，使教会颇感困窘，总而言之，教会逐渐被逼迫去和那些垄断一切权力的政府展开战斗，这种战斗的目的，不单只是在维护牧灵工作的某些权利而已，而是要争取牧灵工作的基本可能性。这种环境的恶化，是因为权利与正义观念的激烈改变。19 世纪是一个很重视法律的世纪，然而 19 世纪竟然把立法误以为是正义。一般民众以为，“凡是议案得到大多数议员投票通过，列入法律范围内就行了”。民众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分辨，政府是否有权力去执行，各项投票通过的议案和法律，因此，在最重视法律的世纪，竟然产生了不正义、产生了暴力事件、而且竟然是野蛮未开化的洪荒时代，所未曾有过的呢！19 世纪所订的协议和条约的片面废除、教会财产的充公、修会团体的解散、神职人员的被驱逐、推动牧灵活动而遭到政府的惩罚等等事件，都以法律为借口，因此，19 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是在跟新陈代谢的各个政党与政府交战。

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是在跟新陈代谢的各国政府或各个政党相抗争，这并不是说，教会本身具有一套决定性的政治计划，我们最多只能说，教会倾向于一种保守的政治，通常都希望能维持原有的状态。当一个政府或政党比较趋向温和的和平政治时，教会便能与它建立比较友善的关系，然而，在激烈的革命运动中，教会的稳定性经常会受到损害，虽然教会除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之外，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和计划。但是在 19 世纪时，广大的民众大多自动或则是被逼参与政治活动，也因此，许多国家的教友们开始有了政治的意识。通常，教友们常是站在权威的一方面，可是呢，当政府与教会为敌时，他们会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采取反抗权威的态度，他们并不以暴力来抗拒政府，而是对政治表示厌烦与消极姿态。在政治上，他们犯了狭窄、懦弱与莫不关心的毛病，凡是天主教的教友热爱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惯，也爱自己的家庭和国家，但是，也希望别人不要打扰、或破坏他应有的宁静的生活；更愿意避免与他人发生不愉悦的冲突。当代表教会权益的政党建立时，使得教友们都相信，这样的政党所定的政策是合理的，往往并不困难，但是要他们在决定性的日期去投票，这就不容易了！教友们普遍都厌恶，国家全能制和政府垄断一切的现象，一旦警觉到这一点，就会抗拒到底，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有着基本上的错误。这就是 19 世纪特有的国家观念与国家主义在作祟。对自己国家骄傲与自大、代替了对国家真正的爱，这些政党的领袖，往往不以国家利益，而以国家权威为前题，在殖民政策，商业政策，以及个别的经济事务上，也都如此，因此各个政府都想尽办法要捉住，控制年青人的教育。政府所审定的教科书，常用一些虚伪夸大的词句，把国家的统一、自由、力量、地位与光荣等等观点，都钉牢在年青人和儿童们的心灵上，由于这个心理原因，许多政府把天主教当成是来自外国的敌对力量，误以为教会的活动会干扰到国家的内政、会损害到国家的荣誉；把天主教教友当作是，倾向于外国政治势力的团体；有的国家误认为，同罗马所作的协议也好、订定条约也好、或是有任何的商讨洽谈，都算是国家的一种耻辱；还把天主教教友看成是可疑份子。这不但有失公正，而且违反国家利益，也有不少教友，信德不坚定、个性较为懦弱，在政府的压力下，处处想要表现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国家主义者”。好在，大多数的教友都胸有成竹，不为所动。大致上来说，19 世纪时许多国家，所走的路线都大致相同，当极端的自由主义份子掌握政权时，教会的财产就被没收充公、神职人员也就遭到迫害、教会教育年青人的权利就会被剥夺。等到那一个比较温和的政权建立时，他们便又把某些财产或权益归还给教会，同时也会和教宗达成某些协议。过了一个时期，另一个极端自由的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又开始破坏种种协议。法国大革命以前，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中，任何行业的工人都有自己的同业工会的组织，为的是保障工人的权利，防止资本家垄断独占。本来这种工会的组织，早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盛行，但是，到了十八世纪的末期，自由主义表现在经济上，演变为自由经济的制度。这种自由经济，首先在英国兴起，然后传到法国，它的原则

是“听其自然，随它去吧！”的放任作风，也就是说，凡是一切对经济和商业所加给的任何限制，都应该取消，让工业领袖和工人自由订立合同，他们相信，自由经济可以产生繁荣。这些原则，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都加以实施，取消了工人的一切工会，建立了自由竞争的制度，如果，还是像中古世纪的那种生产制度的话，也就是说，仍旧是家庭手工业的话，这种自由经济的制度，或者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但是在当时，产业界正在进行着产业革命，它在经济和社会上所产生的效果，不亚于法国革命在政治上的效果。许多大型机器的发明，像是蒸汽机、纺织机等，改变了生产的情形，机器代替了手工，而且，只有资本的人，才有资金装置那些价值昂贵的机器。手工业不能和大工厂竞争，只好关闭自己的工作坊，到大工厂去作工，结果在 19 世纪中叶形成了资本社会，造成了两种阶级，一种是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另一种是，只靠工资生活的无产阶级。产业革命的好处是，生产工厂化，大量的生产，因而价格低廉，适合多数人的购买力，但是，这种制度的特色就是“自由竞争”，却给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为了使产品更低廉，就必须大量的生产；为了销售产品，就必须降低价格，这样就得降低成本；为了能降低成本，厂主们就减少工人的工资，并且尽量延长工作的时间。相反的，工人们却一点儿保障都没有了，因为规定工作的时间和工资的一切法规都被取消了，禁止工人联合组成工会，免得工人串连，无论条件多么的苛，工人只有接受，否则就无法生存。

就那时候开始，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流弊，尤其是对女工和童工。比方在英国，就曾经有七、八岁的童工，被迫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他们那柔细的双腿，因为工作的疲乏和劳累，变得衰弱无力，竟然不得不用铁皮捆起来，避免打瞌睡时跌倒。被迫离开家庭到工厂去找工作的人，成千成万的集中在，工厂林立的新兴大城市中，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他们工作的体力。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商品，价格由厂主和工人来订定，生存成了越来越陷入严重的痛苦中的奋斗，以至于没有空暇再顾及宗教的义务了。工资的低廉，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不顾人道的任意延长，不但只是男人，甚至连女人和童工，他们也都被迫去担任过度的工作，结果，所造成的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社会的不道德和不正义，这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后果，使得弱者任由强者摆布和控制，没有丝毫的保障。这种自由竞争的悲惨结果，势必激起反抗和因应，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在法国，有散西蒙和普鲁东等人策划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的口号是“友爱和正义”，但是他们所给人的影响，却无法和马克思相比。马克思把法国的学者所提出的办法当作是“乌脱邦”，他自己呢，则是要在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他自己的学说，他的哲学是“无神唯物论”；他的方法是“辩证法”。他认为，领导历史过程的，不是大人物，像是思想家，或是国家元首，而应该是经济上的事实。产业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极端过度发展，必然引起阶级的斗争和革命，这样，就会出现共产的社会，在共产社会中是绝对不容许宗教，宗教必然没有立足之地，注定要遭到淘汰。这种学说是绝对反宗教的，而且还攻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仇恨和阶级斗争来代替友爱，希望能够加速共产主义的成功。这种自由主义的潮流在经济上、在社会上造成了工人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安，当然也引起了有远见的天主教人士的注意。在法国，是蒙丈郎白尔和自由主义的天主教教友的奋斗，使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初步法律得以通过；在德国，奠定天主教社会理论基础的，最着的名是梅因斯的主教凯特莱，不过真正有权威的综合各种理论，集其大成的，却是教宗良十三，他在十九世纪末叶所颁布的《新事通论》。

接下来，我就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十九世纪的教宗们。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进展，天主教的组织也越加的坚固，以致于教宗个人的品格，似乎已不再像 16 和 17 世纪那样，具有很重的影响力。现代的牧灵工作，有赖于各国的主教、神父以及大批的修会会士，而教会最高的权力机构“梵蒂冈教廷”，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教会事务的中心，教宗的更迭不至于影响教廷的活动。但是近百年来，教宗对教会的命运，仍然有着最大的影响。十九世纪，教宗们的阵容从碧岳七世开始，任期由 1800 到 1823，他是一位高贵的受难者，他引导教会

经历“拿破仑时代”暴风雨，进入较为和平的时代；良十二世继承了他的职位，由 1823 年到 1829 年；下一位继承人是碧岳八世，任期由 1829 年到 1830 年，他继承了碧岳七世的工作，但是，任期太短，前后不到两年，没有留下深刻的治绩；后继者是额我略十六世，任期由 1831 年到 1846 年，他被许多同时代的人批评为，不问世故的反动者。他不问世故，是因为他来自隐修院，那么为什么又称他是反动者呢？因为他全力反对自由主义的狂澜，并且附合追随神圣同盟的政治体系，但是，今天我们是再也不会把这种批判加在他头上了，他的一连串，针对自由主义在神学思想上的教义谴责，实际上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他是小小教皇国的元首，对当时正在酝酿发酵的政治纷扰，当然是毫无力量的，然而在教会内部，他表现了前瞻性的远见，他的名字与美洲教会的发展，以及现代传教事业，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额我略去世之后，荣登伯多禄宝座的，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物，他就是碧岳九世。他的了不起，并不是因为他是圣教会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一位，任期前后长达 32 年，而是在于，他处在圣教会动荡最剧烈的一段时期中，给后人留下了最深远的影响，他似乎是生来就该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秉赋上，他也许不如前几位教宗，在政治上无疑的他铸下了大错。他像保禄三世那样不识人心，对人的判断也是常常犹豫不决。有人说他有虚荣心，他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功，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他个人的成功，不也就是教会的成功吗？其实，对任何一位教宗，不都是同样的道理吗？由于教宗们独特的职责和身份，使他们无法谦逊地隐藏起来，不过，不论如何，碧岳九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物，从来还没有那一位教宗，像他那样的获得全世界天主教友的爱戴，以及教外人士的尊敬。在他那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多难的任期中，教皇国好几次被围困，他都以无比的尊威对抗厄运，在梵蒂冈渡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七年。相反的，这七年为教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3.4 教宗碧岳九世

教宗碧岳九世任期的最后七年，教皇国数度被围困，他都以无比的尊严，对抗教皇国世俗政权终于面对终结的厄运。为了对抗意大利政府，对教皇国的领土和治权的武力侵犯以及暴力强占，教宗碧岳九世拒绝了，所谓的保证法和赔款，他自动的禁锢在梵蒂冈城，自称是“梵蒂冈的囚犯”，以他那钢铁般的意志，终身未再离开梵蒂冈一步。这么大的困扰，并没有能够阻止，他对教会完成无与伦比的事业，他除了同世界各国保持关系，并且签订了许多协议，除此之外，他还以两端新的信条充实了教会，同时也对当时的种种错误给予严正的批评，这些为他赢得了尊严和胜利。下面教宗碧岳九世在他任内期对教会的功勋。

在碧岳九世的任期内，天主教会在地理上的分布更广。1850 年，碧岳九世在英格兰建立圣统制、1858 年在荷兰建立圣统制，他总共设置了 29 个总主教区和 132 个主教区。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海路和铁路的运输改善了世界的交通，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加的密切，到罗马朝圣的人创下了新的纪录。1854 年，碧岳九世裁定了“圣母自始胎未染原罪”成为教会的信条。圣母玛利亚始胎不染原罪，本来不是一端新的道理，而是早在初期教会中，传承下来的传统信条，到了中古时代，方济会的神学家们，尤其是真福董思高，他曾经大力卫护。在文艺复兴时代，教宗西斯笃四世的时候，建立了“圣母不染原罪”的瞻礼，指定在十二月八号举行。就从那时候开始，对圣母玛利亚这种特殊的信仰也就越传越广，教友们也非常的爱慕，不过一直都还没有被教会钦定为一端信条。教宗碧岳九世便在 1854 年，向全球各地的每一位主教发了一份公函，请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在 603 封回信中，有 546 封回信都恳切的要求教宗钦定，圣母玛利亚“始胎不染原罪”为教会当信的道理，于是教宗碧岳九世就在 1854 年的十二月八日，于圣伯多禄大教堂当着两百位枢机和主教们裁定了“圣母玛利亚自始胎，便被天主的特恩所保护，丝毫未染原罪，成为天主启示”的道理。他认为，为宣布这个信条，并没有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他是以宗徒圣伯多禄、圣保禄，以及他自己身为教宗的特有权威行事。16 年以后，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中，隆重地承认了教宗的不可缪错的特权。十年后的 1864 年，碧岳九世因罗

马问题所激起的混乱思想中，他认为，揭发当代错谬思想的时代已经成熟，于是就以《何等关心》的通谕，同时对被历代教宗所谴责的邪说“目录”，正式加以谴责。教宗很确定的认为，反对教会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某种或某一部份的谬说，而是来自“自由思想”的污染，这种自由思想对个人生活的问题也好、对社会生活的问题也好，所给予的诠释，和教会的信仰完全不符合。而 19 世纪的中叶盛行着，对科学狂热的潮流，认为科学能够创造一切奇迹，也可以用科学来诠释，天主的启示所已经说明的一切难题，这股狂热的潮流，可以和文艺复兴时代对人文主义所点燃的狂热，以及在 18 世纪对哲学的无限信赖相比。教宗碧岳九世所谴责的是“唯理主义是自然主义”，“唯理主义”的思想否认了一切超越自然的天主的启示。自然主义则认为，社会的建立和治理不需要宗教，而是一种在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教宗也谴责，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无差别主义和法兰西主义。这项“目录”，激起了严重的动荡不安，给了教会的仇敌们，诬蔑教会箝制一切自由、阻碍社会进步、排斥近代的文明。显然的“目录”只罗列了曾被谴责的字句，并没有很清楚的陈述，它们之所以被谴责的理由，有不少天主教的信友也感到困惑，特别为许多对神学的规则不熟悉的人，尤其不容易明了，更何况，为了能正确的判断被谴责的内容，必须以教宗谴责它们的原来文献为主才对。奥尔良的主教杜邦鲁，起而为教宗辩护，将教宗谴责的真确意义加以详细的说明。杜邦鲁主教证明，教宗的文献是给教友社会的理想定型，我们应该是向着这个理想去发展，但是并不禁止教友们适应目前的生活条件，把教友的生活纳入当时的社会中，进而使之基督化；杜邦鲁主教，他又把“目录”中每一节的确实意义，说明得清清楚楚，澄清了许多观点和误解。

2 梵一大公会议至一战

2.1 梵蒂冈一次大公会议

距离最后一次所召开的“特力腾大公会议”，圣教会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而 18、19 世纪间的一百年中圣教会备受种种困境，面对教难和侵犯教会基本权利的现代思潮的攻击下，教宗迫切需要，把教会体制的要点予以澄清并加以裁定，至少要在天主教人士中，不至于再有争论才好。公元 1868 年，教宗宣布召开大公会议，这次大公会议的目的是，向仇视信仰和反对教会的趋势示威。教宗宣布召开大公会议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人希望对“教宗在信德道理上不能错误”的信条能够加以确定。其实，连续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端道理，在天主教中各个神学派别，始终只把它当作是一项神学的理论，在教会的内部，从来就没有引发过大的争论，甚至在当时，这项道理也并没有什么“正确”或是“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个“它是不是应当相信的启示真理的问题”。我用神学术语把它说得更清楚一些，它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非是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应该把它定为信条的问题。”1869 年的 12 月 8 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就在圣伯多禄大教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共有 747 位枢机和主教，盛况超越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大公会议。由于出席人数的踊跃，会议的进行遇到许多困难。1870 年 3 月以前，主席团决定开始讨论大家最关心的“教皇国是否不能谬错”的问题。主教们因意见不同而分成两派，不赞成的主教们，他们所考虑的是教会的利益，其中不乏许多杰出的善牧，他们担心这项议题，如果被通过，定为信条时，将会助长敌人的骚动，使人难以皈依天主而造成不幸的后果；而赞成的教长们认为，问题既然产生了就不应该逃避。连许多没有出席大公会议的神学家们，以及教友们之间，也展开了笔战，直到 1870 年 7 月 13 日，才举行投票，其中有 451 票赞成定为信条，62 票保留，88 票反对定为信条。有人跪着恳求教宗不要宣布这个道理定为信条，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连教宗也无法挽回了。有 55 位主教在辩论终结以前，便请求教宗退席离开了罗马。7 月 18

日正式投票表决，只有两张否决票，“教宗不能谬错”的信条正式宣布时，连这两位否决者也公开宣布表示赞成了。碧岳九世便声明裁定，“教宗不能谬错”是一项信德的道理，同时还明确的说明了所涵盖的界限，那就是“当教宗由职权，以全体教友的司牧和最高导师的名义发言时，依据他至上的宗徒权力，裁定有关信德或品行的道理时，享有绝无错误的特权。”全世界的教友都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教宗绝无谬错”的信条。意想不到的，第二天“普法战争”爆发，返回自己教区的主教更多了。9月比埃蒙人占领了罗马，大公会议只好宣告无限期的休会，而在所预定的52个议题当中，只完成了两个。不久以后，曾经表示反对的主教们以非常正确的态度，顺从了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是在德国、瑞士和法国，少数的反对者所担心的事发生了，有了离异的事件。德国的离异份子组成了旧天主教会，而荷兰的“杨森派”替这群离异的旧天主教会，祝圣了一位主教；在瑞士则产生了所谓的“基督徒天主教会”，在文化战争期间，旧天主教徒曾经获得普鲁士、巴登和巴伐利亚等政府的鼓励，在1879年时，人数有五万人，大部份是知识分子，这真是德国天主教的一大损失，就从那时候起，旧天主教徒的人数不断的衰减，到目前，大概只剩下几千人左右。

虽然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没有圆满闭幕，但是，它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那时候，大家以为大公会议提高了教会和宗座的声望，因此所有反对天主教会的人都很讨厌这次会议，奇怪的是，反对的情绪几乎完全都集中在“教宗不能谬错”的这一端教义上，许多人都忽略了，在当时也同时决定的另一端信条。其实这一端要远比“教宗不能谬错”的道理更加的重要，这就是“教宗具有对全体神职人员和每一位教友的统治权”。这一项信条，使“加利冈主义”和“弗博宏尼主义”的旧理，以及英国国教所主张的罗马、东方教会、英国国教相平等的理论是不可能成立，无法兼容的。大公会议并没有改变教宗和教会，但是大公会议却阐明了教会的基本教义、以及教会的中央行政制，借着“梵蒂冈大公会议”而达到了无限权力的境地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自从召开这次大公会议以来，教会行政机构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教会的内部，不可能有一般所想象的那种中央集权制。因为每一位主教在他的教区内，都享有训导权，这和教宗对全世界教会所有的统治权，都是来自同一个“神权”。在这次大公会议中，有许多开始讨论而没有结论的问题，并不是毫无用处，当碧岳十世开始重编教会法典时，大多都是根据这次大公会议的议案。

公元1870年，当意大利的军队，趁普法战争时，法军退出罗马的空隙，以武力强占了罗马，教宗从此自囚于梵蒂冈，一直到他死，未曾离开过梵蒂冈。教廷的国土也全部丧失，因此，也宣布教皇国的结束。这样，教宗在尘世的权力也全部终结，教会的敌人预料说，天主教已经到了穷途末日了，各国政府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教会和教宗了。在“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以后，又活了七年，他在痛苦事变中的尊严、在逆境中的坚贞、他那质朴的慈祥，为他赢得了普世信友日益增强的尊敬。对“教宗绝无谬错”的裁定更加强了他的声望，当尘世权力和国土丧失的时候，反而使教宗摆脱了治理国事的烦扰，对他的神权反而更为有利。1869年是他晋铎金庆；1871年是他当选教宗的银庆；1876年则是他就任教宗30周年；1877年是他荣升主教的金庆。这些庆典，就好像是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全球各地的教友络绎不绝的到罗马来向教宗致敬，天主教教友衷心的愿望，就是瞻仰教宗的慈颜，这也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教友们因教宗的职守而爱教宗，也因教宗而爱他的职守，对教宗怀着宗教性的崇敬，这并不因为教宗高人一等或是具有什么超然的能力，非天主教友是不易了解教友们对教宗的爱。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会，年代大概界定在公元1870年到1914年间。1870年，不但在教会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里程碑，也正从那时候开始，整个欧美世界，开始了一连串的事变和社会改造，终于使人类走上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后续效应，一直到目前，仍然不停的在发展着。在这短短不到50年的时间中，比较重大的事件，在政治方面，有“普法战争”，它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意大利也因此完成了统一；有国家主义在欧洲和南美洲的进展；有非洲的开发、殖民地的建立、有民主思想的普遍抬头等四个大的项目。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一是实用科学的进步，二是机器的发达，三是工业的迅速扩张，其结果是，城市的繁荣和人口的集中，再加上交通工具的进步，不但人及货物运输都大为方便，而人类的思想也很快速的由世界的一端传达到另一端，从此以后，在地球的某一处所发生的任何重要事件，就会很快的影响到整个儿世界。

2.2 现世主义的冲击

现在，就介绍“现世主义”。我们知道，思想和信仰领域内的变化，并不亚于社会和政治对教会的影响。18世纪的启蒙哲学，虽然曾经反对启示、反对基督的神性，但是，连那创造万物的真神也不信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而到了现代，连这一点也遭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时髦的学说或是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它们就是主张，在经验的领域之外，无法知道什么确实的实情。其中影响到对神、对天主的信仰最深，打击最大的是法国的哲学家孔德，他认为，只有能够直接的被观察得到的事物，才能称为科学，他把人的思想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神学的，或是宗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切的现象都是出于神的意志，由神所创造。第二个阶段称为哲学的形上学的阶段，人是在抽象的概念中去寻求解释和答案。到了第三个阶段时，人就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不再要求认识世界的起源和归宿，只是探讨现象彼此之间的规律便足够了，孔德称这样的哲学为“实证哲学”。他避开神、避开精神、避开灵魂等等，而这些在已往，都被看成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的问题。他不再谈宗教问题，他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事了，当然也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所犯下的错误就是，他所提出的三个连续的阶段，其实呢，应该是对事物三方面的三种思想方式。真正的进步，则是要把这三方面清晰的分开来，然而实际上却是共同存在的，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孔德想用已经被他所神化了的“人道”，来代替降生成人的天主，他为这个新宗教拟定了日历、礼仪和许多的节日，这一切都是模仿天主教的敬礼，他还预言说，终有那一天，在巴黎的主教座堂中，十字苦架将要被人的塑像所取代。他这种“人道”代替“神道”的新宗教，比起法国大革命时所建立的类似敬礼，并没有更大的成就，但是，却对十九世纪末叶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此外，还有其他的思潮，也朝着同样的方向激荡，许多人被惊人的科学进步冲昏了头，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的幸福日子就快来临了。很不幸的是，物质越进步，假如道德不同时跟着进步，会为人类产生更恶劣的浩劫。然而人人憧憬着进步，“进步”这个名词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号，在书籍报章杂志上到处可见，甚至谈到了“科学的宗教”这种说法。

哲学家不只是攻击信仰，他们还攻击圣经，早从18世纪以来，便以历史批评为名，从事攻击圣经，像是德国新教的解经者，他们就是用“唯理主义”的成见，认为奇迹和超性都是不可能的超性之谈。凡是圣经中与他们的理论不兼容的时候，就都把它当作是神话或者是传奇小说之类的作品。一名叫史特劳斯的作者，写了一本《耶稣传》，在书中，他就认为奇迹和基督的复活，全是由耶稣的门徒们的幻想所伪造的，用来欺骗人的话罢了！史特劳斯的这种思想和看法，被雷南拿来加以发挥，那就散播得更广了。他在1863年也写了一本《耶稣传》，虽然有很多人对他所用的历史方法严加批评，缺乏学术上的理论，但是他的文笔很通俗化，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西欧各国很快的就有了翻译本，他删去了福音中与自己的看法观念不同的章节，他对耶稣基督，虽然口口声声极力的称赞，但是他把有关耶稣基督“天主性”的部份全给取消了，他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

在现代主义思潮中还包括有马克思主义和现世主义，我就先谈马克思主义。记得在上星期的单元中，我曾经跟各位简单的提到过，不过没有谈到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我们知道，资

本主义的进展，也助长了工人群的无信仰，成千累万无产阶级的人，放弃了他们所生长的农村，向大城市涌进，与他们的长辈和故乡失去了联络，劳工像商品一样的被出卖，对生活的挣扎也就越来越尖锐了，对宗教也无暇顾及了。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是用来麻醉人民以便奴役他们的工具，所以为了使人民获得解放，就应取消宗教。”他这种论调，得到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工人人们的回响和认同，因为他许给人民，在世界上可以获得幸福的天堂，那是资本主义所不能给予的。

信仰无神共产主义的人，当时还没有取得政权，也还没有对信仰天主，也就是信神的人公开宣战。在 1870 年到 1914 年的 45 年中，教会遭到政府不少的攻击，除了只有少数几处之外，还没有以“现世主义”为借口，而发生公然流血的迫害、斗争。我们称“现世主义”为“世俗主义”，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及对神的崇拜，这种“现世主义”在 19 世纪的末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就好像是“自由主义”在 19 世纪中叶受人欢迎一样，它也和自由主义一样，用了各种暧昧的说法。其实，我们只能说，现世主义是有意的，想把世俗之事和宗教性的事务分开。如果提倡现世主义的人，只是限于，把国家的权力与教会的权力，公正而清楚的分开，他们又何至于和教会冲突呢？何况教宗良十三世当时也已经清楚的讲明了，但是，他们在现世主义的借口下，实在是想用一种新的观念来改变人的生活，而许多现世主义的煽动者是无神派。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宗教应该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取消，至少呢，可以拿它当作是私人的事情而予以容忍。现世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社会，尤其是针对天主教。以现世主义为借口来攻击教会的欧洲各国中，分析他们战斗进行的方式和持续不断的情形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从各级学校和社会各阶层中，达到消灭宗教思想。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在拉丁美洲，都用了同样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正与往后产生的极权国家想要消灭宗教时，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由于宗教的信仰已经深入人心，是很难正面攻击得倒、消灭得掉的，所以，他们才一步一步的慢慢儿的进行。他们这种持续的反宗教行动，可以由“共济会”的活动来加以以说明。这种秘密的“共济会”，表面虽不激烈明显，但是却在各处活动，我曾经在前几次的节目中，跟各位提到过“共济会”。这种组织在法国革命以前所鼓吹的是“自然神教”，到 19 世纪时，在他们的规章中已经把“宇宙大建筑师”的说法取消了，决心变成了“无神派”，仇恨教会已经成了他们活动的主要动机。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里，许多政府的要人都是“共济会”的会员，他们都遵行着上级的指示去行事。还好，在当时的教会领袖，是一位识见特别高明的教宗良十三世。

2.3 教宗良十三世的成就

当良十三世在 1878 年当选教宗时，已经是 68 岁高龄的老人，外表上看来好像很脆弱，但出人意外的是，他竟然能够展开他那坚强的活动能力，长达 25 年之久。良十三世，他生于罗马的望族，曾经奉派为教廷驻比利时大使，随后在教廷的领土内，做了 32 年的珀鲁查主教。欧洲思想界和当时的各国政府的政局，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都是他所亲身经历的，他埋头深思，想出了整套的道理和实行的计划，在他长时间的教宗任期内，加以推行。由于他对教会的忠诚和热心、对政治也有尖锐的敏感度、而且又有高度的智慧，使他能分辨得出来，那些事行得通，那些事行不通。那么，教宗良十三世行事的大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教会只是保持消极自卫的态度，教宗们为了维护道理的纯正，发出了许多谴责和惩罚，再加上治理教会的神长们，又都是在革命所激起的混乱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亲身经历的种种患难，使他们对自由主义感到强烈的恐怖，他们认为教会所遭遇到的种种灾难，都是自由思想惹的祸，除了杜绝这种自由思想，好像看不出其他的解救办法，他们

动辄就以开除教籍，来攻击时髦的文化。有许多天主教教友，他们和企图恢复革命以前制度的政党结成一气，彼此联合起来，但是，他们却不承认，历史是不能逆转倒流的啊！教宗良十三世，就洞悉了这中间的危机，他深深知道，只是一味的反对，拒绝接受这些新的思潮是没有用的，如果教会能够以正义的力量出现的话，那么民众就能分辨得出，这股似是而非的思潮，而与它划分界限了，但是，也必须避免教会和现代的世界关系破裂。他深知对过去的一切空怀悲叹，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要采取有建设性的积极态度，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原则。教宗良十三世一面坚决地维护着，过去历代教宗所坚持的道理，尽力使教会和现代世界协调，他愿意分清楚，什么是原则、什么是该指责的错误倾向；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实。教会有责任把基督的精神，灌输到可以接受的事实当中，他先后公布了一连串的通谕，把有关信条或伦理方面的专著；把福音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贴合在世界经常变动的环境中。在一连串的讨论动摇人心问题的通谕中，在在的都显示着他识见卓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工人地位的《新事》通谕了。1891年的五月，教宗良十三世给全球教友，指出了指导劳工组织的规范。在此之后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纪念《新事通谕》颁布70周年，对其中所颁布的《慈母与导师》通谕中，他对《新事通谕》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很少有教宗的言词，以所谈题目的深刻，广阔和冲击的力量，比它更有普遍的反应，它给教会的活动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最高的牧者，把贫苦受压迫者的痛苦、怨叹和希望当作是自己的，再一次的挺身而出，做他们权利的护卫者。”这份通谕被称为“劳工大宪章”。

18世纪末期，思想界所流行的时髦思想，我们统称它们为“现世主义”。我们也谈到无信仰的趋势日渐猖獗、马克斯主义的流传以及对圣经的种种攻系，教会在良十三世的领导之下，他如何一方面护卫着教会信仰的纯正，而另一方面又尽力使教会与现代世界协调。他颁布了许多通谕，每一道通谕都是有关信条或伦理的专门著作；他把福音不变的原则，贴合在世界经常变动的环境中。在节目的最后，我曾提到良十三世的一连串通谕，构成了庄严道理的整体，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在1891年5月所颁发的《新事》通谕，被大家公认为《劳工大宪章》，向全世界指出了，指导劳工与资本家和平共融的规范。今天，我们稍微再花一点时间，对被称为“劳工大宪章”的《新事》通谕，它的缘由和精神做一些说明。自从产业革命以后，使世界各地原有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自由经济的制度也随之兴起，这种制度的铁律就是自由竞争，但是却给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新事》通谕中，良十三世把劳工朋友们的悲惨处境完全的揭发出来，他说：“劳工们毫无保障地任由资本家、不仁道的厂主们支配，成了贪得无厌的竞争者们的牺牲品，吃人的高利贷、工商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垄断了市场价格，这一切都给无数劳苦的工人大众，加上了奴隶般的桎梏。”他谴责自由经济，将人性的尊严看成了机器，把人的劳力看成为商品，任凭双方指定价格买卖，它对工人的不幸、阶级之间的仇恨应负大部份的责任。要真正的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在成立符合正义规则的世界劳工组织。政府为了保障劳工阶级的生活和利益，是有权力而且有责任干涉的，厂主和工人应该成立协会，保障他们的利益、解决工人生活的问题。“劳工大宪章”的《新事》通谕，给天主教的信友们布置了、也扩大了社会的运动，到处可见社会的事业热闹地展开了活动，也看到了信友们提倡，使符合通谕原则的法律得以通过成立。按照正义公正，在厂主和工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所强调的、所召告的是劳工的尊严，在物质和道德方面，都把工人的地位提高了，也为教会和教宗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谈，教宗良十三世在位时与欧洲各国政府的关系。良十三世虽然热烈的希望和各国协调，也多次的向许多国家所制订的反宗教法律，提出抗议，在这一点上，最使良十三世关心的是，三个新组成的政府，那就是日耳曼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和意大利王国。当他登基时，教会和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紧张，良十三世与两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宣告成功，不过，良十三世虽然满怀善意，本身也拥有外交天才，但是，却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成绩微乎其微。信奉新教的普鲁士，把日耳曼境内的各个大小邦国统一起来，在1871年成

立了日耳曼帝国，而天主教教友的人数只占了全日耳曼帝国的四分之一还不到，当时的首相就是著名的俾斯麦。一方面因为他信奉的是新教，再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国内推行的是专制政体，所以俾斯麦强烈的仇视天主教。俾斯麦为了反对天主教会，曾经进行了历史上所谓的“文化斗争”。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打击天主教便是为了文化斗争。他用 1871 到 1875 年间所通过的一连串法令，努力的想把教会完全的置于政府的手里，由政府来操纵控制。他剥夺了各修会会士的教育权，把一切修会会士驱逐出境。首先向耶稣会开刀，然后指向其他各大修会，强迫修士们到国立在大学里去攻读神学，天主教的神职应该由新教的政府来任命才算有效。主教们对这些剥夺教会自由的措施，自然是提出抗议，因此不少的主教被逮捕下狱，好几百位司铎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甚至有不少被放逐流亡到国外。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以他那坚决的意志，决心贯彻到底毫不让步，非要打倒教会在德国人心的影响绝不停止。他曾经声明说：“我们决不去坎诺萨堡。”坎诺萨堡是影射中古时代亨利四世向教宗额我略七世忏悔的地方。俾斯麦估计天主教信友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抗，但是，却出乎俾斯麦的预料之外，天主教的信友们，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党”的政党，在几位很有分量的领袖的领导之下，纪律非常严明，例如凯特来主教，还有一位名叫温陶尔的天才政治家，他同时也是一位信仰虔诚热心的天主教教友。这个“中央党”，代表着国会中一份相当强的力量，俾斯麦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是无法统治世俗的。最后，俾斯麦终于让了一步，史学家称它为“小型的坎诺萨堡”。刚登基不久的教宗良十三世，以他那精明的外交天才，与德国重新建立了已经中断了十年的外交关系，反宗教的各种法案，也就逐项取消，一直到 1887 年，完全绝迹。天主教教友组成的中央党在国会中越是奋斗，也越加坚强，天主教会也就很快的把学校、医院、大学以及许许多多的有关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协会，又重新建立起来，到 19 世纪末年时，已经成为天主教世界的模范。1885 年，俾斯麦作了一件创举，这对由新教所掌控的政府而言，可以算是很惊人的。当时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了太平洋上的卡洛林群岛的占领问题，而发生了争执，俾斯麦竟然向教宗呼吁，要求教宗良十三世出来作两国之间的仲裁人，西班牙也同意邀请教宗当仲裁人，良十三世所拟定的仲裁协议也被双方所接受，这样，两国避免了一场战争，这也足以证明，教宗良十三世的声望有多么高了。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良十三世与法国的关系。在日耳曼帝国境内，天主教教友只是占了少数而已，但是，教友们都一致的服从他们的领袖，也就是各教区的主教们和教宗。由于他们的团体一致，得以迫使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都不得不让步。但是，在法国就正好是相反了，天主教教友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不过，在现世主义攻击教会的奋斗过程中，却不能得到胜利。您是否觉得很奇怪呢？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环境的不同。各位还记得，反对宗教的言论、服尔泰的讥讽、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对人心的影响很大，也因此减弱了法国天主教信友的宗教生活和信仰的程度，所剩下的只是外在的形式和礼仪了，像是领洗啦、结婚啦、殡葬啦。更何况，教友们在政治的立场上也已经四分五裂，在短短六十年当中，法国先后经历了六次的革命，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轮流接替，而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有自己的拥护者。拿破仑三世失败以后，只不过由多了一票的“共和党”取得了政权。许多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们，都希望因政治形势的转变，重建一个有利于教会的“君主政体”。他们对“共和政体”也不全都同情，再加上不久之后，在国会中的激进党又占了多数，激进党的党员们虽然对许多问题意见分歧，不过在仇恨天主教的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自居，而加入“共济会”的也不在少数，更有人认为，如果不成为现世主义的信徒，就不是法国良好的共和国民。他们没收教会学校、驱逐修会会士，他们反对教会的花样很多。而天主教人士对用各种方法欺辱他们的政权都感到苦闷，但是，他们却又不能像德国的天主教教那样，采取一致的行动。良十三世注意的观察法国政局的动态，痛惜法国对宗教的仇视，他也认清君主政体已经走上了历史的不归路，于是他向法国的信友们建议，不要把宗教的问题和政体的形式问题联在一起，信友们最好能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好能在共和的政体下，

设法改善反宗教的立场。为了拥护教宗的愿望，许多信友们牺牲了自己的爱好，对共和表示了赞同，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平息反教者的仇恨，苟安了几年以后，攻击天主教的运动又死灰复燃，而且还更变本加厉，一连串的立法，触及到残存的修会，他们有的被贬到羞辱而无法接受的地位、或是遭到解散；他们的财产全被充公，天主教教育因而遭到致命的打击。教宗良十三世对调解天主教与法国政府的努力，显然是失败了，教宗非常的悲痛。法国政府对教会的攻击在良十三世去逝以后，又延长了好多年，但是，正因为良十三世的忍耐，久而久之，到教宗圣碧岳十世在位时，终于发生了效果，人心也逐渐的平服。

紧接着，我们来谈谈教宗良十三世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关系。良十三世他对意大利保持着和碧岳九世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他仍然坚持碧岳九世对侵占教廷领土的抗议，何况“反神职主义”在意大利也与法国一样的激烈。残存的修会解散了、罗马的的修院被充公了、神职人员也得服兵役；教育机构排斥宗教教育；政府更纵容报章杂志对教宗恣意的凌辱诬蔑。当碧岳九世的棺柩迁葬的时候，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点，失控的暴民险些把教宗的棺柩丢到台伯河中，事态的严重可想而知，以致于良十三世好多次想放弃罗马，避居到国外，因此在这种敌对的情形下，罗马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了。

良十三世在 1903 年，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逝，枢机们选出了出身贫寒的撒尔多枢机为继承人，他就是圣碧岳十世。他在当威尼斯的宗主教之前，曾经担任过副本堂、本堂、修道院的教授和神师，然后担任满度亚的主教，所以，他对牧灵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枢机们之所以选举他，则是由于他的圣德和声望，那是，凡他所呆过的地方，都是有口皆碑，他也绝没有想到他会被选为教宗。他虽然赋性温良，但是个性刚毅，当他认为天主教的利益发生了问题时，他便百折不挠去克服。在他担任教宗的任期内，他都努力的实现他的格言：“在基督内建设一切”。当碧岳十世即位时，教廷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十分的紧张。1903 年，法国与教廷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取消了一百年前拿破仑与教廷所签定的协约，宣布政教分离。这种分离，竟然是在最严酷的条件下提出来，不但对神职人员已经商讨妥当的津贴待遇被取消，这笔津贴待遇，原本是大革命期间被充公的教产的赔偿金，这显然是一件违背正义的事，政府并且声明：“政府才是一切财产的主人，只有专门作为敬礼天主的圣堂，才可以交给由各地方所选出来的委员会来自由处理。”而委员会又是由俗人所组成。为了避免教会的财产被完全剥夺，教宗碧岳十世要怎么办呢？

2.4 教宗碧岳十世的成就

教宗良十三世在他的任内，一方面努力捍卫教义与信仰、维护教会的尊严；一方面周旋于受到现世主义无神论影响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尽力使教会与各国能够协调，把基督的教义和精神灌输在可以接受的事实中；我们也用了相当的时间，特别介绍了良十三世所颁布的“劳工大宪章”，那就是《新事》通谕。今天在节目中，要为您继续播出教宗良十三世的继承人，也就是在 1903 年登基的圣人教宗碧岳十世，他在位的十年内，教会与欧洲各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教关系。我们上星期已经提过碧岳十世即位时，教廷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的紧张，法国与教廷不但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取消了，一个世纪以前和拿破仑所签下的协议，宣布政教分离；在上星期的节目中，我还跟各位说过，这种分离，是在最为严酷的条件下完成的，不但取消了，原来已经商定的神职人员待遇的给付，而且还声明政府才是教会一切财产的主人，包括了大殿、圣堂、学校、修道院，以及主教的住所，只有专门用来敬礼天主的建筑，是交给各地方自己所选出来的委员会来自由处理；我也跟各位说过，这种委员会大都是由世俗人组成，为了避免教会的财产被完全剥夺，有些人竟然答应了组织这样的委员会，那么，身为教宗的碧岳十世，他是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呢？这才是我

们所关心的问题。碧岳十世，他在焦思熟虑之后，以他那刚毅的个性，甘愿冒着可能会导致形成裂教的危险，拒绝接受，这种剥夺教会正当合理的自由。教宗碧岳十世并不是不知道他所作的决定，会使得天主教会，在法国境内的财产会被剥夺一空，同时全体神职人员，也要被迫去度完全赤贫的生活，然而法国的全体主教，对教宗表示一致的服从，使当代的人都为之喝采，称赞不已。但是却没有料到，法国政府有鉴于天主教方面，这种坚强不屈的态度，竟然不敢全盘执行这项立法，圣堂却让神职人员和教友们自由的使用。法国的天主教，虽然因此而一贫如洗，却因为这样的净化而显得更加的坚强有力了。全法国的教友都团结起来，共同应付这个新的局面。由于教友们的慷慨解囊大力捐献，使得新的修道院、新的医院、新的学校又陆陆续续的建造起来。这种所谓的政教分离，在现世主义者的心目中认为，必定可以使法国天主教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被消灭，没有想到反而成了法国天主教蓬勃更新的良好机会。碧岳十世对所谓的“现代主义”，也表现了同样的刚毅和睿智。现在再让我把“现代主义”错误之处，再作一次简单的说明。这样会更明白碧岳十世是如何的坚强而又充满智慧。

所谓“现代主义”，应该说是一种经过很好的伪装而形成的一种错谬的思想潮流。这是由几位思想偏差的神学家、教友学者所绞尽脑汁想象出来的，他们原来的目的，是想使天主教教义和现代的思想相互协调，出发点和用意并非不善，而且也正是教宗良十三世所曾经想要尝试的方法，但是，以教会的立场，所不能接受的，就是“现代主义”表面上以协调为借口，以致于染上了反宗教的毒素，甚至于危害了、颠覆了信仰的基础，不但无法保护仰，反而使得信仰迁就“现代主义”的需要而变了质，甚至更进一步，想要否认福音中所记载的事件、所拥有的历史价值，他们把所有的“超性”都当作是无稽之谈的神话，根本不足为信。提倡这种错谬思想的人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都是修道院的、或是大学的教授、以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声明，并不是要反对宗教，而是想要从内部重新加以改造，但是却使纯正的宗教变了质。当他们被教宗碧岳十世谴责时，他们在外表上毫不迟疑的表示顺服，但是，他们仍然用笔名继续散布着他们的错谬和毒菌。教宗碧岳十世看透了、洞悉了这种“现代主义”的危险性，因此以坚定刚毅的立场，在1907年以取名为《可痛苦的》通谕和取名为《牧者》的通谕，揭发了“现代主义”的谬误，还施以严厉的绝罚，他们当中大部份都顺服于教宗的训导，只有少数几个表示反抗，叛离了圣教会，“现代主义”从此也就一蹶不振。这是自从“马丁路得”改教以来，最大的祸害，也就完全被摒除了。

前面，我们介绍了教宗碧岳十世，他为了保卫教会的独立自主和信仰的完整所作的决定。接下来，介绍的是碧岳十世在他的任内，对教会的建设和革新有那些具体的改革。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对圣体圣事所施行的改革。16世纪的特力腾大公会议，曾经劝导教友要勤领圣体，但是，在18世纪时所流行的“扬森主义”思想，一直到了20世纪初期，仍然没有完全的消失。在19世纪的末期，虽然有一股逆流推动教友每天领圣体，但是对积习已久的风气仍然不能扭转过来。教宗碧岳十世仍然以他那果决刚毅的态度，斩断了这个问题。在1905年所公布的通谕中声明，他说：“参加每台弥撒的教友，不可只以神领圣体便认为已经满足，希望教友都能在每次的弥撒中实领圣体，只要是没有大罪，并且有正直的意向，便可以每天领圣体。”此外，对儿童初领圣体的规定，在碧岳十世以前，得满十二岁才准开圣体，到了碧岳十世时则认为，只要儿童本身能够明白教会中最重要的信条和真理，同时也能明白圣体不同于普通的面饼，就可以准备为他们开圣体。这两个上谕，对教友们有很大的鼓励，一直到目前，教友们都深受惠。我们知道，碧岳十世在尚未当选教宗以前，已经对牧灵工作很有经验，对教会管理上的许多缺点和弱点，也都有亲身的经验，而当时的教廷组织，仍然还保留着教宗西斯笃五世所制定的组织，当然是问题重重、困难多多。碧岳十世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全部加以改组，“圣教法典”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累积，已经是漫无头绪，难以符合时代的需要，碧岳十世决心加以整理，他下令组织委员会，命委员们负责汇集整理删定，重新编定了更为明确、更合逻辑的《天主教法典》，内容上与现代国家的民法很相似。这部

《天主教法典》，虽然没有能在他的任期内公布，但是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由他的继承者本笃十五世上任后，才予以公布实施。教宗碧岳十世对教会礼仪也有所改革，他是圣乐的复兴者，他恢复了“额我略圣乐”应有的地位。

2.5 教会在十九世纪的内部生活

2.5.1 教会与社会的情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碧岳十世的眼光深远，早已看出世界将陷入大战争，这场战争也必然惨烈而且还会祸延全世界，他不断的呼吁全世界教友热切祈祷，希望能避免这场战争。曾有军人请求教宗祝福他们的武器，他回答说：“我们祝福的是和平。”他因无力阻止这一场人类自相残杀的大悲剧，深感痛心，因而影响到他的健康，使他提前去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开战后两个星期，他便结束了生命，全世界痛失伟大的教宗，对他的圣德也备加钦敬，在他去逝后四十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将他正式列入圣人的品位，他也是自16世纪碧岳五世以来，第一个享受到这项荣誉的教宗。碧岳十世这位圣人教宗的去逝，象征十九世纪的结束。

近两三个月以来，我们的主题，几乎都在介绍圣教会为了攻斥过分偏激的自由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世主义和现代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教会似乎只是防卫的姿态而已，而且也似乎已经显得筋疲力尽，无力再顾及其他方面了。其实呢，这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看法，在圣教会的历史中，最先浮上抬面的，当然是一些外表的事变，举些例子来说吧！像是同各国政府的纠缠争辩啦、同世俗权力的斗争啦，诸如此类的事件的一面，这一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深藏在内部的情形，应该是教会的内部生活、和天主的圣冠在人类灵魂深处的行动。如果想要批判衡量一个时代，在精神生活上，程度的深浅所蕴含的实质，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精神生活的程度和实质很难量化，而且用数目字来加以统计。不过，话又说回来，每一个时代所呈现的宗教活力，它的效果，必然能够从表面上看得到的，我不是也曾经提到过，不少神职人员的虔诚热心，所表现的高度宗教生活；新修会的兴起，因着英豪的德行表现而册封的新的圣人、圣女；还有那些英勇的传教士们，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去向亚洲、美洲、非洲的教外人传布福音，这些都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会所呈现的活力，而且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教会付出的奋斗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信德的表现最好的地方。十九世纪的圣教会，在内忧外患相互冲击之下，被自己的几个不肖之子所出卖，正面临着严重的灾难，甚至仇敌们口口声声说，教会就要被消灭了的时刻，教会不但屹立不摇，而且还产生了新的力量。有些学者说，十九世纪是一个宗教式微的世纪，显然是不正确的。虽然在许多传统的老教友国家，无神论骗去了许多教友，许多领过洗的人，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但是在另一方面来看，圣教会是比前一个世纪表现出更大的活力。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的报导，有关神职界重新振作的情形。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东征西讨所造成的战祸，给神职界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不但使许多神父丧亡，也使不少神职人员逃往海外，没收教产、关闭修道院，造成神职人员几乎枯竭。好在和平一旦恢复，教宗和主教们所关心的许多大事之一，就是即刻设法发展或创建新的修道院，极力挽救这种颓势，而所期待的效果顺利的实现。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各地修道院都招满了修生，以意大利为例，根据1870年的一项统计，教区神父的人数已有七万人，法国也有五万六千人，西班牙的人数也达到高峰。人数的增加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神职人员的人品素质。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无论是主教或是神父们的神修生活，水平上显然是提高了，这一点，在教会历史上是相当的被看重的。教友们精神生活的水平，也因着神长们的表率而大为提升，每天默祷、每个月小避静、每一年，或是每两三年一次大避静，这些在当时很是盛行。越是

虔诚热心的神父、主教，也就越勤奋的工作，他们并不以做弥撒，施行圣事、讲道理为满足，他们在自己的本堂区或教区内，展开各种宗教性的活动，使用各种方法，培养增强教友们的精神生活，成立各种善会，神长们更以学校来补充本堂区的活动，创办了许多教会设立的私立学校，而且逐渐推广到西欧和北美洲各地。

2.5.2 十九世纪的神职界

整个圣教会，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神职界不但在量的方面增加了，而且在质的方面，也作了显著的提升，因此，使得教友们的精神生活在宗教的层次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位富有圣德，因而能享有圣人品位的本堂神父圣维雅纳神父。他是所有本堂神父的模范。这位模范本堂神父的全名应该是若望·玛利亚·维雅纳，他原是法国里昂教区一位热心农人的儿子，他一直与父亲一齐在田里工作，直到 20 岁。他是在革命期间长大的，童年时代，曾经当过被囚禁在密室里的神父举行弥撒时的辅祭，他为人虔敬热心，但是他后来的光芒万丈，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或显赫的地位或成就，而是因为他的资质笨鲁迟钝，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及格通过拉丁文和神学的最起码的考试，但是，他却有比学问和书本更有价值的特殊恩宠，那就是他拥有一份非常健康的思想和意识，而且判断力特别的准确，他更具备了谦逊和不平凡的圣德和修养。当时参加过他所举行的弥撒的人都这么说：“只要一看他主持弥撒，就足以使你相信那些超性的事理。”当他被主教派往亚尔斯担任本堂神父时，亚尔斯仅仅是一个人口只有三百七十人的小小农村，教友们也都十分的冷淡，上酒馆的比上教堂的人多。维雅纳神父天天和这群对宗教冷漠，但却喜好花天酒地的教友们的恶习艰苦奋斗，经过了好几年，农村逐渐的改变了，这全靠他讲解和说教的功效。这不但是因为他言词能深入人心，尤其是他的表样、他那贫苦的生活、以及他那几乎难以使人相信的刻苦，更是有力的身教。他每天所吃的，只是几片剩面包和两三个星期才煮一次的马铃薯，他总是吃剩的、冷的；此外他还经常打苦鞭作补赎。他越是严以待己，对待别人就越是宽厚善良，从此以后，他的名声越传越远。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邻近的堂区请他讲道理、听告解，不久以后，便有许多人自动到穷乡僻壤的亚尔斯来，为的是拜访这位活圣人，并且听他讲道理，向他讨教、向他办告解。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虽然不高，天主却赏赐给他特殊的光照，他有识透人心秘密的特恩，能揭露人的良心，无数的罪人来到他那儿，便同天主和好了；心灵困惑不安的人获得了安宁；也有不少对自己的圣召迟疑不决的人，获得了光明和勇气；还有许多本来没有信仰，只是因着好奇心的驱使，跑来观望看热闹的人，惊奇自己内心的秘密被维雅纳神父识破，而归皈天主了。当时到亚尔斯小农村的交通很不方便，可是从法国以及欧洲各地，甚至遥远的美洲，不分贫富贵贱、社会各阶的人，普通的人、在高位的人、学问高深的人、神父、主教，天天有人赶往亚尔斯拜访维雅纳神父，三十年之久未曾间断过，平均达到每年八万人。维雅纳神父丝毫没有求取功名的心，他只是为了拯救人灵，甘心承担了繁重的后果。他每天 16 到 18 小时坐在神功架里听人的告解，冬天冷得发抖，夏天闷得要死，只有在每天清晨五点做弥撒和 11 点讲道理的时候才走出神功架，下午又坐进神功架，一直要听到夜深以后才去睡一会儿，这种累死人的工作，他一直做到 73 岁去逝时才结束。1922 年，碧岳十一世登基以后不久，就将这位以身作则的维雅纳本堂神父的模范，列入圣人的行列，成为本堂神们的主保，受到了全世界教友的钦崇，历久而不衰。

接下来谈谈十九世纪修会的复兴和新型修会的创立。在十九世纪教会生活最显著的生活，应该是精神生活的进步了。从这方面来说，就只有十三世纪托钵修会，也称募缘修会的时代，可以和十九世纪相比，而且十九世纪的每事物，规模都比较大，而且还和教会的普遍成长相称。

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启蒙时代的反宗教思潮、以及教会财产的没收，都使教会遭受无穷的灾患，受害的不仅只是在 18 世纪末叶被正式解散的耶稣会，所有其他的修会也都可以说必须重新开始。有些修会在 19 世纪中叶，会士的人数就已经恢复了往年的情况，但是也有

些修会，因为受到灾患过于深重，虽然惨淡经营，但仍然未能恢复旧日的规模，像是嘉布遣修会，在 1782 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会士两万六千八百多人，到了 1853 年时锐减剩下一万一千多人，而到了十九世纪末，1888 年的统计就只有七千五百人了。

许多修会的复兴，要比教区神职界还更值得人注意。自从 18 世纪以来，修会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成为众矢之的。各位一定都还记得耶稣会的被取消解散，就是这场革命斗争中最为惨烈痛苦的事件，其他的修会当然也吃了不少的苦。奥地利国王若瑟二世，就在奥地利境内一下子取消了六百座修院；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期间，又把所剩无几的修院全部没收消灭，以致于在天主教的欧洲修会几乎完全绝迹，既使有，也不能公开活动了。局势稍微平安情势刚好转一些，修会复兴的工作，便呈现了教会有史以来少有的现象。1804 年，教宗碧岳六世解除对耶稣会的禁令以后，到 1850 年间，会士便已经超过了六千人，19 世纪的末期，人数又翻了一翻，达到一万两千多人。本笃会虽然没有遭到像耶稣会那样被解散的命运，但是在暴风雨中，本笃会所立的修会也所剩无几，在十八世纪现下半年几乎完全被扫荡的本笃会，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有一位了不起的本笃会神父，名叫盖郎日神父，在法国复兴了本笃会，其中最著名的本笃会修院是索来斯木修院。这座修院后来就成了复兴教礼仪和额我略圣乐的中心。十九世纪中期时，本笃会修士的人数是一千五百多人，到十九世纪末年时，已经增加到五千两百多人。他们的修道院分布在全世界，虽然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规模，然而本笃会对教会的贡献，是足足可与该会会史上，最光华绚烂的时代相提并论的。19 世纪中叶的方济会，是修会中会士人数最多的，大概在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之间。到 20 世纪中，会士的人数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在 1897 年时，方济会的各个支派，合而为一，有了统一的行政体系和同一本会规，这次的联合可谓一大成功。除了这些著名的大修会外，道明会也在拉高尔代的领导下，重新振兴了起来，会士的人数到十九世纪中期时，也增加了两倍，除此之外，其他的几个著名的大修会，也都在 19 世纪时复兴起来，而真正代表十九世纪修会兴盛的，要算是许多新创立的修会。这些新型的修会蜂起云涌，有如雨后春笋，而且也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几乎每年都有一种或两种新的男修会或女修会产生，而且发展迅速。

从 1800 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底创立了多少修会，几乎无法统计。就拿法国来说吧！这一百年间便产生了一百多种的男修会、三百多种女修会。其他的像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加拿大、瑞士等国，修会发展的情形，也都大致相同，只是不像法国那样的普遍罢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流行着一个笑话说：“虽然天主无所不知，但是连天主也弄不清有多少女修会，更不知道每个女修会所穿的不同型式的会衣了！”男修会中像是无染原罪奉献会、白衣传教司铎会、圣心传教会、圣言会、救主会、赎主会、慈幼会等都快速发展。而慈幼会的成长最为惊人，它在 1859 年由若望·鲍斯高在意大利创立的，到 1907 年时，会士已有四千一百多人。现在再看看女修会的情形，十九世纪女修会的成长与增加，尤其令人惊奇，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女修会的世纪。1845 年乌苏拉修女会有三千修女，到后来增加到一万三千人；圣母往见会的修女也从三千增加到了八千；仁爱会在 1877 年有两万修女，如今已经有六万人。在十九世纪时，各地都有新的女修会创立，修女会数目之多已不可胜数，像是 1800 年创会的善牧修女会，有修女一万一千多人；玛利亚方济传教会创立于 1877 年，到 1933 年时已有修女六千五百多人；在日耳曼地区，也产生了许多新兴的修会，也都发展快速，也有许多日耳曼的女修会，是在北美洲奠下了基础。美国修女的圣召非常的多，到 20 世纪中期，修女的人数大约在 15 万人以上。19 世纪开始，追随圣召的人数不断的在提高，到 20 世纪的前 30 年，全世界修女的人数增加了两倍。我们可以从圣召人数的惊人成长，来证明外在的成长，常常是内在力量的标记，圣召的人数不也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在精神生活的准确指标，从这一点上看来，法国、德国是 19 世纪的开路者，比利时与荷兰也参加了这一阵容，目前，美国与西班牙在圣召上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些新兴的修会与中古以来所创立的修会，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很少是度默观式的隐修生活，而绝大多数是献身于各种传教活动，有些专门是为到外教地区宣传福音而设立的，例如巴黎外方传教会、白冷外方传教会，但大多数是在已奉教的国家，也在传教区工作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新局势，造成了不少人精神和内体上的灾害和痛苦，像是无知、贫穷、疾病和儿童及老人的被遗弃，针对这些问题，许多新型的修会出现了，连教会的敌对者，对于这些为了爱耶稣基督而放弃世俗，献身于一种忠诚的生活，也都感到惊奇而加以称赞。在这些打破传统的新型修会中，我在这里，只提几个分布最广、最为我们中国所熟悉的修会给各位作参考。在法国创立的有无染原罪圣母会，他们的会士散布在澳洲、锡兰向北直达北极；在非洲有白衣传教会的神父；在比利时创建的有圣母圣心会；在荷兰创立的有德国籍的圣言会；在意大利创会的有慈幼会和救世主会；此外还有专门献身于教育青年的圣母小昆仲会、卫道会。至于在这段时间内所创立的女修会，那可就多了，针对当时社会上的需要，并且为了救助贫病，真是应有尽有。

19世纪时新创立的男女修会的修士、修女们所开创的使徒工作与传统的修会所度的修会生活有什么不同之处。我相信听完我的说明之后，您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种新兴的修会发展快速？为什么有心修道的人，成千上万的都风起云涌的加入这样的新型式的修院，来为修会所开创的传教事业和使徒工作而牺牲、奉献他们的全部生命了。下面就为您举几个例子，来介绍女修会。他们中有专为教育青年女子而献身的圣心修女会；有专门收容无所依靠的老人而创立的安老会；有专为济助堕落的女孩子而创办的善牧修女会；有专门以服侍贫穷人所立的功劳，来用以拯救炼狱灵魂的拯亡会，这些都只不过是新兴的修会群当中所举的少数几个实例而已。在所有新兴的众女修会中，都没有像圣鲍斯高所创立的慈幼会所传播得那样的快。

圣若望·鲍斯高，他生于1815年，死于1888年，他并无意要创立修女会，而是在时势的巧合中看出来天主的圣意，有让他创立修会的必要，因而创立了慈幼会，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位有“孤儿之父”称号的鲍斯高，早年受到良好的家教，从小就意识到天主对他的招呼，他必须勤奋地努力工作，好能赚取所需要的学费，他在1841年晋升神父，先是被派往杜林城做副本堂，就在杜林这座大城，他开始认清了，那成千的被遗弃的孩童在街头流浪闲荡，受到身心伤害，甚至犯罪坐牢。鲍斯高对人灵，尤其是对青年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不久就有上百位的孩童奔向他、投靠他，他便决定奉献自己的一生，为儿童服务。他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和反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收容流浪儿童的地方，他随即为他们开办夜间学校，天资较好的，受过相当的栽培以后，便当老师，教育其他的儿童，如果有天主的圣召，他就帮他达成心愿。以后，为了这些孤儿能自力更生，就设立各种工厂，尤其是印刷厂，教导他们学得一技之长；为了使这些工作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鲍斯高因而创立了慈功会。当他在1888年去逝的时候，慈幼会的会士已有九百多人，以后会士不断的增加，到了1907年时，就已经增加到了四千多人，在全世界各地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各传教区，都有慈幼会会士所设立的学校；此外鲍斯高还创立了母佑修女会，为献身于女子教育。鲍斯高的教育理念是，坚强与慈爱并施，他的教育方式是，采取预防邪恶胜过纠正邪恶更为重要，尽力避免强制的体罚、设法以善表和信任心去影响青少年、努力用宗教信仰的力量和善功。比方说，勤领圣体、勤办告解、孝敬圣母、劝诱青少年向善等。圣鲍斯高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优良的作家和实践家。教宗良十三世还曾经请他调停教会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冲突。他有很深的灵修生活，也常有特殊的恩宠，经常受“神见”和“圣神显现”的启发和鼓励。据说，天主借着他而行了不少的奇迹呢！

在十九世纪所兴的修会，都遵循了16世纪时圣职修会所开创的道路，至于修士、修女们个人的成圣，与其说是靠苦修与祈祷，还不如说是，借着与传教的理想相符合的严谨工作，也就是说，办学校的，从事教育工作；办医院的，从事医疗工作；或其他种种慈善工作，亲

自走入教友群中，或是走入非基督宗教的地区，以医疗、以教育、以各种慈善工作从事人灵归化的工作。这些新兴的修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投诚于严谨的、富有意义的传教工作。这些新兴修会的创始人，大都在 20 世纪的前半期，先后被教宗列入圣人的品位，成为全体天主教子民的楷模，像圣若望·鲍斯高、圣若纳安迪·特多勤、圣索非亚·巴拉、圣方济·加善勃里尼、圣佛拉西亚·柏莉蒂等等。

2.5.3 十九世纪神哲学的发展

谈十九世纪中，有关神学方面研究发展的概况，十九世纪并没有产生像圣多玛斯和圣奥斯定那样著名的、第一流神学家，但是却产生了许多相当重要的作品。我们就概略的说吧，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由于欧洲各国神学专刊的发行，神学研究的著作有了发表的园地因而日益可观，其中就有不少成为真正的神学文库。神学专刊中最古老的刊物是都屏格季刊，它创刊于 1819 年，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继续刊行着；其他像是园地较广的，更适合一般读者的刊物中，也常常登载了神学问题的论著；同时在德国、法国、英国、北美等地的神学研究中心，常和当地著名的大学相连，像是慕尼黑大学、波昂大学、鲁汶大学、巴黎大学、罗马大学等等，也都以神学研究而获得好评。在出版方面，也有几家规模相当大的天主教出版社。那么十九世纪的神学著作，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当时的著作，比较着重在护教方面，常执着于所谓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天主教神学，原本是避免采用这个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意味的名称，然而，这个问题却是信仰与知识、启示的真理和理智之间，老生常谈的论题。由于到了十九世纪时，信仰和知识两方面都有了进展，所以护教的问题，就常常以新的姿态出现了。有些神学家引伸康德的哲学，放弃了士林学派，用理性来解释信仰问题；有些传统主义神学家们所索求的是相反的论证，他们也放弃士林学派的思想，把理智的知识与信仰的知识完全分开，他们宣布以哲学方法去证明信仰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而这两种论点都不合教会的立场，都受到了教会的谴责。不久以后，研究注释士林哲学与神学的风气又再度兴起，这种运动的主角是在罗马的学术团体，其中有道明会，也有耶稣会的著名学者，也是教廷的枢机，他们恢复了哲学知识在神学体系中的地位。教宗良十三世在 1879 年所颁布的《永生之父》通谕中，特别承认、称扬圣多玛斯这位士林学派的大师。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也宣布了：“人的理智，能从受造物中，确信有天主。”使得这方面的争论豁然开朗，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叶，许多神学家们的意见仍然分歧，尤其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神学家们受到了非天主教的“圣经批判”和“教义沿革”理论的影响，开始对信仰与知识的和谐问题感到失望了，想要从康德学派的实践理性方面，求得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对于这些神学家们的看法，教会的立场又如何呢？教会如何来整合这些分歧的意见呢？

教宗碧岳十世在 1907 年，颁布了两道通谕，一为《可痛苦的》通谕，另外一道通谕就是《牧者》通谕，一一指陈了他们思想上的错误，他指出这些不同的倾向，都有着相同的根源，而且已经偏离天主教信仰的基础很远很远。教宗在通谕中，统称这些分歧的新意见为“现代主义”，并且对这些学派的领导人物加以严厉的责斥，所幸的是，并没有产生脱离教会的教派，我们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异说，消除得如此的快又彻底的了。在整个十九世纪中，除了这些短暂的学术风波外，严谨的神学研究教会历史学、教父学和历史神学各方面，都有相当好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德国的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值得赞扬的。而在“士林学派”学术的研究面，成就也是卓越的，这里暂时省略了这些具有成就、享有盛名的作者们的名字。十九世纪对圣经的研究之门大大的敞开，从事圣经研究的学者，必须对文字学、版本的批评和东方圣地的考古学上的种种伟大的成就有所认识，这样才能够建立一道，强而有力的防御破坏性批评的堤岸。在 1909 年成立了宗座圣经学院，该院的教授们在这方面付出了心血，尤其是德国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令人激赏的；在巴黎，由维古路所出版的《圣经辞典》，方便了对圣经的研究；法国籍的道明会会士拉格朗奇，他在耶路撒冷创办了法国圣经考古学校，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史学的进步，使理论神学

得以跨越而受益，它使圣经和传统的论据愈加的丰富和精确，真实与假设也越加能够分办得清楚。除此之外，有一位名叫若翰·罗西的教友，他在罗马发现了古代地窖，找到了第三世纪的教宗彭谦、法比盎、高尔乃略以及其他几位教宗的墓穴。这一大发现，和它优良的出版品，使得天主教的考古园地大放异彩，而这时候，又正好是“历史怀疑论”威胁到远古教会历史的时刻，这些适得其时的新发现，加强了对教会历史渊源的信心，考古的工作继续下去，许多更有力的古代文物纷纷出土，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

2.5.4 十九世纪的牧灵事业

我们来谈谈十九世纪教会的牧灵工作。在天主教信友与教外人士中间，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都以为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会，失去了吸引群众的力量，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因为大家所看的是这样的事实：“自从十九世纪的中叶起，在大多数的国家中，甚至在古老的天主教国家中，广大的民族，在内外两方面远离了天主教会，这些人也许领过洗，只不过是统计数字上的天主教徒，不但如此，广大的群众对天主教的态度，由冷淡而转变成敌亲，也的确有理由把他们称为是一种新的外教主义。”如果，我们观察当时的政政治环境，就可以对这种看法找到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天主教教友都只占少数，而且往常是受迫害的一群，即使他们坚决反抗，并且获得重要的胜利，但是，在人数上，他们仍然是少数。在我们要开始研究为什么教会节节退却，失去了对广大群要的影响力以前，让我们先来探讨确知上面我们所说的现象否正确、是否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注意教会在人数方面的成长，那么，在1800年前后，她大概有一亿三千万教友，到十九世纪中叶，已经是增加到三亿五千万，再从教会的内在生活方面来看，不可否认的，十九世纪的末叶的教会，在精神生活的层次上，要比十九世纪的初叶来得更充沛、更活跃，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十九世纪的天主教并没有失去吸引群要的力量，反而是赢得了更广大的群众。由于教会必须把握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在人口激增的十九世纪，她来不及改进牧灵方法，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陈旧的牧灵方法，对新生的一代发生不了效力，新生的一代便在教会以外成长。

十九世纪圣教会的牧灵工作，由于教会必须把握到，每一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人口激增的十九世纪，教会还来不及改进牧灵的方法，以适应环境的需要，那陈旧的牧灵方式，对新生一代来说，是不容易发生效力的，所以形成了新生的一代在教会外成长。从这一点来看，这些欧洲和美洲的新外教主义者，和教会之间一点也不发生关系，正如同遥远的非洲人和咱们十亿中国人与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一样的。我们研究教会在地理上与人数上的发展茁长，是教会史学者的责任，这一种发展和茁长是非常的快速的，然后我们才可以追问：为什么这种发展和茁长，没有能够更迅速呢？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各地人口激增空前的世纪。在非洲、亚洲，人口增加率特别大，连欧洲、美洲，人口的增加也令人惊讶！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尤其明显，像伦敦、科隆、慕尼黑、米兰这些大城的居民都已经有一百万人，这种人口激烈增加的现象并不完全正常，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使乡村居民减少，农村也跟着衰落，更何况人口激增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出生率的增加，而是因为死亡率的减低。十九世纪以后，医学发展、药物与病源的发现、都市的环境卫生也大大的改进了、瘟疫也能预防了、民众的卫生习惯改善了、婴儿的死亡率也大为降低，许多的不治之症，也有了治疗的可能，生命的欲望也大大的提高，这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大事，但是它也有黑暗的一面，人类平均年龄的不断增加，比人口的激增，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更大的经济恐慌和停滞。针对上面所提到的现象，因此呢，教会的使命，是开创新的传教方法，以便能在人口的波动中，尤其在新生的一代中展开牧灵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但在美洲重要，既使是在欧洲也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在牧灵方法急需改革的大城市，以及其他地区，也是很重要的。在人口激增的实况下，教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创建新的教区。在英格兰的圣统制是新建的，1850年建立了十三个主教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波兰也都有新的主教区建立起来；此外，更是大量的建立了牧灵中心，也就是一般所

谓的本堂区，特别是在人口迅速增加的都市和工业地区，常是成百的新本堂区建立，我们可以丝毫不为过的说：十九世纪所建的新教堂，比以前的各个世纪所建的都要多得多。这些新建的教堂大部份是新哥德式的建筑，规模宏大，已经具备了现代都市气象的特征了。今天，当我们游览参观莱茵河流域、西发利亚、法国北部、维也纳与其他地区的教堂建筑物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艺术价值，除了大量的增建宏伟的教堂以外，我们也把 17、18、19 三个世纪，司铎与教友人数作个比较，这样就会明白这期间，变化的趋势。

事实上，到 19 世纪时，司铎的人数和教友人数的增加不成比例，有些教区的牧导环境比较优越，像在威斯敏斯特教区，十位司铎需要照顾 420 教友；在巴尔迪摩教区，一位司铎则只需照顾 320 位教友；然而像在巴西，司铎人数太少，四千位神父竟然需要照顾三千万教友。在 17、18 世纪时，全教会的司铎人数，从比例上而言，比 19 世纪要高，但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司铎们活动要比以前紧张。过去，有一部份教区司铎和修会司铎，很少负责牧灵的工作，仅仅只是享受丰厚的俸禄和只做弥撒而已，像这类的司铎已经逐渐遭到淘汰而逐渐减少。而到今天，已经几乎绝迹，因为在整个圣职团体当中，牧灵的热忱和责任感已经加强了，而且神职人员的经济基础完全的变了。在这之前，教会团体，大多数都是依赖热心人士的捐赠、自己募捐或是地产的收入。根剧估计，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全法国土地的十分之一属于教会的各种团体，当教产被革命政府没收以后，各国政府都还保证，司铎与教堂的最低开支由国家来支付，但是这种补助从开始就不够分配，再加上十九世纪时各地的通货膨胀，使得这笔经费变得有名无实，更何况这笔经费的发放，完全要靠政府的善意或是专断了。从此以后，教会的经济基础，开始依靠教友们的自由捐献，在那些原本没有教会财产的地方，像是英国和北美洲或是政府不加干涉的地方，譬如西班牙“宗主权”所包含的地区南美洲，天主教会也唯有这一种经济的来源。教友们自由捐献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教堂内的捐献、有个人的捐赠、或是遗产捐赠；美国各地教堂的收入在最初，是来自各个家庭专用座位的租金，一直到今天，北美洲教会的开支和慈善救济的费用，仍然还是以教堂的募捐为主要的来源，弥撒献仪成为全世界神职人员经济基础的一部份。从物质面而言，天主教会实在是比以往贫穷得太多了，但是，在新的环境中，教会却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偿报，当然在 19 世纪时，教会还没有统一的经济制度，个别的教会团体，像是教区、教堂、学校各种慈善机构、社团或是修道院在经济上仍然是独立的，但是，教会团体的总部和分部，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凭靠土地而来的收获了，而且，他们辛劳的结果，仅够糊口而已，神职人员不再因此而遭受到外在暴力和困扰了。十九世纪的历史中，常看到的地方性的损失，都是比较容易弥补的。

2.5.5 十九世纪的教育工作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神职人员的圣召增加了，所以，教会特别的重视神职生的训练。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有关教育和学校的两个问题。启蒙运动以后，教会一方面需要经常反对政府在教育上的措施；另一方面呢，则可以利用启蒙运动所留下来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在大革命与教会财产被俗化、没收的时期，神职学院也被迫关闭，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又恢复旧观，并且在各地创办小修院，如今，几乎每一个教区都设有神职学院与小修院。十九世纪的神职生和神学的教授们，他们的知识水平都提高了不少，教宗碧岳十一世在 1931 年发表了取名为《学术的主——天主》的文告，对学术研究方面，有很明确的指示，许多的神学教授都是在罗马攻读的。而罗马在设置了国际学舍，神职生在额我略大学或类似的学校，像是道明会的天使学院和拉特朗学院，以及圣经、东方神学、考古学、教会圣乐等专科学院攻读学位，然后回到自己的教区去为牧灵而工作。培训出来的神职人员们的学识，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水平还不很高，这也是为时势所逼，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当时神职人员缺乏，为了维持本堂区的敬礼和宗教生活，在乡村讲道理，为广大的群众施行最基本的宗教教育，不得不采取救急的办法，为了能救急性的执行这一类的神职工作，神职学院的普通教育便足

够应付了，所以神学、圣经以及教会历史等深入研究的课程，也就未免被暂时搁置了。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叶，教会的学术研究才大为复兴。教宗良十三的大力推动，使士林哲学得以复兴，而教会的学术研究得以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天主教大学的重建。鲁汶大学在 1834 年建立以后，法国、瑞士、北美的加拿大、美国的天主教大学都在十九世纪的末叶建立起来。大大的提升了神职人员的学术水平。至于一般儿童和成人的要理教育，有专供教堂讲道之用的要理问答，而学校课程中有宗教课，则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1847 年，耶稣会的德哈勃神父，重复应用士林哲学的方法，编了一本《要理问答》，并且被翻译成各国的文字，这本书一直是要理教学方面的重要课本。近年来切合学龄儿童需要的各种教科书才取代了德哈勃的著作。这些只不过在表示，十九世纪的教育对基本宗教教育的重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都把儿童的要理教育看成是卑微的工作，十九世纪开始，才逐渐受到重视，现在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在政府与教会的冲突中，以及在协约缔结的过程中，在学儿童接受宗教课程，经常是教会所要争取的第一个目标。至于成人的宗教教育，在十九世纪所呈现的是怎么样的面貌呢？无可置疑的，当然是也有了进步，而且这一方面的牧灵工作永远是永无止境的。因为教会需要重新训练每一个世代的教友，用教育方法把信仰的真理，深刻的烙印在教友的心灵上。只是工作的开始，教友们不但需要知道灵魂得救的道理，他们还需要学习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组织与教会遭遇，这就是所谓的教友训练。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天主教教友，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教友的模范，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接受了良好的天主教学校教育。天主教的出版事业也是重要工作中的一环，杂志、周刊、教区或本堂区的新闻纸类，比政治性的日报更重要。最后，让我们深入了解十九世纪教友们的灵性生活。

2.5.6 十九世纪的敬礼

18 世纪的“扬森异端”所宣传的天主，是严肃而又高不可攀的威严性的主宰，因此给十八世纪的教会，在灵性生活上烙上了冷酷严峻的印象，这种思想的痕迹，一直持续了相当久，但到十九世纪，这方面就有了鲜明的改变，教友们逐渐被导向热心的路线，感情和外在的表现也都活跃起来，这应该是由于勤领圣事和倡导正确的敬礼的缘故。这种热心，最有特色的就是以耶稣为中心，那就是说，教友们的思想和祈祷，特别的都是指向天主圣三的第二位，对耶稣圣体和耶稣圣心的热心敬礼，就是这种倾向，最显著的表现。对圣体的热爱与崇敬，在热心教友的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朝拜隐形于面饼形像下的耶稣基督。“四十小时明供圣体”和“不分昼夜的陪伴耶稣圣体”的敬礼，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的在各地举行，教友们轮流到教堂去朝拜，加上夜间也来朝拜，目的是为了赔补耶稣在圣体内所受的凌辱，圣体降福和圣体游行的礼节也增多起来。这种敬礼最盛大的表示就是“国际圣体大会”了，那就是全球各地的教友聚集在一个地方，公开朝拜在圣体内的耶稣，发起这项敬礼的不是教宗或主教，也不是神父或修女，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友，名叫艾米力达·米谢。第一次是在 1881 年的法国里耳城，先是每年一次，然后是每两年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人多，甚至达到上百万的人成群结队的参加国际圣体大会。

十九世纪的教友，在灵性生活方面，盛行敬礼在圣体内的耶稣和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十九世纪的教友们对耶稣圣体的敬礼，敬礼最为盛大、最为隆重的就是国际圣体大会了。教友们如果不是勤领圣体，算不了真正热心敬礼耶稣圣体。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扬森异端”的余毒，还没有完全的绝迹，连在许多修院中，通常的习惯也只是每星期领一次圣体，后来因为圣教宗碧岳十世对勤领圣体和儿童早开圣体的通谕而有了转变。下面，来谈谈对耶稣圣心的敬礼。

敬礼耶稣圣心的礼仪，就是敬礼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情，耶稣基督的血肉之心，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活生生的象征。本来，在教会内早已有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到了 18 世纪，耶稣多次显现给圣女玛加利大以后，才传播开来，在全球各地的教堂或教友家庭中，受到广泛的敬礼。这种敬礼，很适合教友们的热切渴望，而且也是对“扬森异端”所误导的严厉思

想和当代的唯理主义、现代主义最好的消毒剂。1856年，教宗碧岳九世命全球教友庆祝耶稣圣心的瞻礼，这算是正式公开批准了这个敬礼，不久之后，又确认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做为特敬耶稣圣心之日，以守圣时来作为对耶稣圣心的赔补。教宗圣碧岳十世又下令，每年的耶稣圣心节，要将全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这些都是对圣心敬礼最显著的发展。1861年时，有两位耶稣会神父，创立了祈祷宗会，也是受到了圣心敬礼的启示，会员每个月，按照教宗所认可的特殊的祈祷意向，结合于耶稣圣心内祈祷、领圣体。祈祷宗会经过大力的倡导，已经普及全球各个教区了。

十九世纪的教友们，在灵性生活方面，除了刚刚谈到的对耶稣圣体、耶稣圣心这两个以耶稣为中心的敬礼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圣母的敬礼。有些教会历史的作者们这么说，假如十九世纪是圣心的世纪，恐怕应该更正确的说“十九世纪是玛利亚的世纪”。虔诚诵念玫瑰经和庆祝圣母月，已经成了教友们普遍的习惯；此外，还有像是圣母会，以及以圣母为名，也就是以圣母为主保的男女修会，更如雨后春笋，揭二连三蓬勃地在各地兴起，尤其是以圣母为名的女修会，那更加是屈指难数了。神学家们更是专心研究天主之母的种种特恩，这些呢，我们都可以说是特敬圣母的标志。

1854年，教宗碧岳九世还钦定了“圣母无染原罪”为教友们当信的道理，也更增加了教友们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爱之情。天主又用圣母的多次显现，来鼓励这种孝爱圣母的运动。这对信友们有很深的印象，全球教友们反应也极为良好，就如，1754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宣布，在墨西哥显现给印地安人若望·地亚哥的是无染原罪圣母；以及1830年，圣母显现给一位仁爱会的修女加大利纳·拉布莱，命她要人铸造圣母圣牌，显示从圣母手中射出万道祥光，象征透过圣母的转祷，所获得的圣宠神恩，这就是大家所通称的“圣母显灵圣牌”。在教宗碧岳九世钦定圣母无染原罪为当信的信条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858年的二月十一日到七月十六日，在法国南部的庇里牛斯山麓，一个名叫露德的小村子，圣母显现给一个名叫伯尔纳德的十四岁小女孩有18次之多，当小女孩问她是谁时，她回答说：“我是始胎无染原罪者”。教会的神长们开始时，一直抱持审慎的态度，但是，在18次的显现，及以后在当地所发生的，许多无法以理性来解释的奇迹治愈绝症的事件，这才认真的相信了显现的确实性。到露德山洞去朝圣的人越来越多，先是法国各地，然后有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朝圣者，奇迹也就年复一年不断的出现。才女伯尔纳德长大后入了修会，在修院中隐居了一辈子，1879年去逝，1933年被教宗碧岳十一世列入圣品。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时，圣母又在葡萄牙的法蒂玛显现给三个孩子，并且告诉他们，耶稣愿意在全球各地建立“圣母无玷圣心”的敬礼，从此以后，法蒂玛也成了圣母朝圣地与露德圣母的朝圣地相互辉映了。

接着来谈谈，十九世纪信友们的祈祷和礼仪的生活情形。您可别认为，十九世纪信友们的热心，只限于外表的敬礼。在当时，每天都举行默祷神工的，不是只限于神父或修院中的修士、修女而已，信友们也常行停止课外活动的退省神工，享受默祷的神味，并从中取得抵抗自然主义的神力。这种深入的个人内修生活，是一种莫大的进步。不过，信友生活的实质面，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敬礼，在当时还没有明朗化，信友们的灵性生活，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各位别忘了，当时正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世代，教会要培养信友们的热心虔敬，不只是在正式的礼仪中，其他和礼仪有相关性的礼节也会有所帮助的，像是举行圣体降福、圣体游行、耶稣圣心日、圣母月等宗教性的活动，但是礼仪的真正意义，尤其是礼仪中心的弥撒圣祭，一般的信友并没有完全了解。因此在教堂举行弥撒时，只看见信友们不配合弥撒的经文来参与礼仪，只顾自己念玫瑰经，或是念一堆与弥撒礼仪毫不相关的经文，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还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重整本笃会的奎劳吉神父，大力倡导礼仪，在他的影响下，礼仪生活的真正精神才得以复兴，奎劳吉神父是改革礼仪、重振礼仪生活的开路先锋。他以半个世纪不倦不怠的努力，从德国传遍了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的效应，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提倡礼仪运动先趋。到了碧岳十二世，以及六十年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大

力推动，信友们的礼仪生活才进入真正的高峰时期。

2.5.7 十九世纪的宗教艺术

至于十九世纪的宗教艺术，像是宗教音乐、宗教建筑方面有些什么特色呢？我们知道，礼仪生活是和宗教建筑、宗教音乐是相互关系密切的。宗教建筑在于提供举行礼仪的场所；宗教音乐则可以使公共的团体祈祷和赞颂天主的情绪，圆满的表达出来。十九世纪宗教的高潮，本来应该使我们认为，这两种艺术在十九世纪应该是大放异彩的，但是却绝没那么一回事儿，反而使人看到的是，十九世纪在音乐和建筑这两种艺术上，所呈显的是一个停滞不景气的时期。在十九世纪时，虽然建造了不少宏伟的教堂，可是没有任何独特的风格，全是依照古典的风味来建造，可以看出来，是希腊罗马式的建筑风味，然后因着浪漫主义而使中古时期重现，于是又出现了中古建筑的杰作，不是模仿罗马式的，就是模仿哥德式的。当时无论是在法国或德国的各大教堂、以及露德圣母朝圣地的教堂、美国纽约的主教座堂、甚至我们中国北京的北堂，都是模仿中古时期哥德式的作品；而建筑在巴黎致命山上的“圣心大殿”，却是罗马式和拜占庭式的混合作品，这要到二十世纪时，建筑师才按照新时代的风格、用新的材质建造现代化的作品。

接着再来看看宗教音乐。宗教音乐本来是帮助人祈祷，或在礼仪中，借着圣乐而有更好的效果。十九世纪中，在圣堂里作乐很多，歌唱得也不少力不过都是些交响曲，而不是表达祈祷精神的乐曲，好在当时还没有采用世俗乐曲，这些最好是在音乐厅或剧院演唱或演奏，而不是在圣堂。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以后，圣乐方面，有了更新的趋势，这是受了额我略圣乐复兴的影响。当然两位本笃会会士奎劳吉和扫来斯木的功不可没。随后由德国的歌咏团继续的推动，到十九世纪末叶，一位比利时的大师弗兰克，充满了宗教灵感，造就了一批出色的弟子在意大利复兴了古典合音曲。

2.5.8 十九世纪的圣人

最后，我们来谈谈，十九世纪的圣人们。在十九世纪圣德出类拔萃的神父、修士、修女以及一般信友，比起其他的任何时代，都毫不逊色。圣教对册封圣人一向是稳健严谨、态度审慎，但也仍然册封了大批的真福品和圣品，还有不少还在教廷审查之中。我们曾经介绍过好几位大革命时的殉道者、传教士、修会的创立者、以及像维雅纳那样的本堂神父、和圣碧岳十世那样的教宗。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爱德的英雄，像圣若瑟·高岛蓝哥，他生于 1786 年，死于 1842 年。他在都林建立了“主顾手宅”，那是一座只靠随时捐助来支持的收容所，最后竟然发展成了一座城镇，收容了 8 千个病人、残障者、老人和疯颠者，另外有一千位修女和两百位神父为他们服务。至于十九世纪英雄的传教士，我会在下一个大单元中，特别加以介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十九世纪的圣人，不只是神职人员或修女，一般普通的信友也不少，我只从教会已经正式列品的人当中，挑几个为各位介绍一下吧！真福亚纳塔·伊基，她是一位家庭主妇。圣沙维毫，他是圣若望·鲍斯高的学生，去逝的时候才只有十七岁。圣女杰玛，她是一位药剂师的贫穷女佣，但是却修到了神秘生活的最高境界。圣女葛莱蒂，她是一位为了保全自己的贞操而致命的十二岁少女，凶手想奸污她，她抵死拒绝，而被凶手用匕首刺死，圣女葛莱蒂在 1950 年列入圣品，她的老母亲参加了列品大典，刺杀她的凶手已经忏悔改过，进入一座修院中度着忏悔补赎的生活。

最后，要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是圣女小德兰，在我所介绍的这批圣人、圣女当中谁也没有比她更出名的了。这位 24 岁于 1897 年在法国西部的小城里修的静修院中去逝的圣衣会年青修女，谁会想到 28 年以后，便在全球教友的欢呼声中，被教宗碧岳十一世列入了圣品呢？这样的迅速而又辉煌的荣耀，真可谓史无前例。圣女小德兰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世代宗教气氛浓厚。她四岁丧母，从小受四位姐姐和非常热心虔诚的父亲抚养长大。十五岁时，克服了一切反对和阻挠，进入了圣衣会，她的两位姐姐已先她而入圣衣会，第三位也随后加入，她宣发圣愿以后，恪守圣衣会的规矩，度了九年多的静默、祈祷和苦修方生活，最后因结核

病而去逝。她在静修院中，外表上和其他的修女没有任何特别不同的地方、没有任何特别的作为、也没有显过什么奇迹，她的同会姊妹们，有三人还是陪她照顾她长大的姐姐，一直到她卧病不起时，都没有发现她有任何卓越的圣德。但是，当她死后，便开始在里修城由近而远，纷纷传说一位圣衣会的小圣女过世了。死后一年，她的一本自传便问世，几个月后，便有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方阅读这本书，不久以后，便翻译成了几种不同的文字。她给世人带来的天上好消息，便因着她的自传而风行全世界，她生前的愿望在她死后应验了，她说：“我愿以施惠于地来过我在天上的生活。”透过她的转祷而获得的神恩异宠和奇迹，枚不胜举。教宗应众信友的要求，在 1925 年将她列入圣品。

圣女小德兰的自传是她本人奉长上的命令，分三个时期写成的，她的大姐在她死后，把三个时期所写的自传汇集在一起，把叙述的语气稍稍加以修改，定名为《某人的心史》。有这本自传的消息很快的就不胫而走，传遍了全球，一直到 1956 年，圣女小德兰的手稿才印刷行世。中文版，最早的是马相伯先生所翻译的，取名叫《灵心小史》，由上海的土山湾出版；以后有苏雪林女士所翻译的。原文都是根据圣女小德兰的大姐所润饰的底稿。1963 年台湾的光启出版社，请张秀亚女士根据圣女小德兰自己的原稿重新翻译，定名为《回忆录》。这些版本对年过五十的中国天主教徒而言，我知道，阅读过的人必不在少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有机会可以细细的阅读这本书，我保证您一定爱不释手的。为什么她的自传会如此轰动风行全球呢？

下面就揭开这个谜，跟各位介绍她的灵修之道。她在生前曾经许下，愿意以施惠于地，撒下玫瑰花，去过她在天上的生活。说实在的，由她的转祷而求得的神恩异宠和奇迹，还的确是屈指不胜屈。教宗碧岳十一世，应全球信友的要求，缩短她列品的时间，提前在 1923 年宣布了她的真福品，又很快的在 1925 年，当着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空前众多的民众，将她册封为圣女。这位圣女，一生从未走出静修院一步，却在 1927 年又被立为传教区的主保，与 16 世纪的传教主保圣方济·沙勿略的大名并列，受到所有传教区信友的崇敬。圣女小德兰给世人所带来的，而且又被世人所踊跃效法的信息是什么？她在去逝之前曾经声明说：“我知道我的使命就要开始了，我的使命是使人爱天主如同我那样爱他，要把我的小路送给人灵。”她所赖以成圣的“小路”，就是“神婴的路”，她说：“就是使我们在天主的怀里，成为谦卑渺小的一种心情，深知自己的软弱，却大胆地依恃在天大父的慈爱。”这个方式，是由生活中的无数小事实，提取进步的持久方法，谦逊诚实地接受与时俱来的欢乐和痛苦，完全尽好自己的责任，无论怎么难，也要寻找各种机会，对人表示爱情和帮助，加给自己只求天主知道的小克己、小牺牲，这一切都要以爱心去实行，那就是爱那爱我们如子的天主。但是，我们却不可误解，在她的名字和她的道路上所标的的这个“小”字，如小德兰、“神婴小路”，以及她文笔的天真诚朴和她那美丽的比喻“玫瑰花雨”，因而以为“神婴小路”只是一些幼稚好玩的玩意儿，不需要多所努力。其实，她这种断不断的牺牲克己，反而比有时去做件辉煌的大事，所需要的毅力还更大。圣女小德兰不但常以微笑承担会规和长期病痛所加给她的痛苦；还甘心乐意的接受，共同生活所带来的无数冲撞和上司们对她的误解，这一切都是她有真正英雄气概的证明。但是，最惊人的，还是她所受的考验，连她的姐姐们都不知道，那就是多年困扰她的神灵黑暗和疑虑。然而小德兰深明“诸圣相通功”的道理。她进会修道，就是为了拯救人灵，天主使她明白，唯有痛苦才能实现她的愿望，她也了解十字架的真谛，因此，她特别爱慕痛苦，而把它们奉献给耶稣。小德兰还曾说：“我感觉天主号召我做使徒，圣师和殉道者。”她虽然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修道院半步，而她却以祈祷和牺牲拯救了无数的灵魂，这就是教宗碧岳十一世，立她为传教主保的原因。她对天主所说的：“你们若不变得相似孩童，不能进入天国”的这句话，恐怕比任何圣师都了解得更清楚，也更使其他的人了解这句话。她将全部生命奉献出来为了“爱”，证实了她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只有爱情算数”。您不觉得她爱得多，所以天主给她的也多吗？

2.5.9 十九世纪的教友组织

我们谈谈十九世纪中，教友们发起的一些社团组织。天主教會的社团组织，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第三会”，和中古时期的“友爱团体”。在十九世纪时，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牧灵工作的繁杂，再加上教會的财产都被政府没收充公，教會不再用私人捐募的方式筹得新的基金，因此为了维持牧灵工作，尤其是为了外方传教事业，而成立了许多筹募基金的团体。像 1822 年成立的法国“里昂传教团”，是整个十九世纪的传教基金组织。到了 1922 年以后，总部就改设在罗马了。其他类似的社团有日耳曼的方济沙勿略善会、巴黎的圣婴会、德国天主教妇女与女青年传教会、还有专门为非洲传教事业而设的圣伯多禄克拉弗团；欧美各国都有为支助传教事业与传教组织的团体。基金的捐募通常都是积少成多的，在法国，也有好几个为了特殊的目的而组成基金会，有的是专门为了赞助优良读物之推行、有的是专门为帮助新教区中天主教信友们的精神生活。有的专门为帮助移民、有的专门资助文教事业与天主教学者，这一类的社团，当然不仅只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为企使社员们对教會的牧灵工作感到兴趣，并且制造机会让社员能够实践爱德。

3 一战至梵二大公会议

3.1 动荡不安的政治

3.1.1 动荡的政治环境

下面开始来介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圣教會的林林总总。对这一段时间，我先做个概略的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人类矛盾冲突的开始，但是并没有结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三、四十年，只不过暂时的停战而已，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却埋下了冷战的种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签订的和约，使得欧洲的版图大为改变，政治地理的改变，对教會不完全有利。奥匈帝国被分裂为四个独立国。奥地利共和国大部份是天主教信友，它已经沦为次等国家；匈牙利原本是天主教国家，耶稣教徒比较少些；捷克斯拉夫的国民大部份是天主教信徒，但是也有少数的耶稣教徒或是裂教徒，而它的政府却被“共济会”的会员所操纵；南斯拉夫则融东正教、天主教和回教于一炉，东正教徒掌握着政权。另外从 1795 年被强邻所瓜分的波兰又复兴了起来，波兰与梵蒂冈在 1927 年订立协约。立陶宛大部份是天主教徒，也在 1927 年与梵蒂冈订立协议。爱尔兰于 1921 年与英格兰分裂，形成了一个新的天主教国家，然而这件事对天主教會有益或是有害，这还很难说。英格兰天主教徒所处的环境，因爱尔兰的独立而恶化，以前一直在安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占有重要地位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可以说是自动的退居于孤立的境地。大战以后，欧洲方面，不论是战败国或是战胜国，两者都已经筋疲力尽，北美的美国经济却反而大为繁荣，世界的领导权也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而东方的日本，也挤进了世界强国之林。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年代，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那就是极权政府的产生。俄国的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列宁的“布尔雪维克”党战胜，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 1922 年取得政权，建立了“法西斯党”；德国不肯接受《凡尔赛条约》，希特勒组织了“国社党”，也称“纳粹党”。我们的圣教會就是处在这样世界局势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起，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为时很短，我们无法断定这段时间，是否算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代，它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好像 1789 年到 1814 年间的“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各国的战争，开启了十九世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是欧洲各国争取世界霸权的一场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欧洲已成为美洲与亚洲所要争取的目标，这真是一个多难的时代，天主教會要比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政治社会激荡的时期，有了比较好的

预备。当然两次大战所摧毁的无数生灵与人文价值，使教会受到深重的创伤，但是她内在的组织，至今都安然无恙，她不需要重新开始，在这三、四十年史无前例的剧变中，圣教会是世界上唯一稳定不移的组织，人们因此感到惊讶！连她有增无减的敌对者也有同感呢！在有些国家，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大致和十九世纪的情形没有所谓本质上的差异。

3.1.2 本笃十五世的贡献

教会经历了政府的文化战争，没有正式条约的妥协方式，协约与毁约等恍惚不定的政策，牧灵的工作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现在，我就把经历过战争的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他的任内教会所经历的种种事情，稍稍介绍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个星期，教宗碧岳十世便去逝了，他原本希望能尽力避免战争，不断的向敌对的双方发出警告也都无效，他深感痛心，加速了他的惆怅而提早去逝，在这么混乱的时期，统治教会的重责大任遂落在教宗本笃十五世的肩上。教宗碧岳十世去逝的时候，意大利仍然是中立国，因此枢机们甚至那些参战国家的枢机们，都能出席选举教宗的大会，原名雅格德拉·纪艾沙的枢机，也是波隆纳地方的总主教，当选为教宗，取名为本笃十五世。他曾经是教宗良十三世的助理国务卿，外交出身，他外表虽然瘦小，但是高贵、稳重，而且聪明又毫不自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时期，和战后的几年当中，教会不能再找到比他更能干的元首了。教宗本笃十五世深为这次战争的蹂躏和灾难的惨状所震惊，何况对将来的惨痛后果，他比从事战争的人看得更清楚，因此，他会决心设法使战争结束，最低限度也要尽力阻止战争的扩大，提倡和平并努力重建和平，显然该是教宗的责任。以他是教友们的父亲的身份来说，他当然该不偏不倚地严守中立，但是，他这种中立的态度，却招来交战双方无理的反对，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所以双方都诬赖教宗偏袒对方，对教宗的干斡旋双方都不肯接受，都责怪教宗的缄默，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教宗的中立态度，却增高了教宗的政治声望。英国、荷兰与梵蒂冈之间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外交关系，就在 1914 年与教廷之间重新建立邦交，由于英国、荷兰与教廷恢复邦交，这又引起意大利的担忧与不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教宗圣碧岳十世就与世长辞。新选出的教宗本笃十五世，他以教会元首的身份，眼看战争的可怕，既无力阻止，就宁愿保持中立，可是，连保持中立的态度也受到交战国双方的责难。但另一方面，却因他中立的立场，而使教宗的政治声望反倒提高了，进而促使英国、荷兰等国，在 1914 年与教宗重建邦交。不过，这件事又引起意大利的担忧与不安。那么意大利如何应付她所面临的担忧与不安？意大利就在自己宣布参战以前的几天，也就是 1915 年的 4 月 26 日，与英国签下了秘密协定，意大利在获得与她同盟的各国的答应，拒绝教宗参加未来的和平会议。1917 年 8 月，教宗致函给每个参战的国家，邀请他们商讨和平事宜，有些政府置之不理、有些则故意说些客套话加以推托，教宗在失望之余，只有尽力减轻战争的灾祸。他在这方面成就很大，他不分国籍、不分信仰，对交战国的伤患，一视同仁地予以收容救护；他也说服交战国双方要善待俘虏、遣送受伤的士兵返回故乡、协力搜寻失踪的人、救济饥荒者等等；他还筹措了庞大的经费。这些经费，有的从他的私囊、有的来自信友们的捐献，是用来赡养教育那些因战争而收容的孤儿，他更在战后救济俄罗斯中欧的难童，他这种宗教博爱的辉煌表现，为他赢得了普遍的称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意大利签署秘密协定的国家，在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和平会议中，就真的因了意大利的反对，而没有邀请教宗参加会议，而在成立国际联盟时，也拒绝教廷派代表参加。而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正义与和平的呼吁，在当时是最重要不过的了。意大利政府一意紧持拒绝教廷参加，这又是为了什么？因为武力冲突虽然已经中止，一方面满足了他们的贪欲，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宣传却没能平服，教宗也预料到《凡尔赛和约》，不但不是真正和平的开始，已经是再一次浩劫的前奏。教宗本笃十五世虽然处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但是，他却不停止奋斗，在他最后的三年中，表现了他伟大的外交家的天才，和新兴的国家成立了一连串的协议，曾与教廷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又恢复了邦交，像瑞士，就是因为教宗在战争时

期的博爱行动，使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成见，法国也一样，在大战期间，也逐渐平服了他们在 20 世纪初叶，所怀有的那种反神职界的情绪。而驱逐修会会士的法律，虽然没有正式取消，但是，重新返回祖国的会士们，却不再被骚扰。1920 年，法国也和教廷恢复了，自 1904 年以来所中断的外交关系，恢复了邦交与义大利的关系，也有了比较松弛的迹象。自 1870 年教宗碧岳九世在位时，义大利占领罗马以来，所宣布的有关教友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本笃十五世也予以取消，并且为“罗马问题”也做出了谈判的准备，只可惜一时之间还是困难重重。在他生前，虽然没能和谈成功，但是已经为继他位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打开了应走的路线。我们可以从一项统计数字，来加以证明，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时，教廷的声望从谷底不断的攀升，在他就职的当年，与教廷有外交的只有 15 个国家，当他去逝时，已经增加到了 27 个。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期间的活动，并不只限于外交方面，他本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人，因此，对教会的学术，尤其对圣经的研究，他竭尽所能地推动他所建立的，统管各修会的修会圣部和大学的圣部。虽然有大战的纷扰，也未能阻止他在 1917 年所公布新完成的《天主教法典》，这是他的前任教宗碧岳十世，登基后不久开始整理编辑修撰的。自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工程，1912 年时，教宗碧岳十世已经把整部法典的草案，颁发给全球的主教们，但终其在位之日未能完成颁布的手续。继位的本笃十五世，他在 1916 年的 12 月召开御前会议，宣布要颁布法典。1917 年的“圣神降临节”，本笃十五世终于正式颁布了三百多年来，众所期盼的最新的《天主教法典》。这本新的教会法典，立刻获得法学家们一致的好评，他们认为，这是法律典籍中的杰作。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整个圣教会普遍的关怀，他特别挂虑的两大工作。就是东方教会和传教区域，他在 1919 年，公布了《夫至大》通谕，这是近代教宗对传教所颁发的伟大通谕中的一道。他以一种强大的魄力，强调培育本地神职人员的重要性。相传他在临终时，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传教。

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七年，身体一向瘦弱，经常患病，1922 年 1 月中旬，一种很轻微的病便结束了他 68 岁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时期与战后的几年当中，教会不可能找到一位比他更聪明能干的教宗了，假如他身强体壮，而且生在太平的日子里，无疑的，他必然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强势教宗，可惜天不假年，以致使他没有时间实行他的抱负，但在许多方面，他已经采取了步骤，使继承他职位的人，有萧规曹随的便利。

3.1.3 碧岳十一世

教宗本笃十五世去逝后的第十一天，枢机团选出了米兰的总主教兼枢机亚基·雷拉迪为教宗，他取名为碧岳十一世。就身体方面来说，碧岳十一世不像本笃十五世那么瘦弱，因为他出身于，义大利北部米兰附近的小村代西欧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为此比较健壮。他早期的生活，并没有作过大事、经过大场面，一直到 60 岁，他完全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最先是在修道院当教授，而后 30 年都在当图书馆的馆长，先是米兰的盎博罗削图书馆，以后是梵蒂冈图书馆，他和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有来往，熟悉许多国家的情况，并且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在工作之暇，便到一所修女们办的学校去给儿童们讲道理，暑假的时候，他喜欢到阿尔卑斯山最险峻的山峰去登山。教宗本笃十五世慧眼识英雄，1918 年命他出任宗座巡阅使，派他到新兴的波兰去视察。三年之后，果然脱颖而出，显示了他的外交才华和在艰苦环境中的魄力，使他被本笃十五世升为枢机并且出任米兰教区的宗主教。他在宗主教任内只有五个月，便被选为教宗。看到教宗碧岳十一世，就会令人想起 16 世纪，教会革新时期的伟大教宗们，他们都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远的见识，而且也都爱好建筑。当教廷与义大利签订“拉特朗协约”之后，教廷的经济就比较稳定，教宗碧岳十一世，便彻底的重建梵蒂冈宫，这在当时是件绝对必要的事；他又建立了“梵蒂冈博物馆”，设立了“梵蒂冈电台”，以及几个教廷的中央机构。凡是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位随随便便的领袖，他要求于人的很多，但他也信任人。如果说教宗良十三世特征是天资聪颖；碧岳十世的特征是圣德超群；那么碧岳十一世的特征，无疑的，就是他的大无畏精神了。他的智慧当然也不落于这些教宗之后，

尤其是经常的研究历史，使得他显得更为尖锐。不过，在他身上最为显著的，还是他那由人格所流露出的权威，和他那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在次要条件上，他能妥协能让步，但是当天主和教会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任何事情不能使他避开他所划出的路线；任何威胁不能使他战栗；世界任何力量，不能使他退缩。他在位的十年中，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没有消减过。在他和义大利签订和约的过程中，教宗碧岳十一世，正是精明强幹的墨索里尼强而有力的对手，他不怕任何恐吓。1938年，希特勒到罗马，墨索里尼不敢怠慢，以君王的仪仗迎接希特勒，当希特勒表示愿意拜访教宗时，碧岳十一世无意相见，便离开梵蒂冈到冈道尔夫别墅去了，同时也关闭了梵蒂冈博物馆的大门，使希特勒不得其门而入，饱尝闭门羹。

“在基督的王国内，建立基督的和平”，这是教宗“碧岳十一世”在位期间的伟大理想，也是他在第一道通谕《天主的奥秘》内所提倡的。在人们心中、在家庭、在社会内建立和平，为此之故，他特别要用公教进行会和传教工作，在世上推广天主的国，因为在天主内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教宗碧岳十一世虽然坚持教会不干涉俗事，那是各国政府的事，但他却攻击无神主义和现世主义，声言政府也应该遵守道德和精神的原则。人在公共和私人的活动中，都有遵守天主永久法律的义务。耶稣基督不但应当在每个人心中为王，而且他也是全人类的之宰，教宗碧岳十一世，就是根据这端真理建立了“耶稣君王瞻礼”，命令全球教会在每年十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举行庆祝。您记得吧！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时，就已经表示，有意恢复教廷与欧洲各国之间的邦交，碧岳十一世继承本笃十五世的愿望，想要完成这个既定的政策。在枢机加斯巴利的协助下，他不但努力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想要签订协议，来保证教会行使权力的自由，并且调整有关教会和政府的各项问题。比方说，关于主教的任命问题、宗教教育方面问题、信友们的婚姻问题等。过去历代教宗之中，谁也没有比他所签订的这类协议更多了，更没有一项协定比拉特朗条约更响亮的了。教宗的领土被强占剥夺，使碧岳九世和他的继承者提出严正的抗议而造成的“罗马问题”，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本笃十五世生前曾经和意大利政府就“罗马问题”谈判过，但是，没有成功，碧岳十一世继续与对方谈判，在1926年时，谈判已经进入决定时期，而这时候，墨索里尼本人虽无信仰，但是愿意结束这个困扰义大利人民的尴尬局面。墨索里尼深知，如果能和教宗达成协议的话，一定可以名垂千古，他一再地与人重复这一句话，“能解决罗马问题的人，一定是最伟大的政治家。”要解决罗马问题的困难，的确是很大，以至于双方是在极度的机密中谈判了三年，终于在1929年2月，在拉特朗宫签订了两项条约。因为教宗愿意就签订这个条约之便，把教廷和义大利政府之间的其他政治问题，也一并解决。碧岳十一世深深明白，在这经济和军事的强权时代，教宗的独立和声望，和教廷领土的小小没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是，教宗不能作任何世俗权力的附庸，他应该享有一国元首的独立自主的权力，但是，宗座的无上权力，不能只是虚假的，也须有领土为根据，领土的大小，倒不是最重要的。条约中承认，圣座对梵蒂冈所包括的伯多禄大教堂，以及教宗的宫殿和花园，大既是44公顷，有绝对的最高主权，此外还有冈道尔夫别墅和罗马城里的几座建筑都享有治外法权，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宗决定永远解决罗马问题，并且承认义大利王国及罗马为首都的事实。

教宗“本笃十五世”去逝后，继承他职位的是教宗“碧岳十一世”。这两位教宗的作为就是为了天主、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和平而努力奋斗。下面继续先把教廷与义大利政府之间，有关罗马问题的妥协情形作个总结。我们知道，打从1870年开始，双方都先后表示过和好的愿望。从教会方面而言，既不可能也不值得恢复过去的教皇国，但从另外一面而言，必须得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使教廷和义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不再重蹈“亚威农时期”的教宗与法国关系的覆辙。从1922年起，法西斯党的总理与领袖墨索里尼统治着义大利，他个人与教会毫无关系，但是，他一心一意想把义大利造成一个可领导全世界的力量，因此而愿意解决内政上的症结，那就是棘手的“罗马问题”。经过了难困的谈判过程，终于在1929年2月11日，在教廷的拉特朗宫签订了“拉特朗条约”，由教廷国务卿格斯巴

利和墨索里尼代表双方签字。和约的内容是：“教宗放弃过去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而义大利呢，则承认梵蒂冈地区和圣伯多禄大教堂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具有外交、邮政、护照与货币制度等等；在罗马城中，属于教廷的学校与机构，享有多种程度不同的治外法权；义大利赔偿教廷 17 亿 5 千万里拉；同时订立了有关意大利境内，教会地位问题的一项协议。”这是教宗接受“拉特朗条约”的条件。唯有往后的历史学家，才能根据经验来判断，“拉特朗条约”的后果及影响。事实上，我们实在也很难找到当时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所能走的其他途径。讨厌而棘手的“罗马问题”终究需要解决，当然，教宗在 1929 年所达到的最低限度，说实话，“拉特朗条约”不比 1871 年教宗碧岳九世的当时，为教会的损失而提出严重的抗议是必需的。但是，永久的抗议下去，不是办法，也没有用处，教会所要求的是，宗座能摆脱一切政治的羁绊，而能够独立，而“拉特朗条约”正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有些人希望能进一步得到一项国际性的保证，义大利拒绝了，教宗碧岳十一世也没有强求，事实上，如果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一项国际性的保证，对教会反而会造成一种阻碍，这就与“神圣同盟”时的情形差不多，而且国际性的保证也是没有价值的，只要义大利政府能依法行事，教宗觉得并不需要其他力量的保证。对于恶意的权利侵犯与暴力，纵使有一张写在纸上的保证，也是枉然的。

教宗碧岳十一世真正的着眼点，是为了精神的最大利益，满足于物质最小的利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猛然一看，会以为碧岳十一世所要求的，并不比 1870 年义大利政府所提出的“保障法”强了多少，而事实上是有实质上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应该花点时间说个清楚。教宗碧岳九世所拒绝接受的保障法，是由义大利的国会投票表决的单方面的立法，并没有征询教宗方面的同意，所以能够由义大利国会予以取消。而“拉特朗条约”是两方面共同签订的条约，由双方在平等的立场谈判，并且是在教宗所指定的条件下，由教宗受的；还有一点实质上的不同是，保障法只准教宗有使用梵蒂冈宫的使用权而已，而“拉特朗条约”，则承认教宗有完备的主权，而且，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土地面积很小，但是却拥有最高主权的一切属性，也就是拥有自己的立法权、警察权、有自己的国旗、钱币、邮政以及与各国交换使节的全权等等。这项实质的自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充分表现了这种独立自主的利益。这就是教宗碧岳十一世所谓的“为了精神上的最大利益，满足于物质上最小的利益。”教宗愿意使双方之间的协议与条约，紧紧的联在一起，这就使圣教会能够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教宗他不但声明了，天主教是义大利的国教，而且规定，凡是涉及政治和宗教的事项，都应该遵照教会的法例而调整。这样，为天主教信友而言，教会的婚姻享有一切法律上的效果，所以应该受《天主教法典》的保障和约束，一切中小学都应该开设宗教课，“拉特朗条约”的签订，在义大利获得了狂热的回应，在全球也提高了宗座的声望。

碧岳十一世有“公教进行会的教宗”的称号。在他的言论和公文中，这个问题出现过上百次之多，可见他是多么的重视这个问题。自从耶稣创立教会以来，教友们便都参加了传播福音的工作，到了十九世纪，教友们希望能卫护并扩展教会的“社团”纷纷在各国成立了。教宗“良十三世”深深明白，若要使这种，由教友本身开始去从事的使徒工作，获得圆满的效果，必须有人给予指导并加以统一才成。这个在主教们领导之下的信友使徒工作，是由圣教宗碧岳十世加以命名为“公教进行会”。当教宗碧岳十一世在位的初年，已经有了一个公教进行会，在各主教区和本堂区工作着，可以说已经有了追求这类理想的分会，不过，彼此之间互不从属，以致于浪费精力。再说，这些团体好像不能把握住日渐增多的劳工群众，而劳工朋友，不愿意加入公教进行会的组织。他们认为，接触一些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生活又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在感觉上难以适应，很不舒服。教宗碧岳十一世明察到这一点，认为对“公教进行会”有自行处理和予以发展的必要。首先把一切的活动整理一番，找出最为紧急重要的事项，所以是，应当在教宗的最高指导下，归给主教们来管理，尤其应该加强教友们的使徒工作，不可只当作是神父们职务上的补充或辅助而已。因为每一位教友，实在是

他们重要的角色，而且是连神父也无法替代的，倘若引用福音的比喻，那么教友们，是理所当然该发挥酵母的作用，好能使整个面团发酵起来，也只有教友能使基督的精神，浸入他们周围的人群中，尤其是当时的劳工朋友们。因为他们已经被马克斯的“唯物无神”的思想所感染，眼看着连神父们都已经无法对他们发生作用了，那么要怎么样才能使这个计划具体的实现呢？教宗当时的确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恰好，就在这时候，教宗认识了一位在比利时当副本堂的贾尔定，他给教宗带来了一线希望。

下面，就特别介绍贾尔定神父和他所创立的“公教职工青年会”。贾尔定神父生于 1883 年的一个比利时的工人家庭。长大后，向父亲表明了要当神父的意愿，这位虔诚的父亲慷慨地答应了，并且接了一份额外的工作，好能有足够的钱供自己的儿子进入修道院。等到贾尔定暑假回家时，他很伤感地看出来，往日的同学们都在回避他，认为他既然要去当神父，工人阶级的他们，便把他当作叛徒了，这是贾尔定所始料未及的，他决无意要和劳工群众们绝缘啊！1904 年时，他就在父亲临终的床前，发誓要为工人阶级奉献一生。当他在布鲁塞尔的郊区当副本堂神父的时候，便想办法把青年女工团结起来，随后又把青年男工团结起来，他就这样创立了“公教职工青年会”。他所提倡的口号是“观察、审断、力行”。他教导青年男女认真，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或者是宗教方面的，都应当纠正弊端；然后他训练他们，如何审断是非善恶；应当用什么方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行正。贾尔定的工作不久便引起了同情，却也有加以批评，说他在教友当中制造分裂，引发阶级斗争，他被这些批评激动了，跑去见他的总主教，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总主教要他去见教宗，他就真的跑去罗马要求见教宗。教宗问他究竟是想作什么？他告诉教宗说：“为了拯救劳工阶级，即使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正是当时的教宗最关心的问题，于是教宗说：“阿呀！终于有人来同我谈及广大的劳工群众，有人想要拯救这广大的群众了！”教宗又更认真的对贾尔定神父说：“这是你能给教会作的最大的服务了，把教会所失去的群众，再找回来还给教会，十九世纪，最大的耻辱就是‘教会失掉了劳工群众！’”于是贾尔定神父便把自己所采取的方法和计划草案，向教宗作了清楚的报告。教宗告诉贾尔定神父说：“我不但祝福你的工作，而且这也正是我的心愿，我把你所作的工作认为是我自己的工作一样。”贾尔定神父这次晋见教宗，意义非常重大。他这种看来很平凡的工作，经过教宗的一番鼓励和肯定，获得了迅速的推展，由比利时而法国，随后传到了欧美各国和亚洲地区。到了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 19 个国家成立了“公教职工青年会”，咱们中国也包括在内。因为这项工作的成功，更激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在其他的社会阶级中，适合各个环境的各种特殊协会，也相继的组织起来，像是“公教农民青年会”、“公教学生青年会”等等，每一种都有男、女个别的分枝机构。

教宗碧岳十一世在纪念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谕 40 周年纪念时，颁布了名为《四十年》的通谕。在这份通谕中，对这种专业化的活动，不但表示赞成，而且还大力推荐，并且声明这是各种传教方式中，最切合时代需要的一种方法：“把否认基督的各个阶级又重新引向基督，万事之先莫如在各阶层中，把那些明了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并且知道用友爱的精神同他们谈心的助手，征集起来、组织起来，工人们直接的使徒，也应该是工人自己，商业世界的使徒自然是商人。”这种专业化的公教进行会，是圣教会的历史上，在二十世纪最大的成就之一，给教会带来了新的精神，还给了信友们所应有的地位，同时也在各行各业中培植了信友的领袖人才。他们也成了社会上、政治生活、学术生活中的领袖。十九世纪的公教青年，面对着不信和现世主义的攻击，只知道采取消极的防卫姿态，而 20 世纪的公教进行会，却给了他们兴奋剂、创造性和征服困难的能力。在 1965 年时，教宗保禄六世把贾尔定神父晋升为枢机，这对一位没有主教品级的普通神父而言，真是一个罕有的荣誉。保禄六世还说，他之所以如此做，“是为，对一位在这个世纪，为教会和人灵工作最好的人表示歉意。”

教宗本笃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如何努力的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他公布了，

自碧岳十五世在任内所努力完成的新版《天主教法典》；他还颁布了举世闻名的《夫至大》通谕，这一道通谕关系我们中国天主教会至深至远，因为这一道通谕是近代教宗，他对传教所发布的伟大通谕中的第一道，他以一种强大的魄力强调，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重要性。在教宗碧岳十一世的任内几个重大事件，例如，他上任之后的第一道通谕，以《天主的奥秘》为名，揭示了在基督的王国内，建立基督的和平的伟大理想，也因此，他钦定了每年十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做为“耶稣君王瞻礼”；他还为了永久解决从碧岳九世以来，困扰教会和世人的“罗马问题”，与义大利的墨索里尼签订了“拉特朗条约”；他推动公教进行会，鼓励“贾尔定”神父创建天主教职工青年会，这些组织和运动，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在廿世纪最大的成就之一，使群众能够再基督化，给教会带来了新的精神。

教宗碧岳十一世在他所颁布的重要通谕中对我们的训诲很重要。我们可以说，碧岳十一世紧紧追随教宗良十三世的芳踪，他的通谕也都是有价值的专著。他以远大的眼光，将教会不变的道理，贴合在这人世间千变万化的环境上，几几乎涵盖了社会上所有的不同层面的问题。例如，耶稣圣心、基督君王、司祭职、玫瑰经、灵修训练等等，但是其中最著名的通谕，还是那些讨论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道德问题的通谕，像 1929 年所颁布的《神圣导师》通谕。他所面对的是，企图垄断青年教育的各国政府；为家庭和教会争取应有的权利，像 1930 年的《婚姻》通谕，他所面对的是，腐败的社会风气和家庭的解体，因而他阐明了教友们婚姻的道理；在 1931 年，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谕 40 周年时，他颁布了《四十年》通谕，讨论如何重建社会秩序，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势，发表并阐明了教会的立场。因为打从良十三世以来，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展，发生了许多流弊，由于自由竞争的结果，使得经济大权操纵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他们垄断了经济和市场，犹有甚者，他们变本加厉对政府施加压力造成威胁，于是，经济势力的竞争，一时成了不能抑制的严酷。当粗糙的原料，经过工厂的加工，成了精制的、大量的生产工业产品时，人工便一落千丈，道德也因而沦丧，社会上形成，富者愈富、刚者愈刚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改善这种情形，教宗强调两点，第一，应该废止以利润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而代之以公共利益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第二，应当建立职业制度以及国家和国际之间的机构。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使，经济的活动受公共利益的制衡和约束。教宗碧岳十一世不但是“公教进行会的教宗”，他也是“传教的教宗”。往后，我会以专集来加以介绍，现在我只把传教活动的成效用数字来说明，他在位期间，传教区的数目，由 330 个增加到了 541 个，而且其中有 37 个区，是委任给当地的主教或监牧来治理，其中就包括了，咱们中国的六位中国籍主教所治理的 6 个教区。

3.1.4 教会与法西斯共产党的周旋

教宗碧岳十一世与义大利法西斯党之间的奋斗，彰显出他对卫护信仰的不屈不挠精神，这种精神也同样表现在，对抗纳粹德国和无神主义的共产党。义大利的法西斯党，由墨索里尼所创，他对宗教不像马克思那样有清晰的认识，他对圣教会的态度，完全是以直接利益为考量，就这一点，就迟早要导致法西斯主义和教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分明就是一种极权统治。墨索里尼认为，国家的形成，并不是为保障人民的公共利益，而个人呢，乃是为了国家而生存，因此他的口号是：“一切在国家内，除了国家之外什么也没有，反对国家的一切均属无效。”教宗碧岳十一世坚持教会的立场，反对这种绝对极端的国家主义，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他又会答应和法西斯政权谈判，随后又同法西斯政权签下了拉特朗条约呢？这其实是两码子事儿，但是实际上，教会或者是因为希望能够和平相处，或者是为了明哲保身，常常是设法和任何政权建立关系，对于一些无关重要的争执，教宗为了顾全大局，总常是隐忍不说，但是，当法西斯政权对主要的问题与教会为难时，教宗却打破了他一向的隐忍和缄默，毅然决然的加以反击。当法西斯党开始攻击“公教进行会”，尤其是攻击“职公青年会”时，双方的冲突也变得更加严重了，法西斯一党专政的政府，想把教育教青年的权力收归政府来垄断。教宗让他们知道，侵犯“公教进行会”就是侵犯教会，也更好说是侵犯到

了教宗的眼珠子。在他那“神圣的导师”通谕中，对政府垄断教育的作法，毫不留情的加以谴责。

1930年的年底，情势变得更为紧张起来，法西斯党开始对“公教进行会”散布谣言。不久之后，就开始以暴力，抢劫破坏对待许多设在各地的分会，职工青年会还遭到殴打和凌侮，墨索里尼公开的声明说：“儿童到了入学的年龄，便该隶属于国家，而且是完全的隶属于国家，绝对不可分属于别人。”政府甚至还命令所有的儿童和青年，都一律应该入法西斯党，不得有例外，而其他所有一切的青年们的组织都应该解散。这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双方的协议，墨索里尼单方撕毁了《拉特朗条约》，于是取名为《我们不需要》的通谕，就在1931年6月29日的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庆日，有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怒吼了，教宗先是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亲自一字一句的撰写而成，然后呢，他交给外国的通讯社发表，是为了向全世界作证，教宗在这道通谕中，对法西斯党攻击“公教进行会”的谣言一一的加以驳斥，证明“公教进行会”丝毫没有政治的作用，这也是他再一次的争取教会的培训青年的权利，他在通谕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从未否认过，政府有教育国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硬要说，国民从小到大毫无条件的都隶属于国家，这就与教会的立场无法相容了，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根本违反了家庭的天赋权利。”教宗碧岳十一世，也抨击那些武断的根由，称它是“把国家当作偶像在崇拜”，这种对国家极端过份的崇拜，便是推翻社会及家庭伦常的秩序，因为社会是为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人并不是为社会而生存的，教宗碧岳十一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墨索里尼深知态度倔强是会弄巧成拙、有损无益的，而且与教宗正面冲突，在义大利以致于全世界的舆论面前已经造成了重大的错误，于是就放下身段谦和地与教宗进行和平方式的商榷，后来才终于达成了协议。这次风暴的结果，我们庆幸还不算太坏，当然全球各地对“公教进行会”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谈完了法西斯党，下面，谈谈，教宗与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教廷与纳粹之间的冲突，要远比与法西斯党的冲突还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因为义大利人民几乎全都是天主教教友，墨索里尼也深知有他绝对不能跋扈僭越的界限，但是在德国情势就不同了，教友的人数并不那么的普及，教宗在位的前半期，也正是希特勒和纳粹气焰高涨的时刻，他那带有毒素而且具有煽惑性的雄辩，对德国民众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在外国人的眼中，他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煽动者，但是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所屈辱、被失业和穷困所激怒的德国人看来，好像天生此人，就是为拯救德国摆脱共产党，并使德国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英雄人物。1933年，希特勒正式掌握政权，成为德国的独裁者，其他的政党一律遭到解散。在反对天主教这一点上，纳粹和法西斯乃是一丘之貉，国家至上也就是元首至上，希特勒也和墨索里尼一样，认为每个人都隶属于国家，但是纳粹更进一步的攻击天主教的信仰和道理，他想在新的面具下，恢复日尔曼人原有的宗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它那充满优越感的种族主义，最遭德国民族痛恨的种族就是犹太民族。希特勒的这种主张，势必要一方面粉碎人格的尊严，使人民成为万能独裁政权的牺牲者品；另一方面，要对所谓低等的民族轻视和憎恨，这显然与我们教会的道理格格不入，因为教会的道理要我们尊重人格的尊严，主张人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种族肤色都一律平等，都是天父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同胞兄弟，而且命令人要实行博爱，但是，希特勒却如此说：“德国人信奉宗教真是笑话。人或是做基督徒，或是做德国公民，两者决不可能得而兼之。”早在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前，德国的主教们就已经清楚的警告过教友们，但是为什么当希特勒在1933年掌控政权以后，便和教廷达成了一项协议呢？因为他是经过选举才得到了政权，因此也就不能轻忽舆论的力量，他对天主教教友和基督教同样都有所顾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保留了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天主教教友巴本担任副总理，他还向议会中明说：“他愿意同梵蒂冈教廷继续并发展友好关系，因为基督的教义，是民众道德生活的基础。”但是教宗碧岳十一世对希特勒的真正意向决不存幻想，经过谨慎的考虑之后，为了避免在德国的天主教会遭到痛苦和折磨，也为了向

人证明教廷并不拒绝与人和好，所以对希特勒的建议并没有调头不顾。教宗碧岳十一世说：“在有关拯救人灵的问题上，即使是同魔鬼交涉，我也不怕。”实际上，教廷国务卿巴赛里枢机，也就是未来的教宗碧岳十二世和德国副总理巴本之间的谈判，很快的便签订了一项对教会很有利的协议，然而教宗碧岳十一世他也预先看到这项协议在以后必会遭到破坏。不过好在，凭着这个正式承认教会权利的协议，教友们日后的抵抗才可以有法律上的基础。果然不出所料，签约时墨迹未干，一连串对教会敌对的措施便接二连三而来，有的是暗藏阴谋、有的是显然粗野、有些是对神职界和修会的不信任；还有的，则是企图逐渐窒息天主教的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逐渐形成了义大利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以及苏联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局势。教宗碧岳十一世和义大利法西斯党不断周旋，墨索里尼深知教宗碧岳十一世刚强、不屈不挠的个性，因而不得不与教廷以和平商榷的方式达成协议；也谈到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以及教会反对纳粹的种族优越主义和国家至上、元首至上的国家主义，虽然在1933年，曾与教廷签下对教会有利的协议，但是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不久之后，一连串与教会敌对的措施就接踵而来。下面介绍希特勒的纳粹党如何对教会迫害的经过。首先，他封闭了天主教的报馆，解散“公教进行会”和“职工青年会”以及天主教所主办的学校，同时也建立了第一座集中营，把犹太人、天主教教友和共产党的党员禁闭起来，并且逮捕了好几百位很活跃的神父。他这种强暴的手段，表面上看来，好像比苏联或西班牙的要轻些，但是，这种情形长期延展下去，那可就危险性更大了。德国的主教们，首先起来的抗暴政，这是天主教牧者的光荣，慕尼黑的总主教和闵斯特的主教，他们的英勇态度最为突出。教宗碧岳十一世对这些破坏协议、和有意使德国摆脱基督教而重回野蛮时代的异教，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1936年，12月1日，一项新的法令使政府完成了对青年人的统治。这项法令规定：“德国所有的青年，除了家庭及学校的教育之外，无论在物质、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得按照纳粹的精神，为服务民众和公益，接受希特勒青年的教育。”希特勒把所有的德国青年，从十岁到服兵役的年龄，全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了。教宗为了回应这种政策，发表了一道用德文写的通谕，极度秘密的避开了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监视和封锁，在德国全境传播开了，而且还在1937年的“圣枝主日”，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都听到了由讲道台上所宣布的这道通谕，这一下，可把纳粹党人气得爆跳如雷。碧岳十一世把双方冲突的责任完全放在纳粹政府的身上，教宗说：“纳粹把种族、国家的人民及掌权者希特勒都神化，对神化了的领袖加以崇拜，把一个人竟然同基督并列，而与教会学校宣战，这是一种新的、具有侵略性的思想，被掌权者以种种隐密的或公开的强制手段，以恐吓和利诱，企图使德国人民背叛脱离教会。”教宗认为这一切都是侵犯天赋人权，教宗为证明他这种谴责并非政治的动机，同时也准备了一道抨击“无神主义”共产党的一道伟大通谕，是在论德国种族主义通谕的前四天公布的。教宗除了自己的权利之外，没有一兵一卒、一刀一枪，所以向德国政府所提出的违反协议，和一连串抗议，也就得不到什么结果。反倒是攻击教会和神职界的新式暴力的浪潮接踵而来，诬蔑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活动，也更为尖锐了，成百、成千的教友们也被送进了集中营。1938年希特勒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于是又一个天主教国家陷入了纳粹暴政的宰治之下。墨索里尼几年前，还声称种族主义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怪论，这时候竟也和德国的希特勒结为联盟，种族主义的怪论也就侵入义大利。这为教宗当然是痛苦更甚，教宗遂利用各种机会，向全世界发出了他痛苦的呼声，同时也发表了，反对迫害虐待犹太人的抗议，甚至要人记得基督也是犹太人。当1938年，希特勒应墨索里尼之邀正式访问罗马时，碧岳十一世离开了罗马，他说：“为了避免看到那已经准备好的，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的另一种十字架的崇拜仪式，这样的气氛使我难受。”1939年碧岳十一世去逝时，纳粹的报纸所登载的是对教宗的侮辱。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碧岳十一世将永远是一位，面对种族谬论毅然抨击的教宗。

碧岳十一世与法西斯和纳粹的极权政治的搏斗虽然很痛苦，但是，他最为痛苦的，莫如在 1917 年，在俄罗斯获得胜利的共产极权政治，而“马列思想”是最彻底的无神主义，他们企图赤化全世界。碧岳十一世在位期间，已经有俄罗斯、墨西哥和西班牙三个信仰基督的国家，被共产党所统治，教宗称他们是恐怖和血腥的红三角。在苏联，大部份人民信奉东正教，天主教教友大概有两百万左右。当碧岳十一世当选教宗以后，发现教宗本笃十五世虽然没有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却和它有来往，他帮助苏联，在第一次大战以后所引发的严重饥饿缺粮的情形中奋斗，碧岳十一世继续这项救济政策，派遣了 12 位神父到苏联，把从全世界天主教教友所募集到的救济品，分送给在饥饿中的苏联人，每天供给 18 万 6 千多人食粮。苏联的天主教教友，虽然遭到共产党的迫害，教宗也不愿意中断这种救济工作，一直到苏联政府拒绝接受为止。苏联政府最后宁愿让千万无辜的百姓饿死，也不愿再接受天主教的救济。其实，自从“苏维埃政权”开始时，就已经表现了它反宗教的政策了，他们把宗教看成是“人民的鸦片”而加以取缔、教会的一切教产也全被充公、修道院也被查封、圣堂也大都改为电影院或博物馆、圣像和做弥撒行圣事用的器物也被没收拍卖、许多神父和修会会士被逮捕关进了集中营；同时，还有所谓否定天主、否定神的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宗教活动，想尽各种方法来嘲笑侮辱神职人员和教友们，而这些迫害不分东正教或是天主教。1923 年有三位主教、12 位神父和 1 位教友被斗争，更有一位主教被严刑烤打之后，在耶稣受难日被处死。1923 年的年终，竟连一位执行职务的主教也没有了。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教宗派了两位“巡阅使”，以便视情况而祝圣新的主教，但是不到三年，这些人也遭到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在 1930 年时，全苏联剩下不到 30 位神父。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另一个被共产政权所统治的国家，那就是位于中美洲的墨西哥。

自从 1821 年起，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政府的殖民统治而获得了独立，但是，却一直是动荡不安。百姓几乎全是天主教教友，政权操纵在自由党手中，自由党人已经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于是就在 19 世纪，通过了反对宗教的法案，多次发动过真正的教难。从 1917 年开始，墨西哥的执政者，在反宗教的斗争中仿效了“苏维埃”的方式，驱逐外籍神父、关闭修道院、禁止人们向天主发愿、执行圣职的神父，在人数上也被限制；甚至有些地方，在 10 万个教友中只剩下一个神父。碧岳十一世在世时，墨西哥正由总统贾来执政，此时的教难达到了惨烈的高潮。在 1926 年到 1929 年的几年当中，墨西哥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把天主教加以铲除，或是逮捕神职人员和教友当中的领袖，或是驱逐或是杀戮。学校中所有的儿童都应该接受无神的教育，贾来还曾经企图制造一个与教廷分裂的教会，但是，他完全失败了，没有被逮捕的主教和神父，经常被跟踪或追逐，只因他们居留在国内不走，便犯了该死的罪。他们之所以不走，为的是效法耶稣与羊群同在，不使教友们丧失行“敬礼”和领“圣事”的机会，他们只好转入地下。还有好几百位神父不顾死亡的威胁，化装成工人、小贩甚至是警察，巡回各地、游走于教友当中，他们在谷仓或是牛棚马厩、羊栏中举行弥撒，这些转往暗处，冒着生命危险的神父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耶稣会的普劳神父。一连好几个月，他化装成各式各样的人物，避过了所有的警察和密探，甚至在警察守门的家庭中做弥撒，到监狱去为被判死刑的人行圣事，不幸地终于被发现遭到了逮捕，与他的一个弟弟一同被枪决了。他在临刑时，请求差役除掉捆绑的绳索，然后一手握住苦像，一手拿着念珠高声喊着：“耶稣君王万岁！”碧岳十一世得知这些暴行，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迫害才暂时停止。贾来的继任者仍然视天主教为仇敌，只是手段较为缓和。墨西哥的教难期间，殉道的人数高达五千三百人，共有 300 位神父，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教友们的强力抵抗，保持着他们活泼的信德。

紧接着，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在 20 世纪上半期西班牙发生教难的经过。列宁曾经公开声明，在欧洲各国中，首先应当解放的国家应该是西班牙。他认为西班牙虽然信仰最深，但是终有一天要被共产政权控制的，列宁这项预言式的声明还几乎真要实现了呢！1931 年的 4 月，西班牙的国王亚尔来索十三世被迫让位，亡命海外，西班牙政变成为共和政体。这是一

场不流血的革命，教友们都以乐观的态度接受了共和政体，但是不久就醒悟了。在新的政府中，反对神职人员的真是不少，他们煽起了反对教会的欲火，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便开始有暴民突击圣堂和修院，加以抢掠焚烧，而政府竟然不加制止。所公布的新宪法，不但规定政教分离，而且是一种真正相反宗教的行劲，教育也完全世俗化，离婚也合法了，还禁止修会会士当老师、当教授，更进一步解散耶稣会，没收了耶稣会所有的财产。碧岳十一世得到这些消息后，就在 1932 年颁布了取名为《我们极可爱的》的通谕，并且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事情也就缓和了下来。1936 年西班牙举行了选举，这场选举导致“人民阵线”的胜利，也就是左派政党的连合。他们不但通过了驱逐会士、关闭天主教学校、禁止公开举行敬礼的法令；而且还对放任的暴行不加制止。上百座教堂和修院遭到了焚毁，许多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员被杀，天主教的教友领袖在国会中，对放任烧杀掳掠提出了严重的抗议，第二天他就被杀了。四天之后，弗朗哥将军所领导的革命军，便出现了，立刻赢得了全国的响应，于是乎，残烈的内战便开始了！这场内战持续了两年半，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西班牙也从此一蹶不振了。这期间，政府军所控制的地区内，教友们遭受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迫害，成千的教堂被抢掠后烧毁，多少个世纪以来所积蓄的珍宝毁于一旦，神父、修士、修女遭到计划性的屠杀，甚至有时候竟然看见神父们的尸体挂在屠户的铁钩上，已经埋了的修女们的尸体，还被人从坟墓中挖出来任人凌辱。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神父修士、修女实在无法加以正确的统计，至少也在 7500 人以上，其中还包括了 12 位主教。内战持续了 3 年之久，到 1939 年内战结束，西班牙才恢复了和平。

教宗英勇对抗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被共产党所煽惑而发动教难的墨西哥，在总统贾来的任内，墨西哥教难悲惨；西班牙共和国时期内战及教难爆发。真让人难以相信，在 20 世纪人类文明越进步的时代，竟然在已经接受基督信仰的国家内，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教难，同时人类互相残杀的历史，又要再一次的搬上历史的舞台，教宗碧岳十一世自从登基以来，便不停地忧虑即将来临的战争。教宗碧岳十一世对建立在纸上的不自然的和平，根本不存任何幻想。从 1930 年开始，法西斯的进展、纳粹权势的升高和共产党的增强，更加深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他对所接见的政府首长、以及政治或外交人员，曾经一再的重覆他的建议，他谴责运备竞赛所耗费资源和花费，以及潜存的战争危机，他声明了裁军的重要，战云越浓厚，他的呼声也越悲痛。1934 年，他当着许多枢机们面前，预言说：“谁发动战争，谁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和全体人类社会，交付给残杀和灭亡，倘若真有人敢首先发难，那时我们就要被迫向天主祈求说：‘主！请你驱散那些好战的民族吧！’”五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教宗碧岳十一世的预言不幸言中。

1936 年教宗患病，人们都以为他会从此一病不起，他自己也这么以为。他曾经告诉过在他左右的人，说他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以求换得和平，他并且在病榻上，以广播的方式，发表了那篇悲壮的《圣诞节文告》，为和平作了最后的呼吁，不久之后，他却痊愈了。不过，从此，他眼见墨索里尼越来越同希特勒联系得更为紧密，要把义大利拖上毁灭的浩劫，他感觉异常的悲痛，他想要在《拉特朗条约》签订的十周年纪念日，召集全义大利的主教，给他们作最后的指示，并且向导致民族浩劫的独裁统治者的疯狂再次给予谴责。他为了准备将要宣布的演讲稿，弄得心力交瘁，他预感他的终期已经来临，于是恳求天主假以时日，为能宣读他篇演讲，不料他竟在 11 日的清晨与世长辞。这位不知倦怠的斗士，正如他所希望的，竟在全面斗争中去世，享年八十有二，而这时候的世界，正以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战云弥漫的严重情势，对教宗的去逝都认为是世界的不幸。碧岳十一世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庆幸的是继起有人，能以同样的精神，来完成他的未尽之业，他就是碧岳十一世最亲信的合作者，教廷国务卿巴赛里枢机。当巴赛里枢机于 1939 年 3 月 2 日，被选为碧岳十一世的继承人时，他早已是全球教友所家喻户晓的人物了，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位“永城之子”又荣登教宗的宝座，为此罗马人特别感到高兴。他为了表示对前任教宗碧岳十一世

的作风萧规曹随，遂取名为碧岳十二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担任教廷驻德国的大使，也曾经以宗座代表的身份正式视察过法国、阿根廷和匈牙利等国，并且还曾以私人的身份访问过北美，最后的九年又以教廷国务卿的身份辅佐碧岳十一世。他固然是科班出身的外交家，但同时也对祈祷和神修生活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孝爱，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具有语言的天才，娴熟多种语言，尤其是德文，我们说，碧岳十一世的身体和气质，好像生来就是为战斗，而碧岳十二世呢，却好像事事都准备着他来担任和平的使者。他秉性温和，更好说是害怕战争，爱好和平，宁静独处，他的温和使他以坚忍来克胜困难，为此之故，他选择了“正义的工作是和平”来做为他徽章上的题词。然而，这位和平的使者，却作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宗。他以一种和平而不屈不挠的毅力，面对着最困难的情势，靠着他那热烈的信德和负责任的决心支持他到底。在他登基为教宗的当初，欧洲就已经是战云密布，他尽己之所能，不顾世人的误解，设法使圣教会和人类，能避免这场世界战争所将带来的浩劫和恐怖。他用了一切外交方法，企图要召开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以便能抑制列强之间情绪的冲动。1939年8月24日，他借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呼吁说：“正义的道路不是以武力来开辟的，而是以理智，不建立在正义上的帝国，不能得到天主的降福，若用和平的手段，什么也丧失不了，而战争却能丧失一切。”碧岳十二世的呼声并没有被接纳，仅仅是几天之后，德国和苏联便挥军波兰，占领波兰，最后瓜分了波兰。碧岳十二世努力使义大利不要加入战争，但是，越来越倾向希特勒的墨索里尼，对教宗碧岳十二世，作了严酷的批评和责难，教宗率直地答覆了他：“与其对职守有缺，我宁愿准备进集中营。”他当选不到六个月，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碧岳十二世虽然不能阻止战争的浩劫，但是他努力的设法减轻战争的灾害。他先组织了俘虏营的服务队；随后又组织了调查失踪者的机构，帮助了无数失散在各地的家庭得以重行团聚；他又组织了一个救济会，以便在各个交战国内，救助种种的贫困和灾难。当义大利也沦为战场时，罗马也被德军所占领之际，他要求交战国内切勿在这全球教会的京城作战，并对围困在城中的人民施以救济，因此他被誉为“罗马的保障”。有人曾劝他离开罗马以策安全，他不但不听，反而在空袭之后，立即亲身去组织救护队，营救伤患。他曾从纳粹的魔掌中，救出了好几百位犹太人免遭屠杀；他打开了梵蒂冈的宫门，收容难民；他节衣缩食，虽然是在严寒的冬天，室内也不生火，以便能节省开支多行救济，以至于当战争结束时，他已经瘦弱不堪，医生对他的生命很是担心呢！1943年7月，墨索里尼的政权被推翻，义大利政府同意与联合国休战。1944年6月盟军进入罗马，民众感激教宗，向他表示了非凡的敬意。在整个大战期间，教宗借外交方式和无线电广播警惕世人，当德国占据半个欧洲大陆时，教宗为被征服的国家所受到的迫害，提出严重的抗议，当盟军进入罗马时，救济物质也紧接着源源而来，尤其是从南北美洲与西班牙来的救济品，使得教廷的火车和卡车，在义大利各地不停的运输，把食品衣物、药品赠送到各地，甚至远及边界以外的地区。在整个大战期间，没有了往日司空见惯的朝圣团，但是却有千千万万的军人经过罗马，他们都希望在短暂的驻留期间，能够目睹教宗的丰采。最初是德国军人，随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盟军，教宗不辞辛劳的接见他们，免除所有的礼节，并以各种语言和他们谈话，大部份的军人都不是天主教友，有些还甚至来自对天主教充满偏见的地区，这位真诚而友善的教宗，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既被打倒，日本也随之战败投降，人类长期以来所期待的和平却迟迟未能实现。一直到今天，虽然在庆祝二次大战胜利五十周年，但是人人仍然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二次大战才刚结束，美国和苏联所代表的“民主”和“共产”两个阵营的冷战便由此展开，空前猛烈和毁灭性武器的制造，使各民族深感焦虑不安。教宗不停地祈祷着，国际间能协调，有效地消除原子、核子、细菌和化学的战争，他请求善意的人们把这些惊人的能力发现用作和平之途，方才能够给人类繁荣和幸福贡献新的泉源。

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刚摆脱了纳粹的压迫，又沦入更强暴和更仇视宗教的无神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下，像是天主教教友占大多数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拉夫、以及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东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教友人数总共将近六千万人，他们被迫生活在铁幕里，一切宗教生活和宗教情绪，都逐步受到控制。在东亚的北韩和中国大陆外蒙古、北越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在前面，我所提到的国家，共产政权所用的方法都是千篇一律的，只不过是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形，加减施行而已。虽然都提倡信仰自由，在教堂以内有时准许一些敬礼的仪式，其他一切宗教活重，都加以取缔或加以严格的限制。比方说修道院、教授宗教教义、公教进行会以公教出版事业等都一概不准举办；又用间谍或反动份子的罪名，打击神职人员，尤其是那些最能起作用的领袖人物；还在教友当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训练一批所谓爱国教士，煽惑他们组织与罗马教廷几断绝关系的独立教会。1946年，南斯拉夫的狄托将军取得政权以后，有好几百位神父遭到逮捕、或是禁闭在集中营里、或是被杀。首都札格拉布的总主教斯代比纳克，就以南斯拉夫被德国军队占领时，与侵略者合作的罪名，遭受逮捕，然而事实上，这位总主教曾经拯救了许多的犹太人和东正教的人，他就以通敌的罪名，被罚十五年的强迫劳改，在1951年被释放，但是政府不许他复职，被贬谪到他出生的乡村，几年之后便去逝了，教宗却将他晋升为枢机主教。1948年，全世界对匈牙利的枢机闵真谛横遭逮捕和他被审的情形，都一致表示愤慨，他那种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反对政府仇教措施的勇敢，为他赢得了“铁人”的徽号。政府为了摧毁他的抗拒，曾用疲劳审讯，企图给他洗脑，以卖国的罪名被判监禁，教宗碧岳十二世除了严重抗议之外，简直是别无他法。教宗在一次演讲中，很激动的把这种迫害，比作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尼禄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1956年，匈牙利人民抗暴运动时，波兰政府才稍稍放松对教会的严厉手段，把维辛斯基枢机释放出来，使他能有机会出席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共产主义连在西欧也获得了进展，尤其在义大利和法国，不少的天主教徒也轻信了他们的宣传，加入了共产党。教宗为了唤醒教友，曾在1949年公布了一道上谕，将他们都开除教籍，同时在德国的西部、义大利、法国，民主党特别发达，他们都服膺天主教的社会主义大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类的政党在他们的国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1.5 和平的教宗碧岳十二世

关于碧岳十一世的继任者碧岳十二世，一直在呼吁和平。在碧岳十二世登基后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曾给介绍过碧岳十二世坚持不肯离开梵蒂冈，从事许多和平正义的工作，协助犹太人逃亡他国，救护伤患等等。二次大战以后，他又如何严厉谴责无神主义和共产党，也介绍了二次战后，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发生的教难，天主教教友遭到迫害的情形。下面要介绍些发生在教会内部的大事，碧岳十二世最具改革精神的行动之一，就是给枢机团增加了各国的人选。1946年的2月，他宣布任命了32位新的枢机，其中只有4个义大利人，西欧11位、美国4位、拉丁美洲6位、波兰、匈牙利、亚美尼亚、澳洲、印度、非洲和中国各一位，咱们中国的第一位枢机就是田耕莘。在过去，教廷方面任命的枢机，义大利人常在半数以上，这样一来，比例却有了改变，义大利籍总共有28位，属于其他国籍的则有42位之多，而且东亚的枢机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教宗的这项创举，是明显的向世人表示，教会是所有民族的母亲，对任何地域也不见外。尤其是在二次战乱之后，借着新枢机的任命，来充分显示出天主教会的大公性，当他后来在传教区任命许多本地主教时，这种大公的精神就更为显著了。教宗还宣布1950年为“圣年”。在“圣年”中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几百万人的朝圣者拥进了罗马，6月24日为贞女玛利亚·葛莱蒂列圣品，因为前来观礼的人太多，只好改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外面方大广场上举行；8月12日，教宗发表了他最重要的通谕之一，那就是《人类》通谕。在这道通谕中，教宗阐论当代的许多错误思想；10月11日，教宗宣布“圣母是天地的女后”，5月31日为其瞻礼日，11月1日是圣年的高潮。教宗在36位枢机和450位主教50万教友面前，隆重的宣布了“圣母升天”的信条，

并且定在每年的 8 月 15 日庆祝圣母升天的节日，同时又宣布 1954 年为圣母年，为的是纪念“圣母无原罪”信条颁布后一百周年，全世界教友无不热烈敬礼圣母。1953 年，教宗又任命了 24 位新的枢机。1956 年 3 月 2 日是教宗 80 岁的寿诞和登基 17 周年，各地神长教友莫不以赤子之诚和衷心的祈祷来为他祝贺。碧岳十二世想要继承碧岳十世的遗志，修改教会历。于是就在 1956 年的 1 月发表训令，修改教会历和神父们的日课经文规则。他为了使教友们能多了解并且参与耶稣苦难的礼仪，规定了“圣瞻礼五”，“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日”的礼节，改在下午和晚间举行，准许教友在耶稣受难日领圣体，封斋期延长到复活节前之夜。教宗竭力使天主教会能适应时代的潮流，他教义的精髓不可变，但是，介绍教义的方法和途径，则必须配合时代的需要，并且还要能与教会所在地的文化相配合。碧岳十二世所发表的通谕 40 多道，除了前面提到的《人类》通谕之外；还有《天人中保》通谕，内容在阐释礼仪的性质和目的，并且鼓励教友们要多多参与礼仪；《奥体》通谕，目的在说明，教会是基督的奥体，阐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宗这道通谕和教宗的圣诞文告，都已经成为教义方面的标准读本，除此之外；还有《圣神启迪》通谕，内容在专门讨论圣经的研究；还有专门给美国教会的《喜乐交识》通谕；最后要特别提到的是，教宗在 1954 年的 10 月 7 日“玫瑰圣母节”，颁布了《致中国教会》通谕，教宗在这道通谕中，对中国的教会给予慈父的关怀与训勉。除了通谕之外，他还用通讯、广播、著作和许多训话的方式讲解了许多的道理。碧岳十二世遗留下来的言论，比任何一位前任教宗所发表的言论都多，他的言论集总共出刊了 20 卷。他在罗马召开的全国或国际会议不计其数，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愿意觐见教宗，聆听他的言论，而对每一批觐见教宗的人，无论他们是作家或法律家、医生或助产士、警察或消防队员、新闻记者或科学家，教宗总有一套针对他们职业的言论，这表示他常注意科学的最新发展，使他的听众惊奇地感到，科学与天主教的道理相融合而不相违背，并且由他们的职业，引伸他们所负的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由于科学，尤其是在医药的进步，在教友们的良心上，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教宗总是如此处理。他几乎每天都要为面对种种不同的问题所发表的谈话，而做细心的事前准备，这往往要牺牲夜间的一部份时间，再加上接见要求谨见的民众，我们可以想见教宗的工作该是多么的繁重。这些以私人或团体的名誉要求谨见的民众，有来自世界各国、各阶层、各教派的人都有，有政治人员、公教进行会的青年、国家元首、民族的领袖，还有名人博士，尤其其他那具有高度宗教修养的人格，对所有见过教宗的人，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教宗碧岳十二世的健康虽然看来很瘦弱，但是由于责任感的支持，使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将近 20 年。1954 年教宗患了病，不少人料定他将不起，但是他休息了一个时期，竟又开始工作，直到他去逝的前夕为止。

1958 年 10 月 9 日，教宗碧岳十二世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二岁，全球各国无论是教友或非教友、有地位的人或是一般普通的工人，对这位在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动荡时期，坚强地站在岗位上的教宗，一致地赞扬他的智慧和道德。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历任教宗，都是才智品德兼备的伟大人物，他们在这一段特别混乱的时期，不但向教友，而且向全世界，经常讨论着有关人类全体的大问题。据说在一次国际会议时，有人在史达林面提到了教宗，史达林很不屑的说：“教宗？他有多少兵力？”20 世纪的教宗们不以武力作为他们权威的后盾，他们所依恃的只是精神的力量。无论是教内或教外，所有具有善意的人，凡相信世界不能专靠武力征服的人，莫不尊重教宗的意见。

3.2 二十世纪教会的内部生活

这个新的单元介绍在二十世纪的 1914 年到 1962 年这 50 多年之间，教会内在生活。我们已经知道，十九世纪曾经出现了教宗碧岳十一世所说的奇耻大辱，那就是由工业的突飞猛进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群众，脱离了教会，而且越来越远。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很多，不仅是

受共产主义无神思想的影响，现世主义的影响也很大。他们想要把宗教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只准它留在人自己良心的深处。在公开宣称无神的群众中，仍有许多人对教会保持着虔敬与眷恋，他们接受洗礼，并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洗礼；在教堂结婚请求神父为他们证婚；有人去逝时，也遵守宗教的葬礼。但是，经过几代相传之后，这些由传统保存下来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了空洞的虚礼，已经丧失了宗教上的意义，也就逐渐的自动放弃了。到了二十世纪，一种称为“非基督教”的运动，逐渐的开始发展，不再接受洗礼的人数与日俱增，不过除了共产党徒外，还没有人对教会采取公开敌对的情形，只是表示莫不关心而已。想要摆脱宗教的影响，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时代潮流的思想趋势，这不只是对天主教而言，也是世上的其他宗教，在廿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梵二召开之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以前的人认为，对宗教的渴望是一种天赋的倾向，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人类以为是，因为生活的极度贫困，所以导致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把精神的热望完全窒息了。但是，后来生活的水平提高了，资源也有了更公平的分配，然而西方教会的情形并没有好转，人类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反而使人心对超性的事理更加的冷漠了。这种情势假如只看阴暗面，会使人感到很悲观，圣教会的前途也呈现暗淡不安的现象。其实，有些地方，像是爱尔兰，信仰仍旧很活泼，此外，不用说是传教区，就是连英国、荷兰，教友的人数一直是有增无减，还有美国，从廿世纪的初期直到 1960 年时，教友的人数已经从一千两百万人增加为四千万人，当然，除了出生和归正者外，移民到美国，也是教友人数不断增加的原因。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环境的影响，有些地区固然有教友人数减少的现象，但是固守信仰的人，信德则是更加的坚强。我们要说的是，圣教会的前途是乐观的，因为眼见知识份子，尤其是相当优秀的知识份子，纷纷的回归天主教的羊栈。各位听众一定都还记得，在十八世纪时，有许多作家随着潮流而放弃了信仰，对一般民众也逐渐产生影响，到了 20 世纪时，在各种不同的学术领域内，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或是科学，都有天主教教友的出现，就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心的热烈而言，都是非常的卓越的。在大学和科学研究院内，到处可见他们的公开见证，也证明了某些人所声明的“科学与宗教的不相容”是很不合适的。本来，我想把这些知名的科学家一一的介绍出来，但是人数真是不少，为一星期中只有 20 分钟的节目来说，在时间上是不太容许的，更何况不只在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教友，连在农业界、工业界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优秀份子。说来，这还得归功于“公教进行会”呢！由于这批优秀份子，有着卓越的人格，成为职工青年们的楷模，因而培植了农工大众的坚固深厚的信仰，他们不只是保持了个人信德的完整，而且还发挥了酵母的作用，在他们的周围重建了信仰的气氛。

接着要为您介绍，教会在神学方面复兴的情形。在十九世纪的末叶，已经开始复兴的教会学科，到这时期已经全面展开，而且欣欣向荣，已经晦暗不明的传统教义，在神学家的努力之下，又使得它能大放光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奥体的道理。教宗碧岳十二世，他在 1943 年，曾以“神妙奥体”的通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端道理强调了所有的教友，借着与基督联合的彼此关系，为传教职务建立了稳固的神学基础，而且还恰逢其时，使圣教会借着“公教进行会”，在传教事上得到了新的进展。另一方面，神学家们努力的答复了唯物哲学的问题，使人看出来，虽然天主教的信仰，其主要目标是救人的灵魂，但是对人世间的艰难困苦，绝不是漠不关心的。除了神学之外，在圣经学、哲学、教会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经过教会的专家们一致的努力，与现代科学和历史批评的发明相互融汇贯通，因而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为了填平知识份子和神学家之间的沟渠，他们尽量的用现代知识界所容易领会的言语，来阐明信仰的真理，而最大胆的尝试，就是耶稣会会士德日进神父的努力。

这期间教会的神学复兴、它与当代新科学的整合，我曾提到其中最大胆的尝试之一，就是耶稣会士德日进神父所作的研究和整合，今天我就来介绍他所作的努力和成就。他生于 1881 年的法国，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以在中国所完成的工作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在中国度过了 23 年，参与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像是周

口店的北京猿人的研究、外蒙和内蒙地区的古生物的研究和鉴定，都具有特别的贡献；然后又到中亚、南亚和非洲作研究。有许多他的著作，是在他去逝以后才刊行问世，被认定是一位先知性的学者，他曾在他的著作中叙述了他对世界的伟大看法，以他那博学和圣保禄思想中所涵养成的神学知识，描述了世界万事万物的进化，他揭露了一个超自然的意义，他认为万物进化的目的，是要把天主以爱所创造的宇宙，重新引领回归于造物主，这种科学和信仰论据的整合，连对无信仰的人，也激起了活跃的兴趣。我们就拿对德日进神父的著作广泛翻译和出版来作证明，对他作品给予评论性的文字，尤其多得不可胜数，有好多本重要作品早已翻译成中文。

在二十世纪思想混乱的前 50 年前，神学家对科学的进步，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时候也未免诠释得太大胆了一些。有几位神学家一味的想声明，天主教的道理和同时代的精神，并没有抵触，用意固然是为护教，只可惜立论未免偏颇。教宗碧岳十二世的睿智洞悉了其中的危险，便在 1950 年颁布了《人类》通谕，对危害天主教教义基础的几种意见，都曾加以指责，《人类》通谕虽然没有指明谴责任何人，但总算收到了防患未然的作用，免得形成一种新的现代主义。讲过神学的复兴之后呢，让我们再来谈谈圣经学方面复兴的情形。我们知道，教会常鼓励教友们研究圣经，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对极端的、偏激的解释不得不加以防范，于是天主教人士，为反对其他基督教派自由解释圣经，却未免矫枉过正，索性就把圣经束之高阁不读了，这么一来，许多教友除了在主日的弥撒中，所听到的一部份圣经之外，对于圣经的其他部份，也就几乎茫然不知了。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末期，神学家们又再燃起了往深处研究圣经的心火，这也是为了驳斥当唯理派所散布的谬说。1892 年，道明会在圣地耶路撒冷创办了圣经学院；1909 年，教宗碧岳十世在罗马，设立了圣经研究院，对研究圣经的学者，又给了一种新的鼓励；1943 年碧岳十二世颁布名为《天主的感召》的通谕，邀请圣经注释家们，利用批评学、考古学等科学所提供的新形方法，还鼓励学者充份的研究东方的语言文字，以便能够对圣经有更加正确的了解。这其间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以上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已经不再仅限于学者们的圈子，许多通俗的著作也开始源源上市，适合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能力，圣经的翻译本也逐渐的增加了，教友们也重新培养，从圣经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习惯，由于教友们又恢复了研究、熟读圣经的习惯，也就促使他们对礼仪中的词句更加了解，当然也就促进了礼仪生活的再度复兴。

由盖郎日和“本笃会”的修士们所发起的礼仪运动，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只是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这以后，礼仪生活的复兴，却成了教会内在生活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教友当中，已经散布多种不同文字的翻译本，他们去教堂望弥撒时，已经不再只念玫瑰经或是其他的经文了，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弥撒经书来追随着主祭的神父或主教所念的经文。再后来，为了表示弥撒圣祭不单单只是司祭个人的事，而是教友们与司祭所共同奉献的祭献，于是就和司祭一齐应合，并不再只限次辅祭者而已了，教友们与司祭一起，同声颂念光荣经、信经和天主经。在这时期，为了能使教友们能更方便的参与弥撒，连祭台也已经改为面向教友。在礼仪方面的许多事情，早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以前，就都已经由个别的团体在酝酿发动起来，到了正式召开“梵二大公会议”时，才正式获得批准而向普世各地的教会加以普遍的实行。首先是在德国，随即推展到比利时和法国，然后才逐渐推展到全世界的教会，天主教礼仪的气氛也就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样，就更能表达出是教友们的聚会，这才真是名符其实的教友团体，随同主祭的司祭共同组成了基督的妙身。现今的教友们也更为明白，领圣体便是参加弥撒祭献的最佳方式，而碧岳十二世所放宽的“圣体斋”，使得教友们在参加任何时刻的弥撒中，都能够领圣体，这是多么大的恩宠啊！

现在，我们换个话题来谈谈，“劳工司铎”产生的时代背景、演变以及“梵二大公会议”以前的情形。“劳工司铎”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神职界对无产阶级大众的非基督教运动不能容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段岁月中，司铎们，尤其是在法国的司铎们，他们试图用

各种方法，在非基督教的环境中，想要重新建立宗教的气氛，因此呢，就在尽可能不影响司铎身份的条件下，去度着与他们所要传福音的对象，过着同样的生活。这种传教方式中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的“劳工司铎”们所作的实验。他们为了能尽量地深入到无产的工人阶级的圈子里，有许多修会的会士和司铎去做矿工的、当码头工人的、以及当冶金工人的，各种行业的工人都有，他们虽然度的是工人的生活，但同时还想善尽司铎的职务，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个个弄得筋疲力尽，在每天的劳动结束后，又去念日课经、做弥撒、听告解，以及其他属于司铎们所应尽的职务。这种实验，纯粹是由于受到热心传教的感召，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应有的准备和适当的防范，因而产生了许多流弊。1953年，教宗碧岳十二世认为，这种实验未能达到他们所务期的目的，就不可再继续下去，在符合教宗的一连串防范措施下，“劳工司铎”就必须经过当地主教的遴选，同时，还应该接受道理和神修方面的特别训练，并且每天只能作有限度的劳动，避免参加一切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活动，这样才可以去当“劳工司铎”。在教廷所准许的方式下，这种在劳工中间的传教工作，一直到目前仍然在进行着。二十世纪的修会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十九世纪那样快速的增加新创立的修会，但是在已经有的修会，尤其是欧洲以外的修会，却有着大量的增进。这是整个欧洲迫害修会会士所始料未及的，他们被大量的驱逐出之后，辗转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使他们原有在欧洲的修会，反而在异地大放异彩，尤其是在美国最为显著。本笃会在1880年只有两千七百人，到了1962年增加为一万一千人；慈幼会又称为“鲍斯高会”的会士也增加到了两万一千人；方济会的三个分支，共有四万七千人；耶稣会士也由1900年的一万六千增加到1965年的三万六千人。

圣教会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曾经产生特别适合时代需要的修会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无神主义猖獗的时代和落后的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例外，在这里，我想给各位介绍一种，受嘉禄·富高弟兄精神的感召而产生的修会。当然在介绍这种修会之前，我得先介绍嘉禄·富高这位传奇性的圣人他一生的事迹。嘉禄·富高生于1858年，死于1916年，他是法国勃艮地省的斯特拉斯堡地方的贵族子弟，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友，在他不到六岁时父母就双亡，从小跟着外祖父长大，是一个有主见、有坚决意志的人。外祖父爱他、宠他，23岁时加入军团当骑兵团的中尉，这时候的他，早已失去了幼年时的信仰，当然在他那个时代的法国，正是充满怀疑和反神职的气氛，他也过着奢靡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在骑兵团里天天烂醉如泥，经常一掷千金的挥霍着外祖父留给他的钱财。当他的兵团奉派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时，他的情妇，以他的妻子富高夫人的身份早他一个星期坐上了头等舱位的船先走，这女人的魅力倾倒了船长和殖民官员，这件事不久就传到他上司那儿，他先受警告，然后被团长传见告诉他：“或是你、或是这女人必须离开”。他毫不迟疑的告诉团长说：“好吧！我们都离开！”他离开了军队与这女人同居。几个月后，北非发生叛乱，他的同僚都在前线作战，他不忍心置身于事外，于是打发这女人，重新加入编制，就在这时候，他爱上了非洲。叛乱平定以后，他就一扫过去的怠惰懒散，到摩洛哥去探险。他学会了流利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把自己打扮成了犹太人的经师，在摩洛哥待了18个月，在他回到巴黎后，就把在摩洛哥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告，获得“地理学会”的金牌奖。18个月的生活，把他炼净了。二十七岁那年，因着表姐的介绍，认识了聪明温文而又办识能力极强的候威灵神父。因为在摩洛哥见到回教徒的热诚信仰，使他作了一次认真的反省。在候威灵神父的告解亭里，嘉禄·富高跪下忏悔，然后神父为他送圣体。

以后他对朋友说：“当我一相信天主存在时，我就马上知道，除了为祂而活之外，我再也不能做别的了，我宗教的使命和我的信仰是在同一小时开始的。”从此以后，他除了效法隐居在纳匝肋的耶稣之外，别无所求。他徘徊了15年，寻找他应走的路，曾经入过熙笃会，但又离开了，他一直认为应该去寻找更贫穷、更谦卑、更隐晦的生活。他在纳匝肋过了三年的隐晦生活，在一座修院内当一名工人。1901年晋升为司铎，此时他有很深的感觉到有一

种号召，要他去非洲，他几乎无力抗拒，但是他并非去用言语传福音，而是以陪伴圣体、祈祷刻苦去实行福音的劝谕，他对所有的人普遍的友爱，甚至于把他仅能糊口的食物也分施给最贫穷的人，他作这些善工，都尽量地隐姓埋名，不使人知道，当地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已。他又到撒哈拉沙漠和摩洛哥交界的地方去，混在最贫穷、最不被人重视的人群中，渡着贫穷独修的生活。在那里，他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他说：“我愿用我全部的生活宣传福音，我是众人的弟兄。”以后，他又听说在很远很远的撒哈拉沙漠的心脏地带，有一个游牧民族，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真的是被人遗弃的羊群，他便决心到他们中间去。

嘉禄·富高神父在 20 世纪初，有人请他进入非洲与世隔绝的撒哈拉沙漠的心脏地带，与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生活在一起。他虽然个性很强，但是当他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时也感到战栗，他常说：“死亡，是责任的标记！”他决定前往。渐渐的，达曼拉瑟这个撒哈拉沙漠心脏地带的小绿洲，就成了他的家，他在达曼拉瑟是处于非常艰难困苦之中，因而也让我们看到了嘉禄·富高人格的最高表现。在沙漠中，他在谦虚和对当地杜亚力人的爱中，他把自己当作是杜亚力人，过着像耶稣基督隐居在纳匝肋的生活。杜亚力人没有文字，他为他们制定文字，为他们翻译圣经，他为杜亚力人编成了第一本文法书和第一本字典，还把他们的格言和长诗写成了诗集。他拚命的工作，除了长时间的学习之外，他总是很开心的接受任何时间、任何人的打扰，他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对嘉禄·富高来说，都是重要的大事。他甚至还向他的表姐写信，为当地的妇女们索取黑色的染料用来染头发。他为自己造了一间小屋，屋子里放着一个用木箱子改造的祭台，祭台上经常放着圣经，他就是在主持弥撒时，诵读圣经时与耶稣基督相会；屋子的另外一面，是一扇敞开的门，他热烈欢迎任何人在任何时刻来找他。他的善良和不知疲倦的爱德，不但赢得了当地土著人们的尊敬，而且成了他们最爱戴的朋友。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初，撒哈拉还算平静，但是到了 1916 年时，麻烦就开始了，关心他的当地土人劝他离开他的小屋，他就搬到村子里的一个堡垒中。有一天，有人在外面喊叫说，有邮件要交给他，当他开门伸手去接信时，被两个强盗拉了出去，绑了起来，另外一个强盗开枪打死了他，他的一生就这样完结了，好力一粒麦子落到土里。他的一生，看来好像是一个失败，没有留下一个追随他的人，他原本想要招收门徒，他写了好几种会规的草案，但是，只有一个人加入，但当他在去撒哈拉找到嘉禄·富高之前，中途因生病而放弃了。但是，在富高去逝之后，他的精神感召却日渐增长，而且影响到非洲以外。他的著作的、他的生活榜样，启发了许多向慕完善和渴慕传扬福音的人。这粒被喻为“沙漠里的种子”，在他去逝后的第十七年，有五位神父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创立了第一座“兄弟会”，“耶稣小昆仲会”就是由它产生的；到了 1963 年时，已经有“耶稣小昆仲会”的兄弟，在全世界 23 个国家内工作；还有 950 位“耶稣小姊妹会”的修女，分发到 45 个国家去工作。他们来自社会的各阶层，分散在穷人和工人中间，与他们度着同样的生活，在工人中当工人、在农人中当农人、在游牧民族中就做游牧的牧人，完全靠自己的工作所得来维持生活，凡是有穷人不认识或反对基督的人的地区，他就会前去传扬福音，就连在香港，那那些在水上生活的船家和澳门的难民中、或是欧洲或是日本各大城市的劳工中，或是在撒哈拉帐幕中、在比利时煤矿的矿坑中，到处都有耶稣基督的小昆仲和小姊妹，他们用自己祈祷和劳动的生活榜样、用他们对人的友爱，使基督的爱发射光明，给福音的传布铺设道路。

3.3 基督徒合一运动

二十世纪开始，因为大公主义的盛行而产生的基督徒合一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到目前 20 世纪的末了仍然方兴未艾，我们就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梵二大公会议作为一个阶段，那么我所介绍的，就限定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前的大公主义。

20世纪初全球人口接近30亿，其中有九亿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却彼此分裂着，其中有五亿四千万为天主教教友；一亿五千万为东正教教友；一亿七千五百万是所谓的基督教教友，他们又再分属两百多种不同的教派；此外还有四千三百万“圣公会”的教友。这种情形，显然是违反耶稣基督的“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的意愿，这个现象使基督徒都深感痛心。因而在历史的过程中，或是与东正教、或是与基督教、或是与圣公会，都曾经多次的努力想要接近，但是，总也未曾达到决定性的效果。天主教与基督教在教义上的冲突最大，至于东正教，在教义上的不同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应该是很容易合一的，但是彼此的不谅解和分裂了一千多年来所累积的成见，很难消除人事的阻碍而重归于好。双方分裂得越久，就越难接近，不同派别的基督徒都承认，分裂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要合一又有实际上的困难，已经有不少的人，对这种显然违反天主圣意的情况，觉得实在无法再容忍下去，其中有教宗良十三世。在他在位的期间常要设法“如何与其他教派接近”，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尤其是向东正教呼吁合一，可惜不但得不到善意的反应，有时还遭到断然的拒绝，教宗却保持着他那一贯和善的态度，他曾说：“我所向往的教会合一恐怕是来不及亲自促使实现了，但是对所向往的事，一定并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在福音上，明明有吾主耶稣亲口的许诺：‘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羊栈，归属一个牧人。’所有基督的代表，怎么能不继续努力使之实现呢？天主也不许的呀！”就是这种精神推动着良十三世。他也企望能与英国的圣公会谋取合一之路。

前面曾经介绍过英国圣公会的牧师蒲赛和纽曼，他们在牛津大学所发起的“牛津运动”，唤起了英国教会内与罗马合一的有利思想。英国的一位贵族哈利·法克斯爵士，他一生致力于英国国教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协调。他同一位法国的遣使会神父包尔达志同道合，结为朋友，他们两在1894年，便发起了一个和解的运动，从事研究两个教会具体合并的问题。他们特别努力的阐明“英国国教的圣秩”，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也就是主教、神父在英国国教内所领受“圣秩”是否有效？教宗良十三世命人调查历史事实作深入的研究。在1896年正式的裁定，英国教会的圣秩是无效的。这样一来，两派之间的合一问题就更加的困难了，因为加入罗马天主教的圣公会主教、牧师，必须承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领受合法的圣秩神权，应该要重新领圣秩圣事，也就是要重新领神品圣事，重新被祝圣，于是两派之间的合一运也就因此又搁置下来。25年以后，在马连的总主教迈谢枢机主持下，问题又被搬上台面来讨论。代表天主教的是迈谢枢机和包尔达，代表圣公会的是哈利·法克斯及另外的几位神学家参加，这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马连会谈”。虽然有教宗的认可，但是并不算是双方教派的正式会谈，不过，因为迈谢枢机的特殊身份，自然也就显得重要。他们共同讨论双方所争执的重点，双方的发言人都都晓得，他们不能正式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实行了迈谢枢机所提出的大公主义的金科玉律：“为实现合一，必须彼此先敦亲和睦，为了能敦亲和睦，先须彼此认识，必须会面商谈。”非常可惜的是，迈谢枢机在1926年去逝，留下遗嘱说，把他自己的主教权戒赠送给哈利·法克斯，作为希望合一的象征，包尔达神父在不久之后也去逝了，会谈也从此结束，虽然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成就，但是，对双方的接近了解，确实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从教宗良十三世创导以来，借着好几位有心人士的努力，到1961年时，已经前后召开了三次的“世界基督教协会”，也已经有两百个教派加入了这项世界性的组织，连最保守的东欧东正教也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各位还记得我曾谈到，在第三届大会上，全体与会者发表了下面这一段声明：“普世基督教协会是，凡依据圣经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上主天主和救主的教会联谊会，努力的同声响应上主对他们的共同号召，为了唯一的天父、圣子及圣神的光荣。”从这项声明，我们今天就进一步的来看看，世界基督教协会与我们天主教所谈的大公会议，在基本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很清楚知道的是“世界基督教协会”本身不是一个教会，而是各教派之间，为了促进彼此的认识和亲睦，而组成的联谊性的机讲，由于共同相

信，基督是教主和共信三位一体的天主而联合起来的，但是各教派对教义的基本要点仍然各自分歧，各个独立自主，并没有一个统治各教派的权威，它只能建议和提供协商；而大公会议却是由信仰一致并且与罗马教宗相联的主教们所组成的，大公会议是天主教的最高权威。我们可以想见在“世界基督教协会”这个机构内，存在着对教会、对教义的基本概念意见分歧的教派，自然会引起紧张和敌对。从事这项运动的领导人物也晓得这些困难，但是他们对祈祷充满了信心，希望能从天主那儿获得助佑，以便能排除一切困难，共同迈向合一的目标。

天主教对本身以外的大公运动，虽然没有参加这个协会，但是却乐见其成，圣教会认为这是圣神感召。圣教会对那些由洗礼而复义成为基督的神妙身体的人，看成是在上主内的弟兄，圣教会希望天主教教友跟分离的弟兄合在一起，恳求天主赏赐圣宠，以便能够实现耶稣基督所愿望的一致。圣教会也叮咛大家对分离弟兄们的处境加强认识，应该站在平等的立场，并且在主教们的领导下，让专家们讨论，在谦诚和爱德内，共同寻求合一的途径。圣教会也邀请所有的基督徒合作，以推动和平，与人类所面对的灾难奋斗，或在信友的气氛内发展技术和科学，所以曾经派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新德里召开的大会，恐怕有人要评判这种态度是高傲而又不够容忍，但是，凡充份认识天主教所处的地位的人，都晓得圣教会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态度，因为“合一”决不能建筑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圣教会坚决的相信，只有一个建筑在“伯多禄磐石之上的教会”，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在这个教会内从来没有丧失过统一和一致。圣教会从人事的因素来说，常是需要革新，对过去因为不够容忍而导致的分裂谦逊认错，并且向天主和分离的弟兄们商讨合一的途径。圣教会的态度，已经由梵蒂冈第二届大会通过的“大公主义法令”中加以说明，我们大部份分裂的弟兄对这一项法令都很满意。在天主教以外的许多基督教派，想要寻找他们所丧失的一致性，我们天主教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只有赞成并且尽力帮忙，但是，各教会不能承认，外表声称是同一个教会，却各自又保有不同教义的人。那么合一的实现，好像遇上了不能克服的阻碍，不过人所作不到的，为天主却毫无困难，只要我们教友们不断的虔诚祈祷，救主耶稣所叮咛的“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必定会实现的。教宗良十三世也早已提倡，从耶稣升天到圣神降临的“九日敬礼”，特别为基督的合一而祈祷。教宗碧岳十世又批准了，从元月十八日圣伯多禄首座到元月二十五日圣保禄宗徒归化的瞻礼，举行一连八天的合一祈祷周，这项祈祷活动，原本是美国纽约圣公会的牧师瓦特生和他的好友英国伦敦的牧师斯宾赛·琼斯所发起的，目的是为英国国教能够重归罗马的怀抱。瓦特生自己就在1910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种祈祷长达25年久，在天主教以外很少有进展，因为我们分离的弟兄们很难接受。的确，他们既然自信是基督的真教会，怎么肯为他们的教会被天主教吸收合并而祈祷呢？

最后，我们得感谢法国里昂的顾都利神父，他终于找到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祈祷方式，那就是：“为使所有基督信徒，恢复耶稣基督所希望的合一，或是企望耶稣基督所愿望的一致，依照祂所愿望的方法和时间，早日能够实现。”对这一点，谁也无法再反对，因为有谁敢反对完全服从天主圣意的祈祷呢？1953年，顾都利神父的观点，立刻获得了东正教、圣公会和基督教派中大多数领袖们的同意，稍后，也得到了“世界信礼大会”的赞同，从此以后，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便普遍的展开了。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大公运动的进展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公运动才逐渐展开，这是因为有好几种世界局势的影响而促成的。像是无神主义的逐渐扩展，使得所有的基督徒醒悟而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经常不断的举行联合祈祷，各教派的神学家们彼此相互接触共同研究，除此之外，就是天主教教友对研究圣经的复兴，也使他们与基督教徒更加接近，而基督教徒对天主教的圣传，也有了新的认识，礼仪方面的复兴，也使天主教与最重视礼仪生活的东正教更拉近了距离。等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登基以后，基督徒的合一运动又往前大跨了一步。

3.4 十九与二十世纪的传教事业

3.4.1 传教事业的概况

下面就要探讨的是 19 与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传教事业。先作一概括的说明，然后再按地区分别的说明。今天教会已经把福音传播到全世界，这个传播福音的工程看起来，似乎是间歇性的，然而事实上，它并不取决于机会，而取决于内在与外在的条件。外在的条件就是日渐扩展的地理知识，虽然从 1492 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对世界性的知识日趋扩大，而事实上，要到 19 世纪以后，我们才有对世界地理比较完整的知识；至于内在的条件，则是一股推动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宗徒时代以后，催迫着教会走向更远、更新的地方的内在心灵的渴望。西方的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东岸的盆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等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西方的文明中心仍然围绕在这一个地区，只是日渐的向西，传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第七世纪时，回教文化传到这些东方的文明古国，并且在地中海建立了一道藩篱，使基督教文化变成了欧洲文化的等意字。长久以来，教会似乎固守欧洲，但是他那内在的推动并没有减退，当他把向外发展的渴望表现于十字军东征时，他还没有到达整个的欧洲。十字军运动，最初所表现的是，中古欧洲式的武装宗教征讨，然后受到募缘修会布道的影响，演变成了一种扩展实力的运动，经过了一段摸索与试验时期，并没有获得持久性的成功，然而，方济会会士不但经常驻守着土耳其人所统治的圣地，而且在 14 世纪初年伸入亚洲内部，更远达中国。这种十字军的理想，就是以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开拓基督的神国，而这理想仍然存在于伊比利半岛的再度征讨的运动中。当这个运动结束后，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十字军的理想又再以征服的形式出现，传教士也参加了征服者的行列，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保护下，他们在新大陆展开了牧导的工作。因此 16 世纪时，教会不再局部的固守在欧洲，而大部份美洲的土地也成为他工作的园地。到了近代，教会的俗世权力关系改变了，在所有的王公贵族中间，只有西班牙的国君仍然保持着天主教国君的理想，以扩展基督神国为己任。除此之外，各国都斤斤计较谋求自己的利益，教会为了完成自己传福音的大业，不能不摆脱政府的羁绊而独立。从 16 世纪开始，传播福音的工作，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Mission”翻译为“使命”。创用这个名字的是依纳爵·罗耀拉，他把他的耶稣会会士全放在宗座的手里，听从教宗的参遣，以一种特别的服从圣愿，来加强他们服从宗座的意愿。

“Mission”原来意思是到远方异域去完成使命，渐渐的它的意义有了改变，派遣神父到教外人士中去工作，使他们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个新字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信奉耶稣基督的征服者，不再邀请传教士与他们同行，而是教会或教宗自己派遣教士到可以传扬福音和信仰的地方去，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方式下，所有的天主教教友，才有参与传教事业的可能性。从教会一向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动力，产生了有意识感的传教热望，教长们与司铎们英气同发，这只是十九世纪开始的美好事业。教会虽然从欧洲扩展到美洲，但是，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的传教热望，才使教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普世教会。至于十九世纪的传教历史，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也可以用两句话来总括的说，17 世纪所获得的一切，到了十九世纪之初几乎全部丧失，传教的事业好像已接近全部垮台，寿终正寝的地步，好在到了十九世纪的末期，十字架才又在全球各地竖立起来，两个新的大陆，非洲和澳洲给福音敞开了大门，大批的传教士又再活跃起来，16、17 两个世纪，传教的情形可以用飞跃发展来形容。而 18 世纪开始低落，在亚洲的中国、日本、安南、暹罗等地，对传教士的敌视，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问题的症结还是在欧洲，当时的欧洲有“扬森主义”异端的骚扰，加上对礼仪方面的纷争、对宗教的观念扬言要为了合理和进步所激起的战争、服尔泰对传教士的嘲笑讥讽、耶稣会的横遭取缔和解散，这一切的一切，都造成了对传教事业的衰落；此外，法国大革命及其对宗教的不良后果，关闭了修道院、取消了修会，使得传教士的来源也中断了，教会的财产充公

了，教友为教会的奉献减少了，使得传教的经费也为之枯竭，因为政治情势的纷乱，也无暇顾及传教事业，也因为教宗碧岳六世、七世先后被俘，以及“传信部”遭到拿破仑的查封，而使教宗失去了活动的自由。欧洲国家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造成欧洲国家 20 年的陆海战争，当然为了战争使得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络也受到影响。19 世纪初的那 30 多年传教区的情形，是很悲惨，直接隶属传信部的传教区，全球只剩下 250 位欧洲传教士，270 位当地神父，大部份的圣堂毁坏了，老年传教士相继死去又看不到年青的神父来递补，当地的神父也因教难而死伤了不少，于是教友也日渐减少，信心萎靡，以致在日本、高丽、中亚、澳洲、马达加斯加和艾底约比亚，连一位神父也没有了，真令人寒心啊！

这时候，天主教在各地又复兴起来。修会的复兴，其中尤其是耶稣会和遣使会，再加上新的修会不断的创立，这些都是复兴的前奏。19 世纪也是欧美各强国，英、法、德、俄、荷兰以及美国的探险家们，正在热心深入的探寻澳大利亚和非洲以及南北两极，这些尚未被欧美人士得知的地区，这当然也就为传教事业开辟了新的工作园地。传教士的足迹紧跟在探险家之后，甚至有时候，在有些地方还走在他们的前面，而且不只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就连基督教的许多派别也派遣出传教士，到那里去寻找传教的据点，让当地的民众能够皈依，信仰耶稣基督。在 18 世纪以前，几乎只有天主教的传教士到远方去宣传福音，而东正教则一直没有显示过，去外方传教的精神，至于基督教，在他们从马丁·路得改教以后的两个世纪以来，为了他们对天主教或是他们的各个派别之间的神学论争，已经是筋疲力尽，不但没有时间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传布福音，也确实没有那样的精神和毅力。在 17、18 世纪时，德国的一些基督教派的神学家认为，教友并没有应该到国外去传教的义务，根据他们的话说，主耶稣只向十二位宗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何况当时的基督教派的欧洲君王，还好与天主教国家的君王相反，对传教的活动不感兴趣。不过到了 18 世纪的末期，有一小撮的基督教牧师，也开始向欧洲以外的民族宣传福音了，那也只不过是少数牧师的个别尝试而已。要等到 19 世纪，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传教才普遍有了兴趣，随着英国、美国的势力发展，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也就蓬勃的发展开来，传教的机构也如雨后的春笋，纷纷方成立了。我们可以说，那儿有天主教的传教士，那儿也就必然有基督教某种派别的传教士，这种现象，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碰到了，就在同一条街上，有天主教堂，隔不多远就有基督教堂，或是长老会、或是浸信会、或是路得派、或是……其他的什么派别。在台湾台北市的新生南路，方圆一公里之内，就有 7、8 座不同教派的教堂，再加上佛教的、道教的庙宇、连回教的清真寺也相隔不远，因此就称这条路为天堂之路。在教会历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时，彼此并不和谐，这也早在意料之中，而且很遗憾的是，彼此之间还有过非常恶劣的冲突，即使有的地方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的事件，但是，双方教友之间的不和睦，对非教友而言，也是不良的印象，当然也就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工作。

3.4.2 宗座的传教政策

公元 1831 年，天主教选出了新的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在这个为传教事业有决定性的时期，选了一位对传教有毅力，并且积极努力的推动各地传教工作的教宗，正合天主的圣意，也是教会之福。因为他本人曾经担任过传信部部长，相当清楚有关传教的种种问题，因此他登基以后，就把向外方传福音当作他的优先工作，对以传教为宗旨的修会和新设立的传教事业，都尽量的支持鼓励，还派遣枢机主教代表教宗去巡视传教区，他还改组修道院，划分传教区，委任最适当的人去加以管理。额我略十六世使全球的各个传教区借着传信部的运作，而成为直属教宗的传教事业。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从此以后已无力像 16 世纪那样，担保供养传教士和传教所需要的经费，当然也就无力发挥因“保教权”而享有的种种特权了。除了葡萄牙的属地，像是印度的卧亚、中国的澳门、非洲方安哥拉、莫三鼻克等地，仍然有属于“保教权”的传教区之外，其他的传教区已经都直接属于传信部，这种几世纪以来，有伤教会信德光辉的乱源“保教权”才消失，教廷的声望才得以重振。从此以后，那里需要传教士，便

由传信部直接指派传教修会。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也鼓励在欧洲所产生的辅助传教的相关事业，把重要的都集中在罗马，他也经常提醒传教士们许多传教活动的准绳、规矩和原则。例如，不得干预有政治性的事项，严禁传教士经商谋取利益，必须尊重当地的民众和他们的文化，尽速培育当地神职人员。

教会方面的史学家指出，十九世纪的中叶的这一百年为传教的世纪；而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他为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作了许多决定性的规划，也为传教事业打下了基础；也介绍了四个在当代最普遍的善会，传信会、圣婴善会、圣伯多禄会、神圣传教协会，这四个善会也被宗座特别列在自己保护之下，而封之为“宗座传教事业”；还谈到额我略十六世以后的教宗们对传教事业的关心，而真正给“伟大的传教教宗们”开路的是教宗本笃十五世。所以就以教宗本笃十五世为传教事业的所作所为作为介绍。

教宗本笃十五世登基之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了传教事业发展的美好前程，大战结束后，教宗本笃十五世就在 1919 年公布了著名的《夫至大》通谕。这份《夫至大》通谕，被称之为“传教的大宪章”，教宗以远大的眼光，讨论近代传教的各种问题，而继承他职位的其他几位教宗，只不过是把这份《夫至大》通谕所定的原则，加以扩大，确实和实施而已。在天主教国家，刚经历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冲突之后，教宗便向他们强调，应该超越国界的种种分歧，教宗向传教士们说：“你们要牢记，你们决不可为扩张世上的国家而工作，而是为扩张基督的神国，更不是为自己的国家增加拥护的人民，而是为了增加天国的子民，如果传教士们忘记了这条金科玉律，那么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教宗又说：“福音已传入了几世纪的地域，本地的神职人员只是尽一些次要的职务，连一位主教也没有，这其中必定有应该纠正的错误，我们应当为修道院尽全力，以便培训领导本地教会的人才。”《夫至大》通谕不只是为传教士而颁布的，而且也是为全部的天主教世界而颁布的。《夫至大》通谕邀请了所有的教友一齐关心传教工作，为传教事业和传教士祈祷、培养传教的圣召，也为传教事业慷慨捐献。

接着，我要为各位介绍，有“传教的教宗”雅号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我们称碧岳十一世是传教的教宗，可以说是名符其实，他说：“他一想到世界上还有十万万以上的人不认识基督，他便睡不着觉。”教宗碧岳十一世掌理教会的日子，正是乱世，使得他经常挂虑着许多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忽视有关传播福音的事。碧岳十一世在 1926 年颁布了名为《教会的事项》的通谕，提醒传教士不要忘记，传教并不是终点，而应该是建立本地教区，而且培训本地神职人员，由他们接管教区的一段过程，教宗碧岳十一世并且将它付诸实行。他在 1923 年祝圣了第一位现代拉丁礼仪的印度主教。1926 年，为了表示教会本地化的重要性，他以最隆重的礼节，在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亲自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这在传教历史上，实在是一大转捩点。教宗认为，这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播种之后，需要继续加以培植，应该把国人误以为，天主教是从外国输入的另一种商品，或则是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种以讹传讹的澜言加以消除。为了让人明白，天主教实在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公教会，随后，教宗碧岳十一世，委任了好多位中国籍的主教，直至他去逝时，中国的本地主教已经有 28 位。碧岳十一世还实现了本笃十五世所拟定的另外一项计划，那就是使天主教世界都一齐参加传教工作。他邀请所有的修会都能派人到传教区去，连那些创立之初原本不是为传教的修会，甚至是隐居的苦修会也不例外，他希望所有的教友都能觉悟而意识到，传教事业人人有责，他愿意唤起群众的大规模运动，来帮助传教事业，他曾经为这个目标而建立“传教节”。每年在“耶稣君王瞻礼”的前一个主日，在全球每一个教堂隆重的庆祝。“祈祷宗会”每个月的传教意向，也是按着教宗碧岳十一世的希望加上去的。为了能使传教的思想深入人心，他曾经号召，要使用现代的宣传技术。1925 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在罗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传教展览会；第二年在拉特朗博物馆建立了一个传教人种博物馆，不但将一切有助于传教，以及其进步的情形都汇集在一齐，而且还搜集了一切有助于，认识各民族和他们的文

化的文献；他又为了全世界都能获得正确的报导，教宗碧岳十一世便在 1927 年创立了“信德通讯社”，向世界各大报馆提供有关传教士们的消息。在他多管齐下的努力后，在统计数字上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效果。总计碧岳十一世从 1922 年到 1939 年在的 17 年当中，天主教的教友，在传教区的数目，从一千两百万，增加到两千两百万；教区的数目也从 315 个增加到 526 个，其中已有 40 个已经委任了本地主教来管理了。

教宗碧岳十二世和若望二十三世，可以说也都是萧规曹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爆发，碧岳十二世施政的第一步，便是亲自祝圣了 12 位传教区的主教，其中，德籍的 1 人、法籍的 1 人、而法、德两国当时正在彼此打战；此外，印度籍一位、中国也有一位，他就是山东阳谷教区的田耕莘；还有两位非洲籍的主教。正当世界各民族彼此厮杀混战的当中，教会这种超国籍性的祝圣主教，可以说，不能有再好的证明了。为了更便于传教事业，教宗碧岳十二世毫不迟疑的与非天主教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像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以及日本等国，并且继续不断的增加委任本地主教的数目。此外，也公布了重要的传教通谕，就是 1952 年的《福音先驱》、1957 年的《信德的恩宠》，这两个通谕都是特别为非洲而写的。若望二十三世在 1959 年颁布《牧羊人的领袖》通谕内特别强调教友参加传教的义务，公进会、学校、出版事业以及慈善事业、社会事业的重要，还强调应该尊重非基督教民族，在风俗习惯上未沾异端的文化。在 19 世纪中，由法国提供的传教士在人数上常是占第一位。在 1900 年间，在全球各地从事传教活动的六千人中，竟然有四千五百人是法国人，占了全部传教士的三分之二，此外，法国还提供了两千六百位从事教育的修士和一万名修女。从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从教宗本笃十五世和碧岳十一世鼓励传教以来，传教士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传教士的来源也比以往广泛得多了，以前总不派遣传教士或派遣很少的国家，也加入了传教的阵营，有荷兰、爱尔兰、比利时、瑞士、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义大利和美国，而荷兰的神父有五分之一是在传教区工作。

3.4.3 非洲的传教情况

现在，就让我们以朝圣的心怀，走进时光的坠道，走访世界各地的传教区概括地看一看，每个重要的传教区中，许多传教士的英雄事迹和传教事业的发展，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首先，我们到非洲，看看当地传教的情形。埃及和北非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可以说是教会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这时候不免发出惊讶和叹息，这个原本是奥力振、西比廉、奥斯定等著名教父的家乡，广阔的非洲，而且又离欧洲那么近，为什么在近代却成了最后才接受福音的地方？那是因为自从阿拉伯回教占据北非以后，天主教便逐渐的被消灭了，以后被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所征服，这里便成了海盗的大本营，禁止天主教的船只靠岸登陆。要到 1497 年，德伽玛绕过好望角以后，非洲的地形才稍为清楚。于是先有葡萄牙人，然后有法国人、英国人、何兰人都在非洲的海岸边建立了商业据点。天主教的传教士虽然在 16 世纪时，在非洲各处有些短暂的成就，但是从未有任何欧洲的探险家深入过非洲的心脏地带。由于森林无法穿越，浩瀚的沙漠干燥异常，气候又恶劣，又无法医治可怕的疟疾，再加上勇武好战的回教徒神出鬼没，这要比汹涌澎湃的海洋还更难穿过，因此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洲地图，中央部份仍然一片空白，标上“不知之地”而已。要到 1830 年，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后，回教在非洲的铜墙铁壁才被推倒，从此以后，大胆的探险家们，才逐渐的揭穿了非洲大陆的神秘性。而这时候的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正大为盛行，各国政府都认为占领新的土地，就是销售大量工业品的最好办法，于是英、法、德、意等国都锐意快速占领更广大的殖民地。1885 年列强各国在柏林集会，划分了非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十九世纪末叶时，只有埃底约比亚、赖比瑞亚和摩洛哥仍然保持着独立，其他的地区几乎全成了列强的属地。列强各国议定了土著民族的信仰财由应该予以保证，而列强各国呢，应该是不分信仰与国籍，努力发展宗教、科学和慈善的建设。列强各国大致都还尊重这些原则，实际上，非洲的殖民政策和传播福音的工作是并行并进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实行殖民政策的国家也关心、致力于传教，他们为

了经济上或是政治上的利益，有时还反而阻碍传教方工作。举个例子，比方在北非，法国政府竟然不怕妨碍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反而去迁就回教徒的政策，所以列强各国打开了非洲大陆，和平、秩序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传教工作，这是个事实，殖民与传教齐头并进，有时候能够相辅相成，双方有时互相利用，有时候也彼此掣肘。

16世纪非洲海岸各处所建立的那些教团，至19世纪初，几乎都已消灭，整个非洲，不足五万的天主教教友，神父只剩下60多位而已。1817年，有一个新修会的几位修女，在西海岸的塞内加尔登陆。五年之后，她们的创会人也来到塞内加尔，这些修女的到来，可以说是非洲再度传教的开始。这些修女就是圣若瑟会的修女，由雅弗艾修女在法国吕克尼的旧隐修院附近创立的。雅弗艾修女还在童年时，便曾经在大革命中，掩护被驱逐的神父，表现了她的英勇精神，她一心想要献身给天主，有一天，她忽然得到神视，在她的房间里，满是黑面扎的儿童们，向她伸手喊着：“亲爱的妈妈！”又看见圣女德肋撒显现对她说：“这是我给你的孩子们，我要亲自做你所创立的修会的保护人。”雅弗艾修女在塞内加尔找到了这些孩子们，当她一到达塞内加尔，随即显示了她的组织天才，她走访农村，奠下了天主教在塞内加尔的基础，使儿童们得到教育、病人得到照顾、还开辟了模范农场。从一开始，她便认定了，非洲人的灵魂，必须要由非洲人自己去拯救。她于是开始着手培植本地的神职人员，她从一群儿童中选出一些有资质的，送到法国去接受栽培，1840年时，已经有三位晋升为神父，这就是近代非洲的第一批黑人神父。

圣若瑟修女会和她的创始人雅弗艾院长修女，她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展开了天主教在近代传教史上新的一页。雅弗艾修女展现了她的组织能力，带领圣若瑟会的修女，巡亲各个村庄，使儿童们的教育问题、病患者的照顾问题都得以步上了轨道，甚至还开辟了模范农场，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当然，贫苦百姓的生活也获得了改善，她更积极培育本地圣召，1840年，终于有了三位第一批的近代非洲神父，圣若瑟会的修女在塞内加尔为天主教打下了基础。今天，我们继续谈谈她和她的修会。1842年，雅弗艾修女终因操劳过度，健康大受影响而不得不回法国去休养，况且她所创立的修会发展得很快，圣召源源而来，许多地区都邀请该会修女前去服务。雅弗艾修女虽然未曾再回到非洲，但是她仍然不停的为她的黑人孩子们工作，以后有人请她到拉丁美洲法属圭亚那，去接办被救出来的黑奴们的教育工作，于是，她就带了36位修女远赴拉丁美洲。1851年，雅弗艾修女鞠躬尽瘁而死时，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已经有一千两百多人，1950年，雅弗艾修女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列圣品，她的修会已有三千五百多人，她真是近代传教史上，一位出类拔萃的修女。

现在再介绍几个，在19世纪中叶新兴的专门为非洲的传教事业而奉献的男性新修会，一个是圣神会的神父，第二个是设于法国里昂的非洲传教会，再有一个人称“白衣神父”的修会，他们在非洲的传教史上，都占有重要一页。这些修会，使福音传到了非洲黑暗大陆的中心。其实圣神会在18世纪之初就已经成立，只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打击之后，几乎无法重振，会员也只存下很少很少，到了1848年，圣神会和一个归化的犹太人黎伯尔满所创立的新修会合并以后，才恢复了生机。黎伯尔满的健康欠佳，他本人从未出去传过教，但是他有志于非洲的传教事业，当他被选为总会长以后，他便展现了有如圣保禄那样的传教精神。他教育圣神会的神父们，要为了非洲人而自己也成为非洲人，并且在非洲要培植一个当地的神职班。他的非洲传教事业，当他被选为总会长以后，便展现了有如圣保禄那样的传教精神，他教育圣神会的神父们，要为了非洲人而自己也成为非洲人，并且在非洲要培植一个当地的神职班。他的非洲传教事业不久就受到了考验。在1844年派往西非的第一批传教士，去的时候是十个人，在短短的几个工夫就受到病魔的纠缠，只剩下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只好改变地点迁到加彭，这时候黎伯尔满的心情很矛盾，他一方面不愿意放弃，把福音传到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怕派遣自己的属下前去送死，因而踌躇不前，但是，他的会员们却坚决的愿意到非洲去宣传福音，最后他让步了，1846年，第二批传教士终于成行，

勇敢的向非洲出发，他们同心合意，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站，这个地方后来竟然发展成为现在的达卡市。

接着，再来谈谈在法国里昂所创立的非洲传教会，这个修会是由布来济亚主教在 1856 年创立的。1858 年，教宗派他到非洲的狮子国开教，他立刻率领了五位同伴前往狮子国，不料，在他们登陆以后的第六个星期，他与其他四个同伴就染上了疟疾，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些拓荒的传教士，就是麦粒死了，埋了！以他们的牺牲，换得了日后的大进展，他的继任者，仍然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在狮子国宣传福音，他们终于在狮子国为天主教奠下了基础。

1868 年，又有一个专为非洲的传教修会诞生了，它就是我们所称的“白衣神父”。这个修会的创建人是拉维热利枢机。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拉维热利要投身于非洲的传教事业，他原本是法国巴黎大学知名度颇高的名教授，不久以后，他就升任南锡教区的主教。在他担任南锡主教的任内，充份展现了他的才华，大有可能升任里昂或巴黎总主教的可能。当他还是一位神父的时候，曾经在黎巴嫩住过三个月，那时候，回教徒在中东屠杀了将近 20 万的基督徒，他是被派去赈灾的，当时他在黎巴嫩看见回教的影响，因而激发了他传教的热火，因此，当 1867 年，有人给他建议，是否愿意去接任北非阿尔及利亚首都的主教时，他立刻就接受了，同时教宗碧岳九世又把向撒哈拉传教的任务，也全部委托给了他。撒哈拉地区原本就已经非广大，但是，仍然无法满足于拉维热利的传教热诚，以他满腔的传教热火，酝酿出一幅广大深远的传教蓝图。他认为，阿尔及利亚将是非洲两亿人口皈依天主教的门户，从阿尔及利亚，可以进入广大无垠的撒哈拉，他要把基督的福音带到真像不明的黑暗大陆。这个伟大的计划遇到了阻碍，因为自从 1830 年，法国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以后，法国政府的政策就是“禁止一切向回教徒传教的工作”。他不愿意只甘心做移民者的司祭，他认为应该向所有的民族宣传福音，所以他就上书给当时法王拿破仑三世，向他陈明争取传教自由权。法王被他传教的热忱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终于让步取消了禁令。拉维热利主教晓得，要使回教徒改信天主教绝非容易的事，他认为应该从爱德的力量来着手，用爱德来感化回教徒。不久机会来了，那时候非洲发生了瘟疫，大约有十万人成了瘟疫的牺牲品，留下了成千累万的孤儿，拉热利主教收养了他们，建立了育幼院、职业学校、以及农场，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天主教农村的核心。为了实现他那些伟大的计划，自然是需要很多的助手、很多的人力和财力，于是他便创立了“非洲传教会”，训练神父们，如何与非洲人相处、如何仿效非洲人的生活，修士们的会衣就是一套宽大的白袍，就像回教徒所穿的一样，所以一般人都称他们为“白衣神父”。随后拉维热利主教又创立了修女会她们很自然的就被称为白衣修女了。拉维热利主教既然有了助手，于是便派他们穿过撒哈拉向苏丹进发。很不幸，第一和第二批的远征队全部遭到回教徒的屠杀，这条路既然是走不得，就必须找其他的路线。探险家斯坦莱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李文斯顿在 1870 年所走的路，引起了欧洲人对非洲心脏地带的注意。拉维热利认为，那就是他的会士们宣传福音的场所。1878 年，教宗良十三世把这些地方的传教工作全托给了他，他就立刻组织远征队，从非洲东岸的巴加摩药出发，白衣神父们走了一年半，有些中途死了，其他的会士们来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刚开始的时候，国王对他们很好，领洗奉教的也不少，其中还有好多是国王的随从，但是受到回教徒的反对，强逼他们离开。四年以后，白衣神父再回来时，却发现他们最初付洗的教友当中，有人主动的给自己的同胞共 177 人付了洗，并且准备了差不多六百名望教者，白衣神父们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乌干达的首相是回教徒，对天主教很有反感，就这样激起了一次教难，有一百多位教友因此遭到杀害，其中也有国王的随从，所以国王曾亲自劝这些随从背教，但是，他们并不被国王的劝说而改变心意，使国王觉得太没面子，一个个最后都壮烈的殉教了！我在这里要特别的介绍嘉禄·路昂加，他丝毫也不害怕，而且还从容不迫的对刽子手说：“你在我脚下所燃烧的火焰，好像凉水一样的清凉爽快，您侮辱天主可要小心哦！假如你不悔改，恐怕天主有朝

一日要把你投入永不熄灭的火中呢！”勇敢的侍卫长嘉禄·路昂加就在熊熊的烈火中殉道而死。1964年的10月18号，教宗保禄六世，在出席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全体主教面前，将这批殉道者中的22位列入殉道圣人的行列，同时还立嘉禄·路昂加做非洲黑人的主保。而参加这次列圣品典礼当中，就有近代的第一位主教“吉瓦奴加”，他也是乌干达人，在1939年时被教宗“碧岳12世”所祝圣。“殉道者的热血，是信友的种子！”这句话又再一次的得到印证，因为乌干达的教会，成了20世纪非洲最活跃的教会，在廿世纪的六十年代有教友两百万，分为七个教区，有本地神职人员250位。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拉维热利”枢机如何推动反黑奴的运动。早在19世纪的初期，西方国家就已经禁止，在他们殖民地内贩卖黑奴，但是，在非洲的内陆，阿拉伯的商人仍然继续从事着，捉捕黑人贩卖给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回教徒当奴隶的勾当，被捉捕到的可怜的黑人，被成群运送到非洲东岸的桑吉巴岛，在那里装船卖往土耳其及其他回教国家。“白衣神父”写给“拉维热利”枢机的信件内，提到贩卖黑奴的详细情形，据说，被阿拉伯的人口贩子牵到人口市场去出售的不幸者，如果加上那些被打死或病死在途中的都计算在内，每年竟然高达40万人，许多非洲的村庄完全被蹂躏，几乎成了废墟，有些部落因为常常遭到这种威胁，已经陷于悲惨的绝境。拉维热利枢机满心要成为这种悲惨绝伦丑陋的终结者，但是这时候方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他又能做什么呢？他首先向欧洲各国揭发这种悲惨残虐的罪行，并且向全世界的舆论控诉，所以这位老人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到欧洲各大城市去做巡回演讲，激发出听众们的义愤，把所得的报告通知各国政府，警告并且呼吁全世界应该负起良心的责任，也还募集巨款去赎回黑奴，呼吁志愿者去非洲，用各种方法阻止这一类可耻的交易，他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反奴隶的运动，他的热情、他的激昂慷慨的演说，消除了一切的阻碍和反对。1889年，列强的代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集会，采取具体的办法，中止了贩卖黑奴勾当，使它成为历史的名词。

在那么多的传教活动中的英雄表现，我只选取这一小部份，来为各位作为最简略的报导，他们不怕忍受或是冒着人所无法无想像的疲倦和危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把福音传给非洲的人。此外，耶稣会士在马达加斯加岛，遣使会和嘉布遣会在埃底约比亚、无玷圣母会在南非，公保尼主教的会士在苏丹、圣母圣心会在刚果都值得一提的。非洲大陆的探索越进步，传教的事业也越发达；宗座划分的教区越多，各修会的传教士去的也越多，60年代已经有60个修会派有神父在非洲传教，非神职界的修士和修女会都不计算在内呢！

这几个特别为开拓非洲的传教事业而创立的新兴修会，以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是在乌干达的殉道者，还有拉维热利枢机，他以75岁的高龄，用尽他所有的力量，发动了反奴隶运动，成为贩卖黑奴的终结者，这些都在在的激发我们内心的激动，佩服这些为爱耶稣而不顾一切困难，只求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广传，耶稣基督的神国能广扬。在这一世纪以来，非洲的变化太多，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些可钦可佩的传教士，他们所曾遭遇到那些困难，他们传教的方法是怎样的？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梵二大公会议的前后，非洲教会的实况是怎样的。十九世纪时，传教士在非洲工作的情形，我们现在几乎无法想像除了北非的回教国家之外，当年的传教士所遇到的，并不是一个个已经统一的国家，他们都是一些按照种族语言和习俗的差别而聚居的民族或部落，没有文字，更谈不上有任何成文的法律，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规律罢了。而这些传统规律又相当复杂，非洲固然有它的文化，不过，随着地区的不同也有程度高低差别，有些习俗与教会的伦理大相径庭，比方说，酋长的暴虐、各个部落之间的战斗与争夺、啖食人内脏、巫术、杀人以祭神、削弱小的种族或部落、轻视工作，只有妇女和奴隶才工作，所以在许多部落中盛行一夫多妻制，再加上交通的困难和危险，传教士们好像探险家一样，怀着冒险犯难的精神，沿着不明底细的小径或整天整夜的划着独木舟，对地势的探测不能正确，再加上水土的不服，当地人的怀疑和敌视，语言的隔阂，困难就更加重重了。好在，时间一久，传教士们便获得了经验，他们是首批研究非洲语

言、书写、整理文法、编辑字典、编写教义的拓荒者。语言是开启非洲人民心门的钥匙，能与他们讲话沟通，也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明白他们思想，传教的方法也就能正确的运用了。到非洲去的传教士到达某村时，通常都是先开所学校，因为成年人多半疑虑比较多，所以只好先从年青人开始。因此，整个十九世纪，几乎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即便是现在，在非洲的许多地方，半数以上的学校都是青年的传教士开办的。传教士们除了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之外，还需训练传教员，以便能派往其他分站去。这些传教员不但负起管理学校的责任，在学校内教要理，当传教士不在时，还需领导新领洗的教友团体的一切宗教活动。传教士的中心住所，包括一座圣堂、传教士的住所、修女们的住所、男校、女校、简单的诊疗所和几个小作坊，在附近呢，大概会有一个菜园、一些树林或果园，这正好像欧洲中古世纪的隐修院似的。在传教的中心站，不但从事宗教教育，并且开办慈善事业散布耶稣基督爱的光芒。不久传教的中心站也成了文化中心，传教士不久就明白了，除非先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天主教是无法把枝条接得上去的，尤其是当地的人都轻视工作，度着一种闲散懒惰无所事事的生活，在经过了一段好长的时间内，为宗教的陶冶、为宣传福音都是好大的阻碍。传教士们觉悟到，为培训有深度信仰的教友之前，应该先培先如何做人，这样一来，就需要先训练他们以工作为荣，训练他们耕田学艺；而修女们呢，就训练妇女们缝纫烹调，陶冶她们如何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全都是培育教友们信仰生活的基本训练。在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传教区不但加多了初级教育的机构，还增设了中等学校和技术学校，1948年，在刚果创办了第一所非洲公教大学。这样，教友不但能够得到更高的宗教培养，生活水准也随着提高了，对公共管理和私人事业，也有了比较高的能力，也培植了不少的社会精英份子，由于这些重大的改变，城镇也快速的发展起来，传教的方法也就应该有所革新。非洲的情形已经缩小了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除此之外，像是公教进行会、基督徒工会、印刷事业、图书馆都逐渐的兴办起来。前面我所说，都是针对黑人传教的情形，至于与回教徒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必须知道，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是根深蒂固，而且对传教的试探很反感、也很仇视，唯一的能同他们接近的方法，就是办理照顾病患和教育儿童的博爱工作，嘉禄·富高神父的作风便是最好的例子。20世纪中传教区工作进展最快的是非洲，从19世纪初叶的五万教友增加到了两千两百万；神职人员的数目由60人增加为一万五千人，其中已经有两千人是本地神职。此外，还有四千七百位修士和两万一千的修女，因为有了这些进步，所以，教宗碧岳十二世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先后提升了很多非洲传教区成为正式的圣统制。1939年时，碧岳十二世祝圣了两位非洲近代首批主教。23年以后的1962年，已经有44位主教参加梵二大公会议，其中还包括了一位枢机主教呢！

3.4.4 北美洲的传教情形

天主教在非洲传教的成绩虽然很可观，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很满意，应该努力的事还很多。天主教教友的人数只不过是全非洲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教友人数的分布也很不平均。大湖一带、喀麦隆、刚果、尼日利亚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戏剧性的进展，教友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至于其他地区，似乎仍然在迈进。就整体而言，回教的影响力促成他们的进展，要比天主教进展得更快。从1957年到1967年的十年间，非洲大部份的国家，都已经由殖民地的地位进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天主教在非洲近百年的传教重点，多在教育工作和社会工作，促使非洲人民认识到人格尊严和权利，应该是帮助非洲人民，朝向独立自主方向迈进的主要原因。不过因为历史的背景，教会也难免曾与殖民地的制度有着关连性。从教会本身的立场而言，早在非洲反抗殖民帝国以前，就已经对非洲人的独立，清楚地表明了支持与赞成的态度，并且希望能与独立政府共同合作的真挚愿望，大多数新的独立政府，也都应许教会仍然享受与独立之前同样的自由。可是在刚果，传教事业已经笼罩在，独立后所发生的政治苦难之下，造成了全国的大混乱，有超过百余位的传教士和修女，在混乱之中被残杀死亡。其他地方，像是埃底约比亚、几内亚，宗教的自由已经受到法律的限制。在苏丹、

回教徒占了绝大多数，少数的天主教徒因而遭受到歧视与迫害，还更进一步把外籍传教士全都驱逐出境。教会在非洲的当务之急，就是努力的积极的培训本地的神职人员，教友增长快速，就更显得神父的比例太少了，同时也应该培训优秀热心的教友，协助神父照顾众多的教友。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看，十九、廿世纪美洲地区传教事业。美国虽然一直到 1908 年仍然直属于传信部，但是天主教已经不像十九世纪初那么少的教友。他们为了战胜多数的基督教徒以争取社会地位，已经奋斗了好多年，20 世纪时，天主教在美国已经茁壮起来，有自己的神职人员、有各级学校、有大学、有慈善事业，而且在组织上也非常的完善与进步。1860 年时，天主教徒在美国只有三百万，但到 1900 年时，已经超过了一千万，而 1930 年时达到了两千万，根据 1960 年的统计，在全人口一亿八千万人中，天主教徒就占了四千两百万，从此，在美国国内便有了“人数最多的教会”这个称号，基督教以教派而言，任何那一派也无法与天主教相比。广大的美国的西部和加拿大的北部还是红种印地安人漂泊游牧，在 17 世纪曾经有传教士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到 19 世纪时，那些教友团体已经不复传衍下来，早已消灭殆尽。红种印地安人与从欧洲移民而来的白种人格格不入，有被消灭的危险，传教士经常给予保护和协助，免得他们时常受到白人的袭击和迫害。无可奈何的是，白人越向西前进，印地安人也越被迫向西撤退，传教士也无能为力去阻止。好在，在印地安人中，还一代传一代，对黑袍人留有印象。所谓黑袍人，指的是耶稣会的会士，他们曾经在 150 年前曾向印地安人传过福音，印地安人也是多次派代表前来，要求再派黑袍人回到他们中间。恰巧在华盛顿附近，有一批耶稣会会士，是前年刚从比利时来的，1823 年，他们便动身往红人中去传福音，同时还教导他们耕田畜牧，开始学习较为安定的文明生活。在这批耶稣会士中，有一位号称印地安人挚友的斯麦特，他对印地安人的影响非常大。他为许多部落传福音，连那最彪悍的苏斯族人都很欢迎他，白人当中也只有他能够进入最野蛮的民族之间，而平安的来来回回，美国政府，也多次请他去向印地安人洽商和平相处之道。他利用这些机会替红人辩护，他也为红人跑了不少的路，去征求新传教士到红人中加强传教，他曾经 19 次横渡大西洋，进见教宗和欧洲的国王们，几乎走遍了欧洲各国，但是，他的奔走，并没有得到广大效果，因为那时候白人不断的西侵，印地安人已所剩不多了，今天全美国的 33 万印地安人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天主教徒。至于大部份仍然是奴隶，为数几百万的南部黑人，虽然经过主教们大声疾呼，但是，整个十九世纪，对黑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他们大部份虽然在天主教会内领受了洗礼，但是，对教义所知有限。等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奴隶制度才被取消基督教各教派也急起直追，仿效天主教的布道方式，这些黑人又去改信基督教。不过，从此以后，各个传教教会便更加努力的传教，例如圣若瑟会、圣言会的神父们也专心致力给黑人传教，同时也有好几个修女会，特别针对着向黑人传教的目标而创立的。根据 1957 年的统计，在美国一千八百万的黑人当中，只有五十万人是天主教信徒。在美国北方的加拿大，也和美国一样，直到 1908 年仍然还属于传信部，不过没有信仰的，所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居民的绝大多数都是欧洲来的移民，他们不是基督教徒就是天主教徒。1763 年时，法国把加拿大让渡给英国，从此以后，天主教徒就得为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奋斗，1852 年法律才承认各教派享有平等的地位，根据 1962 年的统计，一千八百万居民中，天主教徒占了八百五十万。1965 年时，天主教徒已和基督教徒平分秋色了，这些天主教徒大多为法国移民的后裔，散居在加拿大的东部。

前面简单介绍的非洲和加拿大的传教，不过只是教友在人数上的发展而已。下面看看加拿大北部的传教情形。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北部，广袤无垠、终年积雪、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印地安人和白种人，还有一些两者的混血种的猎人居住在那里，开始时是由加拿大的神职人员开的教。

1841 年，新创立的无玷圣母会的传教士前去增援，在那里几乎只有传教站算是固定的

机构，许多地方所取的名称都是传教站上的传教士的名字，比方说，格鲁阿尔村便是一个代牧区的宗座代牧格鲁阿尔主教的名字。格鲁阿尔主教在加拿大北部奔走传教长达 71 年之久，他是一位不知道什么叫疲倦的传教士，他也是航海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城廓的建筑师、画家、作家，他还是印刷工人、农人，他简直是无所不能。他在 1931 年去逝，享年 91 岁，他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拓荒者，他还是一位爱好祈祷的神修者，他能说印地安人的各种语言，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花白子的伟大祈祷者”。有一个开荒者曾这样写道：“我们从事传教的地区，不像中国那样的人烟稠密，当然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一齐皈依受洗的情形，我们可能因饥饿或冻馁而死，却没有殉道的幸运，我们这些贫困的传教区，没有像你们那样的富有诗情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只是长期的殉道而已，平淡无奇，只有天主知道。”固然有两位传教士被杀殉道，不过这儿最大的危险还是严酷的寒冷。在猎狗所拖拉的雪橇上，无尽无休的东奔西跑，传教士们最大的痛苦，就是长期的孤独。1912 年，有两位无玷圣母会会士，越过印地安人的地区向极北行驶，一直到了北极的冰带，在那里他们看到爱斯基摩人，为数只不过数千人而已。传教士工作了四年，几乎没有一个人肯信教。长上正决定将他们召回时，奇迹却出现了，皈依天主教的爱斯基摩人忽然增多了起来，这批传教士把这个奇迹和转机，完全归功于法国里修的圣女小德兰的代祷，因为这批传教士曾恳求她代祷。当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罗马时，教宗碧岳十一世便决心尊奉圣女小德兰为普世传教区的主保。此后向爱斯基摩人传教的工作一直在顺利的进行着。各位听众朋友，也许您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么浪费人力？既然神父这么缺乏，在那艰苦的地区，为了一两万人的信仰问题，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吗？只因为他们听见而且回应了基督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付洗，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他们答复天主的召叫。”传教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曾对人谈到，加拿大北部的传教事业时说过：“那实在是最美丽、最艰苦也最有功的传教事业，为此，我也特别爱护它。”

3.4.5 拉丁美洲的传教情形

现在，我们转往南方的拉丁美洲，来看看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传教事业。19 世纪的初叶，除了几个印地安人的部落，仍然信仰他们祖先所信奉的，有一些尚未开化的部落退居到深山野林之外。拉丁美洲很少没有不信仰基督的人了，印地安人、黑人都领受了洗礼，而且许多国家都以天主教为国教。不过，实际上这些基督徒的信仰，却掺杂了好多的迷信，神父的人数又少，许多教友连最起码的宗教培育都没有接受过，也无法参加宗教敬礼或领受其他的圣事，虽然是如此，传教的工作却从来没有中断过。18 世纪末叶的时候，耶稣会的解散，曾给他们带去了严重的打击，但是，道明会、方济会和奥斯定会等修会的会士都相继而来，负起了给印地安人传福音和教育他们的责任，并且建立了学校和培训传教士等工作。19 世纪初，从 1810 年到 1825 年之间拉丁美洲各国忙于争取独立，脱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产生了现在的共和国，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教会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新的政府也渗入了自由革命和共济会的反神职思想，这就是 19 世纪期间，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有教难的原因。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都曾经或长期的或短期的驱逐过传教士，修道院空无一人，神父们照顾教友的需要，都已显得人力不足，那还有人去向外教人传福音呢？所以，从 1810 到 1830 年，传教工作是完全的停顿下来。所幸的是欧洲教会的复兴，促使欧洲各修会已有余力派遣传教士，方济会、道明会、耶稣会等修会的会士都卷土重来。不久之后，其他修会的会士也都接踵而来，他们先在天主教徒中从事布道的工作，因为他们太需要了。教宗与拉丁美洲的新政权签订协议时，加上了在异教徒中保护传教的条件，所以拉丁美洲的国家尽管政治不断常有革命，传教士们能在尚未归化的地区，从冰天雪地的火地岛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大陆尖端，向北一直到亚马逊河热带雨林的的心脏地带，各大修会的会士，已经接触至从来没有外人来往过的部落传教，他们传教的情形不但丰富多彩，而且相机变化，各修会都有代表性的表现。

到了 20 世纪，拉丁美洲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人口增加快速，1900 年有人口 6 千 3 百万，1950 年已经增加到一亿六千三百万，1965 年增加到两亿两千五百万，到了 1975 年增加到了三亿人。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社会的改造。在过去，居民只有两种，一种是少数的知识阶级，他们既富有而又保守；另外一种就是乡村民众，包括极贫穷的印地安人、黑种人以及混血人种。由于欧洲移民和工业的发展，社会也随之改变，城市也随之迅速的发展起来，结果产生群众的贫困，生活条件恶劣，饮食菲薄，教育也就更落后了。中产阶级很少，这些贫苦的群众高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五，他们也全都是天主教徒，拉丁美洲的一亿八千万受洗人数，占了当时全球天主教的三分之一。他们的信仰真诚而且根深蒂固，对圣母的敬礼非常普遍，可惜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实在太少，对教义懂得不多，以致于掺杂了许多迷信的成份，而这根本原因就是神职人员太少了，这是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最大的缺点。本堂区的教友太多，平均每个堂有一万五千名教友，大一点的城市，一个堂口教友多到六万人的，而且农村本堂所负责的地区，简直是大得惊人，神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又如何能亲自接触到每一位教友呢？在拉丁美洲徵召修士的运动一直很积极的推动著，效果也很可观，但是仍然属于杯水车薪，难以应急，教友人数的增长，比神父人数的增长要快得太多了！神职人员的严重不足，因此也造成了丧失信仰的危机。当教友们在农村中度著安定的生活时，信仰也就能代代相传，一旦，他们拥向城市去谋生时，远离了传统的习俗，切断了家庭亲属的来往，也就渐渐的忘了他们是教友，也很容易听信其他的教派，以至于沦落成古老的异教徒，或则是通灵术的迷信者了，这在巴西是最为显著的。基督教的许多派别，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派遣了许多的传教士，令不少方天主教徒改了教，数字相当惊人，从 1951 年的三百三十八万增加到 1961 年的七百七十万。唯物共产的思想对年青人的影响也很深，教会当局已经警惕到事态的严重性，从 1950 年开始向欧洲向北美呼吁大规模的协助，否则的话，教友就可能沦为无信仰者，或则转入其他的教派中去了。1955 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国际“圣体大会”，从拉丁美洲各国来参加的主教不少，并且决定组成一个拉丁美洲主教团，目的在研究拉丁美洲教会的种种问题，共谋解决的方案，促进并协助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安排教友们的各种宗教活动，在主教团的推动下，无数的活动开始兴办起来。欧洲和北美各国在教宗的呼吁和鼓励下，对拉丁美洲燃起了关怀的心火，莫不伸出支援的手，除了金钱的协助之外，派遣了宗教社会学的专家，尤其是传教士，于是会内会外的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在俗教友源源而来，听候拉丁美洲主教团的分派。1960 年时，有过一个统计，这些外来的传教士，包括一万两千位神父、三千位修士、一万七千位修女，这在圣教会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兄弟手足一般的通力合作。至于效果如何，我在这里无法给听众们做整体性的报告，因为在我手上无法找到具体完整的资料，也是我感到抱歉的，单凭推测，应该是很好的效果。

3.4.6 太平洋地区的传教情形

下面要到太平洋地区看一看，在这个地区天主教传教的情形。所谓太平洋区，包括了澳洲、纽西兰、新几内亚以及许多散布在太平洋中的岛屿。在 19 世纪以前，这些地方，对传教士而言，仍然是处女之地，尚未对传教士打开门户。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澳洲的传教事业。公元 1770 年，英国的航海及探险家科克发现了澳洲方东海岸，就立刻把它划归为大不列颠的版图，不管散居在这广大土地上的土著民族和石器时代的部落怎么样，英国人便把这新占领的地方作为放逐犯人的处所了。被英国人放逐来的，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其中还包括了两位神父，是以背叛英国国教的罪名被放逐的，他们便成了澳洲天主教的先驱者。起初政府不准他们举行天主教的敬礼仪式弥撒圣祭，因此，这两位神父又被遣送回去。但是，爱尔兰教友，以信仰自由之名提出抗议，终于获得了胜利，于是神父又再回到澳洲定居，教务工作逐步进展。到 1833 年时，已经有了一万七千名教友，而罗马教廷，就委任了一位宗代牧来管理这些教友。1851 年，澳洲发现了金矿，因而涌来了大量的移民，从此以后，教会便不停地增长，教区也加多了，到 1965 年时，已经有了 29 个教区，教友人数已经超过了两百万，

占澳洲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不但很活跃，而且很有组织。我们可以说，教会在澳洲并没有经过传教的阶段，而是由欧洲教会的移植而长大起来。澳洲的土著，是世界上最为原始的民族之一。在 1845 年以后，各国传教士尤其是本笃会士，开始接触这些野蛮又未开化的部落，成绩也蛮可观的。在澳洲东边的纽西兰，教友也是从欧洲移民而来，第一批到纽西兰的传教士，只顾照顾白人的宗教事宜，无暇给土人传教，土人在开始时很受威胁，好在他们有完善的组织，坚强的意志才没有被白种人给消灭，传教士给他们带去了福音，1944 年居然祝圣了一位本地神父，天主教友人数大概 30 万左右。

1995 年元月份，我们可敬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健康情形的许可下，出席了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的世界青年日的庆典，大陆也第一次派了 24 位男女代表出席了是项庆祝活动，随后教宗从菲律宾前往新几内亚，下面就要介绍一下，新几内亚在十九、二十世纪中传教的情形。

新几内亚，位于澳洲以北，在政治上分成两个部份，东部属于澳洲，西部呢！早期时是荷兰的殖民地，1963 年以后则属于印度尼西亚，它是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岛，它虽然山高，但是位于赤道附近，所以高山上仍然常年积雪，而且森林茂密，很难穿越，但在 1960 年仍然有人迹来到内陆地区。全岛居民在当时大概有 150 万人，而巴布亚黑种人可以称得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遗迹。1840 年，基督教的传教士首先登陆该岛，1845 年，天主教的传教士随后也到达岛上，首先是圣母会的神父，1881 年依苏丹的圣心会神父，1889 年的圣言会神父，他们都表现了英豪的精神，去与恶劣的水土、沼泽中的蚊蚋、与要人命的疟疾、饥饿、与高山峻岭、与热带浓密的雨林，甚至与嗜吃人肉的土著搏斗挣扎，这样的传教生活，真是在痛苦中播种，但是他们却尝不到含笑收成的快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把传教事业摧残殆尽，先不谈物质上的损失，只是在新几内亚附近的一些岛屿上，就有 188 位神父和修士、78 位修女被惨杀。二次大战结束后，巴布亚人由于交战国的人马一再的侵入而撤退，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的怕生而逃避外人了，传教士也不像那些先驱者那样遭遇到无数的困难。新几内亚连同附近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总共有 50 万天主教徒，大概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53 年，祝圣了两位巴布亚神父。在当地传教的最大困难就是，被称为石器时代的橱窗的巴布亚人，忽然间一下子遇到了摩登的现代文明，这中间缺少一段过渡时期，造成了当地人民好大的冲突，最时髦的机械到处可见，而所用的工人则是刚从石器时代的生活而来的，因而造成混乱，这也把土著民族的社会湮灭了，因此教育事业就占了新几内亚传教事业的重要地位。除了新几内亚等几个大岛之外，太平洋中还散布著成千累万的岛屿。在这些大大小小岛屿上的居民，大约有一百一十五万人，这中间不包括夏威夷群岛，因夏威夷早在 1900 年已经属于美国的版图。18 世纪的后半期，欧洲才开始对这些远在天边的岛屿发生兴趣，经过探险家们生花妙笔的描绘，很快的就成为殖民国家竞相争夺的对象，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距离的遥远、居民的分散、民族和语言的分歧、土人的野蛮、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相互仇视，这些为传教士而言样样都是困难。再有，就是欧美的渔夫们为捕捉鲸鱼，以及从事各种贸易和投机的人，常在这些岛屿四周徘徊，他们所寻求的绝对不会是当地人民的福祉，这又给传教士增加了困扰。而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纠纷冲突，也是双方传教士要面对的困难，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欧洲探险家发现大洋洲时，正是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步入衰退，而基督教正是在这时候兴起传教的时候，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往往比天主教的传教士捷足先登了好几年，所以也就不愿见到天主教的传教士，所以，您说能没有冲突吗？最先到达太平洋上大洋洲的有两个修会，圣母司铎会在大洋洲的西部，毕布斯圣心会的神父在大洋洲的东部。大洋洲的传教工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牺牲了不少的神父，有的被土人惨杀而死、有的死于疟疾、有的死于海难，遇到台风，船翻了，所换得的是，教会在当地生了根，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才得以传遍了大洋洲，许多代牧区内的居民几乎全都是教友，这一切成果，不得不归功于那些拓荒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中有两位已经先后被祝圣列为教会内的圣人，一位是圣

彼得查尼尔，他是一位爱德的致命者；另一位是疯病人的传教士圣达弥盎。

圣彼德查尼尔，1803年生于法国的东部，当他加入圣母司铎会时，已经升神父好多年，而正值大洋洲需要神父时，他就成了该会第一批派往大洋洲的先驱者，与他为伴的是一位辅理修士。他们在法托纳岛登陆，岛上有居民两千左右，酋长热烈招待他们，但是没有料到两年以后，酋长开始嫉妒他们对居民的影响力，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就随之改变，当他自己的儿子也表示要领洗奉教时，他竟然勃然大怒，立刻命手下用斧头砍死彼德查尼尔神父，神父当场脑浆崩裂。他被杀殉道时只有38岁，他原本预先知道有这场危险而且也可以逃掉，但是，他却不肯逃走，他还说：“我是否被杀都没有关系，反正教会已扎下根基，教会决不会因著我的死亡而消灭！”他的预言后来也应验了。他在岛上经过三年的努力，也只归化了几个人，当他死后的六个月，岛上的居民便自动的要求再派传教士来，两年以后，全岛的居民都领洗奉教了，酋长本人也痛悔前非请求受洗，如今这个代牧区全为天主教徒，而且从他们中间产生了好多位神父。1954年，教宗将彼得查尼尔列为圣品，而且还封他为大洋洲的主保。

在大洋洲的传教先锋者中，第二位要介绍的，就是麻疯病人的传教士达弥盎，在1994年才册封为圣人的。达弥盎他生于比利时鲁汶附近的小农村，他追随他的大哥入了毕布斯圣心会。1863年奉派到夏威夷，在那里他过了九年的传教士生活，从事培训教友、建造小大圣堂。可是，可怕的疯病正开始蹂躏著夏威夷群岛，政府当局为了怕传染扩大，只好把已经患了麻疯病的人集中到摩洛开岛上去，把他们完全与世人隔绝。各位听众，您不妨想一想，把成千患了绝症的人聚在一齐，又与外界、与亲人完全隔绝，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惨状？他们既然已经丧失了任何的希望，那还有什么道德秩序可讲呢？因此，他们说：“在这里既没有法律，更谈不上道德。”有人也许要问：“能让他们连宗教的帮助也得不到吗？”于是达弥盎神父便自动献身，愿意到摩洛开岛上，去自我放逐，与麻疯病人一起生活。他曾写信给他的长上和家人说：“他们的肉体真的是丑陋难看，但是他们都有由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灵魂啊！耶稣还在世上时，也曾经安慰治好过生这种病的人，我虽然不能治好他们，我却能给他们带去安慰和希望。”达弥盎神父不顾一切困难，先尽力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在他的领导下，还有能力工作的人，便开始工作，他们先开始挖掘沟渠水塘，把山上的泉水引下来，作为饮食灌溉之用，然后开荒耕种，建筑房屋和圣堂，组织岛上的居民自力更生。他自愿留在摩洛开岛上为居民服务，他成了这些麻疯病人的神师、医生、辅导者和监护人。这位自贬于麻疯病人行列的神父，逐渐声名远播，于是欧美各地善心人的捐助源源而来。最值得我们钦佩的，还不是达弥盎神父在那有如人间地狱的麻疯岛上所作的物质改善，而是道德与希望、爱德与信仰的重建。达弥盎神父到达摩洛开岛之前，那儿充满了仇恨、互殴、弱肉强食，没有丝毫的道德观念。达弥盎神父到达之后，秩序建立起来了，正式的家庭出现了，暴力酗酒等恶习也绝迹了，儿童们也开始受教育了，男孩儿们组成了各种运动团体，女孩儿们，学习女红烹调、学习唱歌，成年人也学会了教会的礼仪，还常唱歌游行，他们寻得了人性的尊严。达弥盎神父，早已有心理准备，料到有一天他也会感染麻疯病。这一天终于来了，他发现自己染上了麻疯病，他甘心情愿接受了这种牺牲。1889年，他以49岁的英年去逝，在摩洛开麻疯病岛上与病人一同度过了16年。印度的圣雄甘地曾经从达弥盎神父的生活中，撷取到这样的领悟，他说：“如果传教士，尤其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认定了为麻疯病人服务，是一种可爱又可喜的工作，那是因为任何服务也没有这种服务需要更大的牺牲精神，政治界和新闻界所传述的英雄，没有一个能与达弥盎神父相提并论，但是在天主教内，追随达弥盎神父的榜样而献身于为麻疯病人服务，都有成千成万的人，促使他们有这种英勇行为的根由，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这一段话是甘地在巴基斯坦的首都拉合尔对著学生们演讲时说的。今年6月3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自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主持达弥盎神父列真福品的列品大典。

大洋洲在二次大战以后的情形又是如何的呢？二次大战的结束，对大洋洲而言，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几乎所有的大洋洲中的群岛，都接受了西方和亚洲的文化。日本及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海战、空战，所造成的混乱与破坏，实在令人难以想像。战后，这些岛屿又成了观光旅游的胜地，岛上人民的思想或习俗也都有大幅度的改变。在亚洲方面，中国、越南、印度等国的移民，都向著大洋洲移民。根据 1966 年的统计，包括澳洲在内就有中国侨民 9 万 1 千 6 百人，其中天主教徒两万一千六百人，当然，也就为传教士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有与移民相同国籍的神父，或至少会说该国语言的神父，才能对他们传教。但是，最大、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同是信仰基督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彼此间的分裂和竞争，这种分裂更加深了教外人，对教会的不信任。根据 1960 年的统计，大洋洲有 27 万 5 千的天主教徒，有 38 万 5 千的各派其督教徒。

3.4.7 亚洲的传教情形

紧接着亚洲的传教状况，让我们先来谈近东的教会事务。十九世纪的近东，土耳其人统治了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各地区，它和伊朗，群众以回教徒占绝大多数。19 世纪初，已有传教士进入近东，从事传教活动，不过直接讲道使回教徒皈化，几乎是不可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办学校，有教无类，不分种族或宗教都可以入学。这样，一方面可以消减回教对天主教徒的成见，而另一方面，为提高当地的少数天主教徒的水平，这也是必要的。传教士除了开办学校之外，也开办医院、孤儿院等慈善事业，这也能赢得当地回教居民的信任，建立起友谊的管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主教传教士在近东所办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非常繁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881 年，耶稣会士在黎巴嫩所办的贝鲁特大学，它在近东一带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旧繁荣。

下面介绍印度、锡兰、巴基斯坦，以及中南半岛上，天主教传教的情况。20 世纪初，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兴未艾，这场大战激起了回教徒反对基督信徒的情绪，这种情绪疯狂的发动了十年之久，也屠杀了不少天主教徒。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等地的古代教团，都已经是完全被歼灭得无影无踪，传教事业也遭到摧毁；教廷派驻在伊朗的代表也惨遭屠杀；与德意志同盟的土耳其战败以后被分割，它的势力已经只限于小亚细亚。新兴的几个国家，也在第二次世界在大战后也都获得了独立，那就是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以及以色列等国。土耳其人几乎全是回教徒，政府则自称是俗化的，禁止任何宗教的宣传，天主教徒的人数总共不到千分之一，而教会所主办的几座学校和各种慈善机构，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也都只有极少的数量，而分又分属各种不同礼仪的天主教徒和与罗马分裂的基督徒，在伊朗境内的情况也是如此。巴勒斯坦，这原本是耶稣基督诞生、成长、传福音，从生到死而复活的地方，全部沦入回教所包围的氛围，只有几个地中海边的小岛还有人能保有信仰。唯一例外的是黎巴嫩，在黎巴嫩，天主教徒和各个教派的基督徒加在一起，就与回教徒不相上下、平分秋色，而黎巴嫩的宪法也赋予百姓信仰的自由，基督徒与回教徒在平等的地位上尚都能和平相处。至于阿拉伯则是任何的传教士都不得入境，它只是清一色的回教国，近十年来有少数的基督徒能在阿拉伯境内生存下来，但他们都是协助开采石油的外籍雇员。

下面介绍 19、20 世纪印度的传教情形。印度也和其他传教区一样，在 19 世纪初期的情形很悲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在耶稣会遭到解散以后，继承了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不过，人数不足又没地方去求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为了挽救这种情势，派遣了宗座代牧，但是，却遭到葡萄牙的反对，一方面无法负责一切教会事务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著旧日的保教权而不放，因此双方起了很难堪的冲突。一直到 1886 年，教宗良十三世与葡萄牙签订协议后，才获得正式的解决，印度也就在 1886 年，建立了教会的正式圣统制度。

印度的传教工作，虽然是困难重重，但仍然寻求进展的可能性，步伐虽然缓慢，却能保持稳定的进展。1835 年包纳德担任主教，他也就成了传教工作最大的鼓励者。他用印度方

言，编写了一部“救恩史”，这对印度的知识界影响很深。在 1845 年，他召开了第一次教务会议，主要的是为了创建印度的教育体系，连女子教育也包括在内，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改革，同时他在这次会议中，也要求改组与修道院相关的事情，这为召选更多的圣召，并为培育更好的本地神职人员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会议中的议决案虽然不是一蹴可成，但是日子一久，功效自然就彰显出来了。19 世纪中叶，印度北部刚刚开教，耶稣会士随着英国的军队，以随军司铎的身份于 1867 年，在印度北部的高山地带发现了一大族群，他们不像大多数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而是某种精灵的崇拜者。他们全都遭到当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名叫黎万的这位耶稣会会士，在 1885 年到达他们中间，尽力保护他们的权益，这群山林中的老百姓被黎万神父的爱德和慈善所感动，纷纷请求入教，在五年之中，他已给七万九千多人付洗。黎万神父由于操劳过度而不得不回国去休养，但是因为他的鼓励，时常有成批、成队的人要求领洗奉教，在 20 世纪的六十年代，该山区的教友人数已经有 26 万人。

从十九世纪以来，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一直是印度传教事业的特色，不但是初级、中等或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 1958 年的统计，教会办的大专院校已经有 75 座，拥有大专学生三万两千人，这些学校招收学生不限于任何宗教，所以影响很大。在学校受洗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栽培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天主教学生，其中还出了不少的神父，未曾受洗的毕业生，对他们的老师常保持著尊重和感激，其中有不少在政府和社会上，都占著崇高的地位，对天主教保持好感。19 世纪末教会曾遭人轻视，如今则是极被重视，过去的教友大都过分的保守和被动，而今已经有所觉醒而组织起来，公教进行会的成员很活跃。1947 年，印度从英国手中独立以后，曾有一些爱国团体想要立印度教为国教，外国传教士的入境遭到了限制，也有不少知识份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天主教会的本身有着许多弱点，其中的一点就是分配不平均，北部教友很少，天主教徒大多集中在南部。早期圣多默宗徒、及 16 世纪圣方济沙勿略所播种的地区，都是凯拉拉一带，那里的教友最多。至于印度教友的人数，在 1871 年的统计，有 80 万，到 1965 年，已经超过了七百万。以印度人口而言，则是七十人当中，才有一个教友，而司铎和修女的圣召，在南部相当的可观，自行创立的本地修会也不少，传教的前途很有希望，也可弥补北部的不足。1923 年时，印度已有本地的主教，1953 年，印度有了第一位枢机，主教中的半数和七千七百位神父中有六分之五，都是属于印度本籍的神父，一万名修女中七千人是印度籍，当印度在 1947 年获得独立的时候，回教徒占了大多数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共同组成了独立的巴基斯坦，那里只有极少数的天主教徒。宪法虽然保证信仰完全自由，然而回教徒的舆论，却极力反对其他的人，去皈依除回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神职人员非常的欠缺。根据 1961 年的统计，在九千五百万人口中，天主教徒只有 30 万零五千，只占了总人口的千分之三而已，东巴基斯坦，最后终于独立成为孟加拉共和国。

下面，我们就顺便来看看，印度半岛南端，东边外海的锡兰岛，早在 16 世纪时，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来到印度的卧亚，在发现东印度群岛时，就已经来到锡兰，把福音传到岛上，等到葡萄牙帝国瓦解，荷兰的改革派基督教徒占领了锡兰以后，天主教的传教工作，便完全的陷入停顿状态，一直到 19 世纪才开始活动，而锡兰也在 1947 年和印度同时宣布独立。在一千万人口中，天主教徒占了 70 万，有很多本地籍的神父，但是教友人数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加。近年来，天主教被视为外来宗教，触上了民族运动的暗礁，这个运动强调要复兴佛教，要立佛教为国教，限制其他宗教的自由，到 1961 年时，一切私立学校均由政府所接收。

借着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中南半岛上的越南，在 19、20 世纪传教活动的情形。早在 17 世纪时陆德神父在越南开教，虽然经历了教难的时期，仍然能有良好的进展，19 世纪初叶有 30 万教友。但是，阮福皎在 1820 年即位为王以后，实行中央集权，开始迫害天主教徒，兴起了教难，这场教难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1825 年出了禁止传教士入境的命令，随后在 1833、1835 年所发出的命令，一道比一道严峻残酷，教堂被拆毁，还命令把十字架苦像放

在城门口，凡是要进城的人，都得踩著十字架苦像通过，否则就处死刑，因此而殉道的，有 9 位传教士，越南籍的神父，传教员和各层年龄的教友，更是不计其数。阮福皎于 1841 年去逝，儿子阮绍治即位，已不那么严格执行禁教的法令，但是仍然有很多神父和教友被逮捕或放逐，流血的迫害已经减少。越南教会在这悲惨时期的伟大鼓励者，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乐道尔主教。他看到教会没有获得自由的迹象就毅然地从藏匿的地方走出来，到各本堂区去巡视，神父和教友见到了也壮起胆子，不再躲躲藏藏，公开地重建圣堂，庆祝瞻礼或节日，官厅虽然曾经想办法阻止教友们集会，但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神父和教友也未再遭到拘禁或迫害。就在这时期，教宗委任了几位新的宗座代表，从此越南的传教活动又逐渐恢复。1847 年阮绍治去逝，儿子阮嗣德即位，教难又再死灰复燃。他命令把捕捉到的欧洲神父投入海中，越南籍的神父处腰斩的死刑，凡是涉及藏匿传教士的村庄，就挨家挨户的搜查，传教士不得不逃进森林或深山中去避难。乐道尔主教他藏身之处，获得了更恶劣的消息，圣堂被拆毁了，教友遭到了酷刑脸上者被烙上了印，有的呢，被放逐了，这一切都不能使主教绝望，他虽然筋疲力尽，身体发着高烧，仍然从他最后的藏身之处，计划著重建废墟，并直到 1858 年去逝为止。这些情形和消息，传回欧洲，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莫不认为，非替受虐待的法国传教士复仇不可，连非天主教教也同仇敌忾呢！那怕是需要动用武力，也得为争取信仰的自由。于是法国政府真的就派战舰去保护传教士，但是，船舰一开走，威胁一解除，教难便变本加厉起来。这样，法国政府被逼骑虎难下，决心派兵征服越南，教友们就被越南百姓当作是同情入侵的法国的奸细，常常被集体屠杀。到了 1884 年，发生了“中法战争”，1885 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教难才停止。在这半个世纪的教难期间，越南教会表现了英雄般的坚强，有 115 位越南籍的神父牺牲殉道、两千位修女被迫逃散了、10 万教友为保持信德而致命。

殉道的传教士中有一位卫纳尔神父，他在 9 岁时，看一本越南传教士殉道的书，很受感动，就对人說：“我也愿意去越南，我也愿意做殉道者。”长大以后，从来没有忘记他 9 岁的心愿。所以，他加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在 1854 年要求长上派他去越南。7 年的工夫，总是东躲西藏，逃避越南官厅的追捕，最后终于被捕，但他始终笑口常开，表示心里的高兴，他被关在木头钉成的笼子中，等待执行死刑，等了好几个月，就在笼子中他给家里写了好几封好美妙的信，使那些阅读他的信的人，产生了传教的圣召。他在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一路高唱圣咏，好像是要去参加庆祝会一样，所以大家就称他是“喜乐的殉道者”。这些殉道烈士中的一百多位事迹可考，已经先后被教宗良十三世、碧岳十世和碧岳十二世列入真福品。

19, 20 世纪以来，天主教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以及在中南半岛上的越南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在越南，19 世纪前期，阮福皎即位为皇帝，他专制独裁，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同时也开始残酷的手段，摧残迫害天主教，他的儿子、孙子时代，禁教的法令从未停止过。各位必定还记得乐道尔主教的故事，以及喜乐的殉道者纳尔神父殉道的故事，借着继续介绍越南传教的事情。

酷刑、流放、死亡都无法窒息越南的皇帝们所称的邪教，就是连在迫害天主教最剧烈的时期，仍然不断有人要求领洗奉教。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教难以后，接著而来的，是半个世纪的平安时期，田里的庄稼又得以发芽滋长，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和修女们蜂拥而来，连许多专以隐居苦修而闻名的修会，像是熙笃会、圣衣会、加辣会等，也跟著传教士的足迹来到了越南，教友的数字从 1885 年的 35 万增加到 1930 年的 150 万而且还不断的在增加之中。除了菲律宾群岛以外，越南要算是东亚地区教友比例最高的国家，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七以上，越南的天主教、最强、最新的仇敌就是越南共产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宣传的伎俩，对人良心上所施的压力，以及他们所用方法的毒辣，造成了比前一个世纪，对天主教的血腥迫害更为可怕。当 1945 年，越南争取独立的革命爆发，许多越南天主教徒积极地参加了独立运动，但是，实际领导这次运动的幕后主使者是越南的共产党，为了扩张势力，他们想尽

各种办法，而当北越的共产党，认清了天主教徒，虽然那么热烈的参加独立运动，但是，绝对无意按照共产党的利益行事时，北越共产党便改变了对越南的天主教徒的态度，在北越势力所控制的地区，发动了一次阴险而暴戾的政治迫害。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结束了战争，像是“板门店停战协定”，把朝鲜分成南北韩、也把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分成了南、北越，北部归给越共、南越则倾向民主，走亲美的路线，越南百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留地，原来住在北部的60万天主教徒，不顾越共的宣传和利诱，毅然放弃了他们的所有一切，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自由民主的南越。这次北越天主教徒的集体南迁，震惊了全世界，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人和渔民，他们宁愿放弃家园，扶老携幼的流亡到南越，唯一的目的是为保卫自己和后代子孙的信仰自由。他们为了信仰而表现出英勇精神，真不愧是十九世纪殉道者的子孙。这次的大流亡，完全改写了天主教徒在越南分布的情形，过去是北多于南，20世纪的五十年代以后，南越的天主教徒增加为一百五十万，北越的天主教徒则大大的减少，只剩下了八十多万人。

中南半岛上的缅甸、泰国、寮国与高棉这四个国家，虽然有着种种的不同，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佛教国家，佛教已深入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融为一体了。政府虽然依照法律给了人民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们却不容易接受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派，所以在这些国家，天主教徒很少，其中最多的是泰国，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五左右，其他的三个国家，则仅仅只有千分之一到一点五左右。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大都是来自中国或越南的侨民，以及一些不信佛教的少数土著民族。中南半岛最下端的马来西亚，在16世纪，葡萄牙人东来，也带来了传教士。东亚的宗徒圣方济沙勿略就曾经好多次停留在麻六甲传教。在马来西亚，阻碍传教工作的，不是佛教徒而是回教徒，因为半岛上的马来人都信奉回教，在这儿的天主教徒大都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20世纪中大概有16万人。在马来四亚南方的，是印度尼西亚，在殖民时期称为东印度群岛。圣方济沙勿略也曾到过印尼的某些群岛，但是自从荷兰人占领那些岛屿之后，基督教喀尔文教派，便把天主教在16世纪以来的传教成果给终结了。一直要到19世纪，才再重新开始。起初进展很慢，当传教士逐年增加以后，传教事业才蓬勃发展起来，由1928年的二十七万五千，到1960年代增加到了—百四十万人。在印尼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为回教徒，是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国家，大约等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总和。早在12世纪时已经传入印尼，而且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也比较缓和，国家的基本信条不是回教而是五个原则，最主要的是信仰一神，和彼此互助，在这样的原则，他们并不排斥其他少数人的宗教，反而被看成是国家构成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助力，而且天主教的学校最多，进入天主教学校的，也最踊跃，而且印尼政府还津贴教会学校，天主教学校也的确给印尼造就了不少优秀而又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由于神职人员不敷所需，相对的造成了教会进步的缓慢，一方面是外国传教士的入境受到严格的限制，而本国籍的神父，只有一千人，这在当时将—亿人口的印尼而言，怎么够呢？

与印尼岛国相接的是菲律群岛，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天主教徒，在全亚洲而言，是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在16世纪殖民帝国竞争的时代，西班牙的探险家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了菲律中部的一个小岛，福音也就由西班牙人移植到了菲律宾。二、三十年的工夫，便传遍了大部份地区，所以19、20世纪传教工作的重点放在归化深山中的落后部族。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西班牙战败，把菲律宾割让给美国，美国的殖民政策大大的阻碍了天主教的进展，因为美国政府派到菲律宾的教育官，世俗化的思想观念非常浓厚，经常反对天主教会，基督教乘隙而入，抓住这个美国占领菲律的机会而大量的涌入；此外，另一个阻力是，一个名叫“阿格利帕”的神，组织了一个异端教会，取名叫做“菲律宾独立教会”，短短的几年之内吸收了一百多万人。1941年，日本侵占了菲律宾，除了德国和义大利籍的神父之外，其他的外籍传教士，全被关进了集中营，传教工作在战争期间遭受了莫大的损失。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菲律宾就获得了独立，教会也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因为菲律宾人的

宗教性本来就深，而且依照传统，忠实的追随着，宗教节目完全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齐。菲律宾也和拉丁美洲一样，宗教教育接受的太少，只是领了洗而已，原因呢？也是因为神职人员太少，不够分配，神职人员中的半数是本地籍，连外籍传教士在内共三千人，平均每人需要照顾八千七百名教友，为了提高宗教教育的水平，使一般的教友都能多明白一些教义，这样一年年的过去了，天主教已经有了显然的进步。菲律宾，势必要为天主教在远东的发展担负起重要的角色呢！

1831年，教廷传信部邀请巴黎外方传教会，能够重新开始日本的传教工作。但是这项邀请没有能够马上实行，因为17、18两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采取锁国政策闭关自守，也严厉禁止外人入境日本。传教士除了学习日本话作好准备工作之外，可以说是一筹莫展，只好耐心的在靠近日本南方的冲绳岛上，等待时机的到来。在冲绳岛上十年之间只付洗了两个人。1853年22年以后，日本终于和西方列强签订了条约，开始通商，传教士进入日本还要等到1859年以后。贝第让神父在长崎建造了一座圣堂，特别敬礼在1597年殉道的29位殉道者，这座圣堂被指定暂时归于外交使节的使用，因为传教士们认为在17世纪，长崎这地方虽然有50万教友，但经过那么惨酷的教难以后，教友们必然早已散去，对能否找到教友们的后代子孙，完全不抱任何希望。谁知道，在1865年3月17日举行开堂典礼的那天，竟然来了一群日本人，以奇异的步伐跟随着贝第让神父，有一个妇人先开口问神父说：“我们的心同你们一样啊！”随后又问：“圣母玛利亚的祭台在哪里？”第二天，又来了另一群人，甚至还惊动了警察。到了5月15日左右，又出现了上千人，但是，他们在态度上仍然表现出不信任，不知道神父是属于那个派的，又再问神父说：“您没有子女吗？您是不是服从罗马教宗？您也敬礼救主之母玛利亚吗？”等到神父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后，他们立刻喜形于色，完全的信赖贝第让神父。这些日本人，正是十七世纪老教友们的后代子孙，虽然没有神父，他们仍然给孩子们付洗，传给他们重要的信德的道理。不久之后，便有上万的教友后代在教堂出现，再同教会结合起来。当这个令人感动的好消息，传到教宗碧岳九世那儿时，他高兴得流下泪来，于是就委任贝第让神父担任教廷驻日本的宗座代牧。日本政府得知从地下冒出了这个上万人的教友团体，大为紧张，立刻声明禁教的法令仍然有效，于是威胁、放逐、禁闭……等等，想尽了各种方法要使这群教友背教，但是终归无效。因为在1873年西方的外交使节团出面干涉，禁教的法令才被取消，坐监的也放了回来。但是，从1865年到1873年之间，已经有两千教友死了，虽然如此，在1873年的年底，教友的人数增加到一万五千人，还有29位神父。1884年，明治天皇，推动维新改革，颁布了日本第一部宪法，准许信教自由，也准许教会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于是天主教便开办学校，不过进展得相当的慢。当1891年良十三世建立教会圣统制。日本只有四万五千名教友，1947年时增加到了11万人，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政教已经分离，但是一般百姓总还是认为，神道教建基于效忠皇室，对国家也无条件地效忠，这一点是无法和天主教的教义相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以后，虽不再有这种困难，但是原子炸弹落在长崎，杀害了8千教友，日本天皇下诏否认了天皇的神性，往日的体制全部崩溃，在人心混乱和国家观念失败所留下的真空，天主教关怀、同情日本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使日本人民开始向往天主教，给日本招来了许多传教士，但是并没有出现大批大批的皈依圣教会的迹象，反而是因著近年来科技和经济的进步、财富的增加和生活的舒适，因而有利于唯物思想。不过天主教会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却能随着稳定的步伐，每年都有近万人领洗1960年，教友人数超过30万，教会已在日本扎下了稳固的基础。

接着介绍朝鲜半岛在19、20世纪中的传教事业。由普通教友开始的朝鲜教会，从一开始就遭受到流血的考验，这些考验延长了一个世纪之久。所以，研究朝鲜天主教历史的人都这么说：朝鲜天主教会的历史是由神父和教友们的鲜血所写成的。1801年，由北京派去朝鲜，教导那儿的初期教友的中国神父周雅各，与三百位朝鲜教友殉道而死，从此以后，不再

有神父，但是教友本身自组的团体，却仰赖着教友们本身的虔诚，以及传教员的热诚，才使教会保存下来。1812年，他们曾经上书给教宗碧岳七世，请求教宗为他们派遣传教士，当时碧岳七世正被拿破仑掳去，而未能满足这群朝鲜教友们的期望，以后又上书给教宗良十二世，教宗就委托巴黎外方传教会去设法办理，但是朝鲜的禁教仍然没有放松，传教士只能冒险偷渡。1835年第一位宗座代牧是从中国起身前去的，但是他在入境之前就已经身心交瘁而死，其他两位同会的神父，则偷渡成功了，随后新任命的宗座代牧伊伯特主教也成功的进入朝鲜，教会在的他们的领导之下便壮大起来。1839年教难又再变本加厉，许多教友被逮捕而且受到刑处，神父也遭到通缉。宗座代牧伊伯特是第一个被逮捕的，他以为如果神父自动去投案，教难就会停止，于是就命令他的两位神父去自首，两位神父果然就听命前往自首，这真是善牧为羊群舍命的壮烈行为，他们受到了种种酷刑之后，和自己的主教一同被斩首而殉道。6年以后，另外一位主教和一位在澳门读书晋升神父的朝鲜神父金安德进入朝鲜，可惜金安德神父在回到自己祖国的第二年便被逮捕，他和许多教友在1846年被处死，1925年，教宗碧岳11世把1839年和1846年两次教难中殉道的79位列入真福品，其括了金安德神父。

朝鲜的传教工作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是教友人数却是有增无减。1866年一次更有计划、更加惨酷的教难正在如火如荼雷厉风行，教友的人已经增加到了两万多人，两位主教，七位神父被捕处死，教友方面遭到彻底的搜查，以便集体处决，几乎半数以上的教友被杀，或则是逃到山里，有的是冻死了、还有的饿死了。一直到1884年，教会才获自由。就从1884年开始，教会不停的在进步，1905年，日本并吞朝鲜以后，企图把他们的神道教介绍给朝鲜，不过并没有阻止天主教。新的传教士，包括了本笃会、玛利诺会、圣高隆邦会的会士，都先后派会士到朝鲜来加强阵容。根据1940年的统计，朝鲜的教友人数是20万，本地籍的神父有139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朝鲜带来了新的困难。1945年朝鲜以北纬38度被一分为二，北朝鲜已由共产党支配，南朝鲜则参加由美国所领导的民主阵营。1950年，北朝鲜侵入南朝鲜，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已经有好多位神父被逮。1953年终于国际间的联军的努力，迫使北朝鲜停战，停战以后的调查和统计，被杀害的、失踪的、死于囚禁的共有88位，其中有宗座代表，另外还有31位修女和25位辅理修士，北朝鲜没有一位神父能自由，在那儿，天主教的公开生活已经完全被取缔。圣教会在南朝鲜努力减轻人民的极度贫困，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死里逃生之后，对生命的意义自然便要重新估计，凡是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教会都能给他满意的解答。所以从1953年以来，无论社会的优秀份子或是一般大众，向往天主教的越来越多，就只是1957到1958年一年之间，受洗的就有六万一千人，根据1966年的统计，南朝鲜的两千九百万人口当中，教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七十万人，一般教友对传教的热忱，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祖先对开教的热诚，本地神父的人数也相当的，这一切对传教都有很大的贡献。

3.4.8 总结

下面，我愿意对传教工作做一个总结。几乎两千年以前，耶稣基督曾吩咐他的宗徒们说：你们到普天下去，给所有的受造物宣传福音。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60年代的一百五十年之间，传教士的努力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福音是否真的已经如同耶稣基督所期望的，传到了所有的民族了吗？1951年教宗碧岳十二世，他在福音的《宣传者》通谕中，曾经公布了一项统计，1926年有四百个传教区，教友的总数是一千五百万，几乎所有传教区的领袖都是外国传教士，25年后，传教区超过了六百个，教友人数达到两千八百万，已经有88个教区，移交给本籍神职管理。也从那时候开始，新的进步也有所记载，自从亚洲的许多国家加入共产党阵容以后，非洲传教事业的发展，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天主教在非洲近代百多年之间所造成的形势，已经能够和初期教会时代，在罗马帝国内三个世纪所造成的形势相媲美了。自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天主教的大公无私才充份的表现出来。出生在亚、

非两洲的本地主教已经有一百六十多位，他们和东正教的主教们，也参加了大公会议，这种场面，无论是谁看了都会又感动又高兴的，可见，教会绝对不单是西方或白种人的教会，圣教会的大公，不再只是一种许诺而已，而且已经成为铁的事实。那么传音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吗？我们只能说不但没有，而且还适得其反，甚至还应该说，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世人比以往反而更多了呢！那就是说，当我们的教友人数在增加时，我们可别忘了世界人口的数字在比例上也不断的大大的增加著。20 世纪初叶以来，人口同物质进步的速度，尤其是医药卫生进步的速度，也同样越来越快。1880 年世界人口是十三亿两千五百万，天主教教友则是两亿一千一百万。1964 年时，世界人口已经超出了三十亿，而天主教徒的人数是五亿七千五百万，如果把东正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合在一起则是十亿左右，然而尚有 20 亿人口还没有信仰基督。在非洲教友数字的增长在近代传教史上，算是惊人的，但教友与人口的比例也只是 1: 5，而且皈依的人越多，新生教会的困难也越大，神父太少，又得照顾日益增加的教友，又得向同样一直在增加的外教人传福音。在占了世界人口一半的亚洲，除了菲律宾之外，教友的人数只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一。从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福音传播的速度，已经是历年来最快的了，但是我们还无法看出，什么时候才能让普天下完全皈依。在将来的岁月，教友的人数与世界人口的比例还会再下降呢！我们教友应当体认到这个事实，将我们传播福音的热诚，付诸行动才是，在圣神，在耶稣基内，我们期望普世万民都明认主耶稣基督，并在 内都能合而为一，共成一牧一栈。

3.5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3.5.1 若望二十三世的序幕

教宗碧岳十二世于 1958 年 10 月去逝，全世界的枢机们于 10 月 25 日聚集在罗马，召开秘密会议，准备选举新的教宗。到了第三天，枢机们终于完成选举，一位被指定的枢机，照例出现在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阳台上，向等候了三天的教友们宣布选举的结果说：“我各位带来了一个喜乐欢欣的好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位新的教宗，他就是隆嘉礼枢机，他取名若望二十三世。”碧岳十二世又瘦又高，若望二十三世呢？则是又矮又胖，他们两位的身世，也有强烈的对比。碧岳十二世是罗马贵族出身，而若望二十三世则是和圣碧岳十世一样，出身于意大利北部，子女众多、生活又清贫的农家。若望二十三世身体健壮，虽然当选教宗时已经高龄 77 岁，但是精力充沛，不过，枢机们选了高龄 77 岁的他当教宗，自然的说明了他任在位不会太长久。当时曾传出这样的话，碧岳十二世长期在位之后，若望二十三世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教宗罢了！强人之后，也需要一位小人物、小角色来缓冲一下，而若望二十三世的谦逊朴实，很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和看法，他要以其那令人愉快的微笑和众人共知的幽默感，使教会放得比较有弹性，以便能大事发挥。很少有人料到，正是这样的一位教宗，要发动这一世纪，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要任在他的任内，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但是当若望二十三世回忆说：“自从他晋升铎品到他膺选为教宗的五十八个年头的日子，能清楚的看出来，他的一生力就是天主在冥冥中早就安排好了，是为召开这次大公会议而准备好的人选。”他刚念完神学，就被任命为他的故乡柏尔卡摩总主教的秘书，他连续十年之久，分担着总主教的操心和工作，也参加了牧灵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随营司铎的身份，在战场和医院中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学会了爱护士兵，尤其是受伤的士兵，不论他们是属于交战国的哪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先后在保加利亚，然后在土耳其，接着在希腊做了 20 年的宗座代表，因而对东正教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的心中产生了热切的希望，愿意为所有的基督徒的合而为一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混乱期间，奉派出使法国，成为教廷驻法国大使，操练外交的本领，最后升任意大利威尼斯的宗主教，正好可以发挥他

那牧灵和治理教会的天赋能力。在他所担任过的所有职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表现了擅长于“和事佬”的个性，他虽然在，当天主的教会利益受到损害时，会发发脾气，但是他宁愿和解，也不愿意纷争。他那慈祥、朴实和细腻的仁爱，赢得了众人的心，无论是上至国家元首或是最为贫穷的，或是常被遗忘的人都喜欢、敬重他。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 1958 年 10 月 27 日被选为教宗碧岳十二世的继承者，也同时介绍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被选为教宗以前的种种工作，说到他的性格，人人称他是“和事佬”，他宁愿和解而不愿纷争，他有牧灵、有治理教会的天才。在他当选教宗登基以后，发挥着他的天赋能力。下面我们来听听 77 岁的他，是如何的不服、绝不认命只当过渡期的教宗就罢休的种种划时代的作为，他要把天主教会领向那儿去呢？好几个世纪以来，教宗的四周便显得讲排场，甚至有时候得太过分了，若望二十三世却一变而为朴实谦逊的作风。他真正做到了名符其实的“天主的众仆之仆”，许多已经不合时代的排扬和繁文缛节，逐渐被取消。他以咏唱信经代替了教宗进入圣伯多禄大教堂时，对教宗的欢呼，他宁愿步行也不愿意高高的坐在轿子上，被侍卫人员抬着进圣伯多禄大教堂；梵蒂冈宫廷内，只要他认为不合适，他就毫不迟疑的加以革新。打从三个世纪以前，就是定下枢机的人数，固定是 70 位，若望二十三世便加以突破，从此以后，枢机的人数就不断的增加，到目前 90 年代，枢机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一百位，而且已快接近一百五十位了，而升任非洲的黑人为枢机，就是他的创举；他还在东亚的菲律宾升任马尼拉的总主教柯道斯为枢机，这就是菲律宾的第一位枢机。若望二十三世在他登基以后的三个月，也就是 1959 年的 1 月 25 日，他在圣伯多禄大堂，为结束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一项典礼，向全世界宣布说，他有意要召开大公会议，在那天典礼当中，他还公开要求在场参加典礼的人，为他所昵称的“伟大的中国”念了一端玫瑰经，这真是我们中国教会的福份啊！

当礼节结束时，他召集御前会议的 18 位枢机开会，交给了他们三种草案，一个是罗马教区会议，一个是大公会议，一个是重修教会法典。最最使人吃惊的是第二个草案，这 18 位枢机，以极度的惊奇的心情接受下来，好奇的是，这位已经 77 岁的老人家，到底要玩什么花样？要立下什么丰功伟业呢？召开大公会议这件事，是令谁也想不到的，不但是因为它出自一位，被人们认为是过渡期的教宗，而且是来势突然，更是因为自四百年前“特力腾大公会议”以来，只开过一次大公会议，那就是 1870 年所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就在这次会议，宣布了教宗不能错误的神权。从此以后，就有许多人，连天主教会内的许多人也不例外，认为已经没有再开大公会议的必要了。既然教宗能单独决定，又何必要有召集全球各地的主教们开会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更何况从 1870 年以来的 90 多年间，圣教会并未再面临任何真正的异端，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变故，又何必惊动整个教会呢？这项大事的宣布，未免使人惊奇，连教宗本人也觉得奇怪，他自己事后承认，想要召开大公会议的想法，并不是出自多次的默想深思的结果，乃是一种不曾料到的意外冲动，就好像是预报春天来临的一朵早开的花一样，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认为那是圣神的灵感。那么召开大公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若望二十三世希望这次会议没有任何对象需要谴责，他要的是一种实用性的会议，而非宣布教义。教宗为了说明这会议的性质而惯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提出来讨论。”他曾经借训词、广播词、通谕、宗座法令、公函以及国务院的函件等，各种机会强调这次大公会议应该是，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在民主与共产阵营等各种纷扰与骚动之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为唤醒人类切实行动的一种重要而有力量贡献，是为促进教会生机，增进信德及改善风俗至为重要的时机，是为教会全面革新的发展。大公会议也应该是，福音在全世界崭新而有力的发扬，更应该是天主对圣教会大显仁慈的象征。教宗还把他之所以要召开大公会议的目的归纳为八点。

第一，为了要弘扬信德并且要重整教友的生活，修订教会的纪律，好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 第二， 为了使世界人类看到天主教会的永久的生命力与真理。
- 第三， 教会先把过去的面孔扫除净尽，对分离的弟兄显示出一种更吸引他的面孔，使他们看到这种景象，认为是对他们诚恳的邀请，要为共成一栈，同属一牧的事铺路，因为这种合一，正是耶稣基督向天主圣父所热切祈求的。
- 第四， 为了加强神职人员的圣化生活、增进教友的德行，并且给一切为信德及和平而努力的人一种鼓励。
- 第五， 要使众人知道，梵二大公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使圣教会在各种不同礼仪所放出的异彩上，在各种不同型式的工作上，在他不可分离的统一上，获得新生活力，好能完成神圣的使命。
- 第六， 希望梵二大公会议能发生效力，使圣教会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主耶稣所建立的。
- 第七， 使大公会议成为一种促进世界和平，有效而重要的助力。
- 第八， 最后一点，对大公会议所怀的希望是信德、教义、教会纪律，使教会及灵修生活产生新的朝气，并且使圣教会于重申有关推进国民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公教原则，那么梵二大公会议要成为一种伟大的助力。

我们回溯一下，从上届大公会议以来所有的变化，实在是要比从教会成立以来到梵二开幕时所有的变化还要大。汽车的发明还没有一百年，飞机和无线电广播的也才刚 60 年，太空飞行还不到十年，电的利用也不过一个世纪，原子的运用也才 20 来，以前的世界很安定，进化得很慢，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进步越来越快的世界，这种情势，自然也就要求教会有同样的越来越快的适应。这一切进化的原动就是科技文明的进步，在各方面把生活、工作以及商业的都大大的改变，使得现代人类普遍的希望过更舒适的、更享受的生活。人类的寿命延长，人口增加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科技改变了物质生活，也改变了思想的方式。过去，人类靠传统而生活，现在呢？是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所提供的新闻及活动而生活。当然，社会生活也跟着不断的在变，乡村人口拥向大都市，使得都市人口不断的增加，人与人、国与国互相依存的关系也日渐密切，人文的一致性也越来越紧缩，这原本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进步之中也显露出许多的矛盾。这是世界团结的时代，但是也同时是国家主义抬头兴旺的时代，是容忍、自由、民主和摆脱的时代，但是也同时是暴力、洗脑的心理酷刑，极权和变相奴役的时代，旧有的社会伦理也不断的在分崩离析，至于圣教会本身又如何呢？就它的情势而言呢，也很奇特，她的活力、她的声望也都比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要高出很多，也是在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各地的传教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而那些老教友国家的热心，又有领导能力的教友与圣教会的关系更为的密切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着大批大批的群众与教会的关系有着疏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当时全世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无神主义的政府底下，割断了与教会之间的接触，这也就是梵二大公会议，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时代背景，这样的科技文化，进步固然是进步，但是也失去了平衡。教会一方面接受这些进步和变化，但是还有神圣的使命，那就是要如何将现代文明予以净化圣化，朝向基督化，而不让它变质呢？这正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所以要召开梵二大公会议灵感。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召集大公会议以前，乘《新事》通谕 70 周年之便，在他那《慈母与导师》的通谕，已谈到社会生活的几个严重问题，最使人惊奇的是，其中的人情味。凡是阅读这份通谕的，在《慈母与导师》通谕中找不到什么抽象的理论，教宗所重视的是人，他是理解和同情的心怀来研究人的问题，教宗在慈母与导师通谕的第一部份，提示了前任教宗良十三世、碧岳十一世、十二世对这方面的问题所给的教训，然后就以简明的语气，提出了时势演变所要求的正确性和补救的方法，使人体位到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教宗，是以多么适切而热烈的爱心，来谈论现代农民的地位和问题。最后，教宗触及到当代最为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在经济已经发展的国家和经济正在发展的国家之间的问题，经济已经开发的国家，已经在享受高度的生活水平，正在发展的国家，则受着严重的物质缺乏之苦。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对营养不足的民族人人有责，他因此呼吁国际之间的合作，就如教宗良十三世在 1891 年，曾保护无辜受贫困的无产阶级群众，若望二十三世也同样替现在被逼处于恶劣情势的民众辩护。在慈母与导师通谕中，显示了作者的人格，他那牧灵的热诚和乐观，不但教友，连所有善意的人，都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下面呢，我就简略的介绍一下，梵二大公会议筹备的经过。打从 1959 年 1 月 25 日，教宗在罗马城郊外的圣保禄宗徒大殿的本笃会会院，向在场的枢机们第一次透露，要召集一次大公会议的愿望以后，在当年的五月中，大公会议的初步筹备委员会正式的成立，由教廷国务卿达第尼枢机担任主席，教廷的各部次长为委员，征询全球的主教团、各教会大学和教廷各圣部对大会的建议。6 月 29 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宗座这份通谕中指示了大会的目的是发扬信义、整顿教化、革新纪律。6 月 30 日教宗亲自主持第一次初步筹备委员会会议，发出了两千七百封问卷。10 月底，筹备委员会主席达第尼枢机主持记者招待会，预告这次要召开的大公会议要称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且预估整个筹备工作，需要三年的时间，大会内的公开语言是拉丁语文，需要的时候可以用翻译。并且说明将要召开的大会，并不以使各个分离的教会合而为一作为直接对象，各个分离教会的代表，或是政府的首长，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到了 1960 年的五月底，教宗在御前会议之后，向全体枢机表示大会的初步筹备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开始进入正式的筹备阶段，全球两千多位主教，60 多所教会大学，以及教廷各部门，都已经答复了所征询的问卷，这些资料，都已经列入档案，作为筹备的主要参考。

1960 年的 6 月的“圣神降临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颁布《上天授意》手谕，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将这次大会正式定名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成立神学、行政、纪律、修会、圣事、礼仪、教育、东方礼、传教、教友生活等十个筹备委员会；还成立了新闻处，各基督徒合一联络处以及大会经济技术处等三个秘书处；此外，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秘书处，各组的主席、秘书、委员及顾问全都由教宗亲自任命，78 岁高龄的教宗，亲自担纲，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这一个正式而又庞大的筹备委员会，总共有 715 位成员，其中包括了 49 位枢机、222 位主教、176 位教区司铎，261 位修会会士，还有 7 位教友。咱中国有三位，一位是田耕莘枢机主教，他是 49 位中央委员中的一位，第二位是罗光总主教，他是传教组的委员，第三位是施森道神父，他是顾问。以后正式筹备委员会把初步委员会时所收集来的全球主教、教廷各圣部以及宗座大学的建议，由中央秘书处出版，定名为《梵蒂冈大公会议初步筹备文献》。就只初步文献而言，中央秘书处将它们按照地区及职务分别装订成四卷 15 册，总共 9520 页，那么，您就可以想见，全球各地对大公会议的支持和响应的程度是多么的热烈。中央秘书处把其中来自全球各地的问卷装订了八册，将这八册的内容加以分门别类，缩编为提案，总共缩编草拟了 8972 件提案，共有 1549 页。从初步筹备数据，已经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梵二大公会议的伟大场面，以及各地教会的实力所在。下面，我再特别介绍这是当时全亚洲 229 位主教的建议，就中国而言，有 55 位主教的建议，但是中国本籍主教的建议仅有“田”枢机和“袁”主教两个人而已，根据查询，牛会卿主教，没有能够按期收到中央秘书处的问卷，而台北教区的郭若石总主教的建议则被单独的列为台湾岛的建议，又把一位越南主教的建议列入中国之数，可见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对中国的情形还相当模糊不清。1960 年的 11 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正式的筹备委员会开幕，七百多位筹备委员及顾问，由世界各地聚集到罗马，开始工作。分配工作之后，居留在罗马以外的委员们，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地方分工作，以后他们曾多次按期到罗马参加筹备会。1960 年的 12 月 2 日，英国国教，也就是圣公会的首席主教菲雪尔访问教宗，已经分离了四百多年的两个教会，有了初次的接触。从 1961 年开始，筹备的工作更是紧锣密鼓，在 1 月 5 日，教宗亲自视察了中央秘书处，2 月 2 日教宗亲自祝圣了大批圣蜡，分别赠送到世

界各国的首都，每一个国家三支，两支为该国首都中最古老而又严格的男女修会，另外一支则由当地的主教指定受赠的人选，使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都点燃起为大会祈祷的热忱。从2月开始，教宗亲自主持不同组别的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从6月12到6月19日之间，教宗亲自主持了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在梵蒂冈召开的筹备会，他说：“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解决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到了当年11月7日到17日，教宗又召开了第二次的中央委员会筹备会，同年的圣诞节，教宗还在百忙中抽空发表了名为《人类救赎》的宗座诏书，昭告天下将于1962年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一个两千多人共聚一堂，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没有长时间而又细心的筹备，也就不可以获得预期的结果，经过三年半的繁重工作，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表了取名为《推动》的上谕，正式的向全世界发表梵二大公会议开幕的日期，大会决定在1962年的十月十一日为天主之母瞻礼日。这不但是天主教所渴望的盛举，也是全人类寄望最深切而一致瞩目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主教们，自从接到教宗的训令以后，都在兢兢业业的准备着参与这世纪当中时代性的集会。

3.5.2 梵二大公会议的开幕

1962年的10月1日，这个富有历史性的日子终于来到，在前一夜都还大雨滂沱，谁知，经过一夜的风啸，把雨云打散了，到了当天清晨，天是那么的明亮，地面也已经干燥，这一切正是吉祥之兆。在梵蒂冈教宗的国土上，有史以来，第一次聚集了这么多的主教，一时之间，红袂穿梭，东西流荡，蔚为人潮，好壮观啊！当时的伯多禄大教堂外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好几万人的教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都是赶来参观这终身难逢的盛大典礼。大家都鸦雀无声的等待着，在群众的宁静缄默中，那超然的宗教气氛更显得浓厚而虔诚，这种神圣的氛围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真是肃穆得令人起敬起畏。上午九点，教宗在圣保禄小教堂朝拜圣体以后，梵蒂冈的歌咏团就高唱“万福光耀海星”这首柔美而动人心弦的圣母颂歌，主教团也跟着唱这首圣母歌的诗节部分，为的是祈求圣母玛利亚的光照，向着真理的顶点走去，就在这时候，主教团的行列便开始从教廷宫殿的紫色铜门中走出来，在瑞士卫队的开导下，经过伯多禄大广场慢慢的向伯多禄大殿内大会会场走去，但是走在最前面的是教宗所御封的爵士和骑士队伍，跟在后面的是所有宗座大学的校长，教廷内的讲师及理事，各修会的总会长，大公会议的筹备委员，梵蒂冈的音乐导师，教廷事务员及秉印大臣、圣礼部、圣职部、其后是十字架、吊炉和辅礼生，接着的是主教团，入场和秩序是修院院长，主教、总主教、首席主教、宗主教、枢机主教、教廷的各圣部的部长，最后才是教宗的御座，由八个侍卫人员抬着，教宗身穿白衣，头戴金冠，一路上举手祝福着两旁的观众，教宗经过会场往祭台走上去，全体与会者都起立向教宗致敬。

应邀前来观察的各种宗教的代表们，都被安排在教宗宝座的斜对面的观礼台上，和外交团的代表们合座，教宗进入大会会场后，脱去了宗座的高冠，登上正祭台的礼座，开始咏唱祈求圣神降临，于是全体会场上的与会者，跟随着管风琴节奏，接着咏唱圣神降临的诗歌，唱完之后，就由枢机院的首席蒂赛朗枢机奉献开幕弥撒，祈求天主圣神赏赐圣教会特殊圣宠与光照，使参加大会的主教们，为这次大会多作贡献。弥撒以后，教宗接受了枢机团向他所表达的服从及信德的宣誓，然后由大会秘书长朗读主教向教宗宣誓服从及信德的誓词，全体主教随和着宣读着，这一片诚挚的宣誓声，许多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泪。主教们宣誓之后，由教宗领导全体大会会员恭唱圣人列品祷文。祷文唱完之后，按照每次大公会议的惯例，再由东方礼的主教，用东方礼举行祈祷，他们的祈祷词是希腊文，这种作法的目的，是在表示大公会议是东西合一的，虽然礼仪上有区别，但是只属于一个宗教，共同为拯救人类而宣扬真理。最后由教宗致开幕词，教宗的开幕词，着实令人感动。教宗致完开幕词后，也就是开幕典礼结束的时候了，遵照惯例，他施放全大赦和宗座遐福，然后教宗吩咐大会的秘书长上台宣布，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日期及时间，最后教宗换下礼服，跪在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墓前，祈祷片刻之后，离开去了。半小时之后，教宗又出现在他办公室的窗口，给广场上的群众祝

福，还带着笑容风趣地说：“欢迎并谢谢你们没有被邀请而自动前来的各位”，于是广上响起了振耳的掌声和哈哈声响彻云霄，教宗觉得自己的幽默，惹得大家快乐，所以他自己也接着捧腹大笑，随后就在窗口消失了。

历届的大公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多人，有投票权的大会会员应该是两千九百零八位，当然，有的年事太高、有的健康欠佳、或其他政治情势而未能参加，不过每次出席的人数平均都在两千两百人左右。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这样完美的表现了圣教会的普遍大公，不但是足以代表东方教会的宗主教和主教们全体出席，其中安底约基亚的宗主教马克丝·穆斯四世，虽然已是 85 岁高龄，却曾发表了数次卓越的演讲；而且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不但有传教的主教，而且还有好几位本国籍枢机和主教，代表东亚和非洲的黑人出席了大公会议。教宗为了使主教们更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讨论，他就不出席一般的讨论会，只以电视追随着，很审慎的领导着议程，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些僵持不下的情况，他才会出面斡旋，也有许多普通教友列席，只不过没有投票权而已。在第一期会议期间，教宗曾经以他个人的名义，邀请了法国哲学大师和作家钱桂顿列席参加，随后保禄六世也请了另外十个教友，以旁听者的身份列席人，以后每一期会议，旁听者的人数也随着增加，从第三期开会时，就有女性列席参加，在大会闭幕，共计有 46 位男性女性列席旁听，此外，也是从第三期会议的中途，有 36 位本堂神父和 10 位修女，也应邀参加，甚至还有好几位教友，其中的一位还是非洲人，有几位本堂神父，还曾经应邀在大会中发表言论，代表分离教会的观察员也应邀参加。

在历史上的历届大公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都应该严格的保守秘密，但是，万万想不到这次大会竟然能面对全世界，公开的讨论教会内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怕被没有足够的能力人误解，再是为了避免大会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在大会开幕，也曾经有过要保守秘密的规定，但是经验很快的便证明了，在这个已经到处充斥着新闻报纸、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大众传播工具的世纪，简直是无法保守秘密。因此，从第二期会议开始，大会便取消了保密的要求，反而在每一次会议之后，便把简要的消息，主动的告知新闻记者，因此，世界各地的舆论，每天都能注视着大会的过程和变化，这也足以显示世界各地的人都一致的关心这件世界大事。

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我们已谈到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圣神的灵感下，宣布要召开已经停了 92 年未曾召开的大公会议，他申明这次大公会议的性质和目的，我也把三年多的筹备工作，作过不少的报导。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还把开幕当天的情形，作了报导。下面就该深入报导会议进行的情形，在过去历届的大公会议，都是针对一定的问题而召开的。并且早已经事先划分好了讨论时，所应遵循的步骤，而这次的梵二大公会议却不相同了，因为它的目的是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提出来讨论”。在筹备期间所收集来的大批资料已经过各个小组委员会的综合整理，增删、修改、合并成为讨论的基础，各种不同的资料，已经汇集了 70 种草案，数据仍嫌太多，而且系统仍然不够清晰，对这样庞大的项目如何着手？如何运用？在两千多人的会议中，怎么样能让每一位与会者都有发言的自由，而又能避免长篇大论、喋喋不休的危险呢？否则，会议的时间无法控制而不断的延长下去，这是事先应该加以防范的，而且对显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又如何加以答复？这些问题，令许多会员们所担心的。教宗自己也曾想，为了避免上面所谈到的问题，就应该有所行动，终于会找到应该遵循的途径，他本人先选了一个开会讨论的主题，那就是《礼仪草案》。礼仪正是一个最实际的课题，似乎不致于遭遇到困难而引起争辩和反对，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很快的便发现到到问题的最深处，因为势必触及教义的问题，例如，主教们的权限、教友在教会所处的地位等等，所幸有孟狄尼枢机，他就是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他和比利时的丝南枢机引导议题的讨论，使光明逐渐的展现出来，把许多认为混淆不清的问题，归并为决定性的程序，大会应准许教会借信德的光明，确定它的性质和使命，另一方面也应认定，革

新的教会与今天的世界及其重大的问题，要如何应付？例如信仰的自由、和平、贫穷与饥饿以及人身的尊严等等，这也正是大公会议的深刻灵感，让教会先说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再去与教会以外的人相谈，这是给此后的各期工作指定方向的两个关键。梵二大公会议从 1962 年 10 月 11 日开幕之后到该年的 12 月 8 日闭幕，这两个月的会议，我们称它是第一期会议。这一期并没有批准通过任何一项公文，按照教宗本人的预计，梵二决不可能两、三年内可以结束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继续领导大会的艰巨工作，并在休会的期间，继续在小组委员内工作，此外教宗还择空撰写了取名为《和平在大地》的通谕，在 1963 年 4 月公诸于世。这道通谕竟然一反惯例，并不只以教会内的人为对象，而是向全世界的人所写的一封公开信，向所有的充满了善心善意的人所发表的一篇谈话，所使用的言词相当的简明，在这篇《和平在大地》的通谕中，他说：“全世界所希望的和平，应该要以真理作基础，以正义为规范，以爱为动力，以自由作为养成之所。”还没有一位教宗，在全球各地，引起过那么一致、那么有力的反应。这一道通谕，仿佛是教宗的遗嘱，因为那时候的他，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几乎无法饮食。他的生命延长到五月底，群医已经束手无，回天乏术了，全世界的人都以激动的心情关注着他的弥留。教宗，他已经赢得了众人的心，不分种族或信仰，几乎人人都爱戴他，在他弥留的最后几天，他强忍着痛苦，为大公会议的成功，和人类的和平奉献了他的生命，他对环绕在他病床前的人友爱有加，一直为世界的大问题祈祷着。1963 年 6 月 30 日，当无数的群众正聚集在伯多禄大殿前，参加为教宗所举行的弥撒时，这位以“善良的教宗若望”而永留史册的老人家，便安然的去逝了。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又七个月，但是他已经结出了百倍的果实。每位教宗的去逝都受到普世教友的哀悼，而他，若望二十三世却被基督教、东正教、犹太人以及无信仰的人同声哀悼，全世界一致的由衷的分担着罗马教会的悲伤！我们的一位分离的弟兄 奈德纳宗主教，曾用福音上的话贴在教宗身上说：“曾有一人，是天主派遣来的，他名叫若望。”召开大公会议的教宗去逝了，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按照教会的法典，主教们如果不与教会的有形领袖教宗联合在一起，就不能组成大公会议，教宗一去逝，会议马上停止，继任的教宗有重开，或是断然关闭的自由。在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谁会占上风呢？到底是深怕若望二十三世所发动的革新运动的人？还是对大公会议怀着无限希望的人呢？谁会继承若望二十三世的职位呢？

3.5.3 保禄六世的继任

6 月 21 日，选出了若翰·孟狄尼为教宗，他取名为保禄六世，当时人便晓得了教宗若望的事业，决不至中断了。因为，孟狄尼枢机早已表示，他希望能够亲眼看见大会圆满的闭幕。新教宗保禄六世，也与若望二十三世一样生于意大利的北部。对他而言，天主早已经把他准备好了，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直到 20 岁那年，身体才完全康复，基于这个因素，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他恬静、温顺、冷淡的个性。1920 年他开始参加梵蒂冈的外交工作，从驻华沙教廷公使做起，一直升到教廷国务院的国务卿，成为教宗碧岳十二世得力的助手。外交占据了生命，从 1923 年到 1954 年先后长达 30 年之久，而这 30 年来的外交经验，使他懂得如何容忍、拖延等待一个更适当的机会，自由和容忍成为他主要的性格，可是他决不是一个弱者，当他面对原则时、当他必须在自由与强权之间有所取舍时，他是坚强的、彻底的，甚至必要的时候，他不怕大胆行动。1924 年 1933 年之间，他一方面是梵蒂冈国务院的助理，而另一面他又是意大利天主教学生的总指导神父，也就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当时变动社会的漩涡。他目睹当时法西斯暴行，不管是站在教会立场，或是自由的立场，都促使他起来领导反抗法西斯的压迫。由于他的思想前进、行动激烈，终于被迫辞去了学生指导神父的职务。二次大战后，意大利另一股极权势力起来，极右的法西斯党跨了台，极左的共产党抬头，可是孟狄尼依然不折不扣的坚持着他一贯的原则和立场，像反法西斯一样的反共。作为一个主管内政事务的国务卿，他以教会方面的全部力量，在 1948 年，意大利有决定性的选举中，支持基督徒民主党，反对意大利共产党，这件事使他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因此，孟狄尼也就成

了共产党的眼中钉。1954 年底，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工业重镇米兰教区的总主教，米兰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大本营。1955 年 1 月 6 日他坐火车前往米兰，而米兰的共产党早已磨拳擦掌准备好要对付孟狄尼，他们说：“让这个小小个来，他将会看到我们的颜色。”孟狄尼接受了这份挑战，他到了米兰以后所受到的欢呼，远远超出那群共产党的想象，这位一向恬静的教廷外交官，像旋风一样的到处视导，在工人、人、工厂……之间奔波，他协助米兰的商人，解决工人的生活、改善当地的教育、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访问了米兰的共产党区，米兰人尊称他是“工人的总主教”，即使是终身的共产党，也一再的跪在他面前，亲吻着他手指上所戴的权戒。孟狄尼一直是意大利天主教自由集团的领袖。

1958 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去逝后，他已被认为是教宗的可以人选之一。在若望二十三世在位的四年多，孟狄尼声望更是蒸蒸日上，很多迹象显示。若望二十三世一直希望孟狄尼能做他的继承者。无论如何，在 1962 年秋，第一期大会举行期间，孟狄尼是住在梵镇的少数枢机之一，而且他也曾循例主持庆祝若望二十三世就职四周年纪念的庆祝弥撒，同时在若望教宗弥留时，陪同他的兄弟和妹妹进入病房。若望教宗在去逝的前两天，最后一次接见在罗马的枢机们，亲口向孟狄尼说：“我把教会、把大公会议以及世界的和平，委托给你。”若望二十三世一死，孟狄尼这位超越教会前进派和保守派的自由集团领袖，自然而然的在众望所归之下，登上了教宗的宝座。保禄六世上台后，立刻宣布继续“若望路线”，继续召开大公会议，他也要为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基督徒的合一而努力工作。保禄六世先后主持了后三期的大公会议，每一期会议的时间大概都有两个多月。至于我们不要认为这次大公会议的主教们一到达罗马，进入会场后，便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听到后就会立刻就会一致同意，得到结论。我们知道，圣教会对信条，固然是命令所有的子女全心信服，但针对其他的问题，却有着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几乎在讨论在所有的讨论题材上，经常有争辩，有时候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希望革神、有的又深怕图谋革新能危害到信德，给异端说敞开方便之门的保守派。不过，无论是革新派或是保守派，都是热心的卫护真理和圣教会的益处。每一位与会者都全力以赴的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有对立的争执，但是都同意修改条文，有时候却会把原来的提案修改得面目全非，可以说已经完改变了。我们须要知道的则是：“大会的议决案，几乎都是全体与会的主教们一致通过的，这也证明已经获得了全教会的同意。”我就为各位举些例子，有关现代教会的文件，就是以两千一百一十票对四十四票通过的；再一个例子是，大公会议领袖们通过了一项首创先例的文件，那就是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数百年以来，信仰基督的信徒彼此之间的分裂，不能说一点责任也不负，他们以两千零五十一票对五十七票通过，对于基督信徒的社会之间的歧见表示惋惜。大公会议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全球各地、各国、各民族，无论东方礼或是拉丁礼都聚在一起对质，在私下接触和全体会议时一样，大家交换意见，彼此询问，都能增长自己的见闻。有些主教的知识，以前只限于自己的教区和国家，这次的会议使他们有机会认识了其他各洲的问题，拓宽了他们对世界的眼界，也更加的体会到，自己原来是属于整个儿教会的一份，以及对全世界传布福音的责任。教宗保禄六世凭他丰富的行政经验、外交经验领导后三期的会议，总共通过了四个宪章、九个法令和三项宣言，总共 16 个文件及其附属文件，以及会议闭幕时全体与会者的《告世界书》。

3.5.4 会议的内容概要

这一节内容特别介绍梵二大公会议所议决通过的四大宪章、九个法令和三项宣言，这 16 个文件的名称，在这些冗长的文献中主要的几点是，一切都向着教会的中心思想集中，大会基本的文献是在 1964 年 11 月 21 日公布的教会宪章《万民之光》。它给教会本身的性质下了定义，就如一个人，虽然不晓得生物学的规律，但是也能够生活得很健康，同样的，圣教会对自身的性质没有思考之前，也已经生活了好久而且逐渐壮大起来。神学家们，尤其是在基督教分裂改教以后，对这方面的思考和分析，深深的下了一番功夫，基督教推翻了教

会的圣统组织，否认教宗的首脑地位，不承认教会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天主教的神学家，以圣伯拉明为首，曾经努力的反驳那些错误，并且提出证明，证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有形的教会，它在世上的领袖就是继承伯多禄宗徒之长职位的罗马主教，这是一种必要的响应，但是因为强调了这一项真理，以致于把教会无形的，然而却同样基本而重要的另一面过分的忽视，以致于使它显得晦暗不明了。梵一大公会议，已经开始辩论关于教会本身的道理，但是，因为政局的关系，使得大会未能充份的准备，便因“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匆匆结束了它的工作，只是把有关教宗的那部份中，只把确定他不能错误的“神权”这一章加以讨论，投票通过而已，对于主教的部份，正是为了说明教宗不能错误的的神权所不可缺少的，却没有时间加以讨论，以至于形成了教宗本身的神权特别的突出。而主教们的职务和地位，似乎是被淹没消失掉了。这次梵二大公会议，将教会的问题作了一个通盘的处理，确定了正确的比例，教会宪章提示教会，诸事之先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为我们而言，常显得神秘，为正确的描写教会是谁？大会的主教们引用了圣经的各种象征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牧栈、是羊群、是天主的葡萄园、是基督的神妙身体，对梵一大公会议所确定的道理没有削减一分一毫，只不过是把主教的职务加以充份的说明罢了！”主教由祝圣礼领受了司祭的完满职位，以及教诲、圣化治理的权柄，主教虽然能在他自己的教区内行使这些权力，但是，教宗仍然有权力加以限制。此外，同教宗联合在一起的主教团，能够对全教会行使最高权力，这项最高的权力，固然以隆重的方式在大公会议中使用，但是当教宗批准主教们的联合行动时，也能由教宗和散居在全球的主教们加以使用。梵二大公会议为了落实并实践这个原则，产生了两个新的机构，一个是主教会议，就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主教们共同开会，商讨有关该国或该地区的问题；另外一个为教宗保禄六世所建立的主教咨议会，开会时，由教宗或他委派的代表出席，为的是协助教宗行使教宗应行的职权，而咨议会的会员，大部份由各地主教团开会选举，在1967年9月份于罗马开了第一次主教咨议会。在梵二大公会议中，有了一项新的决定，那就是恢复了六品制，在梵二以前，六品已经由习惯而只成了迈向司铎圣秩的一种过程而已了。由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主教们的要求，梵二决定恢复六品成为一种永久性的阶级，各地方的主教可以开会决定，为了教友的好处，制定六品制，然后请求教宗的批准就可以实行。六品可以付给已婚的成年教友，或付给有志的未婚青年，但是若在未婚时领了六品，就得终身保持独身。六品职务是些什么呢？这种永久六品的职务包括了，给人付洗、送圣体、以教会的名义给人证婚、讲道、领导教友行敬礼和祈祷、最后可以为丧家主持丧葬礼。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梵二公布最早的一个宪章，那就是礼仪宪章，它早在1964年的12月4日公布的。从礼仪宪章开宗明义的诸言：“神圣公会议，既然计划日渐加强信友的基督化生活，使可以改变的制度更适应现代的需要，促进一切有利于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巩固一切召叫众人加入教会的途径，因而自信改革发展礼仪，亦为其务，”看来礼仪宪章是革新礼仪的宪章，或则更好说，是把行使拉丁礼仪的教会已经废弛的古礼，再加以恢复实行。礼仪宪章的原则是要领导教友更完善的、更主动的参加礼仪，同时要使礼仪能适应地方的情形和各民族的心理。当礼仪宪章公布以后，根本不需要各地教会领导人的倡导敦促，新的礼仪就在各地普遍的实行起来。最最使教友们兴奋的，就是在各种礼仪中，使用自己本国本地的语言，由此可见，梵二礼仪宪章的从善如流了。不过还有其他的改革，比方说：恢复了古代教会的共祭，也就是两位或两位以上的神父围绕着一个祭台，用同一个圣爵，在同一个时间举行弥撒感恩祭，这一点，更能表现司祭圣秩的单一性。还有呢？在特殊的情形，准许教友既领圣体又同时领圣血，这也是在恢复古代教会的礼仪。在拉丁礼仪的教会内，直到梵二大公会议，只有神父能领圣血。其实在古代教会，教友们都是兼领圣体圣血的，反而是东方希腊礼的教会，一直都保存了兼领圣体圣血的传统习俗，不过，圣教会一直都坚信饼、酒二形，并没有把耶稣的圣体分开，无论是饼或酒二形，都是完整的耶稣。在西方拉丁礼的教会分开

单领圣体的习俗，则是在 12 世纪到 14 世纪时才流行开来。为什么要分开只领圣体而不领圣血呢？当时，只不过是对于一个实际的理由。因为只领圣体的话，既方便、干净而利落，也为节省时间而已。到了 15 世纪，有“胡斯派”的异端，妄言为了救灵魂，兼领圣体圣血是必要的。这种该法是不正确的，是个很大的错误，为了避免袒护这种错误，1415 年的康斯坦恩大公会议，以及 1562 年的特力腾大公会议，才不让教友领圣血了。梵二礼仪宪章作了这项改革，让教友再度能够兼领圣体圣血，并没有改变教义，只是认为，15 世纪以来的“胡斯派”邪说所带给教友的危机已经不存在了。自从特力腾大公会议以来，教会普遍的现象就是，大权越来越集中在宗座一人，而且在拉丁礼仪的罗马教会内，纪律和礼仪也力求统一和一致性。这次梵二大公会议推翻了这种倾向，像是教会宪章，恢复了主教的权力、创立了主教团会议，尤其是礼仪宪章，在世界各地各民族建立了活泼的礼仪，使礼仪更加的多元化而又不抵触信仰的一致，使得整个教会各地的精神振奋起来。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是为了革新教会而不是为重复已经规定的事情。不过千万别误以为因着梵二所作的改革，教会从此以后就跟以往完全不同了。但事实上，绝不会是这样的，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教会，在根本上常是一样，梵二并不是要把以往的一切抛掉，只是要使我们的教会更符合福音，并且更按照福音去生活而已。

梵二大公会议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给教会以外所有的人，敞开了沟通商谈的大门。以前几乎所有的会议，目的都是在针对异端邪说、针对一些错误的道理加以谴责，而梵二的会议，真的是遵照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愿望，未曾谴责任何人，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商谈沟通精神的会议，转向外界开放教会的大门，邀请所有不是她子女的人来与她商谈。梵二通过公布了所谓的《大公主义法令》。首先邀请那些对基督有共同信仰，与罗马天主教相当接近的分离弟兄，然后邀请那些至少与她共同相信有一位全能天主的人，也就是说，教会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所应该抱持的态度。在《大公主义法令》中，不提彼此的不同，而是要寻找彼此可以接近之处，也就是在异中求同，大公主义法令中说：“天主教绝不摒弃任何宗教所在的真理与神圣性，却是由衷的尊重各种宗教行动与生活的诸般措施，以及他们的规律与理论，虽那些观点及训诲，与我们天主教所抱持的、和所教的不同，但是，也往往提供了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商谈的条件是，每一个人能随从他良心的呼声，这也就是《宗教自由宣言》了。”而真正最为人所周知的文献，恐怕应该是充满喜乐与期望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了》。这个宪章是梵二会议第四期会议举行闭幕弥撒的前一天，也就是 1965 年 2 月 7 日才宣布的最后一个宪章。根据这个宪章的绪言上说的：“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是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凡属于全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教会是由团结在基督内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走向天父之国的旅途上，由圣神所领导，并接受了向全人类宣报福音的使命，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职务之故，大公会议在深加探讨了教会的奥迹之后，不单独向教会的子女及信仰基督者致辞，而且也毫不犹豫地向整个人类讲话，以期阐明教会寄居并活动于现代世界的意义。”

从这一段话，这个宪章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各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变化之后，证明出，人类尊严的基础，是因为人类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创造，并由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宪章中还分析了无神主义的原因，证明这个世界既然能毁灭，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完结，决不在于它本身。但是，教友们也决对不可因为期待来生，便不关心这现实世界的林林总总，反而应当振作精神去加以研究。因为虽然现代世界上的进步，与基督神国的进展不同，但是为天主的却有很大的帮助。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第二部份，在福音和人类经验的光照下，提醒人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特别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类的关系很大，那就是婚姻、家庭、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平。最后这宪章号召大家互相沟通，商谈合作的可行性，以达到建立世界和平的目标。

环绕在梵二大公会议会场四周，看一看、听一听，教宗保禄六世在 1964、65 两年的会期间做了些什么事，来印证实践大公会议的要求。当他对大会宣布说，他有意到印度的孟买，参加 1964 年 12 月在那儿举行的国际圣体大会时，使得与会的大会会员莫不感到惊讶。在 1964 年的年初，保禄六世曾经亲自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这也是两千年来第一位离开欧洲的教宗，是伯多禄的继承人去当年耶稣基督生活与受难的圣地，然而这次去印度，却是到一个信教教友还算很少数的国家，必然会遭到某些国家的批评与不满。但是实际上教宗深深知道，印度人是世界上对宗教非常虔诚的民族，他们认为教宗要到印度去作客，是他们印度人的无上光荣，而当教宗保禄六世一下飞机，就去巡视城里面最贫陋的街道，不只是千万天主教友和政府首长，连所有的印度百姓都给他以印度史上空前的欢迎，民众热烈的程度真是始料所未及。据估计有一百万各种信仰的人夹道欢呼，历久不衰，全国都热情沸腾了起来，这也是印度人对献身于神明的人最传统的虔诚。在 1965 年的 10 月 4，教宗保禄六世应联合国的邀请去到美国纽约联合国组织所在地，当面会见全球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与他们会商。今天人类所关心的种种问题，怎么样才能避免战争确保和平呢？在 10 月 5 月，他就赶回罗马，向大公会议发表声明说：“和平的使命，从来没有向一个更高尚，我们可以说也更爱听的议会传达过，教会显示了她的本来面目，这面目就是天主世人之间的中介，这种中介的角色，可以把人类最深的希望向天主传达，由言语到行动的时间已经来到，从此以后，我们应该更多注意穷人，因为物质分配的不均是乱源，而且还可引发战争，这种对世界上的不公和贫穷的注意，催促著有信德的人去多做爱德的服务工作，不但在大会中讨论，还要同世界各民族及一切宗教信仰中怀有善意的人，促进社交和精神上的来往。”也正是这一个同样的思想，启发了保禄六世要成立一个永久的机构，名叫“无信仰者的秘书处”。他委任维也纳主教科尼担任第一位任主席。我们知道，这种商谈是非常的困难，有时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教会既然已经受命，向所有的受造物宣传福音，必然是要求教会去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好能将真理也传达给不信天主的群众。

3.5.5 大公主义

梵二大公会议与大公主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给大会指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准备实现基督的愿望“一个牧人、一个羊栈”。如果有人相信这个所渴望的日子已经临近，那真是幻想，但是，自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了他的计划的那天开始，可以说已经在这条路上迈进了好大、好大的一步，这一点、一点都不容怀疑。若望二十三世的伟大人格及他那不平凡的慈祥，他那对人的敏感和广泛的理解能力，以及他对东方教会的认识，都大大的有助于创造彼此信任的气氛，这些都是促使彼此接近和来往的先决条件。召开大公会议的预告，也唤起了非天主教徒的最大兴趣。为了便利于彼此的接触和来往，若望二十三世在 1960 年成立了一个永久的机构，名字叫做“合一秘书处”。从机构的名字，已经说明了这个机构的近目的，是协助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观察梵二大公会议的工作；而更广大深远的目的，是要协助所有的基督徒走向合一，这再一次的证明了若望二十三世的经验丰富，善于组织。同时他更委任了最合适的人选，伯雅枢机担任这机构的秘书长。伯雅枢机，曾经担任教宗碧岳十二世的告解司铎，而若望二十三世本人半年前刚升他为枢机，实在是不能再有更恰当的人选，而且大家都知道，16 世纪的改教运动，造成了基督信徒的一再分裂，正有这种说法说：“基督徒是因为对圣经的看法而分裂，那么现在基督徒也只有再借圣经而重新聚首，在圣经内走向合。”这真像是对伯雅枢机的一个预言。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曾在罗马担任了 30 年的圣经学教授，他已经准备好而且最适当不过，去同基督教的神学家分离弟兄开始商谈。伯雅枢机精通多种语言，他那丰富的经验，使得他对这份工作应付自如，尤其是他那敏捷的理解力和坦率豪侠的性格，再加上他那正确而又果决的断能力，使他成了大会中最受欢迎的演说家。他虽然已经 80 岁，但是他的活力仍然充沛，他以“合一的大使”为己任，在周游欧洲各国时，对大公运动曾作过多次演讲，他与分裂教会的领袖们也有过不少的接触，因着伯雅枢机

的活力和 若望二十三世所赢得的普遍友谊与尊敬，产生了非常和协的气氛，其中最明显的表示就是，英国国教派的坎特布里总主教兼安立甘教会的首长斐舍尔博士，在 1960 年 12 月 2 日亲自来到罗马晋谒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虽然申明是以私人的身份来作礼貌性的拜访，而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减低了它的重要性。自从四百多年前分手以来，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安立甘教会的首长来罗马见教宗，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呢？而在当时，谁又能想到五年以后的 1966 年 3 月 23 日，斐舍尔博士的继承人拉姆塞博士，竟然也来到罗马，拜访了若望二十三世的继承人保禄六世呢？更何况拉姆塞博士，他是安立甘教会代表的资格作正式的访问，当然，这还不算是合一，最重要的阻碍仍然存在着，不过至少在爱德内的商谈之门已经是敞开，僵局已经打破，接著就有许多基督教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陆续造访教宗，教廷也派遣观察员去参加“普世基督教协会”。尤其 1961 年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所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

在大公会议正式筹备会中，讨论到是否邀请分离的弟兄，尤其是两个最大的集团，基督教和东正教呢？如果他们被邀请，那么他们是以怎么样的身份来参加呢？这些问题都与大公运动有着关联。当然，不能邀请分离的教会代表来参加大会的讨论。并且在邀请作观察员之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罗马教廷愿意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邀请，而事情也似乎令人费解，东正教对信仰、对教会的观念，都比基督教派更同天主教接近，但是，事实上与基督教交谈，却远比同东正教交谈要来得容易。普世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中的几个大教派，都派遣了观察员，若望二十三世还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了许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出席了大会。

同东正教之间的交谈相当的困难，1961 年所有东正教会在希腊的罗得斯岛集合，他们决定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却出了许多难题。因为东正教有的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内、有的在民主地区，更何况还有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的竞争问题。君士坦丁堡享有精神领袖的荣誉，号称“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奈德纳是东正教最高权力的象徵，因此罗马的请柬便寄给了奈德纳，然而莫斯科的宗主教是拥有教徒最多的一个教会，他不承认君士坦丁堡的首席地位，而争取第二罗马的名衔。本来奈德纳全心接受罗马的邀请，但是直到大会的前夕，莫斯科方面始终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君士坦丁堡的奈德纳因为不愿意破坏罗得斯岛会议所议决：“行动一致的协定”，便拒绝了罗马的邀请。不料两天以后，也就是大会开会的第二天，莫斯科的宗主教所派出的两位观察员却抵达罗马成为不速之客，给大会平添了很大的喜庆，然而，君士坦丁堡方面却感觉到不是滋味。好在，事情并不是无可挽救，因为在第三期大会时，所有东正教会除了希腊之外，都派遣了观察员。会议的第一期只有 49 位观察员，到第四期大会闭幕，观察员的人数增加到 103 位。许多人以为开大会，只是把教廷所准备的草案稍加修饰批准通过而已。那里料到竟然是自由讨论，人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观察员自然不能参加公开讨论，但是私下却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有不少的小组和主教们，去向他们请教咨询他们的意见，无疑的，因为他们的在场，大会在公开讨论问题，多少有些顾忌，免伤感情。在会开会期间，有两个突发事件，使天主教与东正教的接触和来往大有帮助。第一个突发事件就是，教宗保禄六世亲自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第二个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双方都同意撤消双方开除教籍的法令。现在，我把这两个突发事件作深入作说明。我们先讲教宗保禄六世去到耶路撒冷朝圣这件历史性的的大事。这是自从教宗碧岳七世于 1809 年被拿破仑俘虏以来，经过了 160 年之后再有教宗离开义大利的国境。1964 年的 1 月 4 日到 6 日，“伯多禄的继承者”返回到当年伯多禄宗徒之长，起身到外邦去传教的地方，去到耶稣基督诞生成长和受难的地方伯利恒、纳匝肋、加里肋亚湖边和耶路撒冷。教宗在他所经过的两个国家，约旦和以色列，他曾经受到最殷勤的欢迎和招待，约旦国王胡笙和以色列的总统夏莎都在教宗抵达该国国境时，亲自去欢迎致候，但是最令人感动的是，群众们如醉如狂的兴奋，他们冲破了警察的一切封锁，为的是要接近教宗，以至于预先安排的礼节和演讲都无法举行，我想，教宗的演讲都无法比得上群众的兴奋更为有声有色的了。

无论是阿拉伯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基督的信徒也罢、阿拉伯的信徒也罢，莫不争先恐后的想要一睹这位罗马教宗，“纳匝肋耶稣”的代表的丰采为荣。当教宗一宣布要去耶路撒冷的计划，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奈德纳便高兴的宣称：“这真是由天主来的临感！”奈德纳也立刻回应说，他本人要亲自到耶路撒冷去会见教宗。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相互拥抱的，那张他们两位拥抱的历史性照片，随着大众传播工具，传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这样会见和拥抱已经隔了 500 年。1439 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约瑟曾经往义大利的佛罗伦斯参加大公会议，并且曾经与希腊人共同签署了“合一”的协定，但是当时并没有合一的诚心，成见也好，怨仇也罢，也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合一”的签定只是一份公文，并没有认真去实行。而这次东西教会的领袖在耶撒冷相互见面，互相拥抱却正好相反，虽然双方都明知为全面的合一还有很大的阻碍，但是双方在心灵上已然接近，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双方会因主耶稣之名，合而为一的。

从若望二十三世宣布要召开大公会议开始，就一直努力的要实现耶稣吩咐的“让众人都合而为一，共同成为一个羊栈、一个牧人”的愿望。在筹备会中，成立了“合一秘书处”，以伯雅枢机为秘书长，伯雅枢机也以合一大使为己任。在 1960 年开始与基督教之间已经打开了僵局，基督教、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相互拜访，这些分离的弟兄们也派出了观察员参与了大公会议，从第一期的 49 位观察员到最后一期开会，已经有 103 位。在大公会议期间，发生了两件突发事件，一件就是教宗保禄六世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在耶路撒冷，500 年不曾交往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奈德纳和西方天主教的罗马教宗，在耶路撒冷历史性的会晤了，双方热烈真诚的拥抱在一齐，因著圣教会努力的自承过去的分裂，有自身该负的责任，发出邀请坦诚交谈在大公主义合一运动中，跨出历史性的一大步，双方先后相互消除了成见和仇怨，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和好行动又更往前迈步。东正教为了回应主教的大公主义合一运动，便在 1965 年 12 月 7 日，也就是梵二大公会议闭幕的前夕，双方教会在和解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双方同意取消那份在 900 年前所造成的东西双方教会决定性分裂的“绝罚令”，教宗保禄六世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在宗主教奈德纳和议会面前宣读了共同声明取消“绝罚令”。同时，一个以梅里东为首的东正教代表团来到罗马，在圣伯多禄大殿，参加了由教宗和 20 多位主教所举行的弥撒圣祭，在礼仪中，梅里东宗主教宣读了同样的声明，虽为双方都公认彼此的分裂，并没有因为相互取消“绝罚令”而结束，但是，在共同声明中双方都承认：“这是双方谅解的诚恳表示，并共同邀请，在彼此信任、尊重和相互的友爱下，彼此进行商谈，期望能够仰赖天主，促使双方在信德和友爱的完美共融中生活，这也原本是东西教会，在他们历史的最初一千年，早已存在的现象。”在这份文献宣读完后，教宗保禄六世和梅里东宗主教相互亲抱，大会会员报以激动而热烈的掌声。我们站在这段和平与谅解的历史过程，希望使教会长期悲伤的分裂早日结束，这一天要到何时才能到来呢？谁也无法预言，因为双方之间的阻碍仍然很大，不过，有一件事实是可以确认的，也就是从 1054 年开始的塞鲁来裂教和马丁路德的改教以来，东正教和基督教走上了他们彼此并同天主教越来越远的道路，自从若望二十三世即位后，他们这两教已对天主教向著辐合的道路迈进了。我们对完全实践耶稣说的：“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的愿望”，已经可以寄以坚强的希望，让我们继续祈求天主，让我们都在他的圣名下都合而为一，让这一天早日来到吧！

3.5.6 梵二大公会议的总结

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给圣教会打开了新的里程碑，实在是教会在 20 世纪中最重要的大事。随着大会所公布的 16 个文献，近 30 年来，各项革新工作一直都在蓬勃的展开，以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使我们深切的体验到，天主圣神的临在，圣神的风吹遍了整个教会。这些年来，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梵二大公会议的文献，尤其是四大宪章，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大公会议的确发挥了启发性的、先知性的、指导性的意义，例如，教会活力的增加、教会对现代人类发展及社会问题的关怀、礼仪生活的革新、教友传教组织及工作

的普遍展开、牧灵工作的革新、地方教会的建设等重大现象，都说明教会在适应现代人类及当地文化的需要，使福音能继续发扬光大，所表现的苦心好大好深，相信在天主圣神的领导和推动，这一番苦心必定会迅速的结出丰富的果实。

结语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接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在田地里所撒下的小小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不少的帝国倾覆，许多的文化也被摧毁消失了，而我们的圣教会经历了这些危机，虽然遭受了无数的痛苦，却能够依然屹立不摇，我们的教会虽然常是在可被毁灭的文化中，然而教会却世代代的传达著耶稣基督永世不灭的天国喜讯。

教会在成立之后，便面对了选择与挑战。耶稣身为犹太人，他的第一批信徒也都是忠于“梅瑟法律”的犹太人，那么教会仍然要保持只属于犹太人的教会吗？教会是否要成为犹太教中的某一派吗？是否要收录外邦人呢？迟疑并不长久，圣保禄毅然决定了选择的路线，圣伯多禄也批准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教会不再有犹太人或希腊人、文明的人或野蛮的人、自由的或是被奴役的分别，人人都同样被召叫成为天主的子女。教会摆脱了梅瑟法律的羁绊而成长起来，在罗马帝国中发展著，然而福音的观念，有不少与罗马文化的基础是相抵触的，信友拒绝崇拜皇帝，不承认他为良心的、至上的主宰，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教难，教友们英勇战胜了迫害者暴力，造就了不少的殉道圣人、圣女。君士坦丁大帝给了教会自由，使教会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成长发展起来。蛮族的入侵，使希腊、罗马的世界崩溃，蛮族征服了罗马帝，而教会却教化蛮族，并且使他们接受了福音。接著是回教徒的入侵，淹没了北非的教会，也阻止了教会继续向东方发展，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与西罗马的教会，很不幸的越走越远，终于在 1054 断然脱离罗马。

西方中古时代的教会，在文化上达到了最高峰，教友的生活也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在教会的领导下，创立了大学，在建筑、在艺术上大有成就，出现了许多圣人和圣师，像圣方济、圣道明、圣文都拉、圣多玛斯。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15、16 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印刷术的发明等，使整个中古欧洲越来越独立自主，互相争雄，使得借中古封建制度的关系所建立的教会团体逐渐分崩离析。西方大分裂，几乎认不清那一位才是圣伯多禄宗徒的真正继承人，因而大大的减低了教宗的权威，人的思想也大为改变，来世的永生和今世的幸福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像教宗尼古拉五世等有心之士，想要把文艺复兴运动纳入正轨，这个颇具危险的大胆尝试，往往只是矫枉过正，有不少人受到了异教思想的传染，导致了道德的堕落而教宗尼古拉五世的继位者，又纠缠在俗事之中，虽然维持了信德未受损伤，但是，对自己神圣的使命，只是聊以塞责而已，对全世界所期待的教会内部革新未能采取主动，于是有马丁路德的奋起，可惜他未能做到革新，反而煽起了宗教的叛离，使北欧的大部份同罗马分离了。其实，当时的天主教已经在从事革新，古老的修会在重新整顿，新的也正在创立，传教士也随着探险家的脚步去新发现的地区，开创一个接一个的传教区。教会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中，更加确定了教义，锐意于纪律的革新。大批的圣人，有教宗、主教、修会的创立人或重振者，努力的将特力腾的议决案付诸实行，使教会得以重振。

不料近代文明又形成一股思想的溯流，他们所攻击的竟然是教会的本身，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坚持要把它建立在科学上，想要消除一切神秘。教会来自启示的真理被阴险地攻击着，竟把启示的真理列为古老的传奇小说，有人相信进步是无止境的，人的本性是彻

底善良的，长久被压制的冲动应当给以解放，服尔泰和卢骚自称是这种新福音的先知，不料却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浩劫，革命的浪潮冲击着被人视为显然摇摇欲坠的教会。拿破仑失败后，浪潮逐渐消退，这时候人们很惊奇的发现，教会竟然屹立不摇，教会作了唯理派的轻亲和讥讽嘲笑的目标，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又一次的证明了教会的生命力，虽教会在物质上显得贫困了，但是教会却以更大的毅力，负起了对远方的传教事业，在这个工业的新时代，走在世界的前面。一位天才型的教宗良十三世，对他所处的时代有广泛的理解，良十三世为了使教会的信理适应新的时代，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在混乱的时期，早早看出来，极权政府的诞生和世界性的大战争。碧岳十一世和十二世，把教宗的声望提升得很高，20世纪开始，整个世界又一次的改变面貌，新的科技、新的传播方法，改变了生活的方式，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与改变的速度越来越快，人类借着新科技似乎能改造自然进入太空，人类借着资本与产品，不断的创造财富、累积财富。但是，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是两极化的现象：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贫富悬殊的偏差、武力与强权的竞争、种族与宗的冲突……等等，还有随时都可以引发毁灭性的核子大战，似乎在许多人的心中，虔诚的不安消散，形成了不是不信神的，就是对宗教的冷漠和不关心。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上，我们似乎感觉不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我们相处得太近，反而视而不见。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真知灼见，看出了新时代来临的标志，教会应改善自己的组织和办法，好能适合社会的新组织和需要；教会该给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线光明；教会该给个人和民族间向往更大的正义与和平的人，指出应走的道路；教会对寻求合一的基督徒，无论他们属那一个教派，教会应该有所答覆。若望二十三世这位被视为是过渡期的温文和善的老人，竟然有那么远大的眼光与惊人的毅力，宣布要召开大公会议，教会借着大公会议，在分离的弟兄和全世界人类的面前，给自己下了定义，改革了信友的礼仪生活，与分离的弟兄们、与非基督徒，至是无神论者，大胆的敞开了商谈沟通的大门。梵二大公会议在教会历史上，也像特力腾大公会议一样，为教会开创新的局面。将来的史学家必有公正客观的评价，因为会议不是终点而是起点。30年来，我们已经经验得到我们天主教的面目逐渐彰显出来，将好像一棵枝叶繁茂的树，过了每一个冬季之后，必然要结新的果子，暴风雨能够摧残它，枝叶能够枯萎掉落，冬去春来，新芽又再繁茂，仍然是原来的那棵大树。

同样的，教会两千年来经历了无数的变化，却仍然是那个建立在伯多禄盘石之上的教会，因为她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已经许下了“我同你们天天在一齐，一直到今世的终结。”